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ADVENTURE CAPITALIST 风险投资家 环球游记

THE ULTIMATE INVESTOR'S ROAD TRIP

[美] 吉姆·罗杰斯 著

凌建平 胡利平 译

跟随投资骑士的环球之旅，探寻人生财富之源



上海人民出版社

ADVENTURE CAPITAL

风险投资家 环球游记

THE ULTIMATE INVESTOR'S ROAD TRIP

[美] 吉姆·罗杰斯 著

凌建平 胡利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7054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险投资家环球游记/(美)罗杰斯(Rogers, J.)

著;凌建平,胡利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书名原文:Adventure Capitalist: The Ultimate
Investor's Road Trip

ISBN 7-208-05152-6

I. 风... II. ①罗... ②凌... ③胡...

III. 投资-概况-世界 IV. F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3409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装帧设计 王晓阳

风险投资家环球游记

[美]吉姆·罗杰斯 著

凌建平 胡利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75 插页 2 字数 296,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208-05152-6/F·1158

定价 32.00 元

献给此书出版后即将出生的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平生干的最冒险的一件事。希望她永远勇于探索,质疑,了解真正的世界。

中文版序

1999年1月1日我们从冰岛启程驾车环游地球时，不知是否能生还。我们打算用三年的时间，从1999年到2001年开车周游116个国家，行程24.5万公里。但这会很难，甚至不可能。当时我们十分兴奋，如果成功的话，这会是一次了不起的历险，而且会受益匪浅。后来我们穿过战火纷飞的地区、热带雨林和沙漠，经历了暴风雪和肆虐的流行病，但从未起过打道回府的念头。

我们比较了到过的116个国家后，对中国情有独钟。我已三次开车穿越中国，每次玩得都十分开心。我很想定居上海。上海正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的城市。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但21世纪将属于中国。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可以感受到创业精神。中国正在走向世界。

2003年5月30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她有一个来自北京的中国保姆，已经开始教她中文。凌对我们的女儿只讲中文。因为我和我夫人非常喜爱中国，她更喜欢讲中文，而不是英文。

和其他新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也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例如，中国需要使本国货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不过一切会水到渠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最迟到2007年，人民币将成为可兑换货币。人们不必担心。别忘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期间，也曾遭遇过重大的挫折。

2004年或2005年，中国很可能会受挫。中国政府正在设法冷却过热的经济，而且一定能达到目的。也许事情会做过头，导致经济冷却过度，甚至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诸位不必担心。如果你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看到“中国动荡”的字眼，那是再次购买中国股票和期货的信号。

我们去过的国家中，崛起的很多，衰落的也不少。我在书里会分析解

释它们兴衰的原因。读者可以从我的网站(WWW.JIMROGERS.COM)上获取更多的信息。

例如,俄罗斯始终是一场灾难。今后几十年里,这场灾难会愈演愈烈。俄罗斯动荡期间,西伯利亚已经出现了真空。西伯利亚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一缺劳动力,二无资本。劳动力充沛的中国需要自然资源,资本雄厚的日本同样需要资源。中国的劳动力和日本的资本将流入西伯利亚,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填补出现的真空。西伯利亚将成为 21 世纪的新边疆。中国开放北部边疆地区有助于减轻改革开放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19 世纪美国发展时期,曾流行过一句话:“年轻人,到西部去!”因为去边疆可以创业,可以致富。今天的中国也是一样。姑娘小伙子们,到东北去!

我在书里还提到,中国和很多亚洲国家不久会面临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男人意识到男多女少后,妇女的地位会大幅上升。

我漫谈世界各国时,还阐述了日本、印度、欧洲、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而玻利维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秘鲁、缅甸和其他一些国家正在崛起。

进入 21 世纪后,我为自己的国家——美国——担忧。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纵观历史,任何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都经历过一场危机,甚至是全面危机。美国也不会例外。今天,美国的政治家夜郎自大,真的以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当然,美国仍然是一个大国,但无论从军事意义上讲,还是从财政意义上讲,都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不幸的是,美国无视现实,继续不自量力,结果只会加速自己的衰落。这是亘古不变的历史教训。

我的网站和这本书里,既有历险的经历,又有爱情故事,还有对第三个千年之交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口状况的分析。我讲述了今后如何投资,在哪里投资,还讨论了投资家如何思考投资问题,如何决定投资结构以及如何决策等问题。

你们在书里可以看到,我俩环游地球期间,险象丛生,困难重重,但兴趣丝毫未减。能活着回家实在出乎我们意料,因为在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从陆地上环游过地球。不过能生还还是挺让人开心的,毕竟外部世界

如此丰富多彩。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多出门走走，多了解了解世界。我已经两次驾车环游地球，沿途的见闻既有趣，又富有启迪意义。周游世界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国家，了解世界。出色的投资家需要了解世界。诸位有机会，一定要多到国外走走。中国再次鼓励本国公民出游。希望和诸位路上见。

吉姆·罗杰斯
写于纽约

中文
版
序

推 荐 序

2004年5月，吉姆·罗杰斯第三次来到中国，这位被誉为“投资骑士”的大师级人物分别在北京、上海、深圳和大连举行了巡回演讲，在中国投资界刮起了“罗杰斯旋风”。

其实，吉姆·罗杰斯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成为华尔街名人，而且名声并不比乔治·索罗斯小。1970年，罗杰斯与索罗斯共同创立量子基金。1970—1980年，在罗杰斯离开量子基金前的十年里，量子基金的年复合收益率高达37%，量子基金的资产升值了33.65倍，超过同期巴菲特的29%和彼得林奇的30%，创造出当时华尔街的赚钱神话。

10年后，吉姆·罗杰斯再次引起人们注意。1990年暮冬，罗杰斯开始了历时22个月的第一次环球旅行。他骑着摩托车共跨越了六大洲，到过五十多个国家，行程达6.5万英里，这一壮举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1999年1月1日，罗杰斯携未婚妻由冰岛出发开始了历时三年的第二次环球旅行。这一趟，他驾驶那辆著名的黄色奔驰跑车一共跑了116个国家，全程达15.2万英里，再次改写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本书是罗杰斯第二次环球游记(*Adventure Capitalist*)的中文全译本，该书2003年3月由美国兰登书屋正式出版，不到一个月即登上全美畅销书榜，赢得一片称赞。罗杰斯在书中以丰富的知识、独特的观察角度、诙谐幽默的口吻详细地记载了这次旅行的全过程。通过本书，读者不仅能够一窥罗杰斯独特的投资风格，而且可以跟着罗杰斯环绕世界“走”一圈，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概貌，并从中体会到罗杰斯是怎样将这些因素糅合在一起发现投资机会的。

1942年，罗杰斯出生在阿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市的乡下，1964年毕

推
荐
序

业于耶鲁大学，获哲学和政治学学位。并于1964—1966年就读于牛津大学，获经济学学位。毕业后曾入美国陆军服役。1968年，罗杰斯进入了华尔街，并于1970年同乔治·索罗斯共创量子基金。入行之初，罗杰斯兜里只有600美元，而当他1980年离开量子基金时，兜里的钱——1400万美元——足够他圆环游世界的梦想。那年罗杰斯37岁。此前，身为量子基金的创始人之一，罗杰斯负责分析全球范围的资本、原材料、商品及信息的流动情况。别人不去投资的，罗杰斯投了并赚了。他在全世界开发华尔街所忽略的各种金融商品的处女市场，敢为人所不为是罗杰斯成功的一大原因。

不过罗杰斯当初闯荡华尔街的初衷，也是他搞长期投资的初衷，却是投资行业里并不多见的——罗杰斯想周游世界，而且想看看其他人难得一见的世界。他坚信，只有到了别人未到之处，才能真正了解这个世界，才能发现新的投资机会。这正对应了我们祖先“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的古训。

罗杰斯在华尔街之所以成功，靠的就是他独特的审视世界的眼光。环球旅行既是冒险，也是不断求知的延续，使罗杰斯受益匪浅。他的见闻常常打破以往的定见，戳穿不实之说。

通过考察那些曾经辉煌过的国家或者城市的现状，罗杰斯认为，变革是国家繁荣强大的原动力，抵制变革的人是在螳臂当车。当今世界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帝国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保持开放，是一个国家繁荣的前提条件。公元10世纪之交，位于西班牙南部，有将近50万人口的科多巴也许是世界上最大、最富饶的城市。公元14世纪，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是一个文化和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昔日这两座城市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中国人或印度人，与他们和睦相处，没人排斥外国人。可以说，它们之所以繁荣，正是因为它们异彩纷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学者和商人慕名前来。20世纪的美国也是这样。但现在的美国，保护主义盛行，动辄采用制裁的单边主义手段来威胁其他国家，而实际上，制裁很少能起到作用，相反，制裁给美国造就了更多的敌人。作为一个美国人，罗杰斯对美国的前景深怀忧虑。他认为，美国的政治家夜郎自大，大多数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很少，甚至根本

不愿去了解。如果对其他国家不了解，就不可能了解自己的国家。环球旅行加深了罗杰斯的这种忧虑。

罗杰斯周游世界，到过 116 个国家，对中国青睐有加。他曾三次驱车环游中国，看到了中国的勃勃生机，并且爱上了这个国度。他说：“我很想定居上海。上海正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的城市。19 世纪属于英国，20 世纪属于美国，但 21 世纪将属于中国。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可以感受到创业精神。中国正在走向世界。”1999 年，罗杰斯走进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了 B 股账户，并且购买了大量股票。罗杰斯至今仍然攥着这些股票，一股也没抛。他看好中国，希望把这些股票当作遗产留给自己的女儿。

罗杰斯的环球旅行，可谓困难重重，常常身临险境，时刻面对挑战。在环球旅行的三年里，他差不多赶上了世界各地 30 场内战中的 15 场；他遭遇了暴风雪，穿越了丛林、沙漠和疫区。虽然历尽千难万险，但他从未想过回家，并且为自己前无古人的陆路旅行而自豪。

除了旅途历险，当然还有各国秀丽壮观的风光，这些都使罗杰斯异常兴奋。不过以他投资家的身份，罗杰斯也忘不了抓住时机、画龙点睛地大谈投资秘诀：趁市场低迷，人心浮动，价格低廉时，先人一步下手。即使你不是个精明人，只要在经济低迷时投资，经济好转后一定稳赚。要想狠狠赚上一笔的话，非得趁人心惶惶的时候投资。

罗杰斯告诫人们，不要拿自己的钱去冒险，永远都不要。成功的投资家的做事方法通常就是什么都不做，一直等到你看到钱就在那里摆着，就在墙角那里，你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走过去把钱拾起来。这就是投资之道。

人都会犯错误，罗杰斯也不例外。在纳米比亚，当罗杰斯以 500 美元购买了据说是价值 7 万美元的钻石并沾沾自喜后，却发现他买的不过是一堆玻璃。为此，他写到：“我本人曾无数次规劝过别人：除非自己对某个投资项目了解透彻，否则绝不要投资。我的信条是：我不会给你任何抢手的内幕消息。成功投资的必经之路是要了解你投资的对象是什么，要做到彻头彻尾的了解。如果你不了解华盛顿州的苹果园，就不要涉足苹果行业。”

推
荐
序

罗杰斯总是告诫投资者要有耐心。他说，很多人在股票市场买了某种股票，看到它往上涨，就自以为聪明能干。他们觉得买卖股票容易得很。他们刚赚进了很多钱，就立即开始寻找其他可买的东西。结果可想而知，又把先前赚的全赔回去了。自信心会导致骄傲，最终导致狂妄自大——其实此时你真的应该把钱存进银行，到海滩去玩上一段时间，直到自己冷静下来。因为好机会本来就不多，更不会接踵而来。一生中你并不需要很多好机会，只要不犯太多的错误就行了。抓住几次好机会你将会变得相当富有。

罗杰斯总是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待问题。华尔街的经历证明，“专家”的话常常是错的。因为，很多权威几乎“足不出户”。在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都在关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一举一动时，罗杰斯却说，格林斯潘从来就算不上是一个成功人士，他的失败事例举不胜举，并且直言这就是为什么格林斯潘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原因。在本书中，罗杰斯列举了一系列格林斯潘处理危机和制定货币政策失败的案例。对于一个敢如此评价格林斯潘的狂傲人士，你应该去了解为什么罗杰斯会这样想！

好了，赶快阅读这本书吧！或者带上它，或者把它放在随手可取的地方，跟着罗杰斯，换一种眼光，去了解去认识去感悟这个世界。你的视野会拓宽，你的知识会丰富，你的投资思路将更明晰。总之，如果你领会了这本书的精髓，你会很快掘到你的人生第一桶金。然后，就像吉姆·罗杰斯所说，什么都不要做，只需开着你的吉普车或者摩托车，潇洒地周游世界。在路上，你只需耐心等待，一直等到你看到，或者发现，或者碰到，或者通过研究发掘到你觉得稳如探囊取物的东西，这时你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走过去把钱拾起来……

李 驰

深圳市同威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目 录

中文版序 001

推荐序 001

第 1 部 1999 年

- 1 黄色奔驰跑车 003
- 2 土耳其的年轻人 016
- 3 即将降临的中亚之灾 028
- 4 红色中国的一流商人 044
- 5 亚洲的新危机——女孩短缺危机 066
- 6 数字化的蒙古 081
- 7 婚礼 099

第 2 部 2000 年

- 8 走进非洲 123
- 9 我的加纳经纪人 142
- 10 旋转狂舞的苦行僧 159
- 11 阿拉伯之夜 183

目

录

第 3 部 2001 年

- 12 同 6000 万人一起洗涤自己的罪孽 207
- 13 去曼德勒之路 227
- 14 在拉巴斯客串侦探 251
- 15 我父亲的坟墓 269
- 16 重归故里 289

旅程时间表 311

第 1 部

1999年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1

黄色奔驰跑车

1968年我加入投资行业时，兜里只揣着600美元。1980年离开这一行时，兜里的钱足够我圆一个梦——过富有刺激的生活。那年我37岁。此前，身为一家海外对冲基金的两个创始人之一，我负责分析全球范围的资本、原材料、商品及信息的流动情况。别人不去投资的，我投资了。我在全世界开发处女市场，这是我成功的一大原因。不过我当初闯荡华尔街的初衷，也是我搞长期投资的初衷，在我这一行里并不多见。我想买自由，尽情享受生活。我想周游世界，而且想看看其他游客难得一见的世界。只有从陆地上，方能见识到别人见识不到的地方。只有从陆地这个有利的角度，才能真正了解这个世界。

我想看一看我心目中的真实世界。

我见过比我游历更广的人，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一地飞到另一地。我认为，不亲身穿过一国的边境，没有自己寻吃觅喝过，或是找汽油，找地方过夜，一句话，没亲自经历过这一切，就不算到过一个国家。

1990年暮冬，我骑上摩托车，开始了一次历时2年的环球旅行，共跨越了6大洲，到过几十个国家。这次65000英里的旅程使我上了《吉尼斯纪录》，我还写了一本畅销书《骑摩托车的投资家——和罗杰斯同游世界》。回到纽约后屁股还没坐热，我又开始策划新的旅行。这一次日历帮了我的忙——恰逢千禧年。我有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总想亲临实境，了解世界，亲眼看看发生的一切，挖掘事实真相。千禧年的历史时机也令我

心动。我计划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时，花上 3 年时间，开车绕地球一周，在千年之交的时刻给地球号脉。

我在阿拉巴马(Alabama)州迪莫波利斯(Demopolis)市的乡下长大，后来上了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毕业后在美国陆军服役，最终加入了华尔街。华尔街的经历告诉我，“专家”的话常常是错的。我的旅行计划既是一次冒险，也是我一生不断求知的延续。我的见闻常常破坏了以往的偶像形象，戳穿了不实之说，证明了某些“权威”对世界所持定见的错误——很多权威几乎足不出户。我在商场上之所以成功，靠的就是换一种眼光审视世界。

虽说我从未嫖过妓，可我知道，要想更好地了解一个国家，跟妓院的老鸨或黑市上的贩子聊上片刻，胜过会晤一位政府部长。若要真正对一国深刻的了解，没有什么比跨过该国边疆更有效的了。

寻找好的投资机会并不是我这趟旅行的既定目的。不过既然我就是这么个人，每次旅行，也就免不了搂草打兔子，捎带着搞点投资调查。作为投资人，我想了解中国、非洲和南美洲的市场。可能的话，还想参观前景看好的证券交易所。过去我在昏昏欲睡的市场上赚过钱，例如奥地利、博茨瓦纳、秘鲁等国家。这样的机会，今后肯定还会有。

倘若我在这次旅行中命丧黄泉，也死得开心。为圆自己的梦而丧生总比哪天兜里揣着没花完的美元死在华尔街强。

我这趟一共跑了 116 个国家，很多国家鲜有人去过，例如缅甸、安哥拉、苏丹、刚果、哥伦比亚、东帝汶等。我先沿非洲西海岸从上往下走，再从东海岸由下往上返回，途中经过了 32 个国家(上一次，我从非洲中部径直穿过，从突尼斯一直到开普敦)。我从大西洋走到太平洋，从欧洲经中亚到中国，然后取道西伯利亚从太平洋返回大西洋。从非洲的东北海岸，我来到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次大陆，再到印度支那半岛、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游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后，我又启程前往南美最南端，再从那里驱车到阿拉斯加，最后返回纽约。没有人开车沿这条路线走过。世界各地 30 场内战中，我差不多赶上了 15 场，全程达 15.2 万英里，是我上一次环游的两倍多，再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研究表明，周游世界是所有人的梦想。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告诉我：“别人憧憬的事，在你身上实现了。”

1999年1月1日，我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启程。这一次，我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一位美女陪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洛基山城的金发女郎佩奇。1996年，我在夏洛特城的货币博物馆演讲时与她邂逅。佩奇在皇后学院工作，负责筹资。该院院长曾向她推荐过我的书。这次她专门来听我讲述上次摩托车之旅的经历。第二天，我找到她，请她共进午餐。

头一次约会，我就告诉她：“我计划再次周游世界。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想借新千年之机成行。”

佩奇也觉得这趟旅行会很有意思。

“你想和我一起去吗？”我问道。

她不禁怔住了。

“想，算我一个。”她说。

不消说，我俩都认为，这不过是戏言而已。

世事难料。

佩奇和我谈了一年多的恋爱。1997年10月，她辞掉在夏洛特的那份工作，搬到纽约市，自己租房子住，并在一家营销公司上班，任部门经理，我俩的关系也不断升温。与此同时，我开始认真研究一条陆上的旅行路线。

没有什么比骑摩托车更过瘾的了。我有过好几辆摩托车。1988年，我首次骑摩托车穿越中国。美国公共电视台曾在《世界各地》系列节目中播放过我的这次旅行，题为《长途跋涉》。骑摩托车不仅过瘾，而且简单。让一辆摩托车漂洋过海，穿越沙漠或是穿过丛林要更容易些。如果佩奇喜欢的话，我俩就可能骑摩托车周游世界了。可她建议我考虑改为开车。我并不想随便找辆车上路。我必须得有一辆跑车，而且还得是敞篷跑车。我想打开顶篷，让风吹到我的脸上。

不过我对汽车一窍不通。因为住在纽约市，我1968年起就没买过车了。我向人解释说，我想要的是一种双座、高底盘、四轮驱动的敞篷跑车。我敢打赌，换了任何一部其他车子，绝不可能绕地球跑一圈。听我这样说

的人，都知道我对车子是多么无知。

所有人都告诉我，市场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汽车。

慕尼黑市每两年举办一次规模很大的四轮驱动汽车展。1998 年春我去了一次，没找到我想象的那种汽车，但见了当地一些改装汽车的厂商。此时我已看过很多型号的汽车，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跑车的车身，丰田汽车的底盘。一个厂商建议我去加利福尼亚的一个人。找人就是这样，为了在加州找到一个人，非得跑一趟德国。加州的那个人又推荐了同在加州的另一个人（这很像我两年后设法进入喀麦隆的经历）。几番周折后，我结识了格哈德·斯坦尔。正是他和普里斯马（Prisma）国际设计公司的其他同事，为我组装了一辆独一无二的梅塞德斯—奔驰跑车。我和佩奇开着这辆跑车绕地球跑了一圈。

那时，我已经基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车了。除了敞篷这一条外，还必须有一个可伸缩的车顶。我可不想冒汽车顶被掀掉的风险。周游世界时，这种事可能会带来大麻烦。此外，汽车必须用柴油发动机。全世界的卡车、公共汽车、火车和轮船都用柴油发动机。在哪儿都能找到柴油。上次旅行时我发现，汽油常常很难找到。即使有的地方有汽油，也不敢保证质量。

斯坦尔曾担任过奔驰公司北美地区高级设计部总裁，他建议采用奔驰 SLK 型的外壳和内部配置，奔驰跑车型吉普车的底盘和柴油引擎。这种跑车型吉普车在欧洲为 G 系列。G 系列当初是专为德国的军队和警察设计的，这种车型要等 3 年后才在美国市场上推出，型号定为 G500。SLK 系列的标准配置包括一个可伸缩的顶篷，轮距与两种 G 型号车中较小的一种一样宽。两种车型的底盘完全一样。斯坦尔认为，把这两种车型结合起来无需动大手术。

我让斯坦尔多加一个油箱，外带一个秘密储物箱，用于藏钱。他告诉我，因为顶篷缩起后占了后部行李箱的空间，还需要一部挂车。他可以设计一辆与跑车相匹配的挂车。斯坦尔还劝我打消要手排挡的念头。因为奔驰车的驾驶技术比我高明多了，遇到问题时，与其我用手排挡，不如依赖奔驰的自动挡摆脱困境。

“年底前一切都要弄好，”我告诉斯坦尔。

没想到斯坦尔不是简单地订购我要的汽车，而是给奔驰北美公司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有我这么一个怪异的顾客，提出了什么要求，问他们是否愿意管这事。显然，奔驰北美公司的人对此很感兴趣。斯坦尔再次给我打电话时，我惊奇地获知，他说服了奔驰北美公司免费为我提供车子，我只需支付昂贵的改装费。

“给你的车子当然都带保修，”斯坦尔告诉我。

“那就干吧。”

我早知道，即使不带保修，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也都能找到奔驰车行。即使在发展中国家，车行也比比皆是。世界上的独裁者和黑老大都开奔驰车。哪怕是没有公路的国家，即使没有吃的，也有奔驰车行。这都托了美国对外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福。众人皆知，这些外援不过是肥了伸手捞钱的人，还有援助方和受援方的贪官污吏。他们中没一个人开雪佛兰牌车。

上次旅行让我长了不少见识。这一次环球之旅要穿越非洲，更会让我们开开眼，见识一下近年来民间组织对外援助的黑幕。作为美国的纳税人，我会吃惊地得知，美国援助这些国家的钱，都流到了奔驰和宝马车行，再或是瑞士银行。

关于对外援助的黑幕，后文还会提到。

说真的，倘若换一辆车开，很可能就走不完这一圈。我们这辆车最大的优点是它的颜色。无论走到哪儿，鲜艳的黄色车身总会吸引众多的人围观。托汽车颜色的福，一路上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有几次还靠着朋友的帮助化险为夷。这么一辆与众不同、又不构成任何危险的汽车突然出现在众人眼前，马上就会引起他人的好奇。奇特的混合型车身，耀眼的车身颜色马上令歹徒头晕目眩，在他们醒悟过来说“嘿，我们忘了抢劫了”或“为什么我们不绑架那些人呢？”之前，我们早已脱离了险境。

一说到周游世界，最常听到的一个问题是：“都需要哪些行装呀？”这里要提一下，我们为这次旅行设计挂车时，早已想好了要带的东西。挂车就是为了装这些东西设计的。我们把要带的东西准备好后，堆成一堆，丈量了一下尺寸，确定所需的容积后，告诉制造挂车的人所需的尺寸。我们带了很多东西，如备用油箱和水罐，睡袋，帐篷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

个医药包。包很大,虽然没有大到上不了飞机的地步,但比一般家庭用途的急救包大多了。

为了决定医药包里都放些什么,我们走访了几位医生,包括怪病专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我们放进了注射器,因为在世界许多地方,根本没有注射器,即使有,也是反复使用的。此外,还放进了一些常用的医药品,如绷带,消毒剂,抗疟疾药片和抗生素。医生还告诉我们,周围没有医生时,自己如何使用这些药品,需要注意哪些症状。可以说,这是个相当齐全的急救包。我们还携带了一位医生为我们开的证明信,不管有没有用,过境时可以出示给边防士兵,证明我们不是走私药品的贩子。好在我们带的药品,最终没用上几样。通常我们需要什么,当地有就在当地买,而不是在急救包里找。急救包主要用于野外环境下的应急。

动身前,我还多带了一个钱包,里面塞了几张过期的信用卡,一两张过期的驾照,还塞了一大摞不值钱的货币,如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索和葡萄牙埃斯库多。一旦遭抢,我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递上一大叠钱。

除了用G系列吉普车和SLK系列汽车改造一辆新奔驰车外,斯坦尔还让奔驰公司再捐赠一辆G系列吉普车,供我准备征聘的摄像师和互联网专家使用。

我和佩奇都想把这次旅行记录下来。我无需哪个年轻人跑过来告诉我,“嘿,你需要一个网址”,我晓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10年前,世界上许多地方同纽约惟一的联系办法是发明信片。此后,世界通信技术突飞猛进,我和佩奇决心亲身体验一下这次信息革命。我俩决定开设一个多媒体网址,带视听功能,通过这个网址,可以把每天的旅途见闻放在网上,和那些与我们“同行”的人互相交流(我太天真了,以为这样做很容易。虽然最终网址开通了,但比我当初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接下来的27—31个月里,摄影师卡波佐利和互联网专家约兰德乘坐第二辆汽车和我们寸步不离,记录下了这次旅程。

1998年秋,我连续第3次参加了纽约市的马拉松长跑,跑完全程后,我马上向佩奇求婚。她同意了。此时我们还不能具体敲定旅行计划,谁知道那时我们会在哪里,或到底想去哪里。不过结婚的日子定了:2000

年1月1日。

此前，佩奇为了和我一起去加州学习驾驶四轮驱动汽车，辞掉了工作。但斯坦尔找的那家厂商几次未能在规定的日期内交车，因此我们出发前没能先拿它热热身。在下一个截止期1999年1月1日到来前，我们总算拿到了车子，并用船把它运到了冰岛。

我和佩奇刚刚认识时，就聊起过这次旅行。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了一件事放下手头上的一切工作，等上3年，这很难做到。佩奇感到，这次旅行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会，放弃它会后悔一辈子。虽然她在新公司刚干了一年，又是提升，又是加薪，可她觉得，跑了这一趟后，她的见识会更丰富，更全面，找工作也会更容易。

出发前，我几次给予佩奇退出的机会。眼见出发日期越来越近，我愈加敦促她慎重考虑自己的决定。

我说：“你对这次旅行并不十分了解。任何会出岔子的地方，都会可能会出岔子。我们计划得再周密，想不到的事也会发生。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这是自然法则。旅途中会遇到重重困难，甚至会有生命危险。还有沙漠和热带丛林……”

“我要去，”佩奇说。

“还有战争，流行病……”

“我不怕。”

“会遇到暴风雪……”

“没事，我能行。”

于是，我们乘飞机飞往子夜阳光之地，在那里过新年的除夕。

我们在冰岛遇到的暴风雪，恐怕是当地三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上路后第三天，一场暴风雪突然袭来。哪怕把脸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也看不到汽车的前身。连道路两边的里程碑也失去了作用。我沿着右边的里程碑开，一会儿突然发现它们跑到了左边。里程碑被雪彻底掩埋后，我知道问题严重了。

能见度降到零，到处是厚厚的积雪，我们陷入了困境。

一流的驾驶技术已经不够用了。只要稍稍向右偏一点，就会跌落山

崖。而向左歪一点，又撞到了山上。即使不偏向任何一边，也有可能与对
面的卡车迎头相撞。

我俩从冰岛出发，开始周游世界时，不知是否能生还。但我们再悲
观，也没想到上路第三天，就可能要命丧黄泉。

冰岛地处欧洲最西端。当时，它正在庆祝埃里克松从冰岛由西驶往
北美一千周年。不过我挑中冰岛作为起始地，是出于地质学方面的考虑。
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地下构造板块在冰岛相接。从地质上讲，冰岛是世界
上惟一可以从北美一直开车开到欧洲的地方。还有比它更合适的旅途起
点吗？

1998年12月31日这一天，我俩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Reykja-
vik)，正赶上观看世界上的一大景观。除夕之夜，冰岛举国上下人人燃放
鞭炮。每个城镇，每个街区，每家每户，每个人，同时燃放鞭炮。想象一
下，一个15万人口的城市，上空五彩缤纷，谁都不甘落后。这就是除夕之
夜的冰岛图景。庆祝新年的活动由点燃全城的巨大篝火拉开序幕，大约
是从晚上10点开始。成群结队的人从一处篝火走到另一处篝火，往篝火
里扔东西。雷克雅未克城外，可以望见50公里以外的城镇上空，被篝火
染红。午夜前不久，人们开始燃放鞭炮。每个城镇的上空亮如白昼。我
和佩奇坐在建于雷克雅未克一处地热水蓄水罐顶上的旋转餐馆里，看得
目瞪口呆。

第二天，也就是1999年1月1日，我们在距离雷克雅未克大约30公
里处的辛格韦德利(Thingvellir)喝了香槟酒，正式开始了环绕地球之旅。
两个半球的构造板块就是在这里衔接的。我们后来得知，两大构造板块
其实正在分开。由于地壳不稳，冰岛多地震、火山和温泉。再过6万年，
这个岛国会一分为二。不过冰岛的电十分便宜，因为岛上蕴藏着丰富的
地热。

就国内能源而言，冰岛比沙特阿拉伯更得天独厚。沙特人早晚有一
天会用完石油，可冰岛有着极其丰富的可再生能源——间歇泉、天然小溪
和热水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有这一切几乎无需投资开发就可以
利用。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天然的室外温泉游泳池。我们动身上路

的头一天晚上，还在一个室外游泳池游仰泳。天上飘舞的片片雪花纷纷扬扬，洒落了一脸。

上路的头一天一切顺利。破晓后，我们动身出发。在地球如此北端的地方，这个季节一般要到上午 10 点天才亮。我们上了环绕冰岛的高速公路。这条公路从雷克雅未克直通埃伊尔斯塔济(Egilsstaðir)和阿克雷里(Akureyri)，然后折回雷克雅未克，全长 1 400 公里。冰岛是一个地形崎岖、风光美丽的国家，冰川、间歇泉、峡湾、古老的火山熔岩、瀑布和小溪星罗棋布，点缀其间。头一天晚上，我们睡在雷克雅未克以东 300 公里外的一个农庄里。第二天一早，我们直奔东海岸的埃伊尔斯塔济。第二天和第一天一样顺利。一路上，冬天的景色美不胜收。沿途往来车辆很少。我们品尝了当天从海里打捞的红点鲑，味道比头一天吃过的鲜海鹦还要鲜美。

我俩开心极了。

接下来是第三天。

我们离开埃伊尔斯塔济后，穿过一个山口前往北部城镇阿克雷里。老天马上变了脸，飘舞的雪花越来越大，很快变成了漫天大雪。刚过正午，天就黑了。沿路的里程碑消失不见了，害我又一次看错了路，把车开出了路面，嘎地停在了一个雪堆前。我俩跳出汽车，在没膝的大雪里铲轮子下面的雪。可没等我们清除干净，新雪又堵住了轮子。我们很快意识到，我们陷入了困境。

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获救了。当时我们已浑身湿透，冻得直哆嗦。一辆驶过的卡车司机告诉当地部门，有两个美国人陷在雪里。一个警察随后赶来，后面还跟了一辆带绞车的平底拖车。他们把我们开的奔驰车拖回路上。我们把它固定在拖车上，乘警车返回附近的小镇。真正惊险的还在后面。开车的警察路上差点要了我们的命。显然，这个小镇只有他这么一个警察。就在他搭救我们时，一架飞机因暴风雪在当地机场坠毁。警察为了尽快赶到出事地点，开得飞快，车子好几次滑出了路面。

佩奇几乎绝望了。

我们正要再次上路时，救援队赶到了。队长告诉我们：“这回我们带你们走。你们是我国的客人，不熟悉这样的暴风雪天气。我们送你们

过山。”

我们到冰岛在当地是一个大新闻。在一个人口只有 27 万的国家，1 月份几乎没什么新闻。三天前，我们动身上路的新闻吸引了许多游客，当地媒体对此大加报道。我们获救的消息自然又受到广泛报道。一些报道称我们是愚蠢的美国人，1 月份开车在冰岛转悠。我们果真死于车祸的话，冰岛方面会觉得脸上无光。两天后我们再次启程时，救援队开着专门定做的四轮驱动越野车一路护送。无论天气多么恶劣，他们开的越野车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直到救援队在山上翻了车。

现在轮到我们的搭救救援队了。

你可以想象冰岛媒体的反应。这一回比上次报道我们遇险更吸引人。两个美国人遭遇冰岛暴风雪，可不得不抢救抢险队成员。我俩把整个过程都录了像，与当地记者分享。镜头里的我为了抢救冰岛的抢险专家，玩命地铲雪。

从录像里还可以看出，佩奇开始犹豫了。

启程上路还不到 5 天，佩奇显露出受惊吓的迹象，面如死灰，浑身哆嗦，恐惧不已。连抢险队都不能自救，这令她的信心开始动摇了。出发前我让佩奇作好精神准备，在俄罗斯可能会遇到匪徒，到了非洲有可能感染上疟疾，惟独没想到会出这种事。

我周游过世界，因此晓得我们的头一次险境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们遭遇了一场暴风雪却安然无恙，这也是冒险的乐趣。”我对佩奇说。

“又不是我们自己脱险的。感谢上帝，救援队赶到了。”

“我们还活着，而且闯过了这一关，不是乐在其中吗？”

“乐在其中？遇险那会儿，我还在想，我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这个男人，可他连车都不会开。我疯了吗？在一场极地暴风雪中，陷在两英尺深的雪里，只穿一双网球鞋。”

“周游世界的乐趣就在这里。”我回答道。

佩奇可不这么认为。

我们在冰岛呆了两周，开车绕全国转了一圈，还谒见了冰岛的总统格里姆松。佩奇问了他很多问题，尤其是有关冰岛妇女的问题。我参观冰岛证券交易所时，她采访了冰岛的女企业家。一家模特公司的老板给她举了一个当地人口的例子，很说明问题。虽然冰岛在世界各国的眼中，盛产金发女郎，但和其他四个北欧国家相比，冰岛的褐发女郎更多。冰岛人的祖先是爱尔兰奴隶，一千年前，北欧海盗把他们带到了冰岛。岛上的纯种白人寥寥无几。

我们在冰岛期间，发现它正处在巨变之中。到处都是年轻人。街上、酒吧和餐馆里挤满了少男少女。冰岛全国人口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一半。50岁以下的人占据了国家的重要职位。就人口而言，冰岛是世界上第四年轻的国家。与世隔绝了数百年后，冰岛的年轻人口必然导致巨大的变化。

由于农业仍然受到重重保护，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生活必需品价格昂贵，因此，不少人必须打两至三份工，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不过冰岛城市化水平正在提高。现在全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首都雷克雅未克。由于受保护的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少，政客更难为农产品价格补贴的做法进行辩护。年轻的冰岛选民认为，在一个毗邻北极圈的火山岛国补贴农产品简直是在挥霍。为捕鱼业制定的配额也重新受到审查。由于限制外来投资，尤其是限制对能源的投资，冰岛利润丰厚的能源资源也得不到开发。

保护以上产业源于陈旧的观点，而对冰岛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受到旧观点的影响。历史上，冰岛曾是丹麦的属地。直到今天，冰岛所有学校的学生还必须把丹麦语作为第二外语来学习。想想看，丹麦是一个有着500万人口的国家，也许地球上总共有700万人讲丹麦语。在当今的世界上，能讲丹麦语算不上什么特长。强迫孩子学习丹麦语无疑阻碍了冰岛的发展。他们的孩子肯定不会再学丹麦语，而是学英语、西班牙语、汉语或广东话。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这种现象。例如在爱尔兰，那里的孩子必须学盖尔语，也就是今天他们所称的爱尔兰语。当今世界上还有谁讲爱尔兰语？为什么他们不学德语，或是某种中国的方言呢？如果有人非

要学爱尔兰语的话，让他们学好了，但硬性规定孩子去学不会有任何好处。等他们长到 35 岁的时候，爱尔兰语也许只可能帮他们在餐馆找份刷洗盘子的工作了。

不幸的是，再过一百年，世界上恐怕只剩下三十来种语言了，其中恐怕不会有爱尔兰语和丹麦语。爱尔兰语的消失可能令人肝肠寸断，可数百种语言已经绝迹。以位于英格兰西南海岸的康沃尔郡为例。最后一位讲康沃尔方言的人 50 年前就去世了。难道我们要让每个人重新学习康沃尔方言吗？许多美国土著印第安语种和非洲语种也已绝迹。这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但今天人们若仍讲这些语言，他们的处境只会比现在更凄惨。

抵制变革的人是在螳臂当车。想想古往今来那些恢弘的城市和灿烂的文明吧。汉尼拔的祖国——迦太基城——早已烟消云散，如今不过是人们记忆中的一处废墟。无数的家庭、部落、种族、民族、语言乃至整个文明今又何在？我不是在庆贺这一切。如果阿兹特克人能存活到今天，那该多好，我们的生活该有多丰富。我相信，玛雅人希望返璞归真。但与世隔绝，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会使你免遭以上文明所经历的厄运。

1962 年，缅甸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该国军人于是认为，缅甸不再需要外部世界，可以闭关自守。此后，缅甸一路走下坡路。1957 年，加纳是大英帝国里最富裕的国家，比英国还要富。加纳独立后，伟大的解放者恩克鲁玛关闭了国门。“英国人对我们有什么用？”7 年后，加纳破产了。200 年前，埃塞俄比亚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可怜的哥白尼因为宣布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受到惩罚。天主教会强迫他改口。

今天，你也可以仿效当年的天主教会，强迫冰岛的孩子学习丹麦语，可这对自己的国家毫无益处，也无法阻挡变革的潮流。历史上不乏因为无视现实而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

当今世界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帝国扩张时代已经结束了。过去的 300 年里，由于技术的突飞猛进，国家的面积越来越大。今天的趋势恰恰相反。现在世界上有大约 200 个国家。再过 30 年到 50 年，也许会有 300 至 400 个国家。不少国家已经开始四分五裂。前苏联今天变成 15

个国家,前南斯拉夫分成6个,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埃塞俄比亚也分裂为两个国家。索马里呢?天晓得。很多人听说过西班牙的巴斯克独立运动。可有谁听说过,西班牙境内还有三处在闹分离?它们分别是: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卡斯蒂利亚(Castilla)和纳瓦拉(Navarre)。现在又加上一个东帝汶。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部落化。人们听着麦当娜的歌手舞足蹈,喝着百事可乐,开着丰田汽车。与此同时,又追求某种自己看得懂,把握得住的东西。从坍塌的帝国的尘埃中诞生的小国可能会互相厮杀,但也不一定。如果继续开放边境,保持贸易和人员的自由流通,所有国家都会过得更好。

这种趋势在欧洲已经有所显露。但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更加明显,如非洲,尤其是亚洲。正是在亚洲这个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可以看到新千年的许多新气象。我和佩奇渴望前去一游。

2

土耳其的年轻人

穿越欧洲花了我们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从英国出发后，驾车驶向东南方向的黑海。我们在爱丁堡等待拿车时，在一家五星级餐馆吃了顿饭，结果佩奇食物中毒。此时，距我们开始环球之行还不到两周。在此后的3年里，她和我开车到处跑，去过世界上更偏远、更落后的地方，一路上有啥吃啥。佩奇一共食物中毒过三次，每次都是在五星级餐馆吃饭引起的。

我们开车从苏格兰到北爱尔兰。我很喜欢这里，酒吧里熙熙攘攘，和年轻人聊天了解到很多情况。他们不像年老的一代，对新教徒或天主教徒旧怨难解。复活节起义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憧憬未来时，把希望寄托在欧洲身上，而不是伦敦或都柏林。

我在北爱尔兰看到的变化不只是我个人的猜测。现在很多人在那儿投资。尽管一些既得利益集团极力阻挠，但北爱尔兰似乎正在走向繁荣。外国投资者相信，目前的停火协议会带来和平。一心想打仗的新芬党保守分子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外国公司纷至沓来，带来了就业机会。人们感兴趣的是工作，而不是战争。

我坚信不久北爱尔兰一定会实现和平，因此向佩奇建议：“我们在这儿买块地吧。”

投资的诀窍在于，趁市场低迷，人心浮动，价格低廉时，早点下手。根据水涨船高的道理，即使你不是个精明人，只要投资早，经济好转后一定稳赚。我研究了一下北爱尔兰的房地产情况，发现情况不妙（对我而言，



爱尔兰是欧盟里惟一没有遭遇出生率过低危机的国家。

而不是对爱尔兰人而言)，我已经晚了一步。要想狠狠赚上一笔的话，非得趁人心惶惶的时候投资。可今天的爱尔兰，看不到人心惶惶。

爱尔兰共和国自己就是一只欧洲的老虎，经济一片繁荣（虽然有债务在身）。自 19 世纪中叶土豆歉收引起的大饥荒以来，爱尔兰人不断移民海外。现在他们不再移民了。经历了 150 年的移民海外的历史后，爱尔兰人突然开始接待大批涌入的移民。海外的爱尔兰人开始返乡，外国人接踵而至。欧洲人、美国人和跨国公司纷纷在爱尔兰建厂。由于修改了税法，爱尔兰的计算机行业发展迅速。

我周游世界得到的一条经验是，开车驶入一座陌生的大都市时，最简便的办法是找辆出租车带你去酒店。都柏林(Dublin)是我们去的第一座大城市。驾车的佩奇坚持认为，不需要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也可以找到我们预订的酒店。她可以看地图找路。我们开进一条街，结果是条死胡同。换了一条路，又是逆向单行道。

“地图上没说这是单行道呀。”佩奇说。

我俩在原地没完没了地兜圈子，打嘴架。

“当地的出租车司机知道我们的酒店到底在哪里。”我争辩说。

“找出租车又费钱，又耽误工夫。”

“那只会节省时间。”

两个小时后，佩奇终于让步了。我们找了辆出租车，要它带我们走。此后，无论去伦敦还是柏林，每次都是佩奇建议：“找辆出租车。”

离开英国前，我们补充了各种用品——睡袋，帐篷，导游手册和地图。过了这个村，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这样的店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买些像样的英文导游材料。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在改革俱乐部为我俩饯行。我们吃饭的那间屋子，正是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里的主角福格启程前和返回后吃过饭的地方。我们一边喝着上乘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一边品尝鲜嫩的英国羊肉。在法兰克福(Frankfurt)，我会见了一些金融界人士，参观了当地的证券交易所，和很多人交谈过。我听见的见解都过于乐观，还有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新经济”，这些都不足以诱我前去投资。穿过奥地利时，又遇到一场暴风雪，而且是该国几十年来最大的一场

暴风雪。好像每次一有特大暴风雪，必然有我们的份似的。我们抢在道路关闭前，翻过了山。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欧盟国家境内开车，并没有真正跨过什么边境。2月11日，我们穿过昔日的铁幕，来到以前被称为东方阵营的匈牙利。佩奇第一次体验了过境的经历。边防士兵可不像她家乡北卡罗来纳州的浸礼教会牧师那么温文尔雅。他们身挎冲锋枪，差点没冲着她这么打招呼：“喂，我们记得你，你不是当年赢得选美比赛的姑娘吗？”或诸如此类的话。佩奇对我们受到的待遇怒不可遏。

布达佩斯曾是奥匈帝国的心脏。这是一座历史辉煌、风景如画的城市，一座岁月不曾流逝的城市。一百年来，布达佩斯没增添什么新建筑，古老的房子依然岿立着，整个城市简直就是一座博物馆。一百年来，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匈牙利始终厄运不断。先是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又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布达佩斯凝固了一个历史时刻，象征着一种不复存在的灿烂文化的巅峰岁月。奥匈帝国早已成过眼烟云。在蓝色的多瑙河边，也不见了往日戴着假发和雪白手套、伴随着莫扎特的曲子翩翩起舞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公贵胄的影子。

我们本来计划从匈牙利出发后，取道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到土耳其。但天气恶劣，沿途都是山区，路况很差。当时正是数九寒天的二月，我们已经领略过突降暴风雪的危害。惟一的另一条路是穿越南斯拉夫。该国最显著的两个特点令我俩一喜一忧：喜的是有一条南北贯穿的优良公路，忧的是内战从北方一直燃到南方。我们决定试试运气。

南斯拉夫是第一个向我们多征收过境费的国家。此前我去过很多地方，知道多收费的地方，一般也需要多填几张表格，所以早有准备，并不在意。再说我们的其他费用也不多。不过佩奇还是吃了一惊。过一次边境，就长一次见识。不过那天我确实也多长了一次见识。

我们交钱时，边防士兵不收第纳尔。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们当时正要过境进入南斯拉夫，而南斯拉夫的边防士兵却不肯要南斯拉夫的钱，不肯接受本国的货币。

我俩不禁感到好奇，不知下面会遇到什么。我们沿着由军队管理的这条收费高速公路往前赶路，不想耽误时间。结果同样的事又发生了，收费亭里的南斯拉夫士兵也不肯收第纳尔。为了在南斯拉夫使用，我们特地用美元换了一些第纳尔。他们可以收美元、德国马克或是奥地利先令，就是不收本国货币。我意识到，南斯拉夫情况不妙。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货币仿佛是晴雨表，也许没有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可你知道，反正有点不对头。一国政府官员都拒绝收取本国货币时，你知道这个国家快要完蛋了。

天黑前，我们赶到了塞尔维亚南方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尼什(Niš)。尼什到科索沃的距离与从保加利亚边境到科索沃的距离差不多。不消说，我们下榻的酒店同样拒收当地货币或信用卡。店主晓得，我也清楚，由于南斯拉夫受到美国的制裁，信用卡公司不会付账。因此我们干什么都要付现金，但不是南斯拉夫的货币。我们给汽车加油花了些第纳尔，还用它买了点杂七杂八的东西，离境进入保加利亚前，把余下的钱扔给了黑市。

当天晚上，我们被吵醒了。我听出是小型武器交火的声音。

“什么声音？”佩奇懵懵懂懂地问我。

我撒了个谎，哄骗她说，旅馆的人正往楼下搬家具。因为我觉得上路还没多久，我身边的这位旅伴可能已患上了歇斯底里症。

佩奇放心地睡去了。

我本来可以告诉她：“亲爱的，是自动武器。听上去像是有人在交火……”

我意识到，此地不可久留。

我们穿过风景如画的乡村，前往保加利亚。佩奇开车，我照例在车上打盹。一觉醒来后，距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Sofia)已不远。佩奇向我描述了一路上看到的事。她告诉我，路上妓女比比皆是，汽车开过去时，年轻的姑娘掀起裙子，展示自己的内衣。我不相信。后来我在很多地方目睹这一切后，才知道她没骗我。

我们离开南斯拉夫没几天，比我们对它更不满的美国开始轰炸该国。

土耳其是亚洲的门户。我想在土耳其观察一下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巨

大的经济文化变革,把握世界未来的走向。我渴望与当地人交谈,为内心的疑问寻找答案。伊斯坦布尔(Istanbul)位于土耳其的西北部,俯瞰马尔马拉海,是世界上真正充满异国情调的一座城市。我曾来过这里两次,上一次是骑摩托车周游世界时。我想带佩奇好好游览一下这座城市。无论哪个朝代,叫拜占庭也好,叫君士坦丁堡也好,还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也好,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这座古老城市始终魅力不减。

我们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当天,土耳其政府一直追捕的库尔德族首领厄贾兰在苏丹落网。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在街头巡逻,街头巷尾到处是荷枪实弹、神情紧张的土耳其士兵,随时准备对付占土耳其人口 20% 的库尔德人的抗议示威活动。

土耳其是欧洲和亚洲的交会点。博斯普鲁斯海峡把欧亚大陆一分为二,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会点。最能反映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地方莫过于伊斯坦布尔。昔日,它叫拜占庭。公元 330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这里建立了东都,起名君士坦丁堡。东罗马陷落后,拜占庭帝国依然在这里建都,君士坦丁堡成为东方基督教的中心。1453 年,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托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1930 年,土耳其加入国联前两年,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期间,认识了很多,他们认为自己的根在西方,是欧洲人。在这座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我们看到有人在路边杀羊。一天晚上,我们同三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土耳其富商及其夫人一起吃饭。其中一个不厌其烦地解释说,他和他的夫人是欧洲人,和我们在街头看到的那些人完全不是一类人。在他眼里,街头上的那些人都是亚洲人。

“我们不是什么邪恶狡黠的土耳其人,或是你们西方人想象的那种人。”他的老婆补充道。

我们是通过一位有土耳其血统的美国朋友在美国结识这对夫妇的。我们在纽约见面时,我提议带他们去位于曼哈顿上城的哈勒姆夜总会,体验一下美国风情。在著名乐队的伴奏下,我们尽情跳舞。为了答谢我们,他们这次在伊斯坦布尔设宴回请。除了乐队外,土耳其的夜总会还有肚皮舞表演。一位舞女似乎特别钟情于我,在我面前跳个没完。我没有注意到,她经过每位客人时,人人都在她裙子里放了钱。最后,她终于失望

地移步他处，撇开了我这个吝啬鬼。我的疏忽其实很容易理解，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位跳肚皮舞的舞女。我醒悟后，马上站起来，走到对面，按照规矩给了她小费（这次看的肚皮舞和后来我在里海的巴库看的肚皮舞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她冲我莞尔一笑，原谅了我的无知。

宴席上，主人乔拉克奥卢告诉我，土耳其有三家公司是欧洲同类公司中最大的。我着实吃了一惊。一家是家电公司，一家是制陶公司，另一家是轮胎和工业用尼龙产品制造公司，也是世界上同类行业中最大的公司。不要说有三家，土耳其有一家欧洲最大的公司就够惊人的了。老实说，我确实正如那位夫人批评的那样，仍用老眼光看土耳其。

要取得这样的成绩，绝非一日之功。这需要智力、资本的积累及良好的教育体制。土耳其正在起着变化。我打算寻找一下投资机会。

稍后，我们又与阿克塞尔夫妇吃晚饭。阿克塞尔是奔驰公司在土耳其的分公司经理。他告诉我，奔驰公司在土耳其生产公共汽车。

我问他：“土耳其能造奔驰标准的汽车？”

他说：“当然，一点不次于德国造的汽车。”

不次于德国的质量！我又是一惊。我让他重复了一遍。

“不仅质量没差别，价格还比德国低廉多了。我们正在扩充生产能力。”他补充道。

和我谈话的是一位奔驰汽车公司的经理。奔驰汽车公司以其昂贵、优质和精密的制造技术闻名于世。而他告诉我，德国产的一流汽车，土耳其现在也能生产，而且更便宜。

随后遇到的一件事，才给我的投资热忱泼了冷水。我们路过德国时，曾为挂车订购了一个罩子。离开德国时，罩子还没有做好。我要厂家做好后送到土耳其。环球快递公司把它送到了伊斯坦布尔机场。

“请送到我下榻的酒店。”我告诉当地的邮递人员。

“我们不送货上门，你必须亲自到机场领取。”

“拜占庭”一词（该词在英文里还有“错综复杂的”、“迷宫似的”含义——译者注）于是开始跳出字典，有了实际的含义。从土耳其海关领取挂车罩子需要办理繁冗的手续。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穿梭于几个部门之间，为盖十几个印章交费，还为一块只值 150 美元的防水帆布花了大

约 75 美元购买许可证，好像我进口罩子是为了贩卖似的。我从一个部门跑到另一个部门，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这一切不过是为了一个专门定做的汽车罩。除我之外，它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何况我还会把它带出土耳其。真是祸不单行。第二天，我的笔记本电脑也从纽约运到了。于是我再次折回机场。这一次，我见了 22 位官员，有些人我先后打过三四次交道，盖了更多的印章，填写了更多的表格，来回奔波……领取了几十份文件。与土耳其的衙门打了两天的交道后，我先前的投资劲头减少了。

尽管有这次不愉快的经历，但我无法对土耳其的经济进步视而不见。前苏联解体后，前苏联的各中亚加盟共和国开始对外开放。与西欧国家相比，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可以利用在东部边境出现的庞大的新市场。中亚地区曾是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被土耳其控制。中亚各国有着相似的语言、宗教、历史和文化。在土库曼斯坦，我发现当地的奔驰代理商是一个到新经济边疆寻找机会的土耳其小伙。我们从黑海驱车前往东面的塔什干(Tashkent)，途中穿越昔日的一些伊斯兰哈里发王国。一路上，到处遇到土耳其人。他们正在填补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撤走留下的真空。

几十年来，土耳其一直争取加入欧盟。土耳其需要欧盟，但欧盟更需要土耳其。不少欧洲国家的人口正在迅速老化。例如意大利，11 月时我们走进一家餐馆，举目四望，没看见一个年轻人，全是 50 岁以上的老人。意大利是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欧盟大部分成员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整个欧洲，人口定时炸弹上的指针正在滴滴答答地走着，随时都会爆炸。如果你正打算在欧洲办一家工厂，比如德国或西班牙，最好三思而行。再过 5 年，养老金的巨额费用，也就是社会保险，或随便你怎么叫，会让你吃不消。政府不会把本国老人抛向街头，而是向公司或公司职工征税，或两者都征税。由于每个退休者只靠一两个在职工人养活，所以社会保险的开支会螺旋式上涨。

土耳其就不同了。它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有 7 000 万人口，和德国不相上下。土耳其人晓得如何制造物美价廉的产品，欧盟急需这样的劳动力。欧洲必须为自己的制造业选择一个地方，还得有人为工人的养老金掏腰包。在欧盟国家内，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土耳其若加入了欧盟，国

内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都可以去西门子公司工作,并且纳税、支付自己的养老金,养活德国老人。

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年轻,越容易接受变革。年轻人喜欢变革,犹如老年人留恋过去一样。这不是说,谁比谁更好。指出以上事实也说明不了什么,除非你正在思考未来,或是考虑投资。

这也是我看好伊朗的原因之一。我在伊朗确实作了些投资,这次周游世界很想前去一游。伊朗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今天,伊朗人拼命要孩子。不去听那些毛拉(mullah)怎么讲。大多数伊朗人对一个七老八十的长者的告诫置若罔闻。我想不出历史上有哪个国家像今天的伊朗,年轻人直言不讳道:“现在的日子不错,过去的日子更好。还是回到过去吧。”

美国富裕的原因之一是不停地增添新市场,也就是不停地增添新的州。人们移居西部,一个地区住满人后,便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其实就是增加新市场。美国这个市场于是越来越大。制造驿站马车或汽车的公司不断地把产品卖给更大的市场。欧洲也是这么干的。欧盟不断地扩大市场,始终保持强大的实力。当初欧盟只有6国,然后增至15国。现在接纳土耳其只会使它更强大。

早在1693年,美国早期政治家佩恩曾建议成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欧洲合众国。

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已近40年。出于种种原因,它的申请屡屡碰壁。欧洲人总是振振有辞,但始终没有明说拒绝接纳土耳其的主要原因。说来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是土耳其人,是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也许他们的皮肤是白的,可算不上是真正的欧洲人。他们身上亚洲人的色彩太浓厚了。

正是出于以上原因,欧盟也许先会接纳诸如爱沙尼亚或拉托维亚这样信奉基督教的白色人种国家。其实现在接纳土耳其对欧盟更有利。波罗的海国家都是小国。多一个只有200万人口的立陶宛,市场扩大不了多少,只会增添福利负担。当然,波罗的海国家比中欧国家的状况要好,不过我也不会去与它们扯上什么关系。后者中,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正在申请加入欧盟。中欧地区会成为一场灾难。

两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重新划定了中欧各国的边界,报答盟友,惩

罚对手，根本不考虑当地的历史、民族、宗教或语言。普鲁士的一部分划给了波兰。德国古城哥尼斯堡(Königsberg)，也是康德的故乡，现在跑到了波兰的东面，成了俄罗斯的一部分，而又不与俄罗斯接壤。我们这些人并不关心摩尔多瓦到底属于罗马尼亚，还是属于乌克兰，或者自成一国。可中欧国家的许多人却非常在意。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一分为二，前南斯拉夫现在大概分成6个国家，下一个10年里，匈牙利很有可能和周围的一个邻国兵戎相见。铁幕倒塌后，由于人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宿怨再次泛起。曾有人向中欧人民许诺，民主意味着繁荣。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美国的电视节目在宣传民主即繁荣。我们美国人晓得，民主并不等于繁荣，可许多中欧人现在一肚子怨气没处撒，想找替罪羊。有一个愿意加入欧盟的土耳其在一边等着，为什么要接纳几个既出不了力，又愤世嫉俗的小国呢？它们大多背负巨额预算赤字，不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

接纳土耳其可以给欧洲市场增加7000万人口。土耳其将是欧盟最大的成员国之一。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如果多了7000万顾客的话，可以卖出更多汽车，而且无需交纳国税、关税或海关税。经济学家懂得政治家不愿承认的道理。他也许不去正眼看陌生的土耳其人，但身为企业家，他晓得需要土耳其人的帮助。资本家懂得，无论一个国家遇到什么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也许看上去是宗教问题或种族问题，但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

以德国为例。在经济发展时，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种族问题并不存在。德国扩展时，对移民的大门是敞开的，德国民众并无怨言。把你们那些疲惫不堪的穷人和渴望自由的廉价劳动力送过来吧，我们愿意接收他们。德国成为经济大国后，商务成本上涨，竞争力下降。这时民众的普遍反应是：“赶走那些外籍劳工。我们不喜欢肮脏的外国人。一切问题都是土耳其人造成的。”于是就有了光头党。一旦失去了新的就业机会，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人们就开始寻找替罪羊。最后，总是把一切归咎于外国人：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白种人，黑人或黄种人……美国人，任何人。

经济不景气时，外国人成了众矢之的。一向如此。指责他人乃人的天性，哪儿的人都一样。“这里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息的地方。我们是爱国

的美国人，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从来不是。全是邪恶、狡黠的外国人搅和的。”要么就是邪恶的金融家的错：“衣阿华州的人民是无辜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造成的，都是华尔街那些坏人的错。”

第一个千年之交时，位于西班牙南部，有将近 50 万人口的科尔多瓦（Córdoba）也许是世界上最大、最富饶的城市。公元 14 世纪时，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Samarkand）是一个文化和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我们不应忘记，昔日这两座城市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中国人或印度人，与他们和睦相处，没人排斥外国人。可以说，它们之所以繁荣，正是因为它们异彩纷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学者和商人慕名而来。亘古以来，一向如此。以上地方曾是大量移民的聚居地。经济不好时，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外国人的宗教、文化和种族背景才引起注意。

我前思后想，最终没有在土耳其投资。我担心，追求建立自己家园的库尔德人可能会不停地制造麻烦，直到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而且土耳其内新崛起的穆斯林原教旨派也是个麻烦。商界的人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只有他们才是正人君子，但他们的一些观点令人担忧。土耳其的金融体系一团混乱，政府惯于贬值本国货币。土耳其的货币要具有长期价值，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且不提我自己费尽周折，从土耳其海关那里提货的遭遇。

当时，土耳其并不欢迎投资者。我想等上三四年，看看形势再说。土耳其的很多困难似乎都是过渡经济造成的。以前我在土耳其投资过几次，但都是短线行为。也许再过几年，土耳其会是一个绝好的长期投资对象。

有意思的是，三四年过去了，宗教党派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选票。今天，土耳其的议会由两党组成，历史上实属罕见。土耳其一向苦于多党制引起的混乱。新政府没有奉行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而是推行稳妥的经济政策。它还致力于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与希腊和解，同时更新立法，吸引欧洲国家。由于过去几十年管理不善，遗留下成堆的问题。要不土耳其能这么便宜吗？我又在土耳其投资了。

一天清晨，我们离开伊斯坦布尔，驱车前往内夫谢希尔(Nevşehir)省和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地区，参观那里的地下城。在附近的代林库尤(Derinkuyu)，我们从地层表面走到相当于8层楼那么深的地下，进入一个四千多年前赫梯人修建的城市。公元400—1200年，东正教基督徒完成了地下城的工程，曾有3千人居住在这座地下城里。他们当初在地下建城，是为了躲避经常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峡谷里驰骋的征服者。该地区的地下城展示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令人叹服。

我们沿着从埃尔祖鲁姆(Erzurum)到阿尔特温(Artvin)的公路穿过土耳其东北部时，碰上了一条沿途风景如画的公路，蜿蜒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翻过山脊，跨过溪谷，爬上弯急路陡的高山。一路上我们收起顶篷，打开收音机。佩奇把脚伸出窗外，边听边哼哼。公路柏油铺面，路质优良。没有一本导游手册提到过这条公路。我猜测这是冷战时期美军修建的一条战备公路。我把它列入10条令人心旷神怡的公路之一。

土耳其还没有呆够，我们就启程前往土耳其邻国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巴统(Batumi)，一座位于黑海之滨的城市。许多人看过我们的地图后，对我们去过这么多的地方感到惊奇。可我们看了地图后，没看见别的，满眼都是沿途错过的景点，如位于土耳其西部的古特洛伊城废墟。我们与这些地方失之交臂有个最简单的理由，我们必须赶在夏天结束之前穿过西伯利亚，最晚不迟于7月底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不然就会遇到麻烦。历史上不知多少人发现，俄罗斯的严冬对外国人来说可不是闹着玩的，例如希特勒和拿破仑。连我都晓得，不要冬天启程去俄罗斯开车穿越西伯利亚。

3

即将降临的 中亚之灾

我们在格鲁吉亚边境耽搁了一阵子。抵达格鲁吉亚边境时，国境线两边的士兵都喝得醉醺醺的。世界真的变了。10年前，1990年春天我在同一地点过境时，格鲁吉亚还是前苏联的一部分，边防士兵警惕万分。离开自由世界，到了铁幕的另一边后，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头脑清醒、不苟言笑、办事认真的边防人员。如今，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我们又要填写一大堆表格，办理繁冗的手续。过境的方式仍然因袭前苏联时代的做法，车子刚过境，车的前后方各降下一扇门，把车卡住，然后对车子进行检查。不过这一回检查敷衍了事，不像过去那样认真。昔日，连车子底下也要检查（当年，人是违禁物品，反走私既是为了防止有人偷渡入境，也是为了防止有人偷渡出境）。虽说检查松了，但要想入境还是要经过重重关卡，交纳各种费用，如保险费、养路费等等。由于士兵个个都喝醉了，办理过境手续更不容易。

我们抵达巴统时，已是午夜时分。巴统是我们进入格鲁吉亚后到的第一座城市。

一辆出租车把我们领到城内最好的酒店。这家酒店的旧主人是垄断旅游业的前苏联国际旅行社。上次我路过格鲁吉亚时就住在这家酒店里。事先谈好的房钱是每天25美元，包括停车费。我注意到，酒店后面有一个圈起来的私家空场地，里面停了几辆汽车，大多是奔驰，还有个人在站岗。显然，这些车子是当地黑社会成员的，经营酒店的人也拥有这个

停车场。

我们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发现每一楼层都有一位老年妇女值班，这也是前苏联时期的遗风。在新政权下，她们现在的工作是向住宿者提供娼妓。我们拒绝了这项服务。酒店的位置绝佳，从这里可以直接眺望黑海，现在仍属“四星酒店”。前苏联时期，酒店的住宿条件就很一般。换了朝代后，酒店更是今不如昔，没水，没电，没暖气；事实上，酒店已破落得不成样子，只有一楼的酒吧还能用，里面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由于酒店实在太不像样，佩奇不肯用酒店的床罩被褥，返回车子取回自己睡袋的罩子。我到大堂找工作人员交涉，他们最后同意少收 10 美元的房钱。

早晨 3 点来钟，有人敲我们的房门，问我要不要一个衣着很露的金发少女。

“对不起，他另有人了。”佩奇替我回绝了。

后来我才知道前苏联解体后诸如此类的国营企业是如何易手的。从前，政府拥有这些企业，可现在没有了政府，企业也没了主。当时谁是企业的经理，企业就归谁了。经理声称：“现在企业归我所有。”其他人毫无办法。随后黑社会成员找到经理，说：“不错，这是你的酒店（或工厂或任何其他资产），可我们要向你提供保护。”其实就是告诉经理，他要给他们好处。经理开始向黑社会交纳保护费。由于这些经理往往不称职，企业每况愈下，他们于是坐吃山空，直到榨干企业的资产为止。

次日清晨，我们离开巴统，前往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一路上每走 20 公里，就被警察盘查一次。又是前苏联时期的遗风。此前我们也时不时地受到警察盘查，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警察好奇，想看看我们的车子。我们给他们塞点钱，外加几包烟，就又可以上路了。格鲁吉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每次停下，都有一种遭遇克格勃的感觉。格鲁吉亚的警察不再称自己是共产党人，可一举一动和从前没啥两样，时任总统的谢瓦尔德纳泽当年任前苏联外交部长时他们是什么心态，今天还是同样的心态。

我上次来第比利斯是在 1990 年的 4 月，当时被推倒的列宁塑像横在街上。这次看到的第比利斯有了一些变化，路上还经过了几家私人餐馆。尽管该国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化，但国内形势仍然异常严峻。不过

许多与我们交谈过的格鲁吉亚人对本国前途还是很乐观的。

我找到一位在大学当教授的老朋友阿列克西泽。1990年，我路过第比利斯时与他相识，从他那里了解到不少关于前苏联时期格鲁吉亚的情况。他现在仍在大学任教，生活水平比10年前下降了不少，工资一点没涨，而且难得按时发工资。与此同时，格鲁吉亚的货币愈加不值钱。他住在一栋公寓楼的15层，楼内总是断电。每次楼里有人死了，住户都知道，因为会启用一次电梯运尸体。尽管如此，他仍坚信，格鲁吉亚会有出头的一天。

阿列克西泽告诉我：“政府更迭后，情况越来越糟。但我们格鲁吉亚人知道，形势会好转的。”

他告诉我，格鲁吉亚人不乏民族精神。

“你疯啦？还不赶紧离开这里！”我告诫他。

可他和许多前苏联人一样，依然坚信一切会好起来的，格鲁吉亚一定会再次崛起，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他提醒我，格鲁吉亚毕竟是世界十三大文化之一，有自己的字母表。

“我们仍然热爱格鲁吉亚，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格鲁吉亚人仍怀有希望。”

我固然希望阿列克西泽能够如愿，可我担心，在形势好转之前，格鲁吉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继续恶化下去。

阿塞拜疆曾是前苏联的一大石油生产基地，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盛产石油的省。20世纪初，世界上半的石油来自里海地区。自从我上次游览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以来，阿塞拜疆同西方公司缔结了总额达74亿美元的合同，开发里海地区的油田。除此之外，除了城市照明有了变化，其他方面仍是老样子。

前苏联时期，所有城市，巴统、第比利斯、巴库，全是漆黑一团，没有路灯，看不见商店、餐馆或汽车。无论走到哪里，城里只有一家酒吧，同一支乐队翻来覆去演奏同一批曲目。这次我发现有了明显的变化，看到了商店，餐馆，人行道上的售货摊，街头巷尾卖冰淇淋的小贩。不过能感受到的变化也就这么一点点，其他方面一切照旧，以上城市看上去显得比过去

更破败，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

在巴库，我第一次结识了中亚的一位新寡头。他叫纳米克，和少数投机分子一样，趁前苏联解体之机，发家致富。正是此人，向我解释了巴统那家酒店易手的过程。倘若你曾是一家酒店或伏特加酒厂的经理，侵吞国有资产需要一定的手腕，因为大多数前政府官员不懂得私有制是怎么回事。至于像纳米克这样的人，因为从未在政府里任过职，要达到目的就更需要手腕了。

诸如纳米克这样的企业家趁国家之危，设法搞到出口许可证，如化工产品的出口许可证。拿到许可证非常不容易，当然，如果行贿就另当别论了。一旦出口许可证到手，他就可以按苏联的国内价格从苏联工厂购买化工产品。因为商业往来只限于苏联国内，根本不存在什么市场价格机制。他从苏联制造商那里买来化工产品，凭借出口许可证，再按市场价格把产品转手卖给西方国家，换取硬通货。纳米克在阿塞拜疆以每吨 5 美分的价格购买化工产品，然后以 832 美元一吨的价格在国外售出。因为他搞的是出口贸易，客户在国外付款，所以他拿到的是硬通货，而不是一钱不值的卢布，这样，他就可以把钱存入瑞士银行。

这种机会只延续了一两年。随后所有人蜂拥而入。化工行业的厂商意识到，他们可以自己出售化工产品，不需要拥有出口许可证的中间人。出口许可证已经没用了。在前政权下，没有出口许可证，什么也不能出口。可当年的许可证并不值几个钱。为什么呢？因为前苏联的出口产品少得可怜。

苏联解体后，填补真空的是一批三四十岁的中青年，这些人不属于旧政权的统治阶层，因此损失不大。他们有眼光，不失时机地发家致富。五十岁上下的纳米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聪明，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一身西服笔挺，就像是在伦敦定做似的。他向我解释了新体制的奥秘，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商人如何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今天在里海之滨品尝鱼子酱的经历。

在巴库的君悦大酒店里，鱼子酱是盛在大碗里的。侍者把一大碗鱼子酱放在桌子上，就像其他地方的侍者端上一盘花生一样。这里的一份鱼子酱比你此前看到的任何一份鱼子酱都要多得多。搁在世界上任何地

方,这碗鱼子酱都至少要 1 800 美元。只有盛产鱼子酱的阿塞拜疆除外。

这次我周游世界,结识了一批像纳米克这样的人,深感获益匪浅。篡改一下成语,这叫入乡访乡(毋庸赘言,我也想入乡随俗)。通过与纳米克的交谈,我对阿塞拜疆和新中亚地区有了更好的了解。纳米克的一席话胜过任何一本旅游手册。与他聊天更胜过谒见当地政府官员、政客或某位“世界领导人”。出发前,我曾作过准备,其他人读的书,我都读了,对来自华盛顿的消息也十分注意。可自从结识了纳米克后,发现以前了解的情况并不真实。纳米克的经历其实就是阿塞拜疆的经历。听了他的话,我才明白了几分。我们在一起吃了好几顿晚饭。

阿塞拜疆是游牧民族之地。早在俄国人统治时期,巴库就成了伏尔加河通往里海之滨的重镇,同时也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少至 6 头,多至 6 000 头的骆驼排成一线穿行在沙漠上,载着香料、香、香水、药材、水果、干果、茶叶、盐、宝石、金、银、铜、瓷器、象牙、玉、棉花和丝绸。每头骆驼可以载五百多磅的东西,最大的商队运载的货物和一艘大商船一样多。沿途有一些垒着围墙的城堡,当地人叫商旅客栈,供过往旅客休息,骆驼可以在这里饮水。

近年来,阿塞拜疆的一些企业家把部分商旅客栈改造成餐馆,翻造后的餐馆装潢华丽,骆驼棚成了餐厅。纳米克选了这样一家餐馆回请我们。和头一次见面一样,他这次又携带了一位年轻姑娘。每次我们见面,他都换个女伴,没有一个是他的妻子。上一次佩奇对此就愤愤不平,这回更生气了。

我哄劝她说,纳米克携带一位如花似玉的情人,而不是徐娘半老的妻子前来赴宴是对她的恭维。佩奇仍旧闷闷不乐,认为纳米克携带和她一样年轻漂亮的姑娘前来看上去似乎是对她的恭维,其实是揶揄她。即便他这样做是为了炫耀,也是在恭维我,而不是她,而且是以炫耀自己情人的方式。佩奇感到这不仅是对她本人的侮辱,也是对所有女性的侮辱。

顺便在这里讲讲肚皮舞。我在巴库商旅客栈看到的肚皮舞比在伊斯坦布尔看到的要精彩十倍。舞女的表演博得满堂喝彩。我和佩奇都喜欢看肚皮舞,后来在路上常常谈论起这种舞蹈,对世界各地的舞蹈家展示出的超自然力赞叹不已。到了西非后,看到的舞蹈更令人惊奇。我简直无

法相信，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如此柔韧，一切仿佛是幻觉。接下来的旅途中，我们在东非和亚洲的其他地方看到了更多的精彩舞蹈，令我们目不暇接。

我在饭桌上从纳米克及其情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从“官方”渠道根本了解不到。美国政府声称，我们支持新寡头是因为他们是信奉民主的资本家。其实这些人信奉的是物竞天择的信条。反映在社会经济上，就是黑社会的存在。听了纳米克一席话后，我方才醒悟，在阿塞拜疆投资简直是疯了。

我不是那种善于行贿、许诺回扣、进行幕后交易的不法商人。可纳米克是。他可以找到一位政府官员，说：“直说了吧，你要什么？我想做成这件事。怎么才能做成？”

几个月来，我一直设法搞到去伊朗的签证。我没去过伊朗，非常想看看这个国家。自从1993年至1995年以来，我在伊朗小有投资。为了能在伊朗投资，我上下活动了一年，终于获准购买在伊朗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

不要听信美国政府告诉你的话。今天，伊朗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就人口而言，伊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在伊朗投资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对该国的未来非常乐观。作为一位投资人，我支持伊朗出现的变革。我还结识了伊朗的外交部长哈拉齐。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过我的课，还在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宴请过我。我琢磨着，如果有谁能拿到驾车旅游伊朗的签证的话，那一定是我了。伊朗方面向我保证，我到了伊斯坦布尔后，即可拿到签证。可无论在伊斯坦布尔，还是巴库，都不见伊朗签证的影子。

在伊朗，一切文件的最后审批权都握在位于德黑兰(Teheran)的秘密警察总部手里。尽管伊朗政府多次向我许诺，但警察总部里的一位教士总是一口回绝。显然，他知道我对伊朗的新世俗政府提出的改革感兴趣，因此打定主意不让我周游伊朗，与当地人交谈。他行使了教士拥有的否决权，温和派人士无力更改。在伊朗，无论什么事，谁说都不算数，只有教士说了才算数。根据实地观察，我认识到，无论伊朗的新政府和议会多

么努力，伊朗的改革会比人们预期的要慢。

当然，经常有美国人获准进入伊朗，正如每两个毛拉中，就有一个毛拉的孙子在美国留学一样。但没有一个美国人曾获准驾车穿越伊朗。而且我的行程包括穿越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最终，伊朗还是拒签了。虽然不是什么世界末日，却是我此行的最大遗憾。我最想去的就是伊朗，而伊朗是惟一拒签的国家。

对我们来说，申请伊朗签证遭拒不只是失望，而是意味着更大的麻烦，我们困在巴库了。

由于伊朗阻断了由南边的里海通往东边的道路，我们面临以下选择：要么沿原路返回，掉头向西，重新穿过格鲁吉亚和土耳其；要么往北，穿过今天世界政治版图上称作俄罗斯、而这块俄罗斯领土上的车臣人又称之为“车臣-达格斯坦共和国”的地区。

走回头路根本不可能。中国还没有去，现在掉头折回，会赶上西伯利亚的严冬。向北走呢？车臣一带正打得你死我活，交战者不会允许我们去的。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往东。我们必须穿过里海：开车，或是乘车。

“去土库曼巴希(Türkmenbasy)的渡轮什么时候开？”

我站在巴库的一个码头上，询问定期穿越里海的渡轮。1990年，我就是从这里乘渡轮从阿塞拜疆到土库曼斯坦的。

渡轮公司的工作人员答道：“说不准。下班船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奇妙的回答。

佩奇问他：“有时刻表吗？”

没有。

“明天再来试试。”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码头，然后是第三天。连续几天，我们天天跑码头，直到一天早上，码头上贴出了一张时刻表。

我们获悉，渡轮要来了。“今天晚上来吧。渡轮晚上开船。”

从码头办公室里走出一个男子，把我俩拉到一边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想坐头等舱，他可以半价卖给我们。

“今晚你们来后，找我就行了。”他说。

阿塞拜疆从丹麦购买了这艘旧渡轮后，将它重新命名为“阿塞拜疆号”。渡轮的时刻表遵照火车时刻表，主要为驶入巴库的货车服务，把一节节货车运过里海。没有货车可运时，渡轮就停开。这次乘坐渡轮的人很少，也许最多不过 50 人，除了两个卡车司机外，其他人都是步行者。

我们从那个男子那里买了头等舱的船票后，他领我们上了船。船上的住宿条件吓了我们一跳。船舱的隔墙上到处是洞，地板肮脏无比，全部家具只有地板上的一个薄薄的床垫子，上面的床单恐怕自从丹麦人买下这艘船后就没洗过。真难以想象二等舱会是什么样子，更不要说统舱了。

卖票的人问：有一间供船员用的屋子空着，我们愿不愿意晚上睡在那里？我俩同意了。

晚上，沿海的油井和天然气井冒出的火苗映红了里海的夜空。

渡轮抵达土库曼斯坦的码头后，我俩是最后一批下船的乘客。我们被迫在船上等了 5 个小时，接受一个又一个警察的盘查。显然，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们这样的游客，因此有点害怕，不知如何处置我们。土库曼斯坦是前苏联各国中最糟糕的一个，当地的下级官员简直不知道怎样对付我们。

最后，他们收了 5 美元的消毒费，并保证不对我们消毒后，允许我们把车开下了船。根据当地规定，我们买了一张特别许可证，凭它可以按当地每加仑 20 美分的不变价格购买柴油。我们告诉了他们去乌兹别克斯坦的旅行路线，他们再估算出我们需要的柴油量。他们甚至画了一张图，显示我们需要多少升油，然后我们提前付给他们当地油价与世界市场油价的差额。

我们抵达土库曼巴希市的酒店时，已经是午夜时分。

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尼亚佐夫改名叫土库曼巴希，意思是“所有土库曼人的伟大父亲”。他还用自己的名字重新命名克拉斯诺沃茨克(Krasnovodsk)市。土库曼斯坦的货币上、伏特加酒瓶上以及茶叶袋上，都印着他的头像。无论我们开车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尼亚佐夫的塑像或张贴画居高临下地注视着我们。我们在巴库找的俄语翻译谢尔盖告诉我们，张贴

画上写的是：一个人民，一个国家，一个土库曼巴希。第一次看到这些张贴画时，我感到不寒而栗。多年来，我收集了数百张政治张贴画，其中有一张 1930 年纳粹党的宣传画，上面画着希特勒，还有他的一句语录：一个人民，一个国家，一个元首。

放眼望去，尼亚佐夫搞的个人崇拜迹象比比皆是。土库曼斯坦电视屏幕右上角，一天 24 小时可以看到尼亚佐夫在注视着你。迫于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他才放弃了把自己的头像印在本国国旗上的念头（我返回美国不到一年，尼亚佐夫提议重新命名一年的 12 个月份。一月改为土库曼巴希，4 月改用他 1948 年去世的母亲的名字，10 月以他写的一本诗集命名。这本诗集 2001 年出版后，被当作所有学校的必读教材）。

上一次我来时，土库曼斯坦穷得要死，只有一家酒店、一家餐馆、一条公路。今天故地重游，情况没有多少改善，连土库曼巴希都不例外。我们下船后，惟一还有空房的酒店比贫民窟好不到哪去，现在兼作退伍军人的宿舍。

我什么地方都能睡，可佩奇实在受不了这个肮脏的地方。

我问她：“你打算怎么着？深更半夜的，除了这儿，还有哪里能住？”

我俩常常为住宿、吃饭等问题争执不休。几周来，我们一直吵个没完。显然，提醒佩奇我事先曾跟她打过招呼纯属浪费时间。返回巴库的船已经开走了。我们马上要开车穿越沙漠。换了谁，也不会这时掉头回家。我们决定，尽快离开此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启程上路，希望前面能遇到条件好一点的城市。

卡拉库姆(Kara-Kum)沙漠(卡拉库姆的意思是黑色的沙子)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土库曼斯坦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荒凉国家，90%的领土都是沙漠。一路上，我们看到成群的野骆驼穿过公路。我们沿着丝绸之路，跨过卡拉库姆运河，驶向该国首都阿什哈巴德(Ashkhabad)。不消说，这条运河现在被重新命名为土库曼巴希运河。它把阿姆河的水输往土库曼斯坦的旱区。咸海的日益枯竭，主要就是这条运河造成的。这是世界史上的一大环境灾难。

在前苏联时代，本是游牧民族的土库曼人深受经济管理不善之害。今天依然如此。进入阿什哈巴德后，一路上经过了二十余家酒店，全是靠

西方国家贷款新盖的，家家空着。这个国家已经破产，货币崩溃，而土库曼巴希大肆建造以各官僚机构命名的纪念性建筑——石油部酒店，农业部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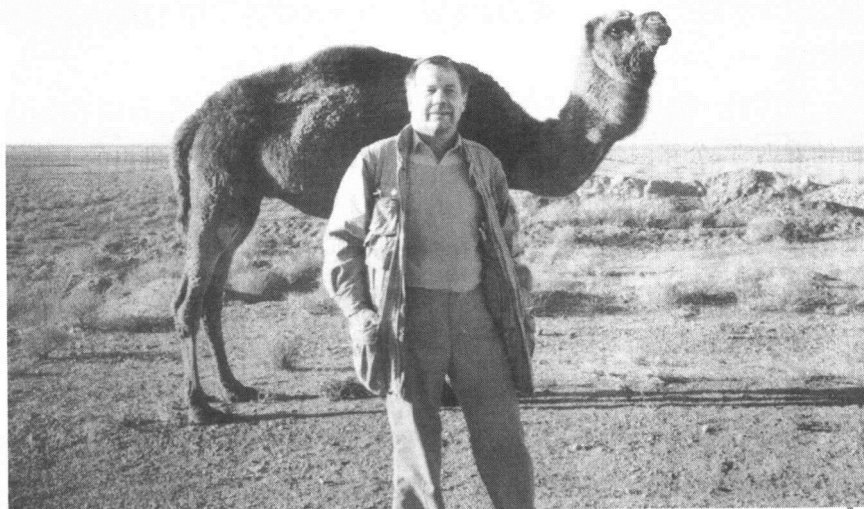
该国惟一的一条优质公路是土库曼巴希上班时走的路，路面平坦，上面铺着沥青，公路两侧风景如画。首都的机场非常漂亮，可进出的飞机寥寥无几，只有 25 架飞机停在那里，上面空无一人。机场通往市区公路的两侧是一个接一个的喷泉。每逢达观贵人驶过时，公路两侧的喷泉开始喷水，而沿途的住户这时就要断水。公路两侧往里两个街口，可看到前苏联时代遗留下的破旧房子。到土库曼斯坦的游客或来访的官员只看到紧靠公路两侧的用作装饰的房子。

阿什哈巴德的市中心，耸立着一座 246 英尺高的拱门式纪念碑，顶上耸立着土库曼巴希的镀金塑像。塑像可以转动，土库曼人民的伟大父亲可以一刻不停地扫视自己的疆土，审视自己的臣民，伸出的胳膊始终指向太阳。

土库曼巴希送给土库曼的每个议员和部长一辆奔驰轿车，但没人有过奔驰 S600 型。S600 型在中亚是最豪华的奔驰轿车。土库曼斯坦只批准进口了一辆奔驰 S600 型，这是德国的奔驰公司赠给土库曼巴希本人的，以此答谢这位总统把外援的钱都转手给了奔驰公司。土库曼巴希（还有奔驰公司）手里的钱来自诸如你我这样的纳税人。要我们纳税名义上是促进民主，实则是扶持石油化工产业。土库曼斯坦是一个 500 万人口的国家，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美国不停地资助土库曼巴希，希望有一天他能开恩，允许美国开采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

一路上，有个在土库曼斯坦工作的美国人不停地给我们发电子邮件。这个年轻人刚携妻子到任不久，一直在网上跟踪我们的行程。他是美国政府设立的一家基金会的经理，向土库曼斯坦这样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类基金会使用私人资金，你、我或任何人都可以投资。前苏联走向解体时，美国建立了一批这样的基金会。它们都是糟糕的投资项目，可所有投资却早涝保收，因为有山姆大叔作担保。

拥有 3 亿美元资产的中亚基金会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基金会的负责人是一些在华尔街混不出个模样的人。倘若你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华尔



在土库曼巴希的“新”土库曼斯坦，野骆驼是卡拉库姆沙漠上惟一的自由灵魂。

我们在街上的饭馆就餐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甭管离“文明世界”有多远。

我们一共食物中毒过三次，回回都栽在五星级餐馆里。在《米什林旅行指南》里，找不到撒马尔罕的这家餐馆。



街都混不出模样，那么到哪儿都不会混出模样，也许除了政府部门。这些人要么是因为过于性急，大手大脚，要么是把钱贷给不该贷的朋友，要么是他们愚蠢至极，很快就输个精光，结果都被调回美国。没人会因此名声扫地，因为有美国政府掏腰包。我认识的那位年轻人和他的老板就是来换前一批不称职的官员的。

我们在中亚与这些基金会的官员吃过几顿饭。关于他们个人，没有什么好说的。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总令我想起吉姆勋爵式的人物——一些在本国混不出头的人。他们总是觉得为政府做事更容易，更愿意到中亚这样的地方工作。他们无需苦干巧干，有自己宽敞的办公室，随意下饭馆，比在美国生活得还好，简直像国王一样，什么事他们都能给出理由。他们会解释说，为了避免警察找麻烦，他们必须雇私人司机。这些人算不上聪明，可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挥霍着我们纳税人的钱。做对做错对他们无所谓，反正出了错，有政府兜着，保证股东不受损失。

诸如此类的项目简直是灾难，是打着向这些国家传授资本主义的幌子（彻头彻尾的傲慢）把钱扔到水里。被派往国外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或德国人，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对别的工作一点不感兴趣。比我聪明的人，如康拉德或格雷厄姆·格林，在自己的作品里都刻画过这类人物。

讲到土库曼斯坦，我还要提一下在查尔朱(Chardzhou)市的一次经历，否则就是失职了。查尔朱是土库曼斯坦的第二大城市，有将近20万人口，与乌兹别克斯坦接壤。市内有一家叫列巴巴的餐馆，寥寥几张桌子铺着绣花桌布，上面摆着漂亮的瓷器餐具和高级餐巾，散发出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息。那天晚上，除了我们，没有其他顾客。今天的土库曼斯坦没几个人下得起饭馆，少数下得起的也不在乎餐馆的陈设好坏。然而即使是在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也总能找到透出人类乐观向上精神的零星地方。我们美餐一顿后，餐馆老板娘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感谢我们前来用餐。我们对餐馆怀有的美好印象，似乎令她吃惊。离开土库曼斯坦时，我们来时一样，仍然不看好该国的未来，不过对人的坚韧又多了一份信心。

我们沿着通往中国的古商旅之路穿越乌兹别克斯坦，沿途参观了传说中的布哈拉(Bukhara)和塔什干。仅仅听到它们的名字，就足以使人发思古之幽情。布哈拉是一个古老的商业中心，又是伊斯兰教权力、财富、知识、建筑 and 艺术的源泉，市内遍布宣礼塔，九十多所宗教学校散落其中。今天，它依然不减当年的风韵。塔什干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这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如今是前苏联地区的第四大城市。有着4千年历史的撒马尔罕城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成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会地。公元14世纪，该城的发展达到顶峰，成为泰摩兰(Tamerlane)帝国的首都。

鞑靼人的首领泰摩兰是早期的征服者之一。他称自己传播了文明。其他人则认为，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笨蛋。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都是个能征善战的人，为自己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通过征服，他在撒马尔罕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和知识。一次，泰摩兰出征时，他的老婆修建了一座巨大的清真寺。后来不知何因，恐怕是因为他老婆红杏出墙，泰摩兰返回后，杀了建筑师的头。从那以后，妇女一律面戴黑纱，以避免诱惑男人。泰摩兰葬在撒马尔罕，据说谁敢动他的陵墓，谁的家就会遭到毁灭。据传，1940年6月20日，一个苏联考古小组打开了泰摩兰的墓。几小时后，希特勒入侵了苏联。

1990年，我路过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时，当地根本没有旅游产业。今天，乌兹别克斯坦极力吸引游客，以显示资本主义在该国的降临。一座座看上去不错的酒店拔地而起。在主要的旅游景点，开始有了卖T恤和地毯的商人。这两座城市无法同迈阿密海滩相比。但是，别忘了，这里是乌兹别克斯坦。不过自从我上次来过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根本看不到游客的影子。

在塔什干，我们遇到了麻烦，害得我一个星期睡不好觉。此前，中国方面要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领取入境签证，可塔什干中国使馆里的领事说，他只能给在乌兹别克斯坦逗留超过6个月的人发签证。我们花了几天时间与北京方面联系，最终拿到了签证。可拿到签证后，我依然不放心。通过与伊朗人打交道，我知道在这个地区，游客对任何事都不能掉以轻心。

站在一个国家的门槛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获准入境。没准入境反而变得更难。我们能否凭拿到的签证进入中国，还是个未知数。况且还是假定我们能顺利离开乌兹别克斯坦。此前，因为有人想行刺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乌兹别克斯坦关闭了边境。

3月份的第3周，我们离开了乌兹别克斯坦，穿过吉尔吉斯斯坦如画的山区和哈萨克斯坦的辽阔草原，驾车驶往中国。一路上，经常看到奔驰在草原上的驴车或骑手，仿佛从古老的传说中走出来似的。我们穿越了横亘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Almaty)和中国边境之间的400公里无人地带。佩奇在阿拉木图第一次参观了一所俄罗斯东正教教堂，还首次采访了一个妓女。我们在阿拉木图逗留期间，佩奇将笔记录了音。一路上，佩奇开车，我陷入对中亚未来的沉思中，尽力不去想中国的边防官员会给我们找什么样的麻烦。

往最轻了说，我对中亚的未来一点不乐观。整个中亚地区动荡不安，民族争端、边界纠纷以及对水、石油和石油管道的争执不断，政治讨论无法进行。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和部族的差异将决定中亚政局的走向。中亚各国内部的各个部族都会跃跃欲试，争取独立。东欧的前南斯拉夫就是前车之鉴。多年来，国家的分裂在非洲也是屡见不鲜。

前苏联已经分裂为15个国家。5个中亚共和国的人民讲18种不同的语言。中亚地区有100多个不同语言、族裔、宗教和民族的集团，没有一个是自愿加入前苏联的(而中国基本上是单一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94%)。华盛顿和华尔街认为，俄罗斯可以保证中亚地区的稳定。他们是在白日做梦。谁保证？俄罗斯的军队吗？8年过去了，它连一个小小的车臣都对付不了。车臣的面积只相当于美国的康涅狄格州或北爱尔兰，人口不过150万。这就是曾让我们胆战心惊过的庞大的俄罗斯军队。俄军士兵逃避兵役，将领忙于敛财。

这些中亚“国家”早晚有一天会破产。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货币急剧贬值，两国经济半死不活。我和佩奇在中亚期间，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的货币已经一贬再贬，黑市上美元比价是官方比价的三倍多。大麻烦还在后面：罢工，暗杀，炸弹爆炸，最终是爆发内战，而且

不止一场。

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很可能没什么意义,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亚各国只会忙于互相厮杀,无暇顾及我们。它们拥有的核武器基本上已经销毁了,没有销毁的也失于维修。只要美国的政客不愚蠢地重复欧洲国家在 19 世纪的错误,重新开始玩所谓的“大游戏”,美国人就不会受到中亚局势的影响。至少几年前,似乎是这样的。现在美国对伊拉克磨刀霍霍,在中亚建立了军事基地,结果在这一地区又树了新敌。看到美国的政客不停地把国家拖入灾难,我不禁痛心疾首。他们事先没认真做过研究,对当地的情况两眼一抹黑。还记得索马里吗?或伊朗的革命?

在世界的这一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其他原料具有地缘政治价值。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蕴藏量占世界第五位,此外还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及煤、硫和盐。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棉花出口国,还是黄金和天然气的重要生产国。其化工产品的生产,在当地也数一数二。哈萨克斯坦蕴藏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煤、黄金、铀、银、铜、铅、锌、钨和铂。可这些国家拥有的丰富资源不会给它们带来任何好处,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依我之见,中亚各国局势好转前,还会继续恶化一段时间。

倘若前苏联除了造出一些空间飞行器、培训出世界一流的奥林匹克运动员和一大批国际象棋大师外,还对世界作出过其他贡献就好了。可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其他成果了。前苏联留给历史的,是它 70 年经济实验的惨败和给世界上成亿人带来的贫困。前苏联地区的未来很像它的过去。从咸海的茶叶上,可以看出它的命运。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莫斯科就决定,需要实现棉花自给,于是开始了一项计划,引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条河水浇灌南方的大片棉花地。咸海的水就来自这两条河。咸海是一个内陆海或湖,面积达 25 000 平方英里,是里海和太平洋之间最大的湖,也是世界上第四大湖。几千年来,来自两河的淡水保证了咸海的盐分不致失调。

前苏联在两河上修建了大坝,还挖掘了一条 850 英里长的运河。以它为主,又修建了一批小运河,构成一个体系。前苏联在 300 万公顷的土

地上种植了棉花，南方新种的棉花满足了该国 60% 的棉花需要。参与这一工程的政府官员于是升官晋级，荣调莫斯科。

此后的 30 年里，咸海完全消失，只留下一条处处是有毒的盐和死鱼的干枯河床和海边灌木。1995 年，咸海的水量减少了四分之三，昔日位于其两边的渔村现在距离它有 30 英里远，四周被沙漠环绕。从前，咸海地区的捕鱼量占前苏联总捕鱼量的 13%，如今咸海里却没有任何生物。

我常听人说，自苏联解体后，该地区的情况有了改善。我本期待着在中亚能看到一些变化，至少希望咸海的状况有所改善。可我发现，自从上次来此地一游后，当地的状况反而更糟糕了。每年，一亿多吨由盐、沙子、农肥、DDT 及工业和家庭垃圾组成的有毒物质随风飘荡。冬天更加寒冷，夏天更加干燥炎热，降雨量逐年下降，草原不复存在，生产下降，当地的孩子因风卷起干枯河床里的有毒物质而患病，成人的寿命缩短。咸海有毒物质上升到大气层，飘到全球各地，落到格陵兰岛的冰川，挪威的森林，白俄罗斯的原野乃至数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南极洲企鹅的血液里已发现含有这类有毒物质。

通过这场生态灾难，可以了解中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全貌，进而对其未来窥见一斑。前苏联的状况和咸海没啥两样，一场灭顶之灾正在酝酿之中。

4

红色中国的 一流商人

从中国大使馆和中国旅游部门那里,我兴奋地获知,我这个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南方乡巴佬是三次驾车穿越中国的第一人。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外国人,而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人。当然,又有谁能知道呢?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样的美事,似乎不太可能。我不禁思忖,能成行吗?毕竟是中国呀,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我在塔什干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虽说好不容易拿到了签证,我还是有点犹豫了。会不会到了中国后,拒绝让我入境?没人能回答我的疑问,因为我们走近中国边境后,发现没人想去中国。这本身恐怕就是一种征兆。戒备森严的边界更加深了我的担心——高耸的墙和篱笆,边界两侧的士兵,还有我们试图穿过的位于两军中间的无人区。哈萨克人会让我们离境吗?

到了边境后,前苏联解体的痕迹依稀可见。边界两侧是遗留下来的数百个商贩小摊。前苏联解体后,这些商贩抓住自由贸易的机会,往返此地,发财致富。1999年的春天,我和佩奇来到此地时,已是人去摊空,边界的防守也加强了。

哈萨克边防军放行后,我们把车停在中国一边,准备应付更大的刁难。何况中国人又绝对令人琢磨不透。

欢迎来中国!祝旅途愉快!

什么?

就这么简单!我们来到了中国。

也许没有这么简单,可也差不多。中方边防人员用仪器扫描了我们携带的所有物品,除此以外,没做其他的检查。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经常出乎世界的意料。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商人。中国人有着漫长的经商历史。1978年,邓小平说,该换个做法了,并宣布了四个现代化政策。他释放了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公元第一个千年之交时,这种精神曾使中国处于世界商业、产业和技术的前列。

公元960年,宋朝崛起,建立了有两万多名官员的高效率政府,儒教学说走向复兴,从而巩固了宋朝的统治和伦理道德。亡于1279年的宋朝经济空前繁荣,煤、钢和军火工业得到发展。1078年,当时中国的产铁量是700年后英国产铁量的两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它制造的商船最多可载千余人。宋朝的都城开封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城市,人口将近五十万,商业兴旺,店铺彻夜营业。

有迹象表明,中国的船只曾航行到非洲的东海岸和拉丁美洲的西海岸,比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要早得多。当时,中国和一些伊斯兰国家远比欧洲发达。15世纪初经历了政治动乱后,排外的中国官员开始闭关自守,销毁了所有的大船以及航海的文献记载。

中国和俄国不同,历史上始终有一个商人阶层,而俄国几乎没有过。在沙皇的统治下,俄国基本上是一个封建社会,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商人阶层。即使有,人数也少得可怜,而且要么早就死了,要么被人遗忘了。别忘了,苏联共产党是1917年上台的。

中国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是海外华人。中国在海外有大批的华人,新加坡、曼谷、温哥华、雅加达和纽约等地的华人事业有成。他们也许已是第五代泰国人,可仍然是中国人。许多人仍讲汉语。中国对海外华人敞开了国门。他们带着资本和专门知识来到中国。专门知识和资本一样重要,因为中国迅速消化了这些知识。中国人非常善于利用外国的知识,而且对这类知识的胃口越来越大。

驾车穿越中国期间,经常看到在田间忙碌的农民。他们从早忙到晚,

这一点也不夸大。实际上天黑后，他们仍在田里干活。我们看到筑路工人开着照明灯加夜班，劳动的妇女和男人几乎一样多。我们从来没看到有人闲坐着聊天。中国人是不休息的。有些老人，的确是上了年纪的人，静静地坐在茶馆里品茶，身边放着喜爱的鸟笼子。除了这些老人外，再也看不到观望街景的闲人。到了上海后，我们对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的规模有了更好的认识。不过最能体现中国美好未来的，还要数敦煌这个沙漠上的小城，还有我的一个私人朋友季先生。

1988年，我第一次骑摩托车游历中国西部时，结识了季先生。当时他40岁出头，当过农民，后来下海，在敦煌市摆了个卖早点的小摊子，卖自己做的面包。我认识他时，小摊已经扩展成为一家餐馆，外加一家旅店。两年后，我在“投资自行车之旅”中二过敦煌，在他的餐馆用晚饭，发现餐馆和旅店又大了点。他能使客人在沙漠上吃到鱼的本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我和佩奇到了敦煌后，四处打听季先生的下落。一晃十年过去了，不知他如今混得怎样？

当地人告诉我，他还在敦煌，而且生意越来越红火，现在拥有一家工厂，几家大酒店，而且不止一家餐馆，俨然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季先生代表了一个新的中国的灵魂。

在茫茫荒漠中间，他还经营地毯生意，雇了手艺熟练的工人，编织波斯或中国图案的地毯。此外，还生产手工制作的丝地毯。季先生并不投机取巧，因为没有必要。劳动力和丝都很便宜，季先生在世界各地已经打开了产品的销路。中亚地区的地毯产业曾闻名于世，但如今大多已破产。伊朗也许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精美的东方地毯生产国。1979年，伊朗革命摧毁了该国的制造业。在霍梅尼的统治下，地毯业蒙受恶名。在霍梅尼眼里，地毯业是受西方影响的产物，所以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亘古以来，中亚各国因布哈拉和其他东方图案的地毯而闻名于世。20世纪90年代政权更迭后，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再为政府编织地毯。反正以前干了也是白干。阿富汗长达20年的战争使该国的地毯业毁于一旦。季先生看到了机会，而且抓住了机会。他并不是什么行为不端的邪恶资本家。其他人的失败成就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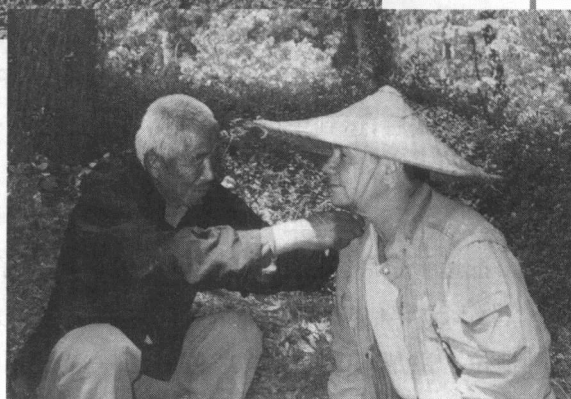
我现在已经和季先生见过三次面，时间分别是1988年、1990年和

谨防开车穿不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的意思是：“进得去，出不来。”

几百年来，世界大多数地区人民的种地方式没有多少变化。然而即便采用旧的务农方式，新中国仍然生产了足够的粮食以供出口。



老一代人和我觉得，这种帽子非常实用。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是从曲阜的一个儒者那里买的，至今还留着。



1999年。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无论经济形势是好是坏，每次见到他，生意总是又上了一个台阶。他一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和一千年前生意兴隆的中国商人完全是一类人，一个在距北京官员1200英里的地方获准发财的商人。

毋庸赘言，我必须买一些季先生的地毯。我挑了三块，都是波斯图案，要他通过海运把它们寄到美国。季先生把我和佩奇介绍给自己的家人和工人后，在他开的一家餐馆请我们吃饭。他领我们来到厨房，看他做手擀面。他想向我们表明，他仍然下得厨房，不鄙夷过去的老行当。

我头一次开车横穿中国时，能活着回来真是够幸运的。时光倒转到1988年，那时我简直就是在沙漠上开车，根本没有公路。今天，国道都是高速公路。中国人吸取了其他国家的筑路经验，如德国、日本和美国，学会了修高速公路。精明的中国人修建了一条又一条付费公路。我认为，中国的公路在世界上堪称一流。

不过中国的西部仍然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在中国的西部，才会有百里无人烟的景象。一路上城镇稀少，都是当年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绿洲衍变而来。千百年前，中国人找到了灌溉这些城镇的办法，在沙漠下面修建了一个水道体系，直通几百英里以外的北边山上，引水进城。我们驾车行驶在茫茫沙漠上，不时惊讶地看到种植的西红柿、南瓜和西瓜。这些城镇的居民非常善于取水存水，为了除尘，甚至还用水龙头冲洗街道。

这里的沙漠叫塔克拉玛干。这片沙漠可不善，塔克拉玛干的意思是“进得去，出不来”。丝绸之路上一个比较有名的城镇是哈密。1500年来，它以盛产哈密瓜而闻名。哈密瓜又甜又好吃，每年到了收获季节，哈密瓜被冷藏后，运到中国的内地销售。即使是今天，把哈密瓜运到北京也令我感到头痛，可中国人几百年来一直这样做，而且效果很好。

抵达伊宁后，我们在伊犁邮电酒店度过了到中国后的第一个晚上。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过热时期修建了大量的酒店，常常象征着一种地位。伊犁邮电酒店就是其中之一。令我们惊奇万分的是，我们走进酒店大堂后，看见前台后面有一面巨大的旗子，横书“真主之家”几个大

字。酒店经理是想借此表达“顾客就是上帝”的意思，可在一个共产党国家，还是令人感到惊讶。中国又一次让人猝不及防。我们在中国旅行期间，发现这个无神论的国家里，用于宗教活动的建筑，例如清真寺、佛寺和孔庙，比比皆是。

我们在中国走了大约两周后，就要走出沙漠时，在距西安 70 公里的地方，路过了一个巨大的基督教堂。是真的，一个位于高速公路旁边的教堂。起初，我们没往心里去。往下又走了几英里后，我俩对视了一下，几乎同时脱口而出：“开回去。”

我们掉转车头，沿着原路又走进沙漠。教堂里并没有什么人藏着，也不是什么地下教堂。它就在一条高速公路的边上，上面耸立着巨大的十字架。在西安郊外的这个村庄里，我们遇到了受 18 世纪传教士的影响皈依基督教的教徒。整个村庄的村民都是基督徒，而且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我们走进教堂，四处张望，坐在里面的人——有孩子，也有一些老人——拿起赞美诗集，围了过来，用中文唱起“前进，基督的战士们”。

佩奇是北卡罗来纳州人，她的老乡赫尔姆斯整天喋喋不休，指责中国迫害信教的人。

佩奇说：“我敢打赌，赫尔姆斯肯定没来过中国。我回家后要邀请他加入我们，同游中国。”

唱歌的人都是基督教徒。他们告诉我们，政府——北京的中央政府——出钱付牧师的工资。

从哈萨克斯坦进入中国后，我们看到，中国对毗邻它西部边境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忧心忡忡。我们还清楚地看到，中国有大批虔诚的穆斯林。独独没有看到他们因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

在平凉，我们爬上一座圣山，参观了一座道观。爬了千余级台阶后，到了山顶。一路上，经常有人超过我们，他们背着沉重的货篓，运货给山上的道士。每天，他们都这样爬上爬下，因为山上的一切用品都靠人运。虽然我们爬不过他们，但比我们 34 岁的中国翻译爬得快。在边境与我们会合的袁先生一直陪着我们，直到我们离开。

爬到山顶后，本以为能看到一座有趣的寺庙，没想到走进了一个小小的院子，惊讶地看到 6 个道士。他们身披道袍，跪在地上。从后面赶上来

的袁先生解释说，他们正在主持求雨仪式。下跪的道士口中念念有词，一边焚香和烧黄纸。抬头看见我们后，也不禁吃了一惊。这不是一个外国人光顾的地方。道士吃惊的程度绝不亚于我们。他们正在求雨，结果求来了洋人（我想象他们喃喃自语道：“念错了。”）。

我们游历中国期间，看见过很多完全自由，不受迫害的宗教活动。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例。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广泛的宗教自由和信教自由。而且我们几乎哪儿都去。在孔子的家乡曲阜，我们参观了一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恢弘庙宇。自从公元前 5 世纪以来，中国人始终遵循孔子的道德学说。庙宇占地几公顷，前来参拜的人络绎不绝。一切活动完全自由，不受约束。

道士在惊讶之余，很高兴我们的到来，请我们坐下来，看他们继续求雨。我们刚到时，已经下起了蒙蒙细雨。看来，求雨的仪式不光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还得到了更高权威的许可。

在平凉，我们傍晚上街遛弯时，看到一个公园里有数百人在跳舞。伴随喇叭里播放的西方舞曲，众人跟着一个年轻的舞蹈教练翩翩起舞。音乐刚刚停止，当地人马上把我和佩奇围了起来，热烈地议论着我们又圆又蓝的眼睛。我们的翻译袁先生告诉他们，我们是环绕地球的美国人。

他告诉平凉人：“他们热爱中国。”

他说得一点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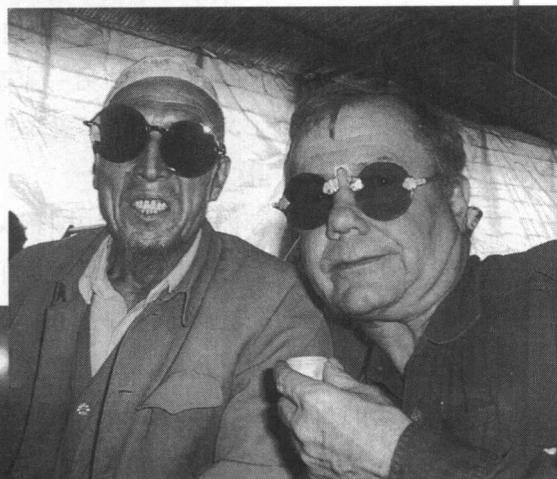
袁先生是北京人。我们很快看出，他跟着我们去了很多他也没去过的地方。他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总是提醒我们不要做什么，不是因为违反了哪条规定，而是他自己胆子太小。不消说，他不要我们做的，我们都做了，他没提醒的，我们也做了。他因此也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袁先生只是个翻译，我们才是导游。

袁先生执意反对的一件事就是去茶馆。

虽说茶馆在中国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因为被看成殖民时期遗留下的产物，代表了懒惰寄生的生活方式，今天的名声仍然不佳。我上次来中国，去过一家茶馆。这一次我还要去茶馆。1990 年，我去了一家叫文化宫的茶馆，门面不大，一些老人围坐在一起，一边抽烟喝酒，一边打牌打麻



我压根没有想到，从此处再往平凉圣山山顶处爬 500 级阶梯后会遇到什么。



我非常喜欢革命前的太阳镜，可茶馆里接待我们的这位老人觉得，我的太阳镜有点太老式了。

“她”是我喜欢的茶馆演员。

将，根本不听一个四人乐队演奏的音乐。文化宫茶馆很像我记忆中美国南方的台球室或理发店。虽然亚洲味很浓，但与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男人俱乐部却有异曲同工之处。我想带佩奇去看看这家茶馆。

我告诉袁先生：“得找到这家茶馆。”

“这可不行，我们不能去茶馆。”

“跟我走就是了。”我答道。

我们上了兰州的街道。兰州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城市，有 300 万人。年轻人穿着五个兜的牛仔裤，足登运动鞋。自从我上次来兰州后，市内又建起了很多现代化的高层楼房，可仍然遮掩不住四周毫无色彩、乏味低矮的水泥楼房。

不消说，找到茶馆并不容易。如同美国人玩的一种纸牌游戏一样，像茶馆这样的地方，一遇到雷达就飞走了。可我们没气馁。打听到文化宫茶馆早已被勒令停业后，我们决心找另一家茶馆。在距文化宫茶馆不远的地方，我们终于找到了又一家茶馆。袁先生不敢进去。

他说：“我可是头一次进茶馆呀。”

“跟我们走。我们带你见识见识中国。”我告诉他。

我们进了门后，一个一脸沧桑的人把我们领到一张桌子旁。我们坐了下来，点了茶水。漂亮的女招待端上了盛在瓷碗里的茶水，里面加了几个桂圆和糖块。除了这几位女招待，茶馆里其余的人都是男的。

没有演出的茶馆，不成其为茶馆。我们走进茶馆后惊奇地发现，前台正在演戏。这是一出令人断肠的悲剧。我高兴地看到，它和西方的歌剧一样滑稽可笑。演员全是男人，浓妆淡抹，身着大红大绿的戏装，不少演员男扮女装，哭哭啼啼，扭捏作态，咏叹不幸的爱情。茶馆里出售色彩鲜艳的大围巾和毛巾，一条合 25 美分。观众倘若高兴，可以把买的毛巾或围巾扔给台上的演员。这是我看过的一出由业余演员活灵活现演出的最出色的戏。我不停地买毛巾往台上扔。结果可以想象，人人都喜欢我。而我总共才花了 5.25 美元。

晚上，我们溜达了几条街后，挑了一家卖蛇肉的餐馆。前面路过了一家蘑菇素餐馆，有四十几种蘑菇菜，我只能记住一种。所有菜都摆在外面，顾客可以随意挑选搭配，恐怕也可以任挑一种吃法。可我看了菜单

后,发现除了茶和啤酒外,只有蘑菇,没有其他菜。旁边有一家餐馆,外面也陈列着附菜单的价目表,惟一的区别是这家餐馆的原料全是新鲜的,几个水池里养着活鱼,一笼子的蛇,一个小池塘里满是乌龟和青蛙,一笼子鸭和一笼子鸡。我们选定了这家。

我选了一条蛇。一个小伙子把蛇从笼子里抓了出来,用一把大剪子一下子剪断了蛇头,随后开膛剖肚,取出内脏,等血流干后剥下蛇皮,把退了皮的蛇送到厨房(佩奇请他留下蛇皮,想用它做条上好的皮带)。

佩奇点了鸭子。餐馆当场宰杀了鸭子,宰前还问她要不要看。佩奇连忙谢绝,一屁股坐了下来。除了鸭肉外,还有菜花和米饭。蛇肉放在一个锅里,炸成了粉红色。

我尝了一口:“吃着有点像鸡肉。”

当然,所有人都这么说。可我不一样,以后我可以在纽约的一家高级餐馆品尝一口价格不菲的鸡肉后,赞扬厨师:“很像蛇肉。”

吃完饭后,服务员又端上了浸泡在中国烈酒里的蛇胆,看上去像是放在一半壳里的蛤蜊。

“据说蛇胆是明目的。”

虽然饭后我很想喝上一盅,可对胆并不怎么感兴趣,无论是蛇胆,还是我能想出的任何动物的胆(此前,我一直不知道蛇也有胆)。不过我生性好奇,现在正周游世界,过过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我决心尝试一切新东西,再说我也不想失礼。我于是连酒囫圇吞下了蛇胆,没敢嚼。我挺了过来,觉得很值得庆祝一番。不妙,又一个服务员走到桌旁,上了另一种酒。

“它对你的皮肤有好处。”

蛇血,专为我留的。

“你看,我的皮肤挺好的。”我告诉服务员。

后来到了北京,我有一次机会纠正了对爬行动物的大不敬。一天晚上,我和几个中国朋友吃完晚饭后,稍稍尝了一点蛇血。

在中国期间,我们什么地方的饭都吃过,每次的饭都很可口。我们于是大吃大喝。一路上我们几次受到宴请。饮食方面我惟一不喜欢的是茅台酒。传统的中国宴会先上数道菜,然后上饭后酒——世界上最难喝的茅台酒,而且量很大。茅台酒比汽油和变质牛奶混在一起还难喝。实在

是太难喝了。可中国人喜欢喝。最后我不得不告诉主人，我可以赴宴，但不喝茅台酒。好在，在如今的中国，哪儿都有当地产的很好的啤酒。

离开兰州后，我们东行到了西安。佩奇看到数千个真人般大小的兵马俑，赞叹不已。1974年，考古学家从地下挖掘出了足以构成大军的兵马俑，从此成了中国最热的景点。我再次看到兵马俑的奇观，同样赞叹不已。这一次，游客比上次多了很多。上次来西安，已经感觉到西安的旅游行业正在走热。显然，现在知道兵马俑的人越来越多。到处是小商贩。旅游业的兴旺是中国正在兴起的又一标志。无数人，包括我在内，不知多少次地撰文介绍过西安。文字是无法充分展现西安这座城市的，图片也是一样。世界上有些地方，根本不该拍照片。要想领略这些地方的奇异风光，必须亲临实地去欣赏，甚至去崇拜，例如美国的大峡谷，印度的泰姬陵，撒马尔罕的拉吉斯坦(Registan)。西安的地下兵马俑也是其中之一。自己去西安看吧。

我前面说过，中国人从早忙到晚。他们不仅勤劳，而且节俭，省下收入的30%用于投资。今天美国人的储蓄率只有1%。正是因为中国人勤劳肯干，善于储蓄，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才超过了美国。

(在中国，存款是免税的。而美国政府不鼓励储蓄，重复对存款征税。现在布什总统建议改革美国税制，将对存款征税改为对消费征税。历史上，美国税制曾有过一次重大改革，即从19世纪以关税为基础的税制过渡到20世纪以收入为基础的税制。布什的建议堪称又一次重大改革。这项措施极其重要，它将保证美国未来的稳固。我希望它能够成为现实。)

我在郑州时，从一位女服务员的身上亲眼目睹了中国人的勤劳。王小姐在市内的一家餐馆工作，她的表现突出体现了所有中国人的工作态度。每当有就餐的人招呼时，她几乎一溜小跑地赶到客人的桌子旁。从餐厅的一头跑到另一头，为的是了解你需要什么。我觉得她好比是某种暗喻，或者说是某种乐旨，构成了演奏上海交响乐的序曲。

我们眼前的上海仿佛来自童话世界。我们走进了21世纪的明珠城市，而且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郑州不过是我们直奔上海途中的第一站。

南京是到上海前的最后一站。在南京的酒店里，我凭窗远眺，四处是吊车。有人告诉我，世界上半的工程吊车都在中国。为我安排的行程似乎是为了让我对下面将要看到的作好准备。

我们终于到了上海。我对上海是一见钟情。上海又变了！这是我第四次来上海，每来一次，它都变一个样，让人不敢认。是不是变好了呢？上海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到处是高楼大厦。上海人时尚，见多识广。而且有钱。我是一个喜欢大城市的人，从来不想回到阿拉巴马州的迪莫波利斯(Demopolis)市。直到我上大学，我在当地的电话号码只有一位数。在我眼里，上海是世界上一座充满生气的大都市，我非常乐意住在这里。这好比在 1903 年移居日益繁荣的纽约。

1949 年上海解放前，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是亚洲最大的，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上海是商业中心，也是远东地区的轴心。1988 年，我参观上海证券交易所时，需要走一段土路，然后来到一栋破烂不堪的楼房，办公面积仅有 1 千平方英尺左右。若要买股票，走到只站着一位营业员的柜台前付钱就是了。营业员用算盘结账。不仅如此，在 1988 年，只有几种股票可以公开买卖。我买了一家银行的股票，不是因为它值钱，而是因为这是一家老银行（装入镜框的购买证书至今仍挂在我在纽约家里的墙上）。当时，我预测中国前途光明。一个电视摄影组录下了我的话，后来在美国的公共电视台播出。

我说：“中国正在创造历史。这正是两百年前美国的证券交易所走过的路。将来有一天，我要在中国大量投资，因此了解它的现状十分重要。解放前，中国有着亚洲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如果我没预测错的话，将来还会有这一天。”

十几年后，上海的证券交易所迁移到了一座崭新的办公楼里。这是一座巨大的正方形建筑，交易大厅宽敞，属超现代的建筑风格。三百多人坐在计算机后面忙碌着。一切交易完全实现电子化，交易规模越来越大。从技术角度讲，上海证券交易所令纽约证券交易所相形见绌。受强大利益集团的影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至今仍然拿着纸头跑来跑去。

不消说，我在这里开了一个账户。

不久前，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投资的需要，中国人发行

了新一类股票——B股。市场上发行的A股只限于中国人买卖。1999年我和佩奇来到中国时，所有的外国人因为没能在中国发横财，开始从中国撤资。他们成了又一泡沫破灭的牺牲者。B股股票的价格跌到了谷底。

人人因绝望而洗手不干，甚至不愿提及投资时，你知道市场跌到底了。我在中国期间，B股就一跌到底。这纯粹是运气，恰好让我赶上了。因为我在市场上玩了几十年，注意到了这一机遇。当时股民灰心丧气，怨声载道，根本不理睬B股。B股每股价格只有20美分。于是我大量购进，买了很多公司的大量股票，一是因为便宜，二是因为我相信中国前途光明。我对买进的每种股票并不了解，只是看好所有这些股票。

假使外国人也能买A股的话，我也不会买，因为人们对A股的厌恶还没有到对B股的程度。当时卖光了手中股票的都是外国人。他们惊叫道：“快把我的B股卖掉！”一年后，中国修改了法律，A股和B股的地位相当。中国股票市场随之暴涨，B股也不例外。出于种种原因，我的股票买对了，但这无关紧要（不过购买别人都不看好的股票一般不会错，虽然有时需要等上一段时间），因为我无意出售这些股票。它们今天到底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我不卖。我现在仍然攥着这些股票，而且希望永远攥在手里。我希望它们成为我留下的遗产。毫无疑问，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挫折。当年英国和美国崛起为大国时，同样遇到过挫折。除非我是傻子，才会卖掉B股。这好比是1903年在纽约买了股票后，1907年又卖了出去。

我在中国期间，中国总理朱镕基到哈佛大学的商学院演讲。听众中有人举手问：“你会不会使中国的货币贬值？”当时，很多人猜测中国政府在把人民币变成可兑换货币前，会先贬值货币。朱镕基回答说：人民币不会贬值。如果你真的认为人民币会贬值的话，我建议你买人民币的看跌期权。

买看跌期权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趁危赚钱手法。而这位来自共产党大国的总理却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买看跌期权，其实就是告诉他：“你要是不相信我，那就试试看！”

中国人知道货币、金融和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讲这番话的是中国

中国没有“废品”。



济南的孩子对美国的兴趣一点不亚于我们对中国的兴趣。

济南的这些小学生从来没有和一个美国人练过英语。他们很喜欢这堂课,不过最吸引他们的还是佩奇那双又蓝又圆的眼睛。



的总理，中国的掌门人，而不是他手下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或证券交易所主席。他懂得货币。这种知识体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理财、致富、储蓄、为了未来投资、子女的教育。

可以把中国人丰富的经济知识同布什的无知作一对比。不久前，布什在讲话中显露出，他不懂得贬值和折旧的区别，真令人汗颜，尤其是他还上过商学院。至于他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这无关紧要。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不只是布什，近年来的美国总统，没有一个具有起码的经济学知识。克林顿任总统期间，甚至看不出几十年来最大的股票市场泡沫即将破灭。他在位时，泡沫破灭了，他也没看出来。我要诅咒美国的两党行霉运，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1999年的春天，我们来到北京，正赶上中国为国庆50周年作准备。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国庆的需要，天安门广场正在修缮，不再对游人开放。西方新闻媒体传说，关闭天安门广场是担心有政治示威活动。其他一些著名景点，如长城和紫禁城，仍然对公众开放。在佩奇的坚持下，我们去了北京的一家摇滚乐咖啡馆。佩奇不顾我的反对，买了一件T恤。

我们在北京期间，美国正在轰炸我们刚刚逃了出来的南斯拉夫，结果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使馆。中国的首都立即爆发了反美示威游行。从报纸上看，似乎全中国都沸腾了。而真实情况是，虽然中国各地爆发了示威游行，但主要限于美国的大使馆周围。根据事先的安排，我们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大约七十多名中国记者到场，准备采访我们的这次旅行。由于担心美国人的出现会引起骚乱，记者招待会草草收场。

佩奇对我说，如果中国人担心我们的人身安全的话——他们甚至把我们拉走了，也许他们真的不无理由。

“吉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多中国人对美国感到愤怒，而且他们有理理由生气。”

虽说我们身为美国人安然无恙，可在这当口来到北京还是让人提心吊胆。

毋庸赘言，误炸中国使馆的说法滑稽可笑。当时我就在一篇文章中

表达了这一观点。我感到可怕的是，美国的媒体从来不对本国政府的解释问一个为什么。6个月后，西方的媒体，首先是英国媒体，才开始证实：我们是故意炸中国使馆的。

在北京期间，一天晚上我们同袁先生一家人吃晚饭。他5岁的儿子几乎什么也没吃，他的父母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饭后，他要了3份甜食，袁先生仍然处之泰然。我和佩奇以为小孩在闹着玩，没想到他的父母答应了他的要求。

“我的天！换了我的父母，肯定要先吃完第一份甜食，才能再要一份。”

我提到这个孩子，不是因为我多喜欢受到溺爱的孩子，主要是想借这件事发表一点对中国儿童的看法。我注意到，中国的大多数孩子都被娇惯坏了。

这是1980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研究表明，独生子女或头胎孩子比其他孩子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成就，当然，也更娇生惯养。中国成了一个独生子女的国家。每一家的孩子都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成就，至少家长是这么认为的（重男轻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到了韩国后，发现它的后果更值得研究）。为了容纳这些“特殊”儿童，满足家长让自己的孩子享受一流教育的需要，中国各地的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形成了一种潮流。年轻教师在中国办教育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你想发财吗？那就去中国开办私立学校吧。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根据我的观察，未来的中国更不会咄咄逼人，倒不是因为中国的青少年都被惯坏了——每个家庭由于只有一个孩子，所以百般溺爱，而是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不会愿意送孩子或惟一的孙子去当兵打仗。

正如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样，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此前中国还必须迈出重大的一步，允许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一国如果没有人民信任的透明货币，没有一个开放的交易体系的话，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也无法确保自

己的实力。

目前人民币实行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它也是少数币值不浮动的货币之一。每天，美元的价值上下浮动，而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始终不变。对一种货币实行固定汇率没有什么理由。固定汇率过去行不通，将来也行不通。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维持固定汇率。有些货币挂过几回钩，回回失败。可很多人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是旧体制遗留下的产物，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乃至70年代的思维结果。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目前，只有美元、欧元和日元可以称为世界货币。如果有哪一种货币可以取代以上三种货币的话，那就是人民币。为什么呢？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大，而且越来越大。2002年，中国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口国。谁都想争夺中国顾客。中国的出口大于进口，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而美国成了债务国，没有净外汇储备，只有大量的外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债权国。第一大债权国日本困难重重，国内举了大量的债务，人口日益老化。今天，日本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而1991年，政府开支只占20%。世界可能欠日本的债，而日本人互相欠债。日本政府欠了本国公民大量的债。中国没有这个问题，既无很多内债，又无很多外债（它是净债权国），而且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

中国的央行晓得，必须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由国际市场决定它的价值。以前，他们害怕这样做，担心本国公民会把钱带到国外，大批外国投资者随之效尤，导致本国货币崩溃。20年前，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可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今天不是1984年，也不是1994年。让人民币贬值吧。谁想抛掉人民币，就让他们抛吧。我是要买人民币的，而且要买人民币的投资者不止我一个。继续往家乡汇钱的海外华人也不会因此停止汇钱。流入中国的钱只会更多。资本总是更有可能流向没有货币管制的地方。

我在中国期间，中国还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它需要有可兑换资金。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立于1948年。当时人们认识到，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30年代世界范围内经济萧条的后果。世界各国纷纷奉行损人利己的

政策,对别国关闭贸易大门,直到所有国家无一例外走向破产。关税、配额和种种贸易限制成了大萧条的催生婆。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人今天已不在世。那些仇恨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人忘记了老一代人用血泪换来的历史教训。

现在,中国仍然对汇率加以控制,并限制贸易。这是反全球化的示威者赞成的,也是从前一些国家在国际上采取的做法。这些做法引发了萧条和战争。

当然,中国并不是惟一想左右逢源的国家。

例如,美国最近对加拿大的番茄征收了关税。看一眼地图你就明白,加拿大是个冰天雪地的国家。你要是正为开办农场选址的话,不太可能先注意到它。但不知什么原因,美国种植番茄的农民种不出加拿大那么便宜的番茄。于是美国政府发话了:“我们晓得,美加两国之间,贸易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我们想购买最廉价的商品。但我们必须保护佛罗里达州种植番茄的农民,限制竞争对手——加拿大农民。虽然他们在极地,美国农民在热带,可加拿大的番茄比美国番茄更便宜。我们要想点对策。可不用担心,这些措施是暂时的。”

这类限制总是作为“临时措施”出台的。

征收关税后,加拿大的番茄价格随之上涨。于是美国的农民不用再玩命干了,可以去海滩,可以每天下午3点收工,而且知道所有的番茄都能卖掉,因为没有了竞争对手。如果因为偷懒,收入有所下降的话,抬高价格就是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这么一个结果。

50年来,美国的钢铁工业一直就是这样。每隔几年,钢铁业人士便游说政府,要求保护本行业,禁止外国竞争。“我们需要企业重组。”可他们并没有改造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学习外国好的经验,而是不断地加强保护。自称是最伟大的自由贸易者的布什刚刚又出台了新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国有2.75亿人。假设美国的钢铁工人加上受益于钢铁产业的人有50万。为了使他们中的少数人多挣点钱,2亿多美国人不得不为钢铁付更多的钱。大多数人并没有上街大喊大叫,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价格的变化。等注意到汽车涨价时,已是一两年以后了。可有人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时,总是振振有辞。出于“国防”的

需要,美国保护大米,保护马海毛。

为了帮助少数稻农,美国人只能买更贵的大米。如果每个稻农都有稳定的收入,有一辆跑车,在海滩边有别墅的话,我们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结果是美国农民不再种大米。

保护主义措施造成的扭曲总是越来越严重。由于稻农的丰厚收入有了保障,他们开始买更多的地,耕地价格随之上涨。稻农然后把高价耕地作为寻求保护的又一个借口。这些耕地也许更适合种玉米或棉花,可由于得到大量补贴的农民抬高了价格,种植以上作物成本过于高昂。

保护主义的后果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学生选学农科,而不是医疗护理或外语,因为务农更赚钱。

这种荒唐事是否有个头?

2002年布什总统提议,到2015年底,制成品关税降为零。我听到后不禁又惊又喜。这是美国总统提出的最令人兴奋的一个建议。美国需要自由贸易和资金的自由流动,不然永远没钱还债。现在,美国的关税体系下有10 200个种类,关税高达48%。不幸的是,不少关税造成的负担压在了诸如孟加拉国这样的穷国身上。全世界每年的关税总额大约是3 000亿美元,近年来还开始上涨。如果布什总统的提案能实现的话,我们大家的日子会好太多了。可我觉得这是天方夜谭。美国连小扁豆和鹰嘴豆都保护。今后很多年里,我们会继续喝价格昂贵的汤。

历史上以上行为屡见不鲜。20世纪30年代,由于贸易停滞,流动资金枯竭,世界经济走向崩溃。为了避免货币间的流通再次出问题,最终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扩大了世界贸易。过去的50年里,国际贸易迅猛增加,各国平均关税从1945年的55%降到今天的不到5%。这都多亏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今天已经是该组织的成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条件,也是自由贸易和开放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人们可以自由携带自己的钱出入境。

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又是不可兑换货币,必然存在人民币黑市。任何地方,凡受到官方控制的东西,都有黑市存在。大麦也好,黄金也好,货币、酒或大麻也好,总会有人想办法绕过限制,发黑财。要想查明一个国家是否出了问题,有多严重,换句话说,给它“测一下体温”,访问该国时

去看看当地的黑市总会很有帮助。我每次旅行，都喜欢逛黑市。到了中国后，逛黑市是我首先干的事之一。

在中国西部的乌鲁木齐，也是我们从哈萨克斯坦进入中国后的第二站，我上街去找黑市，看有没有。我可以借此了解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哪个阶段。寻找黑市的办法之一是去银行，因为换钱的人喜欢聚集在那里。哪儿有钱，他们就去哪儿。在土库曼斯坦，我在阿什哈巴德市一家五星酒店外面的黑市上换了些钱。酒店里的行李员和服务员知道黑市的情况，而且常常自己换钱，但他们给的汇率总是很低。有几次，警察带我到黑市，但总是在还没有崩溃的国家里。在一些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黑市在哪里。在乌鲁木齐市的中国银行外面，果然聚集了十来个人，都是年轻人，等在那里换钱。

他们给我的汇率比官方汇率好不到哪去，跟他们换钱实在不值得。我和几个贩子谈崩后，告诉他们，我要去银行换钱。其中一个头目——总会有一个头目——那天正好在场，一个年轻人向我指了指他。我于是找到他，可他不肯给我更好的汇率。我决定去银行。反正我早晚也要去银行一趟，换一部分钱。有时，在黑市上换的钱是假钞。银行的钱都是真的，为了作比较，我也需要换点真钱。

钱贩子一直跟着我走进银行，公然站在出纳员窗口前面，央求我不要跟银行换钱，而是跟他换。我当时想，不管中国正处于什么样的转折，形势还是不错的。我刚刚从街道上了解到，黑市上外汇与人民币的比价差并不大，中国对黑市的存在也蛮不在乎。差价不大是因为人民币坚挺，携带人民币出国也比较容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黑市上的差价就会高得多，倒汇的人也会更小心谨慎。

中国是不是变得更好了呢？有时，老上海的消失令我伤感。我依旧记得，早晨我步行到公园，混杂在当地的人群中，观看江对岸驶过来的渡轮。来自农村的农民走下船，背负着满盛鸡蛋的篓子。像这样的一景，以后再也看不到了。每次我到上海，都要重返故地，看一看那家公园，那个码头，但已不见了昔日满载商贩的渡轮。上海不再是过去的上海。中国也不再是过去的中国。我拍了一张照片，是一个骑着摩托车，正在打手机



中国西部的企业家一寸空间也不浪费，一分一秒也不荒废。

上海发出的清晰信息：亚洲的妇女很快会有更多的需求，而且会满足自己的需求。



韩国长期奉行的贸易保护政策意味着得不到外国的新设备，国内也缺乏质量控制。



的年轻姑娘。她的衣着不逊于纽约、巴黎或米兰的任何一位妇女。我的思绪回到了西部沙漠城市乌鲁木齐的一位 17 岁少年身上。他惟一的渴望是能在 NBA 打球，卧室的墙上贴满了我不熟悉的美国篮球运动员的照片。与 20 年前相比，中国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天晓得。不管是好还是坏，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5

亚洲的新危机 ——女孩短缺危机

韩国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个高度发达和富裕的国家。韩国是世界上最富的 20 个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的 8 倍，朝鲜的 15 倍。韩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极其成功的范例。退回到 1965 年，朝鲜甚至还比韩国富裕。

韩国的成功以及迅猛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美国的国防部。除了修建优质的高速公路外，美国还在韩国修建了 37 个军事基地，而韩国的人口比印第安纳州或匈牙利的人口多不到哪去。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军在韩国花了数十亿美元，还扶持了一个封闭贸易和社会的独裁政权。韩国从严厉的贸易保护政策中得到巨大的好处，即使只是在一段时间内。

韩国的保护主义给了我们一记耳光。为了获准进境，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与有关政府部门打交道，尽管我们的证件齐全。当然，以前从来没有哪个游客开车从中国进入韩国。即便如此，办理入境手续也过于烦琐和昂贵。在韩国，你马上可以注意到，没有索尼电视机，没有雪佛兰轿车，连丰田轿车也没有。一切商品都是韩国造的。韩国不进口日本电影和音乐。在上海，我结识了一位在韩国生活和工作过的商人。他告诉我，他更愿意在中国做生意，因为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在韩国就不行。如果他的工厂需要什么的话，他必须找到生产国厂家订购。不错，他在韩国可以过得像帝王一样，可帝王想要的东西，他都享受不到。

韩国的繁荣是表面上的。韩国人为自己的繁荣付出了代价。不要相信报纸上看到的東西。韩国不是一个适于生活和做生意的地方，也不是一个适于投资的地方。像韩国这样的经济体制，只有依赖财大气粗的老爹老妈，靠着美军源源不断的资金滋补，才能运转。即使是这样，也无法保证不出问题。韩国最近在国际市场上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一个国家采取上面提到的贸易保护措施（类似美国的番茄种植主目前享受的保护措施）时，会出现什么问题。

由于韩国的企业受到保护，因此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目空一切，以为它们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聪明。他们自信可以同日本人一比高低。韩国能与日本比试的惟一原因是，日本产品无法进入韩国的市场。韩国企业继续向美国出口电视机，向欧洲出口汽车。与此同时，韩国企业日益骄傲自满，借了大笔的钱，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失败。为什么不呢？过了20年后，你不禁觉得，你和西方的银行一样优秀，而且《纽约时报》也这样认为。韩国的企业忘了，他们躲在了经济碉堡的后面。

于是韩国的企业日益庞大，贷了更多的钱，效率更低，竞争力下降，债务越积越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经济受到重创。泰国、马来西亚、韩国，所有这些国家借的都是短期贷款，从而违反了金融界最浅显、最古老的格言：切忌借短还长（Do not borrow short and commit long）。危机袭来后，这些国家的制鞋业再发达，也无力偿付贷款。甭管你多聪明，力不从心时就是力不从心。

亚洲的许多公司虽然在本国业绩很好，但在企业内部的问题暴露后，在世界市场上却缺乏竞争力。有些国家的货币还与美元挂钩。当时，美元在市场上的比价很低。出于种种原因，此后美元一路走高，这意味着泰国和其他国家的货币也一路走高。就在亚洲企业内部问题积重难返之时——效率越来越低，竞争力下降，本国的货币却日益升值。由于以上两个原因，这些国家出口的商品也越来越贵。

我再重复一遍：从长远讲，没有一种实行固定汇率的货币可以持久，无论它同哪种货币挂钩。

结果亚洲国家都被套牢了，许多企业纷纷倒闭。泰国陷入困境后，马来西亚跟着遭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西方人认为，泰国和马来西亚是

一回事，同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都是黄种人。韩国人会说：“等等，我们离泰国 5 000 公里呢，我们是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风俗习惯，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模式。”可日内瓦的人不懂，要么是不关心。当《时代》周刊宣布，现在是亚洲的十年时，美国的老百姓纷纷购买东南亚共同基金的股票。一旦出了问题，马上问：“亚洲到底在哪儿呀？”

有一点我们要明白：哪儿的泡沫都一样。

如果我母亲投资 IBM 或富达(Fidelity)共同基金亏了本，即使有“投资专家”可供咨询，你以为她会说“我把钱从 IBM 撤出，改投马来西亚”吗？IBM 遍布美国大街小巷，有关富达基金的消息天天见报。我母亲投资这类公司亏了本，简直怒不可遏。你以为她会卖掉 IBM 的股票，扫视世界各地后说“我听说象牙海岸是个投资的好地方”吗？我的话听上去似乎像是呓语，但繁荣时期“投资专家”纷纷献策时，总可以见到这一幕。

1997 年，就上演了以上一幕。

韩国的经济状况其实比它的一些邻国要好些。凭借贸易保护，韩国没有欠下巨额贷款，也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泰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曼谷(Bangkok)，似乎每一个少男少女都买劳力士手表或名贵跑车。你要是以为网上公司的那伙人冲昏头脑的话，还是看看泰国吧。随着大笔资金来源不断地流入泰国，亚洲四虎之一的泰国在尽情挥霍。

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国家，大笔借钱并没有错，只要钱用对了地方，能化为有用的资产。19 世纪，美国向世界各国，尤其向欧洲借了大量的钱。当时，美国是一大债务国。美国用这笔钱修建基础设施，例如铁路和工厂。到了 1914 年底时，美国的投资开始有了回报，首次成为债权国。随后，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头号强国。我们举了大量的债，但钱花在了实处。倘若借了很多钱买劳力士手表、名贵跑车或豪宅的话，或是捐给了慈善和福利事业，或大量购买军火的话，是不会有繁荣的未来的(战争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后果相当于毁掉该国一大部分财富，哪怕是赢得了战争)。1997 年亚洲危机爆发前，香港的停车位卖 150

万港币一个，等于大伦敦地区一栋房子的价钱。总有一天，借钱挥霍会反咬你一口。

韩国变富后，韩国人开始到国外旅游。此前从卫星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日本盛开的樱花，中国的变革，美国的生活，现在终于有钱可以走出国门亲眼见识了。年轻人去探望住在纽约皇后区的亲戚，看到他们开着丰田轿车或切诺基越野车，听着汉城听不到的音乐（韩国是世界上第四年轻的国家，22%的人口不足15岁。前三名分别是墨西哥、冰岛和新西兰）。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去西方国家旅游，回国后感到不满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要求政府开放边界，结束裙带资本主义制度，消除由一个独裁者、银行和少数大资本家垄断经济的现象，他们都是一伙的。

于是情况正在起变化。韩国的一些领导人正设法履行自己的诺言，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韩国经济仍然受到保护。所以我不想在韩国投资。倘若真的把韩国企业推向竞争的话，很难说它们能否通过考验。我觉得它们过不了这一关。

当然，在这种环境下我照样可以赚钱，搞短线投资，快进快出。可这从来不是我的风格。交易和投资对我来说不是一回事。经纪人不作长期打算，有些人还善于投机。我对投机一窍不通，也许是最蹩脚的经纪人。我自认为，自己是个投资者，喜欢买下东西后永远保留不卖。我在投资方面的成功主要因为我买了价格非常低廉的股票，至少我觉得价格非常低廉。即使买错了，但如果买得便宜，也亏不到哪儿去。但看什么便宜就买什么还不够，便宜货可能永远便宜下去。你必须能觉察出好的走势苗头，看出两三年内人人都能看出的积极变化。

投资与买卖股票的区别就是瓦尔顿和纽伯格两人的区别。前者几乎从来不卖自己握有的沃尔玛公司的股票，而后者买下股票后没几分钟就卖掉了。纽伯格是一位有名的经纪人，我年轻时在他手下干过。他通常在市场开盘前5分钟开始工作，先读《纽约时报》，然后冷不丁地告诉我或办公室的其他人：“交易大厅里有10万股IBM公司的股票正待售出。89.625美元购进。”

我和其他同事呆坐在那里，面面相觑。他是怎么知道的？他一直坐



在韩国,要不了多久你就可以感觉到女孩的短缺。

这个班的男女生比例是2:1。再过几年,

韩国的女孩可以随意挑选夫婿。

在办公室里看报。我们百思不解。可纽伯格有第六感。屋子另一端的股票电子牌价始终在滚动中。他好像有特异功能，别人一买卖股票，他就能知道。

我们赶到一楼的交易大厅，核实他说的是否正确。果不其然，有12.5万股IBM公司的股票。无论纽伯格坐在办公室里干什么，他报的数目与实际待出售的股票数目总是只差几千股，而且几乎以最佳价格购进。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瞧过电子牌价。他有一种直觉，某种超自然力。在这一行干了50年后，他几乎可以闭着眼睛买卖股票。

我在这方面别提有多笨了。如果我有什么长处的话，那就是我擅长分析人人不看好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国家，而且有胆量，或者说傻到买它们的股票，不管别人怎么骂我傻。你若告诉别人，你要买股票，而别人对你嗤之以鼻，你多半是对的。别人是否反对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如果某种股票人人都买亏了，纷纷抛售，股票价格就会变得非常低廉。我从来就喜欢逆潮流而动。如果我和100个投资人同在一个房间里，听到大多数人说：“我的天，这家股票太好了！”我通常会考虑提前卖掉这家股票。信息和判断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我觉得，我听出了其他人没有听出的东西。再者，我知道大多数投资者已经买了这家股票。还会有谁买呢？

人人都想随大流。如果你走出房间时说，皇帝没穿衣服，人人都会用鄙夷的眼光看着你：

“听见没有？那个人说，皇帝一丝不挂。他简直疯了。谁都知道，皇帝是穿着衣服的。”

“说得对，别担心。我也有那家股票。”

他们这些人相互支持各自的意见。他们给皇帝打电话，皇帝告诉他们：“我当然穿着衣服啦。”

他们又给安然公司打电话。回答是：“公司状况很好。”

他们于是奔走相告：“什么事也没有。我给一个在安然公司做事的朋友打过电话，他说啥事也没有。”

于是几个人在电视台露面，宣布皇帝一切都很好。

尽管韩国的股票很便宜，但我还是没有买，因为韩国的形势并不好。早在2002年的下半年，《纽约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对韩国拥有庞大的外汇

储备极力赞扬。他忘了韩国外汇储备的很大一部分是借来的。我和经纪人不一样。经纪人喜欢不停地倒腾股票。我不愿意整天在华尔街盯着滚动的电子牌价看。纽伯格 99 岁了，每天照常去华尔街买卖股票。股票交易已经融入他的血液和灵魂。我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我真的上路了。

韩国北部和东部是山区，南部是辽阔的平原，全国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部。韩国总人口为 4 600 万，四分之一的人住在位于非军事区南面 30 英里的汉城。不过韩国眼下面临的最重大的人口问题不是韩国人口是否过密，而是过密的方式。我们是 5 月份到韩国的，恰逢学校放假。韩国人携家带口，到郊外野餐。我们在途中看见很多孩子。无论走到哪儿，都是成群的孩子。

可是男孩多，女孩少。

亘古以来，在出生率上大自然是偏袒男孩的，男女比例大致为 51：49。而人口数字就另当别论了。世界上女的比男的多。男孩的出生率略高于女孩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此。男孩出生率高是因为男性寿命较短，更有可能当兵打仗，彼此厮杀，或酗酒驾驶摩托车往墙上撞。不过从总出生率看，男婴数目只比女婴多两个百分点。我在韩国注意到女孩数量较少后，做了一番调查，了解到在今天的韩国，每有 100 个 12 岁的女孩，就有 120 个同龄的男孩。男孩比女孩多 20%。男女比例大大失调，超出正常值的 10 倍。

直到几年前，人类在生育方面仍然没有任何节制。在一个农业社会，多生孩子意味着多一份劳动力，意味着有子女可以养老。在婴儿死亡率很高的年代，也意味着多一份保险。今天，出于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世界各地的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少要孩子。要孩子很花钱，照顾孩子花费的精力严重限制了当代社会已婚夫妇的自由。出于不同的原因，许多国家采用社会工程的办法摆脱人口危机，积极限制本国的出生率。几年前，这还是中国的政策。

（中国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只生一个男孩政策。头胎是女孩的话，如果父母年龄超过 30 岁，头一个孩子至少已经 8 岁，可以再生一个。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生三胎。如果违反规定，会遭到单位解

雇，学校也拒绝接收第二个孩子上学。)*

在韩国，夫妇少要孩子不是出于社会原因，而是个人原因。他们是自愿少要孩子的，不是政府控制的结果。但结果与中国完全一样。中国男孩与女孩的比例是 117 : 100。整个亚洲，都存在男女比例失调现象，如日本及其他国家。在亚洲，妇女是二等公民，扮演丈夫、父母或他们的亲戚的仆人或佣人角色。你根本无需为了增加男孩的数目杀死自己的女儿或把她们送给别人。

如果第一胎生了个男孩，就不再生了。即使头胎是男孩的父母接着生，第二胎有一半可能还是男孩。仅此一项，就打破了人口的比例。如果头胎是女孩，家长会再生。如果第二胎是男孩，父母就此打住。如果还是女孩怎么办？送人的女孩不知有多少。尤其是怀第二胎时，许多夫妇选择做超声波测试。如果是女孩，干脆打掉不要。在韩国，父母利用超声波技术测试胎儿性别愈演愈烈，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但他们又跑到国外去做超声波。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上一个千年之交时，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女孩是发展经济的负担，欧洲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男子的数量超过了女子。女孩一下子身价百倍。一个 19 岁的男孩，如果条件不够好，很难娶到老婆。那时，送嫁妆是男孩家的事。依我之见，再过 10 年，今天 12 岁的韩国女孩会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韩国会和中国一样，有大量剩余的被宠坏了的小伙子。倘若追求者不够恭敬，哪怕是丈夫，韩国女孩马上可以从几十个后备人选中挑选新的。鉴于男子死亡率有上升趋势，20% 这一数字还会增加。韩国的妇女目前几乎占总劳动力的 40%，其中三分之一在家庭农场工作。未来，她们更渴望独立。她们会加入更多的职业，高等教育会更加普及，离婚率肯定也会上升。随后是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动。

于是，我改变了不在韩国投资的想法，思索如何从变革前夜的韩国受益。我同佩奇讨论了韩国妇女生活中起的变化。我看不到一家健身俱乐

* 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作者所说的“只生一个男孩政策”，作者的理解与中国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译者注

部或学校，却看到了一些避孕药制药厂。出于文化上的原因，亚洲很少有人用避孕药。从前，欧洲人也是一样（2000 年以前，避孕药在日本是非法的。日本批准使用伟哥只用了 6 个月，而批准使用避孕药却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日本妇女因此怒不可遏）。由于避孕药市场很小，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很多制造避孕药的药厂纷纷倒闭。可我却看到了潜在的机会。不说，倒闭药厂的股票非常低廉。我还记得，美国妇女最终接受避孕药后，这类药厂的股票扶摇直上。我于是在韩国开了一个账户，买了所有三家制造避孕药药厂的股票。

我看到的韩国人口现象对朝鲜半岛的统一具有重大意义。韩国的男孩需要女孩，可到哪儿去找呢？朝鲜这个民族和其他民族没有什么不同，也想找本民族的人结婚。居住在纽约市皇后区和洛杉矶的美籍韩国人中，倒有少量的年轻姑娘，但大量的姑娘还是在朝鲜。

我还考虑过在汉城（Seoul）置办点不动产。汉江把汉城一分为二，江南面比江北面的地要贵得多，因为韩国人随时担心会爆发战争。人们普遍认为，朝鲜军队可以很容易地向汉城推进 30 英里，最终被挡在汉江北岸。最近几届韩国政府在本国人民的支持下，一直设法与北边的邻居建立正常关系。我坚信，朝鲜半岛最终会实现和平和统一，但我不是一个房地产商，最后还是打消了在汉城投资房地产的念头。朝鲜人应该多买汉江北面的土地，然后宣布“和平了！”，发笔横财。

我们在韩国开车玩了两周，最后一站是釜山（Pusan）。乘船去日本前，还有一件事要做。我喜欢猎奇。若是不能饱一次口福，我的猎奇会留下遗憾的一笔。

几千年来，朝鲜人乃至许多亚洲人一直吃狗肉。我当然也想尝尝。韩国有些餐馆专门做狗肉。我在釜山找到了城里一家最好的狗肉餐馆，点了一块又瘦又嫩的狗肉。我问过侍者后，才惊讶地得知，我吃的狗肉不是流落街头的野狗，而是专门为餐馆养的狗，我想可能是杂交狗。餐馆老板热情地让我看了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说明吃狗肉对健康很有好处。我只尝了一小口，味道鲜美无比，可我无意再吃狗肉。和佩奇一样，我吃狗肉时也感到浑身不自在。她没有吃狗肉。我品尝狗肉时，佩奇的思绪

飞到了她养的小狗身上。狗肉很好嚼，味道更像羊肉，不像鸡肉。佩奇还拒绝吃蚕蛹，我认为她错过了一道美味。街上的小吃摊上有烤蚕蛹卖，我发现蚕蛹很好吃。每只蚕蛹大约有指甲盖那么大，一份一小杯，味道鲜美，越吃越想吃。出门上路以来，我只拒绝吃一样东西——猴子。猴子与人太近了。

我们从釜山乘渡轮穿过朝鲜海峡，前往日本，6月1日抵达本州（Honshu）岛西南海岸的萩市（Hagi）。我们在日本呆了差不多5周，开车到了广岛（Hiroshima）、姬路（Himeji）、奈良（Nara）、静冈（Shizuoka）、东京（Tokyo）、横须贺（Yokosuka）、京都（Kyoto）（佩奇的父母来京都与我们会合，在一起呆了一周）、箱根（Hakone）、金泽（Kanazawa）和伏木（Fushiki）。我们甚至还爬了富士山。

日本是旅游胜地，有悠久的历史，又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一律使用电子显示板，告诉你到达前方各个城市所需的大致时间。电脑统计了天气、汽车流量、交通事故的多少以及时速限制等数据后，给出一个时间。电子显示的时速限制可以根据路况不断调整。电子显示板给出的时间总是很准。输入的软件一定基于以下设想：所有人都会比时速限制开得快一点，许多人，包括我俩，也确实开得比时速限制快。日本主要公路的路面都装有闪灯，驾驶员很远就可以看到前面的弯道。

日本一些城市的人行道多修有天棚，连接两侧大楼。天气不好时，行人，尤其是繁华商业区的行人可以风雨无阻地逛街。铃声提醒路人注意交通灯的颜色，这对盲人和只顾低头走路的行人来说，很有帮助。而且两侧的人行道上还有与之平行的隆起条状，盲人快走到街口时，人行道上的盲道提醒前面是十字路口，并指引盲人沿专线过马路。

日本之富，简直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按照惯常的标准来衡量，即外汇储备额，日本富甲天下。不过外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经济巨人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可怜，无助的日本巨人疾病缠身，而且是自找的。

日本的问题首先是人口造成的。日本是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口的平均年龄又是最高的国家之一。倘若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等不到世纪末，日本的人口就会减半。日本的巨额内债居各国之首，而且越来

越高，而支付内债的人却越来越少。当然，欧洲各国也呈现了类似的人口趋势，可它们在对待移民的做法上却比不上日本。日本的种族主义非常厉害，举个例子，甚至第三代的朝鲜移民都无法成为日本公民。如果你出生在日本，但没有日本人血统，哪怕父母和祖父母都出生在日本，也没有选举权。排外只会导致日本日益衰落，而今天的日本人依旧排斥外国人。等今天没有丝毫发言权的儿童长大后，面对现行政策的后果，必然生怨。

更有甚者，1955年以来一直执政的自民党政客修建了上百座“无用桥梁”，导致债台越筑越高。这些旨在捞取选票的公共工程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完全是为了取悦地方选民和政客。富裕的日本稻农有钱有势，所以日本的大米价格甚至比美国的大米还要高出几倍。不过没有一个日本人会承认这一点。他们辩解说，日本的大米受到保护，是因为日本米与其他米不同，日本人因此有独特的消化器官，日本的管道设备也不同。倘若日本人都吃外国大米，不仅日本国民的身体会垮掉，连日本的下水管道也会坏掉。我亲耳听到过日本的一些学者这样讲。他们可不是空话连篇的自民党政客，而是堂堂的博士。日本人的种种说辞，如大米体现了日本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很难令人相信。日本不过是以此为借口，补贴本国农民。真正的原因是为自民党捞取选票，创造就业机会，或是捞钱。

我们一路向西，准备从日本西岸乘船去西伯利亚(Siberia)，沿途经过大片稻田，感受到水稻种植业的不菲身价，也悟出为什么地方议员可以呼风唤雨。利用率极低的优质公路直通乡村，完全是政客为捞取当地选票而修建的。同自民党的政客相比，华盛顿的那帮政客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日本政府预算的40%用于修建公共工程，美国只是9%。如此预算，使日本经济大伤元气。日本的房价是天文数字，原因之一是土地价格高昂，地价高又是因为米价太贵。没有哪个农民会在种植如此昂贵大米的地上盖房子。

到了神户(Kobe)后，我们品尝了享誉全球的神户牛肉。神户牛肉是极其昂贵的一道菜。日本人会向你解释神户牛肉贵的原因：牛都是特别喂养的，饲养员每天用手给牛做按摩，帮助它长肌肉，而且不让它累着。他们说的是真的，神户牛肉是我吃过的最嫩的牛肉，几乎不用嚼。不过一份神户牛排100美元的真正原因是，日本的牛肉受到保护。日本若实行

自由贸易的话，神户牛排这道菜仍然会很贵，但比现在要便宜一半。听到100美元一份牛排或50美元一个西瓜这种荒唐事时，都要探究一下为什么。

日本奉行的愚蠢的保护主义政策会继续削弱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为了阻止两家煤矿破产，日本政府迫使本国的电力公司以3倍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购买日本煤，然后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为了保护一个政治上有势力的行业里的少数人，1.25亿的日本人和日本经济不得不承受更高的能源价格。

多年来，日本走向繁荣的原因之一是，它与外界隔绝。这个岛国民族单一，全民思维方式相同。日本人集体决定做某事时，一般都能做成。在一个高度集权化的国家里，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日本的民族性格有一个缺陷：过于死板僵硬，几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在富士山附近，有一家餐馆。我去这家餐馆用餐，点完菜后又要了一碗饭。侍者告诉我，菜单上没写米饭。我不禁吃了一惊，问：不会没有米饭吧，菜单上有各种各样的寿司呀。她仍然说，没米饭，因为菜单上没写。我点了十几份鱼肉寿司。侍者端上寿司后，我要了一个空碗，把寿司上面的鱼片去掉，米饭倒入碗内，指着碗对侍者说：“瞧，你们这儿还是供应米饭的。”我这样做并不是想侮辱女侍者，也没有不尊重她的意思。然而侍者无动于衷，坚持说，没有米饭，菜单上没写米饭。

我真希望这件事是我杜撰的，可它是真的。日本在海外素以经济效率高闻名，可它正在被僵硬和过死的规章制度扼杀。当年令日本走向强大的资本——创造力和独创性——正在迅速消失。今天日本的发展阶段相当于当年自满的美国。那时，美国控制了电视机和汽车制造业。结果日本超过了我们，造出了更好的汽车和电视机。日本还没到马上破产的地步，但在一个受保护的日本社会中，战后一代日本人的奋斗精神已不多见。

日本是世界上的头号富国，一个经商意识融于血液的民族。技术据说领先于世界各国。这又是一个据说我们应该害怕并仿效的国家。你开车走过日本的高速公路和极其昂贵的付费公路后，发现无论是收费公路，还是加油站，都鼓励顾客用万事达卡、VISA卡、美通捷运卡和晚餐俱乐

部卡,可它们只接受从日本银行取钱的卡。

日本的体制到底有多僵硬呢?我想开一个股票交易账户,结果在众多股票公司面前碰了一鼻子灰,说开不了。逼得我打电话找日本证券交易所,得知外国人在日本开账户买卖股票完全合法。但只有一家股票公司——东京证券——同意为我开账户。可到了也没开成。该公司负责重要客户的公司职员称,他不知如何把美元换成日元,也不想弄明白。这是达到目的伎俩之一。根据我的经验,日本人回绝别人的技巧绝对是世界一流水平。

读者可能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想在这样一个地方开账户呢?

自从我 10 年前骑摩托车穿越日本后,我趁价格下跌及时卖掉手里握有的日本期权,赚了一笔。现在我看好日本长期投资前景的主要原因是(我认为日本市场看涨),全世界的人几乎都认为,日本已经无可救药。日本的股票非常低廉,与 14 年前相比,几乎下跌了 75%。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的股票不会再跌 75%。但日本市场确实显露出了跌到谷底的迹象,至少就几年、而不是几十年的中期而言。今天的日本人心灰意冷,自杀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而出生率降至最低水平。因为经济上没有安全感,日本人不愿要孩子。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最热门的职业是当公务员。今天的日本,人人自危。

我坚信,日本经济暂时跌到了谷底,经济繁荣——或称之为经济反弹——即将到来。我在寻找适于中期投资的股票。此外,日本银行以其一贯的方式清楚表明,它将加印钞票。从经济角度讲,这是失策。一国政府印钞票时,钞票首先流入股票市场。我觉得,短期内,日元针对更疲软的美元比价将升值,因此不仅一些股票会有不俗的表现,日元也会水涨船高,给我带来双倍的赢利。我再说一遍,我谈的是短期或中期投资前景。今后 10 年或 20 年,我不指望投资日经指数能赚钱。日本正在逆风航行,而不是顺风。

不过还有希望,不管多么渺茫,还是会有转机的。经历了 10 年的经济停滞,由于整个经济体制越来越腐朽,日本选民认识到,国家不堪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败,正在走向崩溃。选民,尤其是没有从现行体制中得到任何好处的城市选民,最近给政客发出了信号。新首相了解问题所在,

讲话也都讲到了点子上。接下来要看他是否能有所作为。

其他国家要求日本改革自身经济体制，清偿破产的公司，规定银行勾销一切坏账。不无讽刺的是，美国调子唱得最高，极力主张日本以此为出路。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国内大幅下调利率并加印货币。美国的银行于是可以搭救无数失败者。熊彼特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奇就奇在创造性的毁灭。去掉朽木后，方可生出嫩芽。可日本和美联储一直阻挠去旧迎新。

我们在日本一共呆了5周。就日本的面积而言，我们呆得够久了。就日本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而言，又呆得不够长。日本的古老寺庙、艺术、音乐、舞蹈和其他文化内容令我们陶醉。我们兴趣盎然地参观了中世纪的古堡，恨不能多看几处。此外，还花了几个小时看了一场职业棒球赛，观赏了大阪水族馆。到过广岛后，我更坚定了反战的信念。佩奇不禁潸然泪下。从太平洋到我们要去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路途遥遥。该是上路的时候了。我们不想赶在严冬季节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倒不是说我们对付不了严冬，而是因为我们明年1月已有其他安排。1月1日，也就是新千年的第一天，或者说旧千年的最后一年的第一天，不管怎么计算，我和佩奇计划在2000年1月1日这一天结婚。不过在哪儿结婚，采取什么方式，还没有想好。

上一次我从日本到俄罗斯时，坐的是一艘客货两用渡轮。渡轮每月一班，从横滨起航。这趟渡轮已经没有了。我们最后设法搭乘了一艘从伏木起航的船。这是一艘运送二手汽车的船，夏天才捎带少量乘客。

日本人有一条法律，其实有很多条法律，硬性规定了汽车安检更新标准。日本人与其一直开旧车，倒不如每隔两三年换辆新车开更合算。人为制定这些苛刻标准是为了确保日本的汽车工业长盛不衰（典型的日本做法，以国民利益为代价）。结果日本三年新的车非常便宜，几乎不值几个钱。由于日本的二手车价格便宜，保养费用昂贵，结果出现了一个在世界各地倒卖日本旧车的行业，而且很赚钱。

例如，大量日本二手车卖给了许多非洲国家。这类车的方向盘在右边，所以很好辨认（日本和英国一样，也是在公路左侧开车）。一路上，我

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方向盘在右侧的日本面包车，车上还贴着日语广告，宣传东京某个家具店，或是大阪的一家生肉市场多么多么好。

西伯利亚的商人大肆贩卖日本二手车。我们搭乘的那艘船上有将近一百辆日本旧车，可以说是满载。我们开自己的车挤上了船，渡过日本海，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整个航程需要 40 个小时。

6

数字化的蒙古

离开日本前，我们又做了些准备工作。我打了最后一针预防乙型肝炎的疫苗。一共需要打三针，第一针打过后隔 30 天打第二针，6 个月后打第三针。佩奇比我打得早，在釜山就打完了第三针。为了这一趟旅行，我们打的预防针比大多数人一辈子打的都多。回到美国后，佩奇的预防针卡上，合计有 24 针，最早一针是我们动身前 9 个月打的。

这次旅行不光是打了很多针。我和佩奇到处找市场逛，借此了解各国的社会。我有收集癖，我俩买的东西很快塞满了汽车的后备箱，里面都是一些没有直接运回美国的物品。几乎每经过一个国家，我们都要抽时间去当地邮局，不断把需要运回的物品运回国内。如果想马上寄一样东西，我们会用敦豪环球快递，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过是想看看当地邮局，通过它们可以了解所在国的很多情况。（在蒙古，邮局在显眼的地方公开出售裸体挂历。哈萨克斯坦的邮政人员没完没了地用蜡封住信口。俄罗斯禁止邮寄胶卷，甚至禁止邮寄俄罗斯的工艺美术品套娃，不过可以携带套娃开车或乘飞机出境。）可以想象，日本的邮政效率非常高。

在东京期间，我们拿到了去俄罗斯的签证。若当初在美国申请的话，还没等入境就过期了。申请签证花了一周时间，每个签证收费 65 美元。签证不过是旅行中需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之一。考虑到我们的旅行方式，随时需要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签证。凡有可能，总是提前两站申请签证。对于一位走陆路的国际游客来说，顺利拿到签证的重要性不亚于保养好

汽车。我们对保养汽车也十分尽心，尤其是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尤其是从现代化的日本开车到落后的前苏联地区。在日本期间，我们换了新轮胎，虽然旧轮胎还好好地。天晓得在西伯利亚会遇到什么？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的海军基地，也是该国在太平洋的第一大港。办理我们汽车入境的手续，整整花了 29 个小时。一位老朋友在这里再次与我们会合。他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和英语，今夏将陪我们走完 7 500 英里旅程中余下的大部分路程。此前，他曾把我们从小格鲁吉亚一直送到中国边境。

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之间长达 400 英里的公路是最后一大段铺设好的公路。此后，直到翻越乌拉尔山之前，再没有看见过像样的公路。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后，我们住进了国际旅行酒店。我上次穿越西伯利亚时，途经此地就住在这家酒店里。我们注意到，酒店里有不少年轻的俄罗斯人，大约有十来个，个个衣着得体，在大堂里晃悠。我们以为酒店里正在举办生日晚会或是类似活动。穿过人群，眼前是一大群已办理好住宿手续的日本游客。几分钟后，我们得知酒店已住满时，方注意到大堂里的年轻人都是姑娘，而日本游客是清一色的男人。

六个专门做日本生意的当地女老鸨包下了酒店的所有客房。其余的几家酒店也客满了。从日本到西伯利亚和太平洋远东地区比到日本人常去的曼谷或菲律宾便宜多了，况且西伯利亚的酒店也更便宜。由于这里的卖淫行业刚刚起步，姑娘也鲜灵得多，其他地方很难竞争过这里。任何一个新市场出现时，总会见到以上屡试不爽的竞争手段。我们获知，游客花上 100 美元，就能销魂一夜。

前苏联终于有了自由贸易。经过了数百年的奴役后，今天的俄罗斯人获得了自由，可仍然没有工作。这些年轻妓女一晚上挣的钱，比干正经工作一个月挣的都多，如果能找到正经工作的话。我感觉，俄罗斯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官方提供的 12% 和美国大萧条期间的 20% 之间。

倘若没有了日本游客，哈巴罗夫斯克的酒店都会关门。而现在，它们个个顾客盈门。多亏了从东京飞来的一个航班被取消了，我们才在城里找到一家酒店落脚。第二架满载嫖客的飞机来临前，旅馆收回了我们的房间。我们被迫离开此地。

自从我上次来过此地后，哈巴罗夫斯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妓女行业除外。城里有几家卖西方品牌衣服的商店，可佩奇很快发现，都是些冒牌货。哈巴罗夫斯克是一个离海不远的大城市，有一些娱乐服务设施，如果你能认出来的话。后来穿越西伯利亚时，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晓得，越往西走，困难越多。西伯利亚的城市，包括哈巴罗夫斯克，在前政权下年久失修。自从前苏联解体后，越发破旧不堪。

哈巴罗夫斯克西边 120 英里是犹太人自治区。20 世纪 20 年代，斯大林建议把它建成犹太人家园（他想出来的办法，好把前苏联的犹太人迁到西伯利亚）。自治区成立之时，不少人心情激动，全世界的犹太人对此寄予厚望。直到迁到西伯利亚，犹太人才恍然大悟，这里是……西伯利亚。所谓自治区，完全是一场骗局。今天，虽然自治区的名字未改，可犹太人不超过当地人口的 1%。当地残留了一座木质结构的犹太教堂。我们来时，借前苏联解体发了家的某个寡头或政客正在建造一座教堂，一座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完工后，面积是犹太教堂的 6 倍。

在自治区首府比罗比詹（Birobidzhan），我们住进了一家酒店。没过一会儿，妓女就凑了过来，一晚上只收 15 美元。

布拉格维申斯克（Blagoveshchensk）位于阿穆尔河（Amur River）畔，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该区的首府。阿穆尔河横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中间。自从 9 年前我来过此地后，该市有了一些变化。前苏联解体时中国人蜂拥而至的迹象，处处可见。和中亚共和国善于投机的资本家一样，中国人来到此地，看到当地难以置信的低廉价格，见什么买什么，然后在国际市场上出手。俄罗斯人醒悟过来后，中国商人的生意变得清淡起来，不过仍可看出，对岸的中国人继续在当地投资，包括建了一家娱乐公园。

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和日本的资本正在填补西伯利亚的经济真空。广袤的西伯利亚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北边地区散布着黄金、钻石和钽矿。中国缺少原材料，什么原材料都需要。而西伯利亚奇缺劳动力和资本。西伯利亚几乎人迹罕至，而中国有 12 亿人口，每天早上醒来，需要有份工作。日本提供了巨额资本，和中国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开发西伯利亚丰富的资源。西伯利亚将成为俄罗斯的新边疆，尤其是现在对付严寒的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毕竟美国人现在能在北极圈附近地区开采石油了。

在远离中国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仍有俄罗斯人抱怨,中国人偷光了一切。他们是指中国人越过边境,抓住机会做起了生意。而中国人则告诉见到的所有人,早在有俄罗斯以前,中国人就定居在贝加尔湖一带了;湖的俄文名字源自两个中国字,中文里是“圣湖”的意思。

整个西伯利亚,包括濒临太平洋的远东地区,曾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正在不断地返回这块土地。19世纪前,阿穆尔河北边地区几乎只有中国人居住。俄罗斯不断向东扩张,把犯人遣送到西伯利亚。19世纪,中国国力日衰,欧洲人乘虚而入。俄国人霸占了中国北边领土,修建了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积贫积弱,内战不止。欧洲人纷纷瓜分中国。

斯科沃罗季诺(Skovorodino)和车尔尼雪夫斯克(Chernyshevsk)之间,是一大片沼泽地。此地从来没有路。要想穿越这片沼泽地,必须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我是上次来此地时知道的。当年,我曾花了两天半时间,乘一辆平板货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次到达斯科沃罗季诺后,我和佩奇开车直奔火车站。

“还记得我吗?”

老站长看见我吃了一惊。

9年前我见到他时,他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前苏联体制下的官僚。9年过去了,他几乎没变样,还是个官僚,只不过体制换了。1990年,我们的翻译敲开他的门,走进办公室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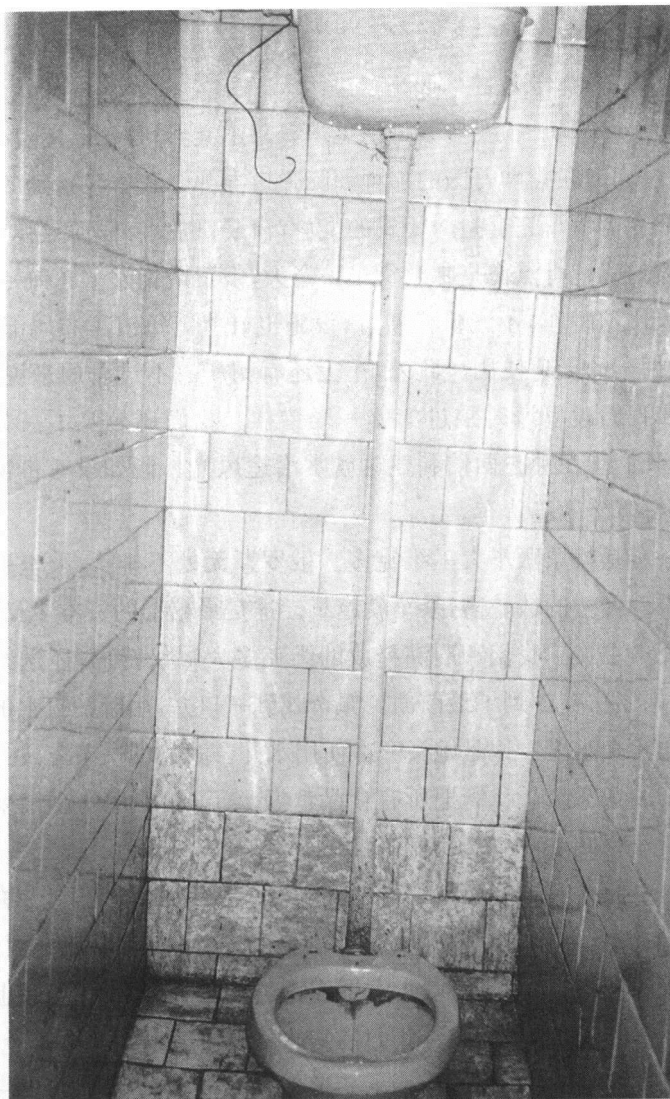
“我带了两位美国人来。他们需要一节平板货车。”

“没问题,带他们进来吧。”他以为翻译和他开玩笑。

我们走进办公室后,他猛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此前没有人骑摩托车横穿过前苏联。今天我又回来了。这回,站长和上回一样吃惊,不停地摇着头。

我告诉他,这次我没有骑摩托车。“我有两辆汽车,一辆挂车,一共5个人。”

当然,运费比过去上涨了很多。站长建议我们不用平板货车,而用另一种更便宜的办法。



在我们走过的大部分地区，西伯利亚的这个厕所还算是比较好的。

“我可以给你们拨一节运导弹的车皮。”

“什么？”

“导弹专运货车。”

“什么是导弹专运货车呀？”

站长沿着铁轨，领我们去见识见识。果不其然，是曾经运过导弹的货车，就是过去苏联瞄准美国的那种洲际弹道导弹。我本该猜到的。

导弹专运货车完全是封闭式的，没有窗子，也没有任何导弹标记。货车外面喷的标记有点像是邮政货车。今天，俄罗斯有大量导弹专运货车。站长建议用这种车，不光价格便宜，设施也好些。每节车厢尾部，有四张床铺，供押车的士兵使用。此外，车上还有厕所。不过总的来说，火车上的设施和我们渡里海时乘过的船一样糟糕。我们还是要了一节平板货车，因为我们想在穿越西伯利亚时欣赏沿途风光。假如没有带窗子的火车，我俩打算坐敞篷货车。

下一步是找票贩子大王维克多。俄罗斯无处不排队，乘坐平板货车也不例外。你付的钱越多，乘车就越早。这是最糟糕的资本主义，抑或是最好的资本主义。我们和刑满释放的维克多大喝伏特加，还送给他一些礼物，结果名次被挪到了最前面。佩奇找到一口井，用辘轳打上水灌满了我们的4个水袋。这是她头一次使用水井。我们的一节车皮挂到了下一辆发车的货车上。我俩把所有食品都搬上了车，外加一个用来方便的水桶。货车一共有66节，我们是最后一节。有些车皮满载二手汽车，和我们渡日本海时看到的旧车一样。晚上，我们睡在平板地上，惊喜地发现我们乘坐的是辆快车。我以为，这一次会和9年前那样，走上两到三天。没想到火车只用了24小时就走完了四百英里左右的路程，一路上很少停车。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克后，我们稍微休息了一下，再次上路。

广袤的西伯利亚原野上，稀稀落落散布着一些村落。惟一条和铁路平行的公路两边，有少许居民。公路大部分地段都没有铺柏油，开车很危险。你也许正沿着一条铺好的公路以100公里的时速飞驰，突然间前面出现一个大坑，要么是柏油路突然中止，似乎修路的人成心想毁你的车。前苏联时期，赤塔(Chita)市曾是一个军事重镇。刚刚出城，我们汽车的一个轮胎就放了炮。挂车刹车失灵，钢板弹簧也坏了。此后，钢板弹

簧又坏过几次。

老实说,我有点绝望了。方圆几百里内,根本没有奔驰车的维修点。可话说回来了,要不是汽车在远离维修站的地方一坏再坏,我们也无缘结识欧根了。不过向你介绍体格高大,如今名扬俄罗斯的欧根之前,我先就奔驰牌挂车的钢板弹簧说几句。

斯坦尔曾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家一流的汽车制造公司干过。这家公司专门制造一次性的汽车或样车。电影行业经常需要这类汽车。如果有哪家制片厂需要炸毁一辆汽车,或是奔驰公司需要一辆样车参加底特律汽车大展,它们往往找这家加州公司。

参展的马和干活的马是不一样的。给参加展览的马安个漂亮的马鞍子是一回事,耕田时就需要另一种马了。加州这家公司擅长打扮参展的马,可对干活的马来说,简直是场灾难。我需要一辆高性能的汽车,可这家公司造不出这样的汽车。

他们告诉我:“这部车子哪儿都能去。我们在土路上试开过。”

在加利福尼亚州,找到土路并不容易。而加州的劣质公路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堪称一级公路。

“我们还在加州的沙漠上试开过。”

怎么说才好呢?加州的沙漠仿佛儿戏。

“这部车哪儿都能去。”

一点不错,在加州哪儿都能去。

这家公司造的几乎所有零件至少坏过一次,常常是坏过两三次。凡是奔驰汽车的原装零件,都没有问题,而且质量一流。我这样说,奔驰公司并不付我钱。凡是加州这家公司造的零件,没有不坏的。拖车的钢板弹簧和轴承断了11次。车上的备用油箱呢?一共裂开了3次,每次裂开的地方都不一样。为了使它看上去更像是跑车,我们更换了挂车的悬架,采用了特制的悬架。后来证明,它经不起阿塞拜疆劣质公路的颠簸。车子撞上了什么后,反弹回来,轴承顶到了油箱底盘。油箱底盘是奔驰厂家的产品,可不管哪个厂家制造的油箱底盘,如果一根轴承以100公里以上的时速撞到它的话,也会被撞破。我们在中国用原装的奔驰弹簧换下了

旧弹簧，后面的旅途中再没有坏过。现在车上用的，仍然是上次换的弹簧。直到我们到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后，才找人一劳永逸地修好了拖车的钢板弹簧。

连神通广大的欧根也无能为力。

欧根五十岁左右，个子矮矮的，一直住在莫斯科。他是奔驰公司在俄罗斯的顶尖机械师。由于赤塔附近找不到奔驰的机械师，我们打电话询问奔驰公司设在莫斯科的总部。奔驰公司在俄罗斯提供一项服务，无论你在哪儿，都可以向你提供路上服务。为了修理我们的汽车，奔驰公司派欧根从莫斯科飞到赤塔。这好比派人从洛杉矶飞到夏威夷。

欧根在西伯利亚和我们呆过几天，我们喜欢身边有他，他也愿意离开莫斯科，到外地走走。他身上携带一张卡，证明他是切尔诺贝利的志愿者。事故发生时，他和其他一些人冲进灾区，抢救受害者。很多人后来死于超剂量辐射。没死的人，包括欧根，也来日无多。他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不喝酒的俄罗斯人。他不敢喝，因为他现在服各种各样的药。喝酒会导致药物失效。他成了英雄，得到一张身份证，每次买东西不用排队。我前面说过，俄罗斯到处是排队的人，而且队很长。此外，他还享受其他一些特权，比如政府津贴。

欧根根本没打算修理挂车的刹车装置，干脆把它卸了下来。

他解释说：“你们不需要这玩意。不拆下来，也会再次坏掉的。”

他安上了从一辆俄罗斯军用吉普车上卸下的钢板弹簧。我们从附近的军事基地买来了这个二手货。基地的人从停着的一辆吉普车上卸下钢板弹簧，卖给了我们。

今天，俄罗斯军队的一切装备都能卖。卖装备的可能是将军，也可能是士兵。各种装备从军需官手里不翼而飞，士兵拿不到军饷。俄罗斯军队和欧根一样，也是来日无多。谁都不用怕它。

俄罗斯的吉普车又旧，又保养不善。我们接下去周游世界时，又弄坏了几个钢板弹簧，包括从俄军用吉普车上卸下的那个。

动身去莫斯科前，欧根递给我们一张名片。

“在俄罗斯遇到什么问题，亮一下这张卡。”他告诉我们。

由于欧根是奔驰公司在俄罗斯最好的机械师，大凡有头有脸的俄罗斯人，没有不认识他的。叶利钦的轿车坏了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找欧根。克格勃的奔驰车出了毛病，也找他。还有黑社会的人。

他的名片是你能搞到手的通行前苏联地区的最好的护照。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佩奇生怕丢了它。

（欧根告诉我们，一次车臣交战双方要求停战，以便让他飞到车臣修理他们各自的车辆。他刚离开，双方又重开战火。我们不相信他的故事。后来到了莫斯科，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是真的。我们当然晓得，交战双方的首领绝不会死在一辆前苏联产的拉达牌汽车里。）

由于俄罗斯的航空业和其他行业一样落后，因此欧根从莫斯科飞到赤塔用了3天时间。在我们等他期间，一点没闲着，好好游览了一下这个城市。正巧有个马戏团路过这里，我们看了场马戏，和跳舞的狗熊合了张影。这3天过得很愉快，觉得还没有呆够。我们还看了一场拳击比赛。当地的黑社会老大还推荐我们去了几家有趣的夜总会。

黑老大的名字叫阿列克赛，外号“巴拿马”。我和他很快成了朋友。他开了一家酒店，叫巴拿马城酒店，绰号就是这么来的。我们恰好住在这家酒店里。我始终没弄明白，怎么给酒店起了这么一个名字。现在想来，也许是俄罗斯黑社会的人都在巴拿马洗钱的缘故吧。两年后，我们到了巴拿马，验证了我的猜测。我们在当地结识了一些参与非法交易的俄罗斯人，如贩毒、卖淫或其他活动。

俄罗斯的黑社会分子看上去都是一个样，一律身着欧洲剪裁的名牌黑色西装。西伯利亚的黑社会人士全是光头，他们自称是夏天的发型。在赤塔的酒店餐馆里，他们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同一张桌子上。过了个把小时后，他们中的一个走到我们坐的桌子边，问：你们没有贿赂任何人，怎么能在俄罗斯一路畅行无阻？

我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没贿赂呢？”心中暗想，虚张声势一下，或许能够过关。

他马上回敬一句：“我知道你没贿赂过，因为我核实过。”

我不寒而栗。如今在俄罗斯，黑社会效率最高。我面前的这个人又是这个地区的黑老大。我马上给他买了杯酒，和他及他的同伙痛饮伏特

加。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成了好朋友。佩奇和其中的几个跳过舞。欧根赶到后，我们的处境就更有利了，黑社会越发把我们看作是自己人。离开赤塔时，欧根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和两个疯狂的美国朋友开车穿越西伯利亚，他感到十分开心。随便他想干什么，奔驰公司都没意见。毕竟他是奔驰公司的王牌。再说，他还有那张切尔诺贝利卡。

动身前，阿列克赛把我拽到一边。此前，我已经去理发店剃了个光头，和新结交的朋友一样，都是夏天的发型。

阿列克赛告诉我：“我已经跟前面的人打了招呼。不会有人刁难你们的。”

他已经给前面两三个城市的人打过电话，让我们畅行无阻。

他补充道：“如果真的遇到麻烦，告诉我。谁刁难你，谁就别想活。”

他说这话可是当真的，不是光嘴硬（在美国住一家好饭店的费用，在西伯利亚就可以雇个杀手。而且如今雇杀手的做法越来越司空见惯）。我们得到了黑社会的保护，还有欧根在我们身边。我俩兴高采烈，继续一路西行。

下一站是布里亚特(Buryat)自治区的首府乌兰乌德(Ulan-Ude)，是布里亚特蒙古族居住的地方。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也是前苏联126个少数民族之一，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佩奇查了地图后，告诉我蒙古就在我们南面不远处。

“干吗不去蒙古看看呢？”她提议。

我没想过去蒙古，9年前路过此地时也没想过。不知咋的，以前我旅行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好主意！”

我们这次旅行又不是美国捷运旅行社安排的环球旅游团，而是一次猎奇游，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吗就干吗。我们找到蒙古领馆，交了钱后领到了签证。因为多交了点，马上就拿到了。于是我们驱车前往蒙古。

1921年，当时的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1924年，在前苏联的援助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37年斯大林开放前苏联边境时，外国人穿越边境只能靠坐火车，没有一条公路，也没有汽车，当地人常常徒步旅行。

即使后来修建了公路，前苏联仍然无法克服自己僵硬的思维。今天，尽管俄蒙边境有一条铺好的公路，但不对外国人开放。外国人还得遵照 1937 年的规定，坐火车过境。旧的制度已经有了自己的惯性。

因为这种荒唐的规定，一门生意应运而生。当地人找到了事做，向外国人收取一定费用后，替他们把车开过边境。像你我这样的外国人需要乘坐火车，花上 8 个小时，也就是一天时间，走完 25 英里的路。这完全是前政权僵硬体制的产物。因为是边境，一切都要受到反复盘查。待过境后，你再去寻找替你把车开过来的当地人。

不用说，我才不干嘛呢。我不会把车交给任何人。

“找辆平板车，自己把车放上去，我们就允许你把车运过去。”

“装货站台在什么地方？”

“我们没有装货站台。”

我锲而不舍，设法找到了上次骑摩托车路过乌兰乌德时认识的一个人。他叫维克多，是一位年轻记者和共产党干部。1990 年，他卖给了我一些违禁物品，如一套苏军陆军军服，就是苏军在阿富汗沙漠穿过的那种，还有坦克车长戴的一顶帽子。我喜欢收集这些玩意。我俩还在一起喝了不少伏特加。他现在是一家报社的编辑。报社正在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不过作为前苏联的官员，他对主管边境地区的将军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听我说完后，维克多拨通了将军的电话。

“让他们开车过境。”他告诉将军。

就这么简单。

我意识到，我并没有战胜现行制度，而是在钻它的空子。面对令人窒息的俄罗斯官僚机构，现行制度之所以还能运转，正是因为它的腐败。这种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只有它失效时，才最有效率。

我们过境时，拿出一台成像相机不停地为士兵拍照，然后把我们的汽车的照片和士兵的照片送给他们，外加香烟，目的是几天后我们返回时，他们每个人还都记得我们。这种时候，一次成像相机派上了大用场。

蒙古和伊朗或阿拉斯加差不多大，总人口 260 万，相当于堪萨斯城的人口。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居住在首都乌兰巴托(Ulan Bator)，其他广

袤地区人烟稀少。14 世纪中叶时,蒙古人还控制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疆界从朝鲜一直延伸到一百年前征服了的匈牙利,实在难以置信。中国正是为了防御蒙古骑兵的入侵,才开始修建万里长城。蒙古人出兵攻打日本时,台风突起,军舰沉没,被迫退兵。从那以后,日本人开始有了“神风”这个词。马可·波罗称,他从威尼斯到过蒙古帝国。蒙古铁骑横扫世界。蒙古人的强大,要归功于一项小小的发明。因为有了马蹬子,他们可以更好地驾驭快马,而其他国家还把马作为运输工具。后来所有人都掌握了这项新技术。此后,更新的技术又问世了。落伍的蒙古人最终被历史淘汰。

今天,“外蒙古”几乎是闭塞的同义词,偏僻、落后、停滞不前。可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也许是世界上技术最发达的城市,完全实现了数字化。前苏联解体后,一个自由、独立的蒙古得到了多种外援。由于不存在需要更新换代的基础设施,蒙古的技术一下子跳跃了 3 代。乌兰巴托全市铺设了光导纤维电缆,市内任何一部电话都能上网。

俄罗斯就做不到,连打个外线电话都不容易。在俄罗斯发电子邮件,必须亲自去网上公司,而不是在网上点击一下。我们沿途不停地拜访提供联网服务的公司。俄罗斯大一点的城市都有上网服务公司,通常是一间小屋子,里面挤放着五六台老掉牙的电脑,几个衣着随便的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我们冷不丁地出现后,他们又惊又喜,很高兴看到来自异域的西方人。

我们拿出笔记本电脑,炫耀地问:“在这儿上网怎么收费?”

1 小时 1 美元。他们按这个价格收费已经狠敲了我们一笔了。不过能更新我们的网址,还是挺开心的。倘若没有偏僻小城里这些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我们会连续几周失去与亲朋好友的联系。这又是一个例子,表明十年内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数据时代带来的又一变革,对世界上的旅游者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变革,就是取钱的手段。这次我和佩奇走了 22 个国家,出乎我意料的是,再也没有遇到上次我旅行时取钱的困难。上一次,每回出入边境时,我不得不把身边的现金藏起来。边境士兵要我在特别的表格上申报随身携带的现金数量(当然,不少士兵不过想得点小恩小惠)。那时,我到处藏现金,



在西伯利亚赤塔市的集市上,妇女控制了集市一端的换汇黑市,男人控制了另一端。



蒙古的一位女牧民在她装饰鲜艳的蒙古包里为我们上咸茶。



几百年来,蒙古的游牧民族仍然阖家住在蒙古包里。
手机是蒙古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这张照片缺了
女主人和她的一个孩子。她想给儿子换件
衬衣,再梳梳头,让他能更上照一些。

摩托车的大梁里、鞋子里、头盔里，任何士兵不可能查的地方我都藏。为了避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我常让我的银行把钱电汇到我要去的国家的首都，用于食宿和买汽油。这一次，完全不需要这样做了。我无需携带大量的现金。新千年降临之际，世界任何地方都接受 VISA 卡、万事达卡、晚餐俱乐部卡和美国捷运卡。甚至在俄罗斯，我们从最近的自动取款机那里想取多少钱就取多少，有时甚至可以取美元，更不用说现代化的乌兰巴托了。不过要小心。一次我在西伯利亚取钱，正把信用卡装进钱包时，取款机又把钱吞走了！结果花了我两天时间，才把钱追回。

在蒙古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管理电话业务不仅是技术上的噩梦，经济上也匪夷所思。于是蒙古直接跳跃到数字通讯。在蒙古，每个人都有一部数字化手机。马背上的游牧牧民随身携带手机。大多数蒙古包内也有手机。

几百年来，跳跃式的技术进步对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 世纪初，美国的城镇渴望有运河，好借此吸引商贩。没有运河的城镇干脆选择了新出现的铁路。很快，运河消失了。（有谁还记得伊利运河？）此后，又是州际高速公路。无视高速公路的老铁路城镇消失了。今天，圣迭戈（San Diego）是美国的一座大城市，而位于新墨西哥（New Mexico）州的铁路枢纽图克姆卡里（Tucumcari）却不是。所以趁所有人都争抢高速公路时，还是赶紧想出什么会取代州际高速公路，然后捷足先登。

在去乌兰巴托的途中，我们看到游牧牧民举家搬迁，赶着马、羊和骆驼转移到新草场。他们都是曾经横扫欧亚平原的成吉思汗的后代。我们注意到，女牧民和男人一样擅长骑马。我们给他们拍了些照片。一次我们给蒙古包拍照时，女主人邀请我们进去做客，给我们端上了咸茶。我惊奇地发现，在这里，人们喝茶不放糖、蜜或牛奶，而是放盐（当然，蒙古本来就不产糖）。又是一种没试过的喝茶方法。

我们想给女主人和她的孩子多拍几张快照，送给她几张。她一共有 8 个孩子，年龄不一。女主人一把抱住最小的一个，让我们等一会儿。她给孩子梳了头，换了一身裙子，再摆好姿势让我们拍照。新换的裙子比旧的稍微新一点。她想给这个孩子拍张最佳照片。她的做法和世界上任何一地的母亲毫无二致。这样的母亲，完全可能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富人区

的一位母亲。如果有人告诉你，人和人有本质的不同，千万别信。

我们到达乌兰巴托时，奔驰公司刚在这里新开了一家车行。车行的主人叫梅尔歇斯，是个德国人，他的同伴是洛杉矶的一个律师。几年前，梅尔歇斯随父亲到蒙古出差，从东往西穿越西伯利亚时，注意到奔驰车越来越多。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任何稍微留点心的人都不难看到，绝大多数奔驰车，可以说所有的奔驰车都是偷来的。大批豪华轿车，有一些是宝马，主要是奔驰，在世界各地被窃，然后在俄罗斯和蒙古非法黑市上浮现。前苏联刚一解体，马上就有了倒卖汽车的黑市。

这位德国小伙子找到奔驰汽车公司，申请在蒙古开个车行。他指望马上在蒙古卖出大批新汽车。他哪里是黑社会的手？不过他算了笔账，一方面，乌兰巴托已经有了一大批汽车，型号老，且没有零配件或配套服务。另一方面，需要新车的外交官以后会越来越多。据此，他说服了奔驰公司，得到了经营奔驰汽车的许可。我们与他见面后的下一个星期，他的设备就运到了。

我们在俄罗斯期间，估计该国大约有十万辆奔驰汽车，绝大多数都是从其他国家偷来的。两年后我们去巴西时，当地的奔驰代理商告诉我们，一辆奔驰汽车从里约热内卢失窃后，出现在西伯利亚。结果这辆车被送到了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奔驰车行那里。工作人员把这辆车的编号输入电脑，查询一个零部件。根据电脑提供的结果，这辆奔驰汽车是4周前在里约热内卢丢失的，然后从巴西南部一直运到了西伯利亚，效率之高几乎不亚于电脑的查询。

直到前苏联解体，奔驰汽车公司才开始打入俄罗斯。前苏联时期，没人开得起奔驰。在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城，我结识了当地的奔驰汽车代理商埃德诺夫。他从事这一行的时间并不长。在车行后面，停着一辆由一个“新俄罗斯人”拥有的S600型的奔驰轿车。新出现的黑社会成员——那些趴在旧经济的躯体上吸吮的机会主义分子——称自己是新俄罗斯人。这辆车的主人对汽车的保养漫不经心，连机油都没有查过，结果车在路上时引擎烧了。他把车拖到这家车行，交代说：“这辆车有毛病，再给我换一辆。”他从代理商那里又买了一辆S600型

的新奔驰轿车，他还为烧坏的奔驰车订购了一部新引擎，可他甚至懒得回来取车。

这就是“非法资本家”物欲横流的新世界。

这些“新俄罗斯人”到底是怎么富起来的？和我在阿塞拜疆认识的纳米克一样，他们凭借手中权力窃取了工厂和原材料，趁前苏联解体之机，以极其廉价的价格把它们卖给了西方。出售后的巨额收入高达数十亿美元，都存在了瑞士银行里。“新俄罗斯人”完全是旧领主在新千年的翻版，只不过今天的领地改成了炼油厂、铝制品厂、巨大的农场、油田、金矿和工厂，外加私人军队。

我听说，莫斯科市内的高档奔驰轿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多。如果俄罗斯有10万辆奔驰轿车的话，往低了算，每辆车价值1万美元，那么进口这些车也需要10亿美元。这笔钱从哪儿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后者的钱又来自世界各国的纳税人。1998年，我曾在国会作证。卢布崩溃后，国会正打算再拉俄罗斯一把。当时我就表示，应该解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这两家机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此后变得越来越庞大，早就偏离了最初的宗旨。它们的分析毫无价值，开出的药方更糟糕。两家组织经办项目的长期效益如何，没有一家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评估过。项目的最大受益人就是官僚机构里1.2万名享受优厚养老金待遇的工作人员。我的职业是分析财务报表，可直到今天，从未看见过一份我能看懂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财务报表，也没遇见过能解释清楚这些报表的人。每当我在一家公司里发现同一现象时，这家公司多半有严重问题。

我敦促国会不要搭救俄罗斯，可国会不听，又假以上两家国际组织之手把数十亿美元扔到了俄罗斯的无底洞里。

俄罗斯声称自己有贸易顺差，西方的银行家和学者马上就相信了。我先后在十余处穿越国境，去过西伯利亚，到过蒙古，我坚信，俄罗斯官方的话是骗人的。到处都是走私分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偷运过境。前面提到的购买奔驰轿车的10亿美元都是你我的钱。我们把钱交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再转手给了俄罗斯的银行家，最后都被他们用来购买失窃



父亲虽然身患癌症,仍和母亲一道从阿拉巴马
的迪莫波利斯市赶到西伯利亚,欣赏我留的
俄罗斯黑社会分子的夏天的发型。

的高级轿车。轻信的人也许相信“官方”数字，而今天的官方数字的水分比前苏联时期还要大。多亏货币市场并不傻。亘古以来，货币市场从来不去理睬统治者怎么说。大街上的老百姓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卢布才一跌再跌。

需要外部审计的不只是俄罗斯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人人都需要它，哪怕是一丝不苟的德国也不例外。多年来，德国政府就业机构称，它实现的再就业率为 51%。最近一家独立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表明，实际再就业率只有 18%。

我们重返乌兰乌德时，过境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边防士兵还记得我俩。上一次入境时值班的士兵蜂拥而至，想让我们再多照几张。没人再坚持要我们按规定乘火车重新入境。

从乌兰乌德出发后，我们一路驱车向西，沿贝加尔湖前往伊尔库茨克（Irkutsk）。就蓄水量而言，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按照计划，我们在伊尔库茨克与我的双亲见面。

7

婚礼

1996年10月，我父亲被诊断出患晚期癌症。他拒绝接受治疗，一直活得很好。父亲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我从来没觉得他喜欢旅游。可他告诉我，听说了我的这次旅游计划后，生平第一次很羡慕我。

他嘱咐道：“无论你做什么，不要因为我赶回来。不要中断旅行或变更旅行计划。”

我听后颇为吃惊。我从来没觉得他这个人喜欢出去玩。他总是说，他不需要旅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游过欧洲了。过去他从不和我母亲一起出去玩。母亲曾随一帮朋友到俄罗斯旅游。她还开车带我哥哥去过加拿大和美国西海岸。

因为不知他能活多久，离开纽约后，我不停地给家里打电话。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多的电话。每次我都劝父亲加入我们。我们本来希望能说服他同去中国，他不肯听。我们继续劝他，最后他同意与我们在俄罗斯会面。于是，82岁高龄的父亲和81岁的母亲从阿拉巴马州启程，前往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

他们到伊尔库茨克不久，我们一起去逛当地的市场，看到很多在户外散步的老兵，身上佩戴着各种勋章。我父亲和一位俄罗斯坦克部队的老兵在一起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前线浴血奋战。我父亲曾在西线作战，和俄罗斯老兵谈起当年他认识的前苏联士兵，讲述战争结束时双方如何互赠巧克力和伏特加。在伊尔库茨克一个明媚的夏日里，两

婚

礼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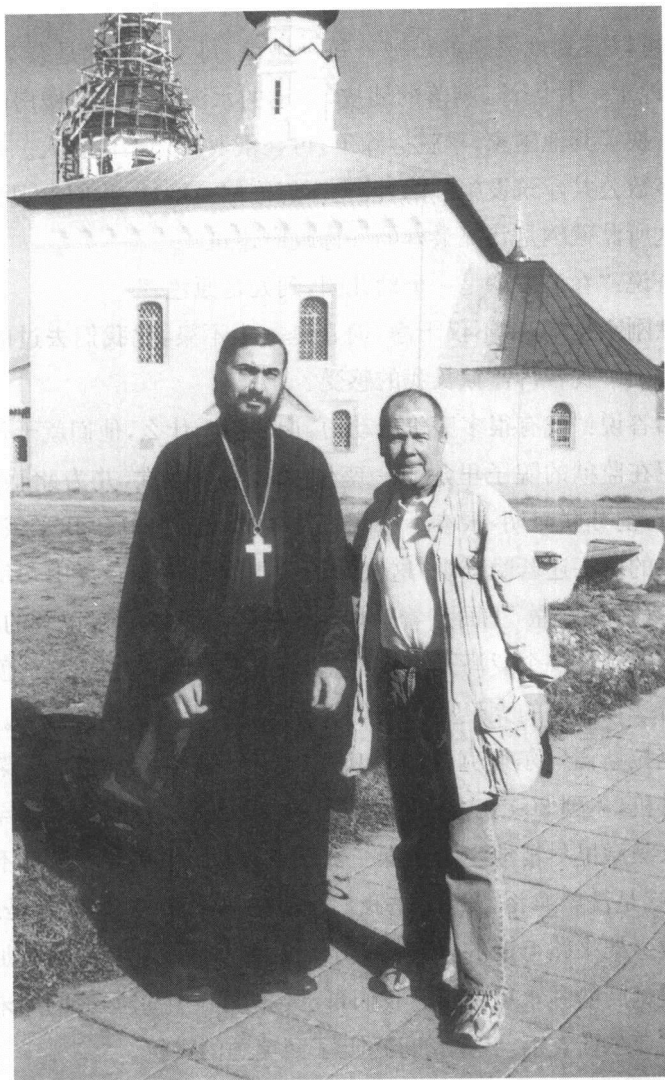
位当年的战友消弭了长达 50 年的分歧，在一起重温战胜希特勒的喜悦，追思逝去的青春。

父母同我们呆了 10 天，一起穿越西伯利亚，从伊尔库茨克一直走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行程将近一千英里。一谈到西伯利亚，马上会想到监狱、水獭，也许还有伏特加。当然，一说到俄罗斯，都会想到伏特加。在伊尔库茨克，我们参观了一家伏特加酒厂。由于来此地的游客并不多，厂长很高兴。（主人盛情邀请我们品尝伏特加酒，结果离开时不免有点醉意。我事先没想到，伏特加有这么多品种。）该厂建于 1905 年，当时还是沙皇时代。后来共产党接管了它。前苏联解体后，厂长将厂子据为己有。尽管这家酒厂垄断了伏特加酒的生产，而且伏特加酒供不应求，但酒厂的工人每天只上一班。我们在俄罗斯期间，无论晚上、下午还是清晨，酒鬼随处可见。

随后，我们又参观了一家毛皮厂，我给母亲买了一顶紫貂帽子，价格别提多便宜了。看见这家毛皮厂和伏特加酒厂，或是俄罗斯众多其他工厂，不禁使人想起 50 年前纽约市的老厂房。今天，没有哪个现代厂家会使用如此落后的电梯和狭窄的楼梯运送原料和商品。工厂简直没有什么像样的机器，环境污浊。换在纽约，倘若有哪个厂主让女工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非得蹲监狱不可。这家工厂加工紫貂和猞猁，墙上贴着付给猎人和下夹子人的价格表。和俄罗斯的其他东西一样，皮衣的质量很差，价格低廉。前苏联时期，质量好坏不是问题，有产品就行了。如果靴子缝制得很蹩脚，或水桶不结实，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会凑合着用。今天，俄罗斯人还是老样子。今后几十年里，这种心态会继续阻碍俄罗斯在世界市场上分一杯羹的努力。

我的一个朋友谢尔盖是伊尔库茨克人，他说服了当地一所监狱的监狱长，允许我们一家人参观这所监狱。直到今天，我都不晓得他是怎么说动监狱长的。还有什么比参观西伯利亚的一所监狱更有意思的呢？而且只需交 2 500 卢布（100 美元），算作给囚犯福利基金的捐款。我们马上答应了。

事先我不知道一所西伯利亚监狱会是什么样子，不过我看到的一切全在意料之中：一张张绝望的面孔，病态而无生气；高高的颧骨，深陷的眼



我上次来时，神父瓦伦廷还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
一位受迫害的神父，在寻求纽约俄罗斯东正教会
的帮助。如今他是新俄罗斯的权势人物，
有房子和古董，手下还有一帮人。

婚

礼

7

睛。我从来没去过美国监狱，那里的囚犯多半也是一个样。

使我感到惊奇的不是囚犯，而是监狱本身。在西伯利亚时，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俄罗斯的破败。每个城镇、每个乡村都是杂草丛生，灰尘遮天，地上一片泥泞，剥落的墙皮，松动的水泥块。许多楼房的阳台摇摇欲坠。换了其他国家，早就拆除了，可在俄罗斯仍然住着人。俄罗斯国内的大多数公共建筑设施陈旧，谁也不想维修。不过，我们参观的伊尔库茨克的这所监狱倒是状况最好的一栋政府建筑。

佩奇说：“看上去像是一个幼儿园，到处是原色。”

监狱刚刚粉刷过，不仅干净，简直是一尘不染，比我们去过的餐馆和酒店还体面。我告诉监狱长我的感受。

他回答说：“我有很多廉价劳动力，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囚犯在监狱的院子里建了一座俄罗斯东正教堂，并为此感到自豪。毋庸赘言，前苏联时期，根本不可能建什么教堂。1990 年我来俄罗斯时，宗教复兴的苗头还若隐若现，这次看到大批教堂正在修复中。每个星期天，教堂都举行弥撒，里面点着蜡烛。这些都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堂，不过我们也看到过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堂和一个犹太教教堂，教堂顶上大胆地耸立着一颗显著的大卫星。俄罗斯境内的佛寺也得到了修缮。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们和谢尔盖花了很少的钱租了一架俄罗斯军用直升机，飞到 300 英里外的熊湖度周末。这里是山区，人迹罕至。我们在一家澡堂里尽情地泡了个澡。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没有不去澡堂的，其实就是洗桑拿浴。这不是我们去过的第一家澡堂，但却是最好的，尤其是乘一架来路可疑的直升机飞了 300 英里后。我们把伏特加和啤酒放到清澈见底的湖水里冰镇。我们自己也过了一个透心凉的周末。返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后，我把父母送上了回美国的飞机。

我和佩奇到了西伯利亚后，缩小了婚礼地点的选择范围。考虑到 2000 年 1 月 1 日我们可能到达的地方，我们把范围缩小到几个国家：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一路上，佩奇开始查看这几个地方的材料，结果全都落选了。例如，摩洛哥规定需要在当地居住 6 个月以上。在自己家乡筹划婚礼已经够难的了，在外国筹划更加复杂。在一个婚礼举办

地以外的国家筹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从西伯利亚筹划……

佩奇毫不畏惧。

我们到了伊尔库茨克后，出于种种考虑，一致选定了英国。在英国举办婚礼比较容易只是诸多因素之一。位于伦敦西北边的泰晤士河畔亨利（Henley-on-Thames）是我和佩奇相爱的地方。1965年，我在牛津大学上学期间，曾在这里参加赛艇比赛，作为舵手指挥全船队员获得冠军，并刷新记录。1980年我从华尔街退休后，经常光顾此地。每年7月的第1周，这里会举办赛艇比赛。能在这里度过1周，简直是太棒了。这里有赛艇队员，香槟酒和皮姆酒，草莓和奶油，还有穿着长裙、头戴华丽帽子的妇女——能领略维多利亚时期英国风情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况且我总能在这里看到很多老朋友。

我前面说过，我和佩奇第一次约会时，问她想不想和我一起环游地球。第二天，我给她打电话，请她看一周后的赛艇比赛。她征求了父母的意见后，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俩一起去了亨利。如果你在观看赛艇比赛时没爱上谁的话，这辈子也不会爱上谁了，因为这是你能想象出的最荒唐、最可笑、最超凡脱俗的浪漫举动，好比是在阿斯科特赛马场举办的赛马会，只不过时间更长。你要是无法赢得一位很少出过远门的北卡罗来纳州姑娘的芳心，就彻底没戏了。好在我成功了。我俩坠入了情网。

我们决定在亨利结婚。此后的半年里，佩奇一直忙于操办婚事，时而用手机，时而发电子邮件。无论是穿越西伯利亚，还是在蒙古、莫斯科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她始终没闲着。

跨越了乌拉尔山后，我们到了乌法（Ufa），从亚洲回到了欧洲。越接近莫斯科，道路越平整，城市越来越大，间距越来越密。我们好像总是遇到婚礼。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婚礼多在酒店举行，而我们常常住酒店。新娘的母亲常常把我们拽到婚礼的队伍里，要么是伴娘或新郎盯着我们的车拍照。随后婚礼人群裹挟我们而去。

外国人如果只去莫斯科或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的话，会错以为俄罗斯真是一个国家。12年前，在俄罗斯找个地方填饱肚子都不容易。如今不同了，莫斯科到处是餐馆、音像店、时装店和露天咖啡馆。有钱的游客在莫斯科甚至能找到五星级酒店，尽管酒店很可能是德资背景，

婚

礼

7

或由德国人管理。前苏联解体后，人民消费需求猛增。

可我们看不到任何新产品的迹象。我们在路上看到的拖拉机都老掉牙了，用铁丝捆着，以防散架。工厂没人管，连是否仍在开工都不知道。街上多了一些新商店，但新的农具一点没增；多了些餐馆，但不是机床；克里姆林宫粉刷一新，可没有一家运行良好的商业银行。不仅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多少改善，旧设施还大多年久失修。

俄罗斯首次证明我决定使用柴油引擎的正确。在西伯利亚时，有一天晚上哪儿都找不到燃料。没想到第二天清晨，一个当地人叫醒了我们。他可以卖给我们 90 加仑的柴油。我们连问都没问，马上按他的价格买下了。

“我们可不想知道他的柴油是从哪儿来的。”佩奇说。

后来，我们得知他是盗油贩子，偷的是当地一辆内燃机火车头的柴油。

俄罗斯其实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资源蕴藏丰富，人民受过良好的教育，工业化程度高，但设备日益陈旧。它从旧的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现代的市场经济过程中，仍然困难重重。为什么呢？一是俄罗斯从来没有过一个发达的商人阶层，二是它不希望变革太剧烈，三是俄罗斯人仍然不信任、或不懂市场。除非俄罗斯开始遵从起码的经济法则，否则它会继续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资本和万有引力一样，有自己不可更改的法则。俄罗斯不懂得尊重资本和保护资本，资本就不会为它出力。聪明的资本不会去帮盗贼。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有可能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而且极有可能造成很大的痛苦。

以上的前提当然是俄罗斯依然存在。一次，我们在莫斯科一个高档商业中心里的餐馆吃晚饭，附近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事件。过去 3 年内，莫斯科发生了十几起爆炸事件，而西方这方面的报道并不多。我们离开俄罗斯前，莫斯科市郊又发生了 5 起爆炸事件。我当时推测，普京不动声色地发动了一次政变，把叶利钦赶下了台，自己取而代之，并得到克格勃内前同事的支持（克格勃现在改名为联邦安全局，不过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称它克格勃）。遮掩这场政变实属必要，以免吓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的资本。



路途中,每天我们都想锻炼身体。而且无论到了哪儿,
都想多见识见识。参加莫斯科和平马拉松赛正好一箭
双雕。(一路上看到很多人作弊,令我们吃惊。)



新俄罗斯人很快适应了不守法的资本主义社会。
莫斯科街头一位扮演列宁的演员与
自由市场的化身对弈。

婚

礼

7

根据从多方面了解的情况,我得出结论,莫斯科周围的爆炸事件都是克格勃搞的,目的是煽起对车臣的恐惧。普京需要借此争取本国人对自己新政府的支持。还有什么比邪恶的车臣穆斯林更能让人恐惧的呢?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曾利用过战争幽灵。(此后不久,普京再次派部队进入车臣。)车臣人否认自己参与了莫斯科的爆炸事件。我于是心生疑虑。过去,车臣人袭击俄罗斯人后,从来不羞于承认。为什么这回不肯承认呢?日后几位俄罗斯记者的报道证明了我的分析不无道理。

今天,俄罗斯政治风云险恶,局势动荡。莫斯科对其他地区的控制微乎其微。凡是认为俄罗斯军队有能力维护国家统一的人,都该开车去俄罗斯一两次。

俄罗斯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中心。然而莫斯科不同于罗马、伊斯坦布尔、塞维利亚或伦敦等其他帝国首都,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文化上、艺术上还是金融上。历史上,其他伟大城市曾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人,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精英,造就了无数的达官贵人,同时得益于他们的重大贡献。而没有人因为去过莫斯科而变得显贵。俄罗斯人常常设法逃离自己的国家。

我前面讲过,中国前途无量的原因之一是,大批海外华人纷纷返回祖国效力,带回了资本和专门知识。而海外的俄罗斯人很少返回祖国。他们都去法国和意大利的避暑胜地了。他们哪儿都去,就是不回俄罗斯。

我们离开俄罗斯前,认识了一个人,后来在到处是银行的列支敦士登又遇到了他。他跑过来问:“还认识我吗?”我们问他来列支敦士登做什么。他神色紧张,马上把话题扯到汽车上。

我们用了8周时间,开车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莫斯科,行程7000英里。此后,走完前苏联境内剩余路程又花费了3周时间,从莫斯科到明斯克(Minsk),向北穿过波罗的海到圣彼得堡,最后于9月中旬抵达赫尔辛基(Helsinki)。我们过境进入芬兰时,佩奇恨不得亲芬兰边防军一口。

从芬兰我们掉头向南,穿过瑞典、挪威和丹麦。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均面临出生率低、负债高的问题,再也不是社会进步的典范。我们到达丹麦时,库尔德人正在示威,抗议丹麦全国反移民思潮。从前宽容友善的丹麦人和瑞典人现在认为,本国接纳的移民人数太

多了。哪怕是你娶了或嫁了丹麦人，也成不了丹麦公民。你的孩子也是一样。瑞典的出生率是斯堪的纳维亚 5 国中最低的，社会正义和福利思想对年轻一代没什么影响。22 岁左右的人问：为什么税这么高？为什么要他们偿还沉重的国债？

挪威有 500 万人口，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本该是一个富裕国家，却始终债台高筑，石油赢利都花在修建毫无投资回报的公共工程项目上。一位记者向我抱怨道，最近修了一条通往一个岛上的隧道，而岛上只有 1 000 个住户（如果修一条 16 公里长的桥梁或隧道，把丹麦和瑞典连接起来的话，会合算得多）。最近，芬兰为了杜绝俄罗斯妇女来此地卖淫，有史以来第一次取缔了色情行业。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面临严重的人才外流。由于课税太重，大批高级人才移居国外。他们对现行的福利制度没有发言权，于是用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10 月中旬，我们抵达德国。10 月底到 12 月下旬，我们遍游了欧洲，流连于著名旅游景点，结果耽误了行程。不过今天回想起来，我很高兴当初在欧洲多逗留了些日子。我已去过大部分欧洲国家，可佩奇没有去过。这次行程是她制定的。我陪她游览欧洲期间，有机会重新修正我对欧盟 3 年后统一货币的看法。

简单地说，世界迫切需要欧元。可惜的是，我估计欧元的日子长不了，虽然我手上也握有一些欧元。

世界需要欧元，因为美元是一种有着重大缺陷的货币。美国是世界头号债务国，而我们美国人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借来的钱。美国的贸易赤字仍然高达 4 000 亿美元，而且越来越多。美国人不再具有竞争力。从官方公布的数字看，我们似乎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其实并没有。每个月，美国政府都公布一些数字，声称我们的生产率正在逐步改善。然而，每天的实际数字表明，我们缺乏竞争力，进口越来越多。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困难，日元也遇到麻烦。作为一种交换媒介，一种保值手段，欧元是很好的出路。

欧元成为世界头号硬通货和交换媒介后，世界上的各家央行会抛售手里的大量美元，购入欧元。目前，这些央行 60% 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

婚

礼

7

欧盟国家的经济和人口超过了美国，因此具有支撑一种世界货币的规模和深度，而且它还有贸易顺差。而美国贸易出现巨额赤字，负债累累。据估计，世界贸易的 30% 采用欧元。欧元的成功会使欧洲人与日本和美国竞争时，更富效率和竞争力，全面降低价格，使所有人受益。欧盟本身是一种了不起的观念——避免战争，促进贸易和人员流动。同样，一种新的单一货币也是了不起的观念。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欧盟几次设法建立单一货币，但都未成功。

1992 年，欧盟终于如愿以偿。15 个欧盟成员国中的 12 个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了欧元。不幸的是，15 个成员国的金融经济状况各不相同。有的国家是债务国，有的国家是债权国。有的国家货币疲软，有的国家货币坚挺。把一种濒临崩溃的货币与行情看涨的货币放在一起本来是不可能的事，因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每个成员国必须整顿好本国经济。使用的字眼是“趋同”，即所有国家必须把本国的预算赤字压缩到一定指标之下。倘若做不到，就要被罚以重款。

倘若哪个国家经济困难，还要挨罚，经济形势只会进一步恶化。罚得越重，形势越糟。不过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国家金融状况基本良好。它们晓得保持币值稳定的重要性。20 世纪 90 年代末，放松贷款政策的政府取代了奉行稳健金融政策的政府。《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赤字不得高于 3%。随着达标截止期的临近，各成员国政府纷纷在账本上做手脚。例如，法国人提出了一个荒唐无比的建议，从国家养老基金里抽出大批款项用于平衡预算，等第二年截止期过去后，再放回养老基金里。法国人甚至公开了这项计划。连造假账的老手意大利人听说后都大吃一惊。接着，意大利人找到了自己玩弄数字的新办法。然后是德国人。最终，大家都造假账。

（美国也造假账。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政府年年宣布，预算出现“顺差”。奇怪的是，政府的负债却越来越多。政客称，政府欠债正在减少。实际情况确如他们所说。可他们是借钱还债的。实际债务越积越多。不仅如此，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费舍尔最近说，政府的隐性债务目前高达“20 万亿美元左右，超过了政府的预期收入”。而政府却要我们遵守交易“透明”原则。其言行不一可见一斑。）

欧元就这样诞生了。当然，英国和瑞典、丹麦一道，选择不加入欧元区。

在旧的体制下，经济形势不好时，一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多印钞票。这样做会导致货币贬值，不过赢得大选的政客不在乎。股票市场会（暂时）上涨，经济形势会（暂时）好转，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会（暂时）多一点，一切问题都会（暂时）消失。至于代价，以后再说。经济不好时，政府还有一招：那就是大量借钱。

欧元成了统一货币后，各国政府再也不能多印钞票。它们必须搞好本国经济，确保人人有能力竞争。以美国为例。如果现在汽车工业不景气的话，密歇根州不能多印钞票，但州长可以大量举债，如同 20 世纪 60 年代纽约州大肆借债一样。洛克菲勒为了收买选票，在纽约州府奥尔巴尼（Albany）大兴土木，富丽堂皇的程度远远超过世界上的一些大天主教堂。纽约州的信誉因此而受损。

等着吧，欧洲也会有这么一天。政客先会用财政急救绷带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无效，马上会相互指责，或指责外来人——那些邪恶、狡黠的外国人，尤其是欧盟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的外国人。欧洲的领导人也不晓得如何处理新问题，如葡萄牙的需要与芬兰或奥地利的需要相左怎么办？欧盟逐渐壮大后，区域压力越来越大怎么办？

我起初看好欧元的原因之一是，过去的 50 年里，德国始终奉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最初的设想，欧元实际上是改头换面后的德国马克。时光转到 2003 年。这一理论陷入危机。葡萄牙人旧习不改，我行我素。更糟糕的是，德国人也是一样。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德国人选择了一个左翼政府。违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最严重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葡萄牙。2002 年大选前夕，两国政府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由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限制增印钞票，它们便大举借债。过去的几十年里，德国的这种做法实属罕见。

一条链子有多结实，取决于其最薄弱的一环。倘若欧元要达到最初设计的效果，欧盟的所有成员国必须搞好本国经济。要 12 个国家一起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事。一旦经济形势恶化，欧元恐怕凶多吉少。

现在几国政府已经赤字累累。法国人甚至表示，他们不会理睬《马斯

特里赫特条约》的条文。最终，会出现一位得人心的政客，指责欧元和布鲁塞尔是本国经济困难的祸首，并以退出欧元区相威胁。布鲁塞尔怎么办？派坦克去？还是妥协，同意增印钞票？无论怎样，都会损害欧元。与此同时，我手里还握有欧元，不为别的，只为欧元比其他货币病得轻点。

欧元本来是可以成功的。欧盟国家本可以搞一项小小的实验，例如，经济关系紧密的德国和奥地利可以先统一它们的货币。经过磨合后，再加上丹麦。后者的经济和货币与德国紧密挂钩。然后，再加上另一家。也许整个过程需要 10 年到 20 年。美国就是这么干的。美国人逐渐向西部扩展，不断增加新“成员”，扩大市场和货币适用区域。欧洲人如果采取以上办法，就很难再把自己失败的责任推给布鲁塞尔的邪恶官僚了。

今天，欧元乃是世界上的一桩大事。为了它的成功，已投进去了几万亿美元。为此改革了银行制度，重修了停车计价表、财会制度和税务法。一切为之改观。倘若欧元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搞成的话，欧元对我们所有人会更加重要。除了美元外，又多了一种坚挺的货币。世界各国会抛弃美元。美国实力的变化会产生深远和灾难性的影响。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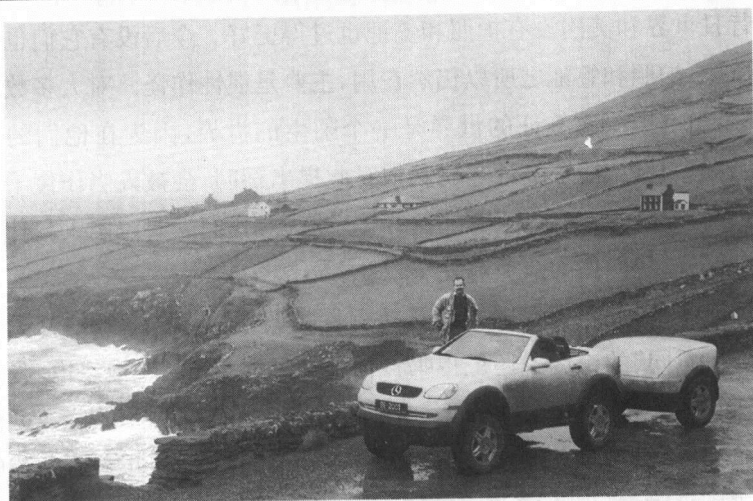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是公认的世界头号强国，好比今天的美国。但作为世界交换媒介和硬通货的英国货币已经病入膏肓。到了 30 年代末，英国开始限制汇率，而且一限制就是 40 年。在此期间，英国丧失了自己的帝国、实力和威风。70 年代，英国经济陷入困境，无力偿还在世界市场上借的钱，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出面拉它一把。

成立欧盟的目的是消除种种障碍，实现人员、劳动力、资本和知识的自由流动。欧元本来也是为了促进这一目标。如果你是欧盟的一员，在欧盟内部旅游无需护照或签证，好比美国公民从田纳西(Tennessee)州去得克萨斯(Texas)州无需护照或签证一样。整个世界都应该如此。

听上去有点离谱吗？过去几千年里，地球没有护照照样运转。哥伦布并没有护照或签证。19 世纪大批涌入美国的移民并没有在纽约的埃利斯岛出示自己的护照或签证。他们就这么来了。如果当初需要签证的话，我们的长辈肯定会被拒签，来不了美国。不受护照签证约束的人奔赴



我单臂托住了举世闻名的比萨斜塔。我们去时，正在加固比萨斜塔，不接待游客。现在比萨斜塔再次对游客开放。路旁的妓女又高兴了。



我们从大西洋走到太平洋又走回到大西洋，是世界上首次开车沿这条路线走完全程的人。冰岛的邓琴(Dunquin)既是始发地，又是目的地。

婚

礼

7

新边疆之日，也是伟大城市、国家和文化兴盛之时。对一个社会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件好事。

护照是英国人发明的，目的是控制本国人民和帝国。他们不希望看到大批外国人从大英帝国迁往英国，哪怕是迁往帝国的其他地区，除非他们能控制这种人员流动。英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有色人种出现在本国。“白人的包袱”不宜在本国背。

最早使用护照的是中国人，或者比这更早。它是发给信使或皇帝特使的证件，以证明他的身份，请求对方“予以照顾”，或“准许放行”。后来，这种做法走了样，被推而广之，所有人出门旅行都要携带护照。很快，连护照也不够了，还需要签证，限制越来越多。

想想成千上万在边境口岸整天检查护照签证，签发护照签证，窒息人员流动、创造力和效率的人吧。想想除去这批人后，节省出的巨额资源吧。

我记得有个古巴人，把自己绑在一个木桶上，一直漂到佛罗里达的海岸边，马上被逮捕了。我真希望能收下他，或者和他同住在一个城镇。如今美国就需要这样的人，敢冒险，有干劲，有胆量，有雄心。

昔日世界和美国没有护照和签证也过得挺好。今后没有它们也一样过。今天，护照和签证之所以仍然在用，主要是惯性作怪。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个没有护照或签证的世界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世界一向有护照和签证。倘若你对此提出疑问，会被人当作傻子。你可能会问，那国防怎么办？其实这好比政府说：我们需要控制人。什么对世界有好处，我们比大众更有发言权。

古往今来，反对移民的人总是持一种腔调，尤其是“今天的移民与过去的移民不同”的论调。还记得吗？19世纪中叶，美国人抱怨道，爱尔兰人“不同于”以前的移民。他们是“酒鬼、歹徒，结成犯罪团伙”。更糟的是，他们信奉不同的宗教——罗马天主教。他们永远不可能是忠诚的美国人，因为身为罗马教徒，他们首先要服从教皇。过去的170年中，一位天主教徒能当选为美国总统是不可思议的事。结果肯尼迪当选了。此后，意大利人，犹太人，中国人，东欧人，埃塞俄比亚人，古巴人，多米尼加人和越南人也受人歧视。亚洲人以前不能买房，因为他们“与众不同”。

今天,歧视以上民族的论调显得荒唐。再过几年,所谓的“差异论”也会令人感到荒唐。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市的市长现在到处征聘圭亚那人,因为他们促进了本市的发展。

闭关锁国不会让美国更安全。俄克拉荷马(Oklahoma)市政府挨炸一事提醒我们,恐怖主义既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麦克维家族几代人在美国定居,华盛顿狙击手枪击案的嫌疑人威廉姆斯也是一样。2002年秋天,连续几周美国人提心吊胆。独自制造爆炸事件的嫌疑犯是个上过哈佛大学的美国人。没有哪场战争是因为签证控制不严而输掉的。“9·11”事件的主谋阿塔在美国的身份是合法的。保证一国完全不受外国人威胁的惟一办法就是闭关锁国。我们是不是要丢下现在的工作,沿着几千英里长的边境巡逻,不让外国人进来?在这样一种国土安全的体制下,外国商人、旅游者、运动员或文艺工作者都不得入境。如此一来,当年的甲壳虫乐队也要被美国拒之门外了。

你想住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吗? 我不想。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我建议采取另一种办法,不要再四面树敌。

美国历史上倘若有过受到敌人威胁的时候的话,那就是富兰克林时期。全国到处是颠覆分子,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站在敌人一边。连富兰克林的儿子威廉也是亲英分子。不仅如此,新生的美国陷入敌人的重围,四面是印第安部落和英国、西班牙的殖民者。当时,英国和西班牙是世界上两大军事强国,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今天,距我们最近的敌人远在5 000英里以外。无论是内忧还是外患,当年比今天要大得多,尽管现在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富兰克林在国土安全问题上的观点是:“为了苟且偷安,宁愿放弃基本自由的人,既不配享有自由,也不配享有安全。”

不用说,若是想来美国的外国人都能来,劳动力就会更便宜。这是一件好事。可代表你们的国会议员不这么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吸引了大量的人,其中一些人可能会压低工资,至少工作更勤奋,因为移民一向要比别人跑得更快。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生产率,所有人因此而受益。因为有了移民,美国才强大。今天,移民继续为美国作出贡献。那些呆在大公司里不愁失业的人,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可其他的人会受益。

美国的合法移民中,21%的人至少受过17年的教育,常常包括研究

生或职业学校的教育。而在美国出生的人口中，只有 8% 的人有这样高的学历。

美国极缺护士、计算机专家、软件工程师和其他方面的工程师、兽医、医生、看门人、教师、教士、保姆和农场工人。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体制急需更多的年轻人参加工作，以保证不致资金告罄。而现在，律师、官僚和握有铁饭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不消说，正是这一部分人，极力想关闭美国的大门。

现在，科学突飞猛进，尤其是在基因研究领域。将来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所有的官僚都有同样的基因——一种有缺陷的基因。全世界的官僚都一样，一遇到新生事物，马上畏缩不前。这样的官僚，我在各处不知见过多少。他们的第一反应总是说：“不行。”

经过一番调查，我们了解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结婚都不像在拉斯维加斯那么容易。廷巴克图可不是拉斯维加斯。不过我们发现，我俩可以在英国合法结婚，于是佩奇开始从西伯利亚遥控，着手操办我们的婚礼。

别忘了，当时是 2000 年 1 月 1 日，正值千年之交。新千年除夕那天，雇英国的保姆看孩子，价钱是 1 000 英镑，约合 1 500 多美元。我们原计划住在红狮酒店，客人也安排在这家酒店。当年，我俩就是在这家酒店坠入情网的。而红狮酒店假日停业，原因是付不起职工加班的工资。婚礼筹划人给了我们一个初步的报价。如果客人定在一百名左右的话，每个人大约是 1 500 美元。

由于要参加千年之交的其他活动，我们预定要请的客人已经少了很多。许多人早已有了安排，参加庆祝新千年的活动。不消说，还有不少人因为担心千年虫，不想出门旅行。当时人们觉得，各地的电脑都会出问题，飞机会从天上掉下来。鲜花几乎卖完。全世界各地，香槟酒均告罄。即使佩奇住在英国，筹划在这一天举办婚礼也太难了。这和她在自己家乡结婚完全不一样。好在她的母亲在美国鼎力相助。

更麻烦的是，你要是离过婚的话，亨利地区圣公会教堂的牧师不肯为你证婚，也不允许你在他的教堂结婚。而我是离过婚的。

以上只是佩奇面临的诸多障碍的一部分。尽管困难重重，佩奇仍然操办了一场我有生以来参加过的最出色的婚礼。

佩奇在亨利找到一家天主教的修道院，是由建筑大师克里斯托弗·雷恩设计的，就在河边上，四周的风景和修道院一样美丽。佩奇给这家修道院捐了钱，于是获准在此举办婚礼宴会。修道院一侧是一个不大的小教堂，我们将在这里完婚。英国一月份的天气，通常阴冷且伴有小雨。婚礼和婚宴安排在一处，免了客人两地奔波之苦。

直到最后一刻，红狮酒店才同意假日期间不停业，但狠敲了我们一笔。即使是这时，酒店经理也不肯答应我们包下整个酒店的要求。我们不得不找到另一家小酒店，费了一番唇舌后，酒店终于答应照常营业。

随着婚礼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人们对千年之交这一天的焦虑不安逐渐减轻。泡沫破碎了。由于担心千年虫，出外旅行的人少了。忽然间，上班的人多了。酒店有了空房间。请个保姆需要 1 500 英镑，或是请一百个左右的人吃顿饭需要花费 15 万美元变得荒诞不经。佩奇设法找到了一个专业摄影队，鲜花，香槟，还有一家餐馆，价格都不很贵。英国一家老牌划船俱乐部同意婚礼前一夜为我们举办晚会。我也是这家俱乐部的会员。除夕那天晚上，泰晤士河畔亨利和世界各地一样，同样有烟火表演。我们告诉客人：“为了给我们的婚礼助兴，我们安排了盛大的烟火表演。”

这一切与我无关，都是佩奇一手操办的。

后来她告诉我：“吉姆，如果有哪个女人在穿越西伯利亚途中筹办婚礼，她一定是疯了。”也许这是所有女人梦想中的婚礼。“不过下一回我建议咱们还是私奔吧。”

我为婚礼做了什么呢？我找了个牧师。

我是在阿拉巴马州的迪莫波利斯长大的。我有一个儿时的好朋友，叫戈德史密斯，是个犹太人。今天想想也真怪，迪莫波利斯不过是一个南方小镇，居然有这么多的犹太人。乡间俱乐部的主席和镇议会议长都是犹太人。

镇上有一座犹太教堂，还有一个犹太人的墓地。日后我到了北方后，才得知犹太人和其他所有人不应该是一样的。20 世纪 50 年代，在阿拉巴马州，至少是在迪莫波利斯，只知道有黑人和白人。犹太人、天主教徒

和清教徒好像都无关紧要。记得我在迪克斯堡(Fort Dix)当兵时,有一次排队领饭,我后面的那个人问所有人:“哪儿的人?”回答是:波多黎哥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甚至不知道提问的人是什么意思,于是回答说:“新教圣公会信徒。”

我40岁那年,戈德史密斯来了个电话,问:“猜猜我要干什么?”

我说:“我可猜不着。”

“我要去神学院当一名新教圣公会的牧师。”

我迷惑不解。不过,那时戈德史密斯很可能对我的一些选择和工作同样迷惑不解。

1999年秋天,当我和佩奇四处物色一个牧师时,戈德史密斯正在伯明翰(Birmingham)市的一个教堂任圣公会牧师。近年来,我们来往很少。可一打电话,又是一切如故的感觉。

“你瞧,这简直太巧了。咱们一起长大,你是一位老朋友,我成了圣公会的教徒,而你现在是圣公会牧师……”

“我正好要休一年的假。”他说。

我得知牧师受的种种限制后,不由吃了一惊。各种规矩极其冗繁。一位牧师到各处履行自己的职责前,必须填写必要的表格。多亏这些繁文缛节是最近的事,不然基督教的影响范围决不会超出伯利恒(Bethlehem)一地。

12月底,戈德史密斯从美国和英国各方面得到许可后,专程飞到泰晤士河畔亨利,主持我和佩奇的婚礼。

2000年1月1日,泰晤士河畔亨利晴空万里,是英国一年中难得遇到的好天气,更不要说严冬季节了。那天好像回到了夏天。客人们纷纷脱下外套,在修道院宽敞的院子内散步,隔河远眺。佩奇乘一辆白马拉的车,穿过小镇的街道,从旅馆来到半英里外的教堂。罹患癌症的父亲专门赶到英国,当我的伴郎。他和我同乘黄色奔驰。

他说,当年他结婚时,他的伴郎告诉他,伴郎的职责是给新郎指一条出路,告诉新郎可以中途变卦,同时还要向在场的客人解释为什么婚礼取消了。父亲说,这些知识他从小就知道了。正是父亲,教我为女士开门,为她们占座。凡是一个男人应该为女士做的,我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不俗的婚礼！以这种方式开始新的生活，走入新千年，太美好了！



西班牙人资助了哥伦布，今天仍坚持哥伦布是西班牙人（正如我在马德里拍的这张照片显示的那样）。其实这位探险家本是意大利人，参考了中国人和北欧人的知识，利用葡萄牙的技术到了新大陆。

和当年他教我吃饭的礼节一样，现在他又一次为我出谋划策，既是父亲，又是伴郎。

父亲还说，如果有孩子我的话，我是惟一没有让他抱上孙儿的一个。他恐怕等不到那一天了。环球旅行结束后不久，我和佩奇计划要孩子。

我告诉父亲：“这么久你都挺过来了，坚持就是胜利。”

我们开着敞篷车来到教堂。

我和佩奇终成眷属。

第二个晚上，我俩在 5 英里外的一个五星级度假酒店共度蜜月，憧憬下一站的非洲大陆。

婚

礼

7

第 2 部

2000年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8

走进非洲

我俩开着敞篷奔驰轿车在马德里的大街小巷转悠，寻找预订的酒店。一辆宝马牌摩托车凑了上来。

驾驶员转头看了我们一眼，说：“你是吉姆·罗杰斯！”

佩奇指着我说：“我不是罗杰斯，他才是。”

骑摩托的人叫泽利格，是西班牙奥林匹克帆船队的队员。他看过我的书，自己也“驾车周游世界”。他把我们带到酒店后，邀请我们吃晚饭。第二天，又把我们介绍给了自己的十几个朋友，一个是一家银行的董事长，另一个是西班牙的一个大公。多数人和他一样，是摩托车的发烧友。不过有一个不是。她叫戈麦斯-蒙切，是西班牙一家著名葡萄酒庄的首席执行官(Tio Pepe 就产自这家酒厂)。她请我们去南方时，顺道参观了位于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Jerez de la Frontera)的西班牙最古老的葡萄园。

出乎我意料的是，今天西班牙的经济是欧洲最好的经济之一，预算盈余，外贸顺差。无论从哪方面讲，西班牙都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国家。我和佩奇甚至讨论过是否在西班牙定居。

雪利酒——一种西班牙烈性葡萄酒——就取名于赫雷斯，意思是“赫雷斯产的葡萄酒”。戈麦斯领我们参观了当地最古老的葡萄酒窖。据说，16世纪麦哲伦动身周游世界时，随身还带了当地产的雪利酒。

戈麦斯和她家人为我们举办的宴会是此次旅行的高潮。佩奇赞叹

道：“戈麦斯真不简单！一个女人经营一座著名酒窖，还烧得一手味美的西班牙凉菜汤。”每当没吃没喝的时候，我俩会想象喝她做的冷汤。

戈麦斯女士送给我们两瓶酒庄的千年琼浆，让我们带在身上，就像麦哲伦航行时携带当地产的雪利酒一样。如果我们安然返回，一瓶归我们自己，留作纪念，另一瓶归还酒庄，放在它的博物馆里。（麦哲伦并没有带着赫雷斯产的葡萄酒周游世界。他带酒是为了在路途中喝。再说麦哲伦也没能活着回来。其他船员完成了那次航行。）戈麦斯还送给我们一瓶1968年产的雪利酒，佩奇出生的那年。我们这些当代的麦哲伦于是可以遵循真正的开拓探险传统，携酒周游世界。

婚后我不停地给家里打电话，询问父亲的病情。2月我在西班牙打电话时，父亲告诉我，他第一次感到胸口疼。显然，癌症扩散了。我和父亲商量，是否送他去医院，以减少痛苦。他以不容分辩的口吻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能回家或中止旅行。似乎父亲在告诉我，他希望我完成这次环球之旅，为了我，也为了他。

当时我正在环球旅行的路途上，离父亲千山万水。我记得，我开的第一辆车就是父亲送的。我17岁那年，父亲给我买了一辆1948年克莱斯勒公司产的汽车，条件是一切维修费用都要由我负担。他是想用这种方法向我灌输一种责任感。

我向父亲保证：“我会照你说的做，完成环球之旅。”

经过59个星期的长途跋涉，走了6万公里后，我们终于到了西班牙最南端的直布罗陀海峡——通向非洲的门户。15公里外就是非洲。我俩隔海眺望即将踏上的辽阔的非洲大陆。非洲之行是我们这次环球之旅中最长的一段，也是激动人心的一段。我们要穿越世界第二大的大陆。非洲的历史、文化和地形地貌丰富多彩，绝非人所能想象的。上一次，我曾骑摩托车周游过非洲。今天，再次前往非洲同样令我激动。我和佩奇站在直布罗陀海峡边，浮想联翩。对难以预料的下一段旅程既兴奋，又有点害怕。

此前，我们对要去的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很熟悉。诸如第二天在哪儿，怎么走，我们一般都心中有数，哪怕是穿越西伯利亚。非洲的情况就

不同了。西方媒体对非洲大陆的报道少得可怜，我们必须自己搜集资料。起初我们有点不切实际，想沿着非洲西海岸走，绕过好望角后，再顺着东海岸一直走到埃及。从纸面上看，倒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可当时沿途的一些国家正在打仗。从扎伊尔、安哥拉、刚果到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战火越过国境，四处蔓延。有些国家因为存在边境争端，根本无法穿行。例如，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关闭了6年，平民不得过境。（两国间的天然气管道畅行无阻。）

除了战乱外，还有各种流行病和自然灾害。前一年，莫桑比克东南地区遭受洪水的袭击。据报道，有个躲在树上避难的孕妇被迫在树上生产。水面上漂浮着十年前内战期间埋设的杀伤性地雷。

无论我们今天怎么计划，明天也许就不切实际了。过去的几十年里，也许从来就没有人沿着这条路走过。

我和佩奇没完没了地奔跑于各国驻欧洲的领事馆或大使馆之间，从法国到英国再到比利时，设法搞到要去国家的签证。结果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总共才拿到10个国家的签证，而且大多数签证的有效期只有3个月，还没等我们去，就过期了。我们决定在邻国申请新签证，可完全没有把握。

疾病是另一个大问题。此前，我们已经打过了破伤风、伤寒、狂犬病和其他更古怪的流行病的预防针，但现在我们最害怕的是疟疾——非洲的头号杀手。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买了专门预防疟疾的药。根据医嘱，我们动身去非洲前两周，就要开始服用，一直吃到离开疟疾区两个月后。医嘱还明确说，这种药只能服用3个月。可我们在非洲至少要呆上9个月。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厉害，例如可以导致神志失常。医生警告我们，一旦出现此类症状，马上停止服药。为保险起见，我们又带了另一种类似药品。（该药的制造商后来说，它还有一种副作用：诱人自杀。）

我们的药箱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药品，如皮下注射针头、抗生素、绷带、防痢疾药和退烧药。我们还检查了净水器。它有一个过滤器和药片。像我们这样周游非洲，这些东西绝对不可缺少。非洲的水绝对需要净化，水龙头里的水根本不能喝。我们还检查了野营的装备，从帐篷到睡袋，从炊具到毯子，样样不落。每天到了住宿的时候，必须有找不到旅馆的心理

准备。同时，我们还备足了汽车的零部件，如千斤顶、轮胎、拖车杠。我们有两部卫星电话，一部安在汽车里，一部是手提的，可不知道是否在非洲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为保险起见，我们又增购了两部 GSM 电话，这种电话在西方化的国家肯定能用，例如摩洛哥和南非，其他地方就难说了。GSM 电话除了声音功能，还可以接收信息，包括电子邮件。但愿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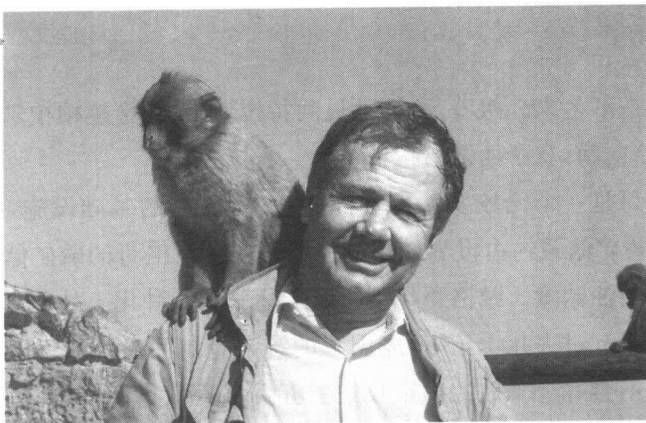
在伦敦期间，我们又买了一部用于汽车的全球定位系统装置。以前我们用的 GPS 系统是阿尔派(Alpine)公司制造的，非常好用，可惜只能在欧洲用。最后，我们买了 4 台短波收音机，3 台便携的，一台安在车里。以上装备绝对不可缺少。随时了解前方情况的最佳途径就是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向非洲播放的新闻，包括非洲新闻。有了这些收音机，我们就可以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了。

1989 年柏林墙倒塌时，整个非洲可能只有三个开放的市场。现在有了十多个。许多国家计划成立证券交易所。一些有远见的领导人想吸引西方资本，引导本国加入全球繁荣的行列。非洲是一个有着 8 亿人口的大陆，其经济力量不可等闲视之。

多年来，我一直在一些非洲国家有投资，如加纳、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不过是间接投资。我在尼日利亚也投了资，而且获益颇丰。依我之见，原材料市场会走高，而非洲蕴藏着丰富的资源。眼看作为未来原材料产地的前苏联地区每况愈下，我更有理由乐观了。博茨瓦纳富有钻石，加纳盛产可可和黄金，摩洛哥有丰富的磷酸盐矿。很多没去过的国家我都想去，去过的国家还想故地重游，如盛产绿宝石和铜的赞比亚，富有石油的喀麦隆。上次我去非洲，有些地方没有去成。这次我渴望能遂愿，例如南部非洲的马拉维，当然，还有马里的廷巴克图(Timbuktu)古城。加纳我是头一次去，不知到了后，能否见到我的经纪人，我和他远隔万里，做了十多年的生意，可从来没见过面。

尤其是，我渴望有惊喜。

我们在摩洛哥逗留了两周，游玩了丹吉尔(Tangiers)、非斯(Fez)、拉巴特(Rabat)、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和马拉喀什(Marrakech)。马拉喀什是摩洛哥惟一座保留了前法国殖民时代浪漫异乡风格的城市，市



根据传说，只要直布罗陀还有猴子，它就是英国的。为了让直布罗陀的居民高兴，伦敦不惜花大价钱。不过，直布罗陀的年轻人若能作主的话，猴子可以留下，但英国人得走。



我一直纳闷，身穿毛里塔尼亚长袍的人里面穿什么。

杰内市的清真寺是世界上最大、最漂亮的泥土建筑。由于欧洲一家时装杂志把它作为一张女性内衣照片的背景，现在已对非穆斯林教徒关闭。



场上有玩蛇的艺人。接着，我们翻过阿特拉斯山脉，穿越柏柏尔人居住的地区，一路向南，直奔西撒哈拉。

摩洛哥是一个比较发达的非洲国家，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人口大约2700万，磷矿储藏约占世界储量的三分之二。摩洛哥的磷矿储藏好比委内瑞拉的石油储藏。摩洛哥控制了制造化肥和各种化工品不可或缺的世界磷矿市场。过去几十年里，老国王的统治专制而又腐败。新继位的国王的日子不会好过。他的父亲收集了五百多辆豪华汽车，拥有十多处行宫，还建了一个巨大的清真寺，耗资上亿美元。这些汽车、行宫、清真寺帮不了新国王多少忙。西撒哈拉原称西属撒哈拉，是非洲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基本上是沙漠。20世纪70年代，摩洛哥国王因为垂涎此地丰富的磷矿藏，将其据为己有。此后，一支名为波里萨里奥阵线的游击队为了争取西撒哈拉的独立，一直武装抵抗摩洛哥。自从1975年来，联合国一直设法就西撒哈拉的前途举行公民投票。90年代初，又派人常驻那里，耗资5亿美元。

我们看到一些联合国的人员，开着有空调的四轮驱动吉普，在高档餐馆里用公款大吃大喝，住在高级酒店里，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此后，我们在非洲其他地方也一再看到同样的情景。到处都是这些官僚分子，不少人在当地呆了很多年。这些国际人员从持续的冲突中坐享其成，有一万个理由延续冲突，而不是结束它。

我们到了波里萨里奥游击队十分活跃的西撒哈拉南部地区后，当局不再允许我们自己走，必须跟随一个有军队护送的车队。车队每周发车3次，始发地是西撒哈拉尘土飞扬的港口城市达赫拉(Dakhla)。我们和一大群前往南方的人在炎炎烈日下等候发车，其中不少是商人或小贩，开着装满了货物(如锅碗、食用油、粮食和毛毯)的小卡车和旧汽车。车队发车时间晚了4个小时。如此奇特的车队，我平生还是头一次看见。

出发后，所有人在沙漠公路上拼命赶路，一会儿护送的士兵就不见了。人人为自己，我们觉得这样挺好，有军队护送反而危险。你的一举一动，他们通过电报都告诉了敌人：“下个星期四的下午三点，有一个车队要经过这里，一共一百来人，车上装满了货物和值钱的东西，同时可能还有几个西方人，如果你们想袭击的话。”

顺便说一下，达赫拉是座迷人的城市，城里有极好的海鲜餐馆。所有酒的买卖都控制在一个人的手里，全城只有两家餐馆能买到酒。我俩坐在餐馆里，眺望毗邻撒哈拉的大西洋，一边喝着冰镇啤酒，一边品尝海鲜，那感觉别提有多好了。我真想再返回达赫拉，尤其是我要能在当地开一家冰淇淋外加啤酒店的话。

到了南部边境后，所有人必须重新集合，一起搭帐篷。又当了回绝好的靶子。此后，我们这些人被移交给了毛里塔尼亚军队和警察，他们负责带我们穿过毛里塔尼亚境内的大片雷区。毛里塔尼亚境内的这段路很长，随行的士兵时不时地检查每个人，确保没有人离队。我们还听说，有些喜欢冒险的欧洲人开车闯入大漠之中，结果葬身沙海。到底是不是真的，没人晓得。不过只要你听到过一次，就会表示：“我跟护送车队的士兵走。”

我们终于到了位于毛里塔尼亚北部海岸的港口城市努瓦迪布(Nouadhibou)。一个表情严肃的年轻人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置身于虔诚的穆斯林国家。任何人，如果卖啤酒，或帮人搞到啤酒，或以任何方式接触啤酒，都要受到惩罚，除非你是韩国人。我们马上找到了一家韩国餐馆。

早在毛里塔尼亚政府开始向世界各地的渔船发放捕鱼许可证时，韩国人就到了毛里塔尼亚。（我们到了以后，港口外面停泊了六十来艘俄罗斯船，一百多艘欧洲各国的船只。）一些渔民，包括我们去的那家餐馆的老板，上岸后选择留在毛里塔尼亚。毛里塔尼亚结束了长达10年的孤立后，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在毛里塔尼亚定居，尤其是如果新发现的天然气田开发顺利的话。韩国人控制了毛里塔尼亚的啤酒生意。其实进出努瓦迪布的人并不很多，可任何人如果想喝杯酒，或到一家像样的餐馆吃一顿的话，只有去韩国餐馆，吃的却是中国菜。没人想吃韩国菜。

非洲可谓千姿百态，可从远处观察非洲，非洲只有两个：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换言之，一个白非洲，一个黑非洲。我们在一家韩国餐馆点中国菜，因为不懂法语遇到麻烦，老板马上叫出一个洗碗的，一个来自加纳的黑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来这里已有三四个月。加纳距毛里塔尼亚南边一千多英里。我们沿着非洲大陆西北海岸一路走去，沿途

遇到许多像她这样的人。她和毛里塔尼亚的很多劳工构成了北部非洲的迁徙大军，穿过撒哈拉沙漠，边打工边往北走，目标是欧洲。她说，最大的拦路虎是地中海。听说成百人在偷渡直布罗陀海峡时溺水而死，平均每晚都要死十来个人。西班牙海军不间断地在海峡巡逻，抱怨它在欧洲各国中首当其冲，为整个欧洲承担了对付偷渡客的责任。很多欧洲国家有强烈的反移民思潮，针对移民的暴力时不时地发生。

（罗马尼亚的保安部队抱怨说，罗马尼亚受到新一代垃圾音乐的侵袭，源头是前南斯拉夫婚礼上的歌手和来自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马戏团乐队。）

刚才提到的这位加纳妇女历经艰险，来到毛里塔尼亚，而且打算一路走到欧洲，不畏地中海和撒哈拉沙漠的严酷。欧洲有她渴望得到的机会，也非常需要她这样的人。鉴于欧洲国家的出生率很低，例如西班牙或意大利，我会请她这样的人去。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一直接纳这样的移民。今天，美国再次急需这样的人。

3月初，我和佩奇从努瓦迪布出发，走进无垠的撒哈拉沙漠。

撒哈拉沙漠漆黑一团。到了晚上，除了星空外，没有丁点的灯光。沙漠上风清气爽，万籁俱寂，只有我俩喝着西班牙朋友送的1968年产的雪利酒，陶醉在世外桃源里。由于四周太寂静了，霎那间我们甚至说不出皮肤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我碰了碰自己的脸：“是微风。”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听到风声，除了撒哈拉外。在撒哈拉，风失去了吹拂的对象。沙漠里的寂静，是死一般的寂静。

佩奇惊叹道：“天呀，真的是风。”

我们距努瓦迪布大约二百英里，离毛里塔尼亚的首都努瓦克肖特（Nouakchott）也有约二百英里。无论往哪边走，都需要一天的时间，穿越几百英里的撒哈拉沙漠，才能到达最近的公路。方圆几百英里内，没有任何电力。亘古以来，这里就没有过人类的文明，只有漫漫无涯的黄沙。在数千年风的吹打下，沙丘呈现出波浪状。若要度蜜月的话，没有哪儿比撒哈拉更浪漫的了。如此仙境，岂是能想象得出的！无论花多少钱，也难买

撒哈拉的一夜。连带我们到这里的白昼也是买不来的。

明天，我们将到达首都，再有一周，我们渴望已久的一段旅程就要开始了。我们将跨过塞内加尔河，进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不过开始下一阶段的旅途之前，我们还要好好享受这一夜。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我们坐帐篷外面，喝着有 37 年酒龄的陈酒，听任来自西大西洋的微风吹拂我们的脸。来自大洋洋面的海风吹过沙漠，横穿非洲，直到红海，完成 3 500 英里的行程。亘古以来，自从第一支商队途经这里，海风就没有停止过。

自那时以来，一切都没有变。变的只有沙丘的轮廓。

睡觉前，我们还要下载电子邮件。

我们在沙漠上开车整整跑了一天。因为没有路，所以我们走过的地方就是路。只要看到有人走过的痕迹，我们就顺着痕迹走。但这并不是一条人们经常走的路。有时可以看到汽车轮胎压过的印。但愿那位司机认得路。

沙丘的曲线总是令我陶醉。没有哪个画家能捕捉到如此性感的曲线，没有哪个雕塑家能雕出如此富有挑逗性的作品。没有哪个女人能同时集婀娜多姿和性感于一身。佩奇一看到这些沙丘后，不禁暗自惊叹，说她看过的裸体中，没有一个有如此美妙的曲线，令人销魂，又可望不可及。像这样的沙丘，我们只在撒哈拉的部分地方、纳米布沙漠和阿拉伯半岛的大漠上看到过。

一次，夜幕降临后，我们偶然看到人迹罕至的沙漠中，浮现出十来个帐篷，仿佛是一幅海市蜃楼图。原来是一群游牧人，只有妇女和小孩，没有男人。我们走过去，自我介绍后问，我们在附近露宿，她们是否介意。她们见到我们，同样是又惊又喜，把我们请进帐篷，端上了热茶。几个小时后，我们酒足饭饱，开始用手提电话和便携电脑下载电子邮件。这些游牧妇女鼓起勇气，又来找我们。她们从来没有见过两个人睡的帐篷，问能否进去看一看。我们当然欣然同意。不过看过她们的帐篷后，我们有点不好意思。

去一趟世界上这个最富浪漫情调的地方可不容易。如果能去的话，

绝对是度蜜月的好地方。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觉醒来，看到了比沙丘还要奇妙的景色。走出帐篷后，我们发现被上百头骆驼围住了。昨天夜里，男牧民返回了宿营地。不久，妇女又给我们带来了早餐——还带着骆驼体温的鲜奶。

后来我们把这次经历讲给佩奇的妈妈听。她马上问：“那奶消过毒吗？”

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平凡的一次经历。我从汽车后视镜中目送着这群渐去渐远的牧民，心想对方一定也有同感。

我们折向南后，再次沿着海岸线走。正逢退潮时，我俩在海滩上开了很长的一段路。宽阔的海滩十分平缓，汽车飞驰在大西洋结实的沙滩上，挡风玻璃一边是飞溅的浪花，另一边是沙丘吹过来的干燥沙粒。

涨潮后，我们才又回到了沙漠。

3月21日，我们渡过塞内加尔河，进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这个黑非洲与白非洲相交的地方，边界上从来没有安定过。整个地区充满危险。塞内加尔国内的局势更是给整个地区雪上加霜。由于该国大选受到暴力的威胁，我们曾被迫推迟行程。显而易见，如果举行大选的话，自从1981年以来一直担任总统的迪乌夫肯定会落选。人们担心，他不会自动放弃权力。反对党的支持者威胁在全国搞暴动。所有外国人都接到警告，要他们不要去塞内加尔。我们把行程推迟了一天，等大选的结果出来后再去。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迪乌夫落选后，欣然下台。法国在“法属非洲”的影响力远远大于英国对其前殖民地的影响力。显然，法国外交部给迪乌夫开了保票。我觉得这又是一个迹象，表明我对非洲未来持乐观态度是有根据的（尤其是新当选的总统韦德是惟一一位与穆加贝分道扬镳的黑非洲国家元首。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推行种族清洗政策）。

我们在塞内加尔停留的第一站是圣路易（Saint Louis）。到了非洲后，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座法国风格的城市。在大多数法国殖民地里，再小的城镇，也有一家面包店，一家糕点店，外加一两家法国餐馆。圣路易市也不例外。身在非洲，而且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我们不禁感受到一点法国的味道。此后的几个月里，我们还多次看到这样的情景。一次，我们

开车经过一条路，看到路边一大群兀鹫正在啃噬一匹马。而这样的情景，在撒哈拉是难得一见的。那里没有很多动物，自然也不会有成群的兀鹫。我们沿河往南走，沙漠越退越远，让位给了灌木丛、树木和各种鸟类。

塞内加尔除了大约五十英里的海岸线外，其余国土环绕另一块前英国殖民地——冈比亚，一个比康涅狄格州或卡塔尔还小的国家。开车进入冈比亚必须先渡过冈比亚河。由于过境耽误了时间，最后一班渡轮已经开走了。我不想错过在冈比亚的豪华度假胜地过夜，房间已预订好了。

我告诉工作人员：“你给船长打电话让他回来接我们，我付给他 200 美元。”

对方听后眼睛不禁放光。最后，我付了 400 美元。不过深更半夜，我搞到了一条私人渡轮，专门摆渡我的两辆汽车和一辆拖车，从而无需在一个不知何地，不知收费多少的地方过夜。不消说，船长把船开回后，所有误了船的人都蜂拥而上。我等于为所有乘客付了船票。他们都睡在卡车或汽车里，或者席地而睡。

在我们等船的当口，一群孩子走过来与佩奇聊天。当初我们从土耳其坐船去格鲁吉亚时，也有一群人围在我们的汽车周围，盯着佩奇看。她吓坏了。这一回她一点都不害怕，与孩子们一起戏耍，显得非常开心，还拿着一次成像相机给孩子们照相。周围是一群孩子，一边唱歌，一边和着节奏打拍子。

很多人觉得，一两天内就可以决定对非洲的感情，要么喜欢它，要么讨厌它。我遇到过一些人，到了非洲后，马上换乘下一个航班回国。我对非洲是一见钟情，而且始终不渝，每次去都一样。佩奇的感觉更复杂，一开始对非洲又喜欢，又不喜欢，直到 9 个月后我们离开非洲时，才真正喜欢上了非洲。

冈比亚最宽处达 30 英里，最长 295 英里，是 19 世纪末英法争夺殖民地时划分出的一块领土。过去的 20 年里，冈比亚重点发展旅游业，但不是最近越来越热的度假旅游。我和佩奇注意到，很多单身女子常常去冈比亚的度假胜地，她们大多二三十岁，来自英国、法国、瑞士和德国。很快，我知道了她们去冈比亚的奥秘。

一位当地记者告诉我：“这些白人女子来冈比亚是为了找个黑人男

友。她们来时都带了避孕套。”

你可以看到，这些女子都是自己来这里寻友的，携男友一起吃晚饭，账单也是她们付的。这些欧洲女子定期去冈比亚寻欢作乐。

我们离开冈比亚后，再次穿过塞内加尔，驶向东北方向的马里。公路是新修的，路况极好。因为刚修好，旅游地图上还没有标出。在马里的第一站是卡伊(Kayes)市。刚进入马里境内，柏油公路就消失了，前面的公路是迄今为止最糟糕的。越往里走，路况越差。卡伊是非洲大陆有记录的最热的城市，早上9点，气温就高达华氏115度。到晚上7点，还是这么热。

正是在位于塞内加尔与马里交界处东边的法属非洲赤道地区，我头一次见识了当地人所称的“臀舞”——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一个词。臀舞使我想起到巴库看到的肚皮舞，不过比肚皮舞刺激多了。

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村子里，我和佩奇恰好遇到一场婚礼。在这个小村子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女人摆动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臀部，摆动幅度之大近乎超人。女人们随着鼓点跳舞时，她们年轻的女儿在一旁边看边模仿，还教更小的女童跳。在一片歌舞声中，新娘新郎双双走进洞房，不多时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双方的母亲，手里拿着床单，上面沾有血迹，证明新娘是处女。此时，欢庆的气氛达到白热化。我和佩奇用一次成像相机给每个人照了相。

我想将来有一天再返回这个村子，把整个婚礼都搬到美国，在百老汇从头到尾上演这场婚礼——音乐，鼓点和舞蹈。哪怕你在纽约挑出20名顶尖的舞蹈演员，也不会有我看到的非洲妇女的那两下子。

西非的妇女戴着精致鲜艳的头饰，和衣着的质地相配。衣服一般要盖到脚面。高个子女人好像不少，举止优雅。我听说马里很多妇女有漂白自己皮肤的习惯后，尤其感到痛心。据一项统计，一半妇女都这样做。她们采用的办法有服用号称能白净皮肤的药片及酸洗法等，后者即为了保持皮肤一时的白皙，烧掉皮肤的外层。以上产品销路极好，好像都是在欧洲产的，然后运到西非。殖民时代后，黑皮肤不再被视为美。

我们先后到了卡伊、基塔(Kita)和首都巴马科(Bamako)。不过我当

初准备行程时，决定去马里主要是因为马里境内有一座名城，上次我去非洲时不幸与它失之交臂。这次，我绝不能再错过它了。发现新大陆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听说过这座古城，但没有去过。我这次一定要去亲眼看看传说中的廷巴克图古城。

廷巴克图位于尼日尔河北面大约十英里处，地处高地，俯瞰冲积平原。廷巴克图恰好是古时商队之路和尼日尔河的交会点，距首都大约五百英里，人口 15 000 人。今天去那里交通不便，可昔日那里却是一大交通枢纽。

上个千年末时，廷巴克图从一个商旅客栈衍变成撒哈拉最南端的一个永久居住地，也是黑非洲和北部沙漠的柏柏族的文化交会点。直到 16 世纪，廷巴克图的人口还有 10 万人，是财富、文化和教育中心。城里有一座世界闻名的伊斯兰大学，有学生 25 000 余人。直到今天，该大学仍保存着收集的手稿。廷巴克图曾是一个著名的商业中心，主要从事盐、黄金和奴隶的贸易。发明奴隶制的其实是非洲人，而不是欧洲人。廷巴克图是奴隶贸易的一大集散地。头一批欧洲人来到这里后，显然自己也沦为非洲人的奴隶。当地可以看到一些纪念早期欧洲移民的铜牌。

17 世纪后，廷巴克图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过去很多年里，我一直以为“廷巴克图”不过是一个抽象词，没想到它竟然是一座城镇。在新世界发现黄金后，奴隶贸易开始遍及全球。当时，沿海地区对奴隶的需求远远超过内地的需要。在西非的沿海城市韦达(Whydah)，国王因为贩卖奴隶发了大财。全欧洲都知道他拥有巨额财富，对进口奢侈品贪得无厌，拥有恢弘的皇宫。今天，廷巴克图只残留下三座泥土砖石结构的清真寺。当地大多数的清真寺和民居一样，都是用干泥造的。在沙漠地带，干泥是惟一的建筑材料。建筑物的外墙有一些突出的小木头或大的树干，雨后可以当作修理房子的梯子。联合国把廷巴克图列入 23 处受保护的世界遗产之一，因为很多这样的墙正在被雨水冲垮。

尘土飞扬、昏昏欲睡的廷巴克图正在倒退到过去，同时，它又使我对未来抱有希望。1 000 年前，骆驼商队从撒哈拉沙漠来到这里，满载着盐巴和黄金。茫茫沙漠中，我连自己一天所需的水都找不到。可古代商队却一连几周穿行撒哈拉沙漠。我自己体验了开奔驰车环游世界的难处

后,简直难以相信这些人怎么有如此大的能耐,不要说1 000年前,就是500年前也不容易呀。我并不是在为人类的生存而担忧。再者,无论我们觉得自己的文明多么发达,我们的前人也曾认为自己的文明最发达。100年后,子孙后代提到我们时,会问:“这些原始的粗俗之徒是从哪儿来的呀?”

廷巴克图南面是杰内(Djenné),坐落在尼日尔河的一条支流上。城内有一座宏大的清真寺,是世界上最大的泥砖结构建筑,造型之美,堪称此类建筑之首。现在外国人不得入内,因为一家欧洲杂志曾把它当作女内衣模特的背景。不过你要是想到这个地区好好玩一次的话,一定要去杰内。不要理睬廷巴克图。今天,去廷巴克图除了证明你去过外,没有其他的意义。

我们穿越前法属非洲殖民地时,看到了猴面包树。这是我最喜欢的树。我提议,用这个树名给我们的一个孩子起名,马上被佩奇否决了。(我们抵达非洲东海岸后,佩奇迷上了洋槐树,建议如果生个女儿,可以用这个名字。我提醒她,她曾拒绝过用猴面包树起名。)猴面包树树干粗壮,最粗的直径可达30英尺,树干上粗下细,顶部枝繁叶茂,盘根错节。猴面包树结一种叫“猴子面包”的硬壳多肉的水果。看上去树好像长倒了。据说,有位神一怒之下,把猴面包树头冲下掷到了地上。

非洲各地的基础设施仍是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在新的解放者的统治下,已破旧不堪。我们开车穿过马里时,看到残留下来的旧铁路、弃而不用的铁轨和昔日贩卖奴隶的交易场所。昔日,奴隶和黄金就是在这里被运到沿海地区。我们穿过布基纳法索,驶向南部非洲。布基纳法索从前叫上沃尔特(Upper Volta),1983年才改名。新名字的意思是“拒腐蚀之地”。从那时以来,这个名字不知多少次成了对现实的讽刺。我们跨过边境,进入象牙海岸。途经现在的政治首都亚穆苏克罗(Yamoussoukro)时,见识了非洲的一些解放者是如何挥霍的。让我们开眼的地方距亚穆苏克罗大约二十公里。我们开车由北向南,前往传统首都阿比让(Abidjan)。翻过一个山包时,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座大教堂,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如出一辙。佩奇觉得自己一定是精神失常了,因为吃了预防疟疾的

药物。

乌弗埃-博瓦尼是象牙海岸的解放者，也是该国的首任总统。20 世纪 80 年代，他这个基督徒突发奇想，决定在他出生的村子，仿造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再造一座，然后把这个村子当作首都。（美国一直承认阿比让是该国的首都。）而基督徒只占该国人口的 12%。乌弗埃-博瓦尼担任总统期间，象牙海岸这块前法国殖民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每当可可的价格暴涨时，大量的硬通货源源流入乌弗埃-博瓦尼的腰包。他打算造一座比圣彼得教堂还要大的教堂，教皇出面干预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经教皇规劝，他最后决定新教堂比罗马的教堂小两厘米。此外，他还建了两个主教行宫，每个 2 万平方英尺，只供教皇来访时使用。教皇总共来过两次。教堂里有自己的圣母怜子图。

我们参观亚穆苏克罗的天主教堂时，第一次遇到了下雨。自从离开欧洲以来，一路上没有下过雨。天空仿佛炸裂开来，大雨倾盆而下，让我们见识了非洲天空的另一面，好像是在提醒我们，现在你们正在热带地区。两个多月来，这还是头一次。如果我们觉得迄今为止的路很难走的话，接下来还有好看的在等着呢……

亚穆苏克罗以前是个小村，现在成了一个有 10 万人口的城市，有宽敞的公路，还有一座能容纳上万教徒的天主教堂。可惜全国的基督徒加在一起也不过 150 万。这座教堂从来没有坐满过，哪怕是圣诞节或复活节也坐不满。我们来到教堂时，导游正坐在长椅上打盹。教堂各处都有空调，但总共只开过 3 次，两次是教皇来访，一次是 1993 年乌弗埃-博瓦尼的葬礼。乌弗埃-博瓦尼留下了一笔巨额财富，足够他死后教堂的费用了。继任的政府当然不会放过这笔钱。公元 3000 年时，这座天主教堂还会存在吗？未来的考古学家会不会挖掘教堂的遗址，设法搞清它的来历和意义？

1999 年 12 月，在我们到达之前，象牙海岸发生了一场政变，十之八九是法国人幕后指使的。乌弗埃-博瓦尼的继任者没把巴黎当回事，大肆挥霍钱财。一位将军突然接管了政府。而一个月前，他恰好在法国访问。在阿比让机场附近，驻扎着一支法国伞兵旅，负责保证象牙海岸政府的安全和稳定。政变那天，这支伞兵部队一直呆在军营内没动窝。

除了可可外，在商业首都阿比让可以见到象牙海岸的另一大宗产品。阿比让是西非的大都市之一，民间组织众多。阿比让的民间组织繁多，几百年来，它们一直决定着非洲的未来。有人可能会想，为什么众多非洲国家的边界都这么整齐划一？1884年，欧洲列强聚集柏林，在柏林会议上瓜分了非洲。它们完全无视当地的宗教、种族、语言、部族或民族以及历史的差异。例如，象牙海岸的北部是占大多数人口的穆斯林，南部是信奉本地宗教和基督教的基督徒。这种现象解释了为什么非洲的和平难以实现，为什么西方的官僚总闲不住。

我们在象牙海岸的一个叫卡蒂奥拉(Katiola)的小镇度过了愉快的一夜。我和佩奇饿了一天，而酒店内的餐馆又黑又脏。没法子，只能找其他地方吃饭。我们沿着熙熙攘攘的街道寻找餐馆，看到了“芝加哥餐馆”的招牌，里面摆着八张桌子，全都空着。店主的儿子独自坐在店里看门。扩音机里大声播放着盖伊唱的一支《让我们开始吧》的曲子。我们只能试一试运气了。小伙子看到有顾客上门，精神一振，迎了上来。我们告诉他，想在这里吃饭。他马上叫来了母亲。她领佩奇到后院，让她看有什么可吃的。这家餐馆好像擅长做鸡。女老板消失了一会儿，后来我们才领悟到，她去市场买米买菜去了。女老板一边杀鸡做饭，我们一边喝着可口的凉啤酒——西非产的啤酒。啤酒都装在一个冰箱里。饭做好了，有炸鸡、蒸米饭和炒蔬菜。虽然简单，却是我们记忆中对在非洲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动身离开象牙海岸前，我们去了一些国家的领馆。在阿比让，我们拿到了多哥、贝宁、加纳、加蓬、刚果和喀麦隆的签证。惊讶不已的安哥拉大使建议我们在快到安哥拉时再申请签证。加纳以前叫黄金海岸，欧洲人最早是受它吸引，来到非洲的。欧洲商人最初是为了黄金和象牙而来，后来逐渐扩展到非洲人一开始就想出售给欧洲人的商品——奴隶。当时欧洲没有奴隶市场。欧洲的封建传统中有一个农奴和农夫阶级。美洲大陆被发现后，大西洋彼岸马上出现了奴隶市场，先是在巴西，随后蔓延到其他殖民地。我们最先去的一个非洲城镇叫埃尔米纳(Elmina)，是个港口城市。我们参观了当地的一个古城堡，最早是葡萄牙人的一个城堡，政府想把它开发成一个介绍黑奴史的旅游点。这座城市曾是贩卖黑奴的市

场，是“黑奴之路”的必经之地，好比是波士顿自由之路的反面。

我们穿过边界，从象牙海岸来到加纳。去了一家银行后，我才意识到加纳的货币危机有多严重。我请出纳员换给我 200 美元的当地货币——塞地。他从窗户递给我一个空的黑塑料袋。我差点问他，给我这个袋子干吗？一瞬间，我注意到，周围的人个个拎着黑塑料袋，大多数袋子塞满了钱。我去过一些国家，当地货币一贬再贬，几乎还不值印钞票的纸。我和其他人一样，看过德国魏玛时期的历史片子，人们用成堆的钱买一条面包。因为这一幕太触目惊心，我一直不相信历史上真有过这样的事。现在在加纳亲身经历了一回后，方知是真的。

起初我和佩奇觉得，大庭广众之下携带这么多钱很不安全。不过很快发现，哪怕是携带一口袋钱，在加纳也买不了多少东西。加纳货币塞地面额最大的钞票还不值 50 美分。盗贼若想买点值钱的东西的话，非得用辆小卡车装钱。

我们想买点加纳闻名的肯特（Kente）布。这种布是由阿散蒂（Ashanti）地区的工匠用手工织成的。我问一个当地人，哪里能买到质地最好的？“天晓得！”他告诉我。我觉得这人粗俗无礼，又问另一个人，回答还是“天晓得！”最后我恍然大悟，“天晓得”是我要找的人的名字。

加纳是一个拥有众多基督徒的国家，尤其是该国南部。该国什么都与基督教沾边，例如“万福玛利亚下水管道公司”，“我爱基督加油站”，“圣母玛利亚干洗店”。显然，有些人的名字也与基督教沾边。城里最好的织布匠叫“天晓得塞托兹”。

“天晓得”是个精明的商人。他听说我们正在找他后，就主动找上门来。他织的布做工精美，色彩鲜艳，黄、绿、红、蓝几色交织。我们从他那里买了一些。可到了付钱时，“天晓得”只收美元，不要我们从黑塑料袋里拿出的钱。不久，我们得知，加纳的商人也不再接受信用卡。和前南斯拉夫的酒店老板一样，他们知道，收到信用卡公司的支票需要一个月。等到拿到支票，本国货币又不知贬值了多少，钱没赚到，反倒蚀了本。

什么是坚挺的货币？什么是靠法令支撑的货币？加纳是一个极好的范例。

加纳最早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接着变成法国殖民地，最后落入英国之

手。今天独立的加纳和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和其他前法国殖民地不同，货币几近崩溃。原因正在于此。

我们刚刚离开的象牙海岸虽然负债累累，却是非洲大陆上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自从 1996 年以来，象牙海岸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递增 6%。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国和出口国。象牙海岸的首都阿比让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倘若我是一个在非洲的企业家，想发笔财的话，或许还会再次光顾象牙海岸。在阿比让，使用信用卡没有任何问题。当地货币十分坚挺。

加纳和象牙海岸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英国和法国的区别。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加纳、尼日利亚和冈比亚独立时，英国人一走了之，听任新政府自生自灭。新独立的国家成立了自己的央行，发行了本国货币。而法国的殖民地仍然保持了同法国的密切联系，如象牙海岸。在前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国家，我们去过的每个城市里，都可以感到法国的影响。我们见到过很多法国商人，在街头上与法国军人擦肩而过，光顾过一流的法国餐馆，买过法国的美酒和奶酪。在书店里，卖的世界地图上特别标出“法语区”国家，就是遍布世界各地的法语学校用的那种地图。法国人继续参与当地的政治。更重要的是，非洲的 14 个前法国殖民地使用“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以下简称 CFA）。

CFA 与法国法郎挂钩（现在又同欧元挂钩），两者比价是 1 : 100 左右。法国政府强迫以上国家使用该货币，从而对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加纳的前独裁者罗林斯若想增加本国货币供应量，指令加纳央行加印钞票就是了。多年来，他一直是这么干的，所以加纳货币才一落千丈。我们在加纳期间，正赶上大选。世界上任何国家，每逢大选年，政府如果能多印钞票的话，一准会这样干，连美国也不例外。看看 2000 年下半年美国政府的开支就知道，增长了很多。法国人晓得加印钞票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吃过加印钞票的亏。过去几十年里，他们多次加印钞票，造成严重后果。1982 年起，法国放弃了这种做法。

如果象牙海岸的总统想多印钞票的话，他必须征求央行的同意，央行同时负责调控所有 14 个 CFA 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它们同样都受到限

制，在财政上必须有所收敛。

尽管如此，以上国家仍有自己的问题。由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能随意加印钞票，于是改为大量举债。象牙海岸是世界上负债最重的国家之一，结果这个非洲大陆上原本稳定的国家，现在局势动荡。我们抵达多哥时，边防警察对我们可能送给他们的小装饰物不感兴趣，只对钱感兴趣，甭管多少。他们一连3个月没领到工资了。据他们讲，他们宁愿给政府白干，也不想失业。一旦失业，就永远断了收入来源。

前法国殖民地也有经济困难的时候，但它们的货币很坚挺。只有投资人确信货币不会贬值的国家，才能吸引资本流入。由于奉行严格的金融政策，加上CFA又与欧元挂钩，非洲的货币更加坚挺，坚挺的货币对这些国家未来的经济是个好兆头。14个法语区国家甚至在探讨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加纳人的生活水准却在下降。一个本国货币不断贬值的国家，是很难吸引外资的。加纳的进口不久将陷入停顿，因为它的货币一钱不值。鉴于加纳高度依赖进口石油，后果可能极其严重。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前英国殖民地尼日利亚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这个作为世界产油大国之一的国家里，我甚至找不到地方给汽车加油。

我期待着与加纳阿克拉(Accra)的那位经纪人相会，和他聊聊加纳的政策。

9

我的加纳经纪人

在 20 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期间，大多数设立股票交易所的非洲国家是不允许外国人购买股票的，这种做法是“把殖民主义者赶出去”时代留下的遗风。到了 90 年代，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他们需要吸引资本，于是规则开始变化了。当时我对非洲颇感乐观，我想参与。通过在美国的一位加纳驻联合国代表，我联系上了在加纳的一个经纪人——在加纳招商银行工作的克拉克逊·阿奇姆彭先生。我给他打电话，发传真，开了一个账户，然后买进股票。我在加纳法律允许股票交易的第一天就开始买股票了。在该国门户开放的首日我的钱就已经在那儿了。

多年来，我时不时地通过阿奇姆彭先生做些其他投资。我们有通信往来，但却从未谋面。事实上我们交谈的次数也很有限，因为加纳的电话服务质量真是差得不值得一提。我们之间的交往大部分靠写信。我购买的股票——加纳银行和酿酒厂的股票——都大幅度增值了，这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我买的时候，这些股票几乎不值分文。只要有红利，我就会用红利买更多的股票。我很少给阿奇姆彭先生写信，要写的话无非也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我看到账上又进钱了。请再替我买些股票。”

阿奇姆彭先生为我打理钱财，这样干了好几年。我对他一无所知，对我来说，他只是纸上的一个名字。若有见他的机会我是不想放弃的。当我开车接近加纳时，我写信告诉他，我要去看他。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只是计划到那里去，礼节性地拜访他一下。见过面以后我们就可以

把各自眼前纸上的名字与一个面孔联系在一起了。

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我吃了一惊：公司里所有的人都在迎接我。当然，我看到的并不是像美林证券公司那样的大公司——该银行投资部门总共大约就十来个人，但是让我惊喜的是，他们都想跟我打招呼，走过来聊聊天。

我不知道他们手上有多少外国客户，但是我想来拜访他们的外国客户可能少之又少，而我恰好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阿奇姆彭先生四十来岁，身材不高，谈吐优雅。像世界上所有在银行界工作的人一样，他身穿一套像是在伦敦定做的西服。他若走在华尔街上，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的。他办公室里其他的投资家也一样。像他一样，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我们谈论起了市场和即将举行的选举。

该国长期执政的军事独裁者杰里·约翰·罗林斯终于要下台了，我认为这再次证实了我对非洲感到乐观是有道理的。我们猜测最可能赢得选举的人是谁，讨论加纳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我向他们解释，他们的货币正急剧贬值，因为政府在靠印钞票争取赢得大选。他们不喜欢听这些话，当时他们也不接受我这样的分析。（现在他们接受了。）我告诉他们，要是政府继续让货币贬值，我就不会再往加纳投资更多的钱。

我们离开加纳后，沿着几内亚湾继续往东，穿越多哥、贝宁和尼日利亚，向喀麦隆方向行进。在多哥和贝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对伏都教(voodoo)的信奉。在这两个国家里，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数加在一起只占总人口的30%，而另外的70%则信奉当地所谓的土著信仰。在多哥和贝宁，土著信仰一般指的就是伏都教。在贝宁，我们参观了维达(Ouidah)镇上的蟒蛇庙。庙里十多条蛇大多数都在睡觉，它们体会不到自己这一生过得是如何的成功、富有和权势浩大。在信奉万物有灵的宗教里，蟒蛇是精神力量的源泉，因此蛇可以在城市里自由出入，在街道上到处游走，无人敢说个不字，蟒蛇到哪里，蛇就可以到哪里，就像印度的牛群一样。我猜想，蟒蛇除了人之外想吃什么都行，而蟒蛇似乎从来不打搅人。蟒蛇庙对面的街上有一座大得多的罗马天主教堂，其重要性与蟒蛇庙相

比就逊色得多了。(贝宁国内所有教派的基督教徒加在一起只占总人口的15%。)为了提高这座教堂的地位以加强其竞争力,教皇觉得有必要将它升格为天主教大教堂,使其享有与梵蒂冈大教堂同样的礼仪特权。

贝宁的蟒蛇让我有点害怕,但是这种害怕与我一想到要踏入尼日利亚时所感到的那种害怕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越接近尼日利亚边境,我的担忧就越甚。在整个旅途中,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了恐惧。我们听到各种有关尼日利亚的传闻,例如暴乱、腐败、滥权、土匪、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残杀、一个紧接一个的政变,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而我前一次对这个国家的访问更使我对这些传闻深信不疑。如前文所述,尼日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但是该国主要的出口项目也许是有组织的犯罪。在我们过境时,我见到的第一个边防警卫对我说的话竟然是:“给我一点钱。”

在沿非洲海岸行进途中,每一个人都不停地劝阻我:“你应该避开尼日利亚,否则你的非洲之行就毁了。”

尼日利亚前独裁者的儿子在接受审判时作证说,作为儿子,仅他一人就为家人将7.5亿美元现金运出了尼日利亚,钱是从各种名目的银行账户里取出来装在箱子和袋子里运走的。尼日利亚德士古公司总裁之所以被派到那里去,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偷公司的钱,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正在中央银行办事,独裁者的妻子同她的一大帮朋友进来了,每个人都拿着手提箱。他们马上要去欧洲,因此把银行里所有的美元都提走了。

尼日利亚是欧佩克的成员,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但是这些资源并没有给尼日利亚人民带来多少好处。(该国人口1.3亿,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所有的钱都被偷走了,至少大部分被偷走了。或者我说的是以前的情况。尼日利亚有四座炼油厂,我们在那里的时候,由于缺少资金,没有一座炼油厂开工运转。我们访问期间正遇上议会选举,议会通过一项措施,批给自己2亿美元,从而使每一个议员都能买一辆豪华轿车,并分享3万美元的家具津贴。

我们不想在尼日利亚呆太多时间,几天后我们就离开了。和该国其他方面一样,办理离境手续也让人头疼。离开这个国家之前,我们必须到8个不同的站所去办离境手续。由于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两国间的局势严

峻,几乎没有什么人过境,但是那里却雇用了 40 个人。这样做并不是因为那里缺少人手。我翻了一下登记本,那天总共只有三个人过境。

像非洲大部分国家那样,尼日利亚是依照命令创建的。其边境线的划定毫无理由可讲,只听凭某些欧洲人简单地说一句“这是尼日利亚”就定了。那里的内乱极其残暴。看一看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比亚夫拉企图分离的例子,想一想最近伊斯兰-基督教冲突中被杀戮的 7 000 人,你对该国的政治生活就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了。荣获 2002 年世界小姐桂冠的是尼日利亚人,但是由于宗教暴乱,挑选她的继任者的竞赛场地不得不转移到伦敦。我认为尼日利亚是无法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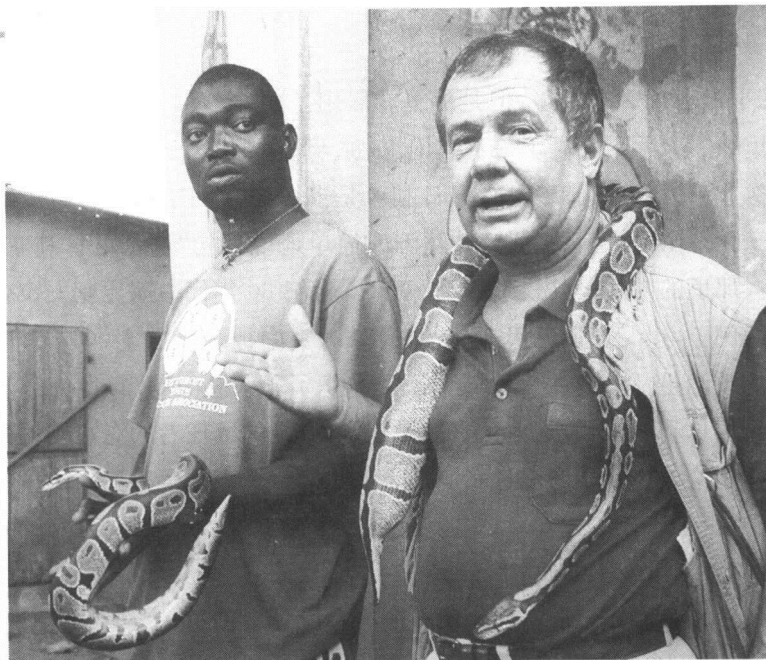
“是吉姆·罗杰斯吗?”

这次不是摩托车而是一辆黑色的四轮驱动丰田车,不是在马德里,而是在喀麦隆西部的穷乡僻壤。我和佩奇在昆巴(Kumba)一个加油站给奔驰车加油,吸引了一大群人——很快我们就被包围了,说得准确一点是被暴民包围了。这时我听到有一个男子叫我的名字,他的那辆新的多功能运动车使他看上去不像是当地人。他没有穿西服,但那身体闲服绝对能让他进出伦敦所有的鸡尾酒会。当他下车时,这三百人左右的人群安静了下来,这些人中境况最好的穿的是牛仔服。当他走过来作自我介绍时,大家纷纷给他让道。

他叫穆凯特·埃卡勒,名字对我来说很陌生,但是他的王子头衔却让我知道了他的身份。尽管穆凯特的父亲是很早以前被英国人指定的国王,在实际权力上屈居在该国总统之下,但是他在名义上仍然是统治昆巴周围区域的国王。穆凯特是在英国受的教育,在伦敦城,即伦敦的金融区工作过,多年来一直看我写的东西——我写的文章、专栏和书籍。他很高兴地回忆说,当年我对喀麦隆的发展颇感乐观。现在在非洲一处穷乡僻壤的加油站里,在赤道的雨林中,在一个可以把狢狢、野猪和箭猪当下酒菜的地方,我居然碰到了自己的一个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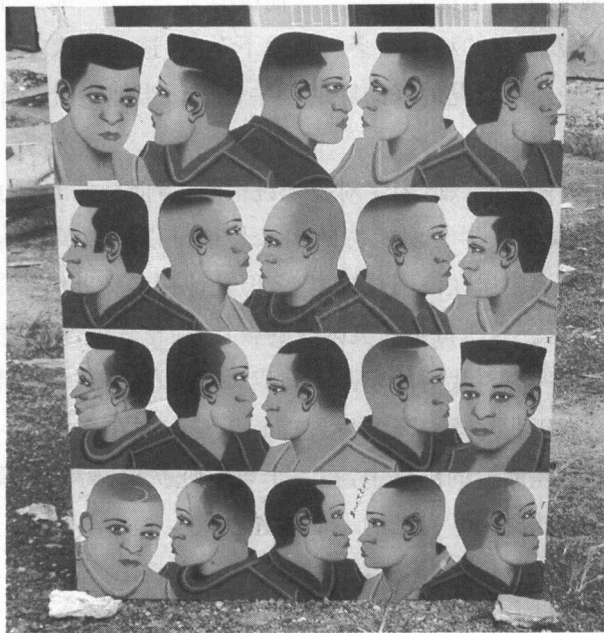
我想自己一定是得了疟疾,产生幻觉了。

他请我们转回到他家去作客。他在昆巴郊区有一幢殖民式大庄园房,我们在那里跟他和他的哥哥一起吃了午饭。[我们在首都雅温得



绝大多数贝宁人都信奉万物有灵的宗教,他们认为蟒蛇是精神力量的源泉。

在加蓬,给我理发的理发师让我从各种发型里挑选想要的发型。



(Yaoundé)还见过面,一起吃过好几次午饭。]见他的哥哥戈弗雷更使我们有种人在梦中的感觉。戈弗雷也是个王子,是耶鲁大学 1975 年的毕业生。他正要再度去美国,参加班级的团聚活动。

这是我在旅途中又一次意外的邂逅。我在旅行中经常有类似的会面,使我长了很多见识。在喀麦隆的橡胶、菠萝和其他农产品中,我看到了极好的赚钱机会。政府指导下所取得的进步小得可怜,因此我考虑买地,把当地生产搞活。两兄弟马上告诉我,外国人在喀麦隆买地是不合法的。我强调吸收新资本和专门知识能创造工作机会和收入,这对所有人都有益,但是他们坚决反对我的想法。这时我意识到,造成该国土地不值钱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潜在的买主被挡在了门外。许多非洲人抱怨,他们国家的土地价格被低估了,但这种结果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土地可以给所有人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是他们宁愿让土地烂掉也不愿意让“外国佬”进来。

感谢上帝,幸亏美国在发展初期没有采取这样的做法。我们恳求外国人来购买他们想买的东西。如果他们愿意往西面去,去开发西部,我们就把土地送给他们。于是,我们从一个不起眼的混乱小国变成了地球上最成功、最强大的国家。

我以前对喀麦隆和非洲感到乐观,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相信新领导群将不同于以前的那帮“解放者”,因为“解放者”后来都成了无耻的独裁者。过了 10 年,人们看到,现在的喀麦隆总统并不比他的前任好到哪里去,而我上次到该国旅行时对他抱着很大希望的。这位总统利用语言和族裔方面的差异,大行偷盗之事,与他的前任相比毫不逊色。我怀疑自己以前对非洲发展所抱的热情是否太一厢情愿了。

我们于 5 月 10 日离开喀麦隆,穿过赤道几内亚,当天就到达了加蓬。在那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穿越战乱不断的刚果共和国,尽量往南方走,躲避战乱更为严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扎伊尔),进入同样处于战乱之中的安哥拉。

在加蓬,我们跨过了赤道线,但是由于我们走的路线除了本地人外几乎没有其他人走过,因此就没有什么机会来庆祝一下了。而在其他国家,

在跨越赤道线时都要庆祝一下的。在野草丛中有一个简陋的标志，上面写着“赤道线”，我们只停留了一下，拍了一张照片就走了。在世界上，加蓬是惟一个搞对了新千年从何时开始的国家——该国将在 2001 年 1 月 1 日庆祝新千年的到来。除此之外，该国做对的事情就不多了。他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白白浪费了巨额的石油财富。那里的房屋建筑陈旧不堪，水泥高速公路又成了泥泞的羊肠小道。我们首次碰到的 7 个官员中有 6 个拒绝让我们通行，原因是我们没有行贿。送礼是一回事，但是他们索要的是明目张胆的贿赂。

与贝宁不同，蟒蛇在加蓬不享有神圣地位。我在离开加蓬之前蟒蛇、大蛇统统都吃过了。在我们往南穿越加蓬的途中，我们看到有人在卖猴子和鹦鹉，当然不是作为宠物卖的——马路旁，吊死的猴子和鹦鹉被挂在棍子上出售。

在首都利伯维尔(Libreville)，我们去了刚果大使馆。据我们了解，刚果近期的内战正在平息下来，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收集各种信息。自从在阿比让买了签证以后，我们在往南行进的途中一直与刚果官员保持联系，评估进入刚果的可行性。

“我们可以开车穿越贵国吗？”我们问在利伯维尔的领事馆官员。

“没有问题，”他回答说，“只要你们持有效签证。”

“我们的签证是有效的。”

“我可以看一下吗？”

我们把签证递过去。

“这不是签证。”他说。

“这是我们在你们设在阿比让的大使馆里买的。”

“我们在阿比让没有大使馆。”

我们得知，在象牙海岸一间漂亮办公室里贩卖刚果签证的那个家伙是个骗子。我们的签证是伪造的。于是，我们在利伯维尔从那个人手中又买了签证。有谁知道哪些签证是有效的呢？

“走吧，”他说，“你们可以到南方去了。”

我们这才去了南方。

这里得说明一下：世界上有两个刚果。一个是刚果共和国，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国家，它曾经是法属赤道非洲的一部分，首都在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跟法国关系非常密切，目前正经历着从内战转变到多党制民主的阵痛。该国的近代历史不像前比利时所属刚果（即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那样充满骚乱，后者自从1960年独立以来一直在给“不稳定”一词增添新的含义。1971年至1997年期间，在蒙博托·塞塞·塞科政权的统治下，该国的国名叫扎伊尔。当我和佩奇旅行时，蒙博托刚刚被赶下台，因为他的政府贪污腐败登峰造极，而导致他下台的内战仍在进行之中。

去了在利伯维尔的刚果大使馆之后，我们又到加蓬的运输和旅游部部长办公室去询问。我们仍然无法确定道路是否安全，是否可以通行。我一直保持着从不同的来源寻求信息的习惯。我发现，大多数身居官位的人都不愿意说“不知道”这几个字，他们宁可向你提供不正确的信息。他们宁愿说谎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无法回答某个问题。

“那里的道路安全吗？”我们很想知道。

“绝对没有问题，”我们被告知。“你们开车去好了，不用担心。”

“你有没有听到有关道路状况的消息？”

“加蓬的道路很好，刚果的道路也不错。”

从那个人讲话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毫不在乎自己信口开河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走了250英里到达边境以北29英里处，在一个叫恩丹德（Ndendé）的小村庄里，我们才发现边境关闭了。

“不要再走下去了，你们在浪费时间，肯定过不去的。”有人告诉我们。

很遗憾，他们说的不错，我们最后从几个法国人那里证实了这个消息。这些法国人在恩丹德从事木材生意，收购珍贵硬木出口。

“你们怎么把树木运出去的？”我问他们。

他们回答说，用卡车把树木运到海边，到马永巴（Mayumba）镇，从那里装船运到欧洲。马永巴似乎是惟一个比较重要的镇。既然那里有船或者甚至有驳船运送木材，我们就有可能找到一个船长，说服他运送几辆车和一伙冒险家。我们不想走回头路，于是我们往西面行进。

我们终于来到马永巴，在那里住了三四天。我们住在一栋位于悬崖上的小屋里，从那里可以俯视整个山谷，还可以看到一个大院子的一部分，大院堪称豪华，但已显现衰败迹象（我们提供了大院里发电所需的柴油）。大院主人是个上了年纪的法国人，在那里已经住了40年了。最后我们搞到了一艘驳船和一艘拖船，两艘船载着我们进入大西洋，沿着被关闭的边境航行，一直到刚果的港口城市——黑角（Pointe-Noire）市。

把汽车装上驳船的惟一方法就是直接开上去，我们只能等到退潮时才能这样做，但是驳船只有在涨潮时才能开出港口。我们花了大半个下午的时间才把车装到船上，然后离开港口。佩奇则利用这段时间购买东西。船员告诉她可以使用厨房，这让她兴奋不已。她把市场上最好的配料都买来了，我们一上路，她就开始起劲地烧饭做菜。我们刚进入大西洋，她就躺在了甲板上，晕船了。这之后的大约二十个小时里她一直躺在甲板上，烧饭做菜就成了我的事了。

我们到达黑角市后，呆了没几天就越过边境进入卡宾达（Cabinda）。卡宾达与安哥拉本土分离，中间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出海口，这是1884年《柏林条约》送给比利时国王的礼物。比利时国王得到了刚果河的出海口，而葡萄牙国王则保住了现在称为卡宾达的这部分安哥拉国土（葡属西非）的占有权，现查明这块土地蕴藏着大量的石油。我没有告诉佩奇，我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分离主义分子在那个星期劫持了一些外国人，把他们当作人质。但是我们一到达区域首府卡宾达市就看出，那里正在发生政治动乱，很明显我们置身于战区之中了。旅馆都被炸毁了，整个城市看上去都被炸弹炸过了。我们一到那里就着手准备继续往南方走。

幸亏在这之前我们已估计到可能无法穿越前扎伊尔的边境，因此我们在加蓬问过安哥拉大使，如何从卡宾达去安哥拉首都罗安达（Luanda），即从该国的一头走到该国中部去。

“有定期渡船，一周两天。”

“那么如果我们无法开车的话……”

“你们就乘渡船好了。”

“你乘过渡船吗？”佩奇问道，现在她对所有官方人士说的话都要打个

问号了。

“我去年搭乘过。从卡宾达到罗安达要走两天。渡船不错，不用担心。”他微笑着说。

在被炸毁的卡宾达，我们一找到旅馆后马上就去了解渡船的班次。

“没有渡船，”我们被告知，“已经有几十年没有渡船了。”

我去卡宾达的“旅游办公室”寻求帮助，听到我问：“我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办公室里的那个家伙好像被我的问题问糊涂了。他告诉我，他们对卡宾达有许多宏大的计划。他们要建夜总会和高尔夫球场，还要盖餐馆，以及为石油工人造迪斯科舞厅。

“他们从不到市区来，他们就呆在大院里。”他说，好像不明白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渡船呢？”我问他。

“没有渡船。”

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渡船。他不知道怎么出去。

我继续四处打听，终于见到一个年轻的葡萄牙商人——胡里奥·弗洛里达·洛佩斯，他是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

“我大概可以帮你搞到一艘驳船，”他说，“我的材料就是用驳船运进来的。但是最快也得等两至三个星期。”

这是个很诚实的人，他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跟我说费用的事。

“5 000 美元。”

让我为难的倒不是钱，而是要等上两到三个星期。

我们身处战乱之地（卡宾达的人民想从安哥拉分离出去，以便由自己来掌管石油），在我们周围方圆 50 英里之内还进行着另外两场战争（在前扎伊尔和安哥拉本土上），在方圆 100 英里之内则有三场战争（包括刚果共和国的内乱）。周围总共进行着四场不同的战争，而我还偏偏想钻进其中最危险的一场战争中去（我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往南行进）。

我们开车到处转悠，不住地打听，有点线索就穷追不已，当我们经过机场时我看到跑道上有一架巨大的俄罗斯货机。我猛然掉转车头，开着奔驰车就往机场冲去，飞速冲过停机坪。货机已经降落，正在卸货。现场指挥的是安哥拉军队的一位两星将军。他要去罗安达。

“你能把我们带出去吗？”我问他。

他说给 400 美元他就干。

“我 40 分钟后就起飞了。”他补充一句。

我们心急火燎地赶回旅馆，拿上行李，途中还处理了汽车熄火的事
故，最后及时赶到了机场。

“我们准备好了，”我告诉他。

“1 200 美元拿来了吗？”

他知道我们已经成了网中之鱼，听凭他宰割了。我还能做什么呢？
1.2 万美元都算是便宜的。我已经知道租一艘驳船要花费 5 000 美元，还
有个是否能租成和何时才能租成的问题。想办法租一架包机来运我们，
一架大到足以运送车辆的货机——这得要多少钱啊？假设能办到的话。
5 万美元？不够？天知道要多少钱？我马上交出 1 200 美元，真怕他改变
主意。

我们开车上了飞机之后看到机内已有三百来人了，有士兵、平民百
姓、看上去像律师的老年人、年轻的学生，男女老少各种年龄的人都有，一
群人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躺在地板上，有的站着，你能想到的各种各样
的姿势都有。直到飞机在滑行中，飞行员拉起货舱门时，他们还在把人往
机舱内拉。机舱内没有座椅，也没有任何安全设施。除了 6 个俄罗斯和
乌克兰机员外，我们是飞机里惟一的外人。其他人显然都是将军的朋友，
或者是能支配他的人。毫无疑问，他是卡宾达最有权势的人。他是统帅
该区域所有军队的司令。

飞机 45 分钟之后在罗安达降落时我们才了解到，这架货机是安哥拉
军队从俄罗斯租赁来的两架货机中的一架。当我们在空中飞行时，飞行
员邀请我和佩奇去参观驾驶舱。佩奇马上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我过了
一会儿之后去看他们在干什么。我进去后看到，所有机员都在喝伏特加
酒。我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跟他们一起喝，我想至少得有一个人保持清
醒的头脑。

（两个月以后，我从英国广播公司对非洲广播的节目中听到，那架飞
机坠毁了，机上人员全部罹难。又过了两个月，第二架飞机也掉了下来，
同样无人生还。）

安哥拉的内战已经持续进行了二十多年，还不算导致 1975 年独立的那场战争。很多年以来，这场内战是由两个超级大国资助的，打仗的军队也是前苏联和美国的扈从——古巴和南非——提供的。直到前苏联解体之前，安哥拉一直是一个意识形态战场，使得美国与一个种族隔离政府建立了暧昧的伙伴关系，一起致力于推翻安哥拉经过民主选举的政府。冷战结束后，两个超级大国退出历史舞台，按说冲突也应该结束了。政府里没有一个人想再当共产党员了。但是安盟(UNITA)，即当时美国支持的那一方，再次拒绝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我们支持了若纳斯·萨文比，这又是一个我们支持暴君，使我们少了朋友、多了敌人的例子。这又是一场“民主与共产主义”的战争，而参战的人则是来自两个扈从国家(古巴和南非)的无辜少年。开始时，公众受到情绪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支持战争。现在的这场冲突则从更有形的事物——石油和钻石上得到动力，实际上这场冲突的核心问题自始至终就是石油和钻石。

罗安达坐落在大海湾之中，四周风景如画，如果没有战争的话，这里可以跟里约热内卢或斯德哥尔摩相媲美。但是，战争把它变成了地狱，市区内满目疮痍，破烂不堪，房屋倒塌，设施破旧。我们走到以共产主义英雄命名的街道上，如切·格瓦拉大街、卡尔·马克思大街、菲德尔·卡斯特罗大街等等，身边到处是人群，战争把他们从农村赶进了城市。我所到之处都能看到群众身上散发着一股强烈的创业精神，蕴藏着的巨大动力正蓄势待发。

我在非洲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再次加深了我上次旅行中所产生的印象：西方国家对非洲人的看法是大错特错了，我可以证实，非洲人并不像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天生的“懒鬼”或骗子，或者既是“懒鬼”又是骗子。在非洲，我会碰见无数有天赋、有干劲的人，他们愿意从早干到晚，他们对工作信念所抱的热诚与中国人不相上下。

由于我持着这种看法，当我们开车穿越安哥拉南部各个战场时，我们更加感到悲哀。当我们驱车往海岸驶去时，我们想到了那些战死的年轻战士，他们中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为了种族隔离制度而战死沙场；我们想到了这些冤魂以及所有在绝无希望的内战中死去的无辜平民，他们是为了支持所谓的“主义”而死的，现在斯人已逝，“主义”何在？

在离罗安达南面不远的一个检查站，我们被告知，如果没有军队护送，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对此我们是有准备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世界许多地方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到了检查站后，我们走进警卫室，询问下一班护送的军人什么时候出发。在首都时，政府官员曾对我们说过，每天有两次护送，上午和下午各一次。

“人数太少，不能护送，”卫兵告诉我们。“你们可以把车停到那里去，”他边说边用手指着停在路边的一辆18轮大车——我们所能看到的惟一一辆民用车，“等人数够了后我们会派护送队的。”

“那你认为要等多久呢？”我问他。

“我不知道，也许等到下个星期，也许等到下个月。”

“吉姆，我们可不能像傻瓜一样空坐在这里。”佩奇说。

我到处打听后得知，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没有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报道。因此，在权衡了各种选择——等在这里，在战区边缘露营，等上一两个星期或等多久算多久，或者不要军队护送自己开车往前走——之后，我们决定往前走。卫兵已经睡着了，醒来后似乎对我们作何种选择根本就无所谓。他听到我们保证前面没有一切问题之后，就让我们通行。

这之后我们开车行使了很长一段路，经常遇到士兵，有些小兵年龄都不足15岁，他们不时要我们停下来，看到我们出现在检查站他们一个比一个更惊讶不已。在途中我们送了很多万宝路香烟，也拍了不少宝丽莱照片。我们要去本格拉(Benguela)，据说这个港口城市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沿途我们看到了各种被炸弹炸毁的车辆——轿车、卡车、公共汽车等等，烧焦的残骸就留在路中间。

“我们真是发疯了，”佩奇说，“这里是一个正在打仗的战区。”她注意到路上根本没有任何车辆，说：“除了士兵外，我们没有看见任何人。”

在城外大约二十五公里处，当我们开上一个小山坡时，一名士兵走到路中间，要我们停车。我们送他香烟，说服他让我们过去。但是，我们被自己的摄像师耽误了，他离我们大约有三公里，在我们后面拍摄战争的惨烈景象。通常我们都会用对讲机呼喊他，让他跟上来，但是我们担心，把我们的通讯设备拿出来会吓坏这些士兵。双向无线对讲机和照相机可能会引起士兵的怀疑，即使最见过世面的士兵也不例外。

当我们在等第二辆车赶上来时，一个军官从山上走下来，说不允许我们再往前走了。我们恳求他，我们据理力争，但是都没有用处。我们被迫在路边过了一夜。

那个晚上佩奇因为害怕而哭了起来，在整个旅途中这是惟一的一次。她以前也哭过，但不是因为害怕；她也经历过很多担心的时候，但从来没有为此哭过。她坚持要睡在车里，因此我们根本就没有支起帐篷。周围全是士兵，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在黑暗中喧哗嬉笑，佩奇不知道他们想得到什么，他们到底是要钱、要她这个人、要汽车还是要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拦住我们。我们在惊恐之中过了一夜，根本无法入睡，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了。

很明显，这里是保卫城市的前哨阵地。如果叛军要攻击的话，这里首当其冲。我猜想，派到这里来的士兵一定处于草木皆兵的状态。

因此，那天早上我在讨好主管军官时，一直小心翼翼，慢慢地提到是否可以拍几张宝丽莱照片。他允许我拍照，我给他拍了一张，他很喜欢，兴奋之余他让手下的全体士兵围在他周围，把所有的枪炮、火箭发射器，所有武器、弹药，全部放在周围，我们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最后，他说我们可以走了。他要陪我们到山顶上去，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将军。

到了山顶我们才恍然大悟。山下大约三百米处有一座桥。我们之所以被禁止通行是因为在我们前一天到达时，桥上已经布好了地雷，布雷是每天晚上的例行公事。他们在桥上布雷是为了防止叛军过桥，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叛军在桥上布雷。每天早上他们再把地雷取出来。如果我们在前一天晚上过桥的话，就是说，如果指挥官在那位年轻士兵对我们放行时不加阻止的话，我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我们见到了那位将军，也见了更多的士兵，又拍了不少宝丽莱照片，然后才过了桥，进入本格拉市。这是座极为漂亮的城市，没有什么外国人，我们在那里吃了丰盛的海鲜大餐。（沿着这片海岸可以找到世界上最大的螃蟹，由于战争，这些螃蟹大多未被捕捞，但是应有尽有，1美元就可以让你吃个饱。）我们再往南行，饱览了整个旅途中能看到的最漂亮的乡村景色，完完全全的自然风光，丝毫没有受到旅游者的侵扰（你想谁会到战区里来观光旅游呢？）



那天晚上,佩奇惟一一次因为害怕而哭了,因为一位安哥拉将军强迫我们在他们与安盟对峙的战争前线与士兵们一起宿营。

过境进入纳米比亚，即前西南非洲，只花了几分钟时间。海关官员见到我们似乎很兴奋。移民官还说了句：“欢迎到纳米比亚来。希望你能把投资人带进来。”他没有想到我本人就是个投资商；他不过是在宣传政府的政策。该国向外国投资开放的政策是真心诚意的，已经深入到最基层。举个例子，我们在这里受到的接待与我们在马里的待遇形成强烈对比。在马里，我们看到一个鼓励在该国投资的大广告牌，但我们的摄影师为了拍它竟然遭到逮捕。除了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外，我们在马里受到警察的骚扰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在纳米比亚，他们似乎真的欢迎我们到那里去。

边境旁边的城镇翁丹瓦(Ondangwa)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安哥拉人到这里来采购他们那里因为战争而无法买到的各种商品。这里有仓库、商店、新建的旅馆。在翁丹瓦，有一个与安哥拉叛军有联系的走私者接近我，说想买我的汽车，用钻石支付。从他那里我得知，从安哥拉走私出去的钻石在南非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平均卖 500 美元 1 克拉。他拿出钻石给我看，当我最终让他相信两辆奔驰车我一辆都不会卖时，他提出让我用现金买他的钻石。他说这些钻石价值 7 万美元。我给了他 500 美元。我深感自豪，自以为这是像印地安那·琼斯那样富有冒险精神的投资者在黑市市场上做的又一笔杰出交易。

从坦桑尼亚的一位钻石商那里我得知，我买的钻石其实是玻璃。

想一想，我本人曾无数次规劝过别人：除非自己对某个投资项目了解透彻，否则绝不要投资。我的信条是：“我不会给你任何抢手的内幕消息。成功投资的必经之路是要了解你投资的对象是什么，要做到彻头彻尾的了解。如果你不了解华盛顿州的苹果园，就不要涉足苹果行业。”

而我自己竟然会把一小堆玻璃球当成钻石买回了家。

这是我在纳米比亚做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资。

出于各种考虑，我不想开车穿越津巴布韦。从我们得到的所有新闻报道来看，很明显，该国爆发暴力事件的范围非常广泛。罗伯特·穆加贝总统过去和现在一直在从事他那种独特形式的种族清洗。他一点都不隐瞒自己的意图，他要把所有白种人全部赶出这个国家，剥夺他们的钱财和

土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同样能说服我们不该去的理由。从这些新闻报道,以及从我们接触的所有人的言谈中我们得知,那里根本买不到柴油。

我在纽约时就认识津巴布韦的外交部长,当时他担任该国派驻联合国的大使。我在该国的股票市场有些投资,是前几年留下来的。但是现在外国投资在津巴布韦已基本上绝迹了,该国的货币在崩溃,金钱纷纷外逃。大家都怕拿不出钱来,因此每一个人都在往外带钱。要说寻找机会的话,单凭一次访问是不会得到什么成果的。

此外,我公开表示的打算绕过大部分非洲国家,驱车沿西海岸到好望角,再往上沿东海岸到开罗,希望成为走这条路线旅行的第一个人。此时进入津巴布韦就会把南非和莫桑比克从旅程中删除出去,这会破坏我给自己定下的挑战。我们可以在北部西行进入津巴布韦,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完全绕开这个国家。

不过还是存在一个我们非去不可的理由:维多利亚瀑布。

维多利亚瀑布是戴维·利文斯顿(我猜想也许应该叫利文斯顿博士?)在1855年发现的。这个瀑布横跨赞比西河,宽达一英里多,是尼亚加拉瀑布的一半,但高度是它的两倍。飞流直下的瀑布震耳欲聋,远在6英里之外就能听见其咆哮之声,看见其遮天蔽日的水雾。我第一次亲眼目睹这个瀑布是在其被发现136年之后,即1991年3月。我们冒险到那里去,因为我绝不能让我的妻子在有生之年错过身临其境的机会。2000年6月14日,即我们蜜月期的第六个月快结束时,维多利亚瀑布向佩奇·帕克展示了自己摄人心魄的壮观景象。

10

旋转狂舞的 苦行僧

我前一次到南非时，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的统治之下，由白人少数政府控制全国。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种族隔离制度寿终正寝，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道德和历史意义的事件。在这次旅行中，我在南非能记录下来的好事并不多，种族隔离制度的死亡是其中之一。

我们开车在装饰一新的开普敦(Cape Town)市游览。开普敦成功地变成了文化和商业中心，市内建造了世界一流的旅馆和餐馆，但是我心里由此而产生的较高期望却因为无处不在、惨不忍睹的贫民窟而破碎。即使是市内那些为取代过去破落不堪的房屋而新建的住宅区，里面生活条件的改善也非常有限。房屋一排紧接一排，密集地挤在一起，市内住在居民区里的居民并不高兴。示威游行司空见惯，开普敦的犯罪率急剧上升。警方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他们仍然有时间干些像对我们进行骚扰这样无聊的事情。

南非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众的失望而造成的，政府无法把因种族隔离制度消亡而产生的乐观前景变成现实。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新当选的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也保证，南非绝不会重犯其他黑非洲国家在前几十年中所犯的错误。曼德拉尽其所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在整个非洲，那些前欧洲殖民地国家终于得到了往往是以无数人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而换来的自由，它们无不声称：“我们将建立民主国家，我们要举行大选，我们会给自己的人民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国家。”但是不

需要多久,这些昔日的自由战士、伟大的解放者们自己就变成了独裁者。一人一票,但只有一次机会。他们喜欢掌握政权。他们喜欢金钱。他们破灭了经济,破坏了整个社会。造成的后果就是:资本抽逃,投资者离散。

曼德拉是值得赞扬的，任期一到他就让位，把总统职位移交给继任者。他坚持要举行选举，他的副手——塔博·姆贝基——当选为总统，将他取而代之。（如果我是曼德拉，曾经在监狱里被关过 27 年，现在已年逾 80，新近又交上了一个年轻女朋友，我也绝不想恋栈，不想把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手里。）但是在我看来，目前把南非团结在一起的惟一个因素就是：曼德拉还活着。他是个非常有威力的象征性人物，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只要他走进暴乱的人群之中，暴乱马上就会停止。一旦他去世了，我觉得这个国家的前途堪忧。

我在南非看到了腐败和杂乱无章的现象滋生蔓延，非洲其他独立国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遭受灭顶之灾的。南非的主要出口商品是黄金和钻石，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其他国家销售。南非具有我们离开摩洛哥以后所见到过的最出色的基础设施，但是得不到维修。新任的交通部长承认，该国在维修方面的支出不到所需经费的一半。很遗憾，我可以证实他说的不错，因为我开车时有切身体会。我们在那儿时，政府居然采取了火上浇油的措施：将货币贬值。关于政治腐败的传闻甚嚣尘上。曼德拉和姆贝基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邻国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但是仍然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需要应对 11 个得到官方承认的族裔团体。

眼下，黑非洲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缺乏进步大为恼火。他们本来期望黑人政府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实惠，但是他们得到的东西与以前相比并没多大区别，官员还是那样谎话连篇，那样无能和凶暴，与当年白人统治时毫无二致。他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政府。（只要付足了钱，任何人都可以买到专业执照；当我听说有为理发师和律师定的执照“特殊费”时我很失望，但是当我听说连护士和飞行员的执照都可以买到时，真让我感到恐惧。）糟糕的还不止这些，他们还雇用了外国人。我们遇见很多搬到南非来住的美国黑人，就像开拓一片新土地时一样，人们会举家迁移过去。他们中的许多人令南非黑人反感，当地黑人指责这些外来的黑

人傲慢无礼、盛气凌人，行动举止处处都要显示自己比本地人高明，好像他们露露面就为所有人做了天大的好事一般。当地人称这些人为新一代“丑陋的美国人”。

南非有三个首都城市：开普敦、比勒陀利亚（Pretoria）和布隆方丹（Bloemfontein），分别是立法、行政和司法首都。我们走访了这三个城市，所见所闻无不让我对该国的前途感到悲观。在约翰内斯堡，我们拜访了一位南非白人，他曾经是我在牛津大学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和他的黑人妻子养育了两个孩子。他妻子带佩奇去她教书的黑人学校，在亚历山德拉镇（Alexandra Township），是当年种族隔离制度下的一块黑人聚居地。她痛苦地告诉佩奇，这所全是黑人的学校在现政府领导下的处境竟然不如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过去。黑人政府不像白人政府那样重视黑人的教育，投入的钱也少得多。她的新任校长简直就是一个政治仆从，惟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职位是否稳当，如何利用手上的职权谋取私利。他根本不懂教育，也不关心教育。每一个族裔群体的本地人现在都纷纷弃国投奔他乡。

我朋友的妻子带佩奇去约翰内斯堡的一家艾滋病孤儿院，让她亲眼目睹这个登上世界所有媒体头版头条的疾病所造成的后果。那天晚上我们和一位著名的非洲事务顾问共进晚餐，佩奇谈到自己的感受，看见那么多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想到他们面临的是与他们死去的父母同样的命运，让人不由地感到伤心。我们都认为，这是一场降临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可怕瘟疫。这位顾问说，遗憾的是，几乎根本没有办法收集艾滋病肆虐程度的可靠统计数字。尽管我们看到的统计数字貌似精确，联合国的数字大得骇人，但是这些数字并不是以科学估算而是以猜测为依据的，是靠推断得出的，经常有些好心人把这些数据挂在嘴上，广为散播。时而这些数据会因政治需要而变化。

这位顾问的经历非常广泛，因为工作关系他需要在非洲大陆到处跑，他证实了我们在路上开车得出的结论。非洲缺乏公路和基础设施，既缺钱又缺专门技术，因此无法收集准确的统计数据。非洲大陆的很大一部分与世隔绝。在许多国家，除了首都之外，对其他地区知之甚少。非洲缺乏检测在那里肆虐的许多天灾人祸：肺结核、艾滋病、贫困、奴隶制、疟疾、

难民、战争死难者。即使政府有意愿这样做——对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这些目的有点得不偿失——政府也不具有实行类似艾滋检测这样的机制。

在我们的旅行中，我们没有遇见任何人在外面收集数据，也没有看见这类出版的数据所应反映的大规模死亡的证据。我们走访过的各个国家的人口并没有明显下降。这样说并不是要降低这场瘟疫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发现，非洲从来不缺少统计数字，但是最难找到的就是可靠的数字。

告别南非后，我们在斯威士兰王国稍事停留。斯威士兰同莱索托王国不同，莱索托四周整个被南非包围，而斯威士兰则有一边与莫桑比克接壤。我们以前去过莱索托，这是南非种族主义者设立的一个黑人家园，是一块黑人自治的飞地或者说是一个集中营——就看说话的人站在什么立场上。莱索托最初是为了限制黑人的行动而设置的，国家穷困之极，毫无希望可言。我们发觉斯威士兰的状况要稍微好一些。该国国王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与莱索托国王不同的是，他拥有权力，在吸引国外投资方面做得也要成功得多。他吸引的还不止这些。每一年，在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仪式上，他会召集该国所有的处女。她们身穿传统服装来参加活动。在歌舞庆祝会上，国王会挑选一位处女，如果他觉得这位处女不错，就娶她为妻，使他的妻妾大队再增加一名新成员。我们在斯威士兰时，32岁的国王已经有7位妻妾、7个儿女和两个女朋友了。他最近颁布诏书，规定18岁以下的少女进行性交是违法和不道德的行为。他内阁中与女中小女生性交的大臣实在太多了。后来，他又挑选了一位17岁的少女作他的新婚妻子。

我们在约翰内斯堡逗留期间曾到马达加斯加去转了一圈。马达加斯加原来是法国殖民地，现在已经独立，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国，也是世界上第四大海岛，属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马达加斯加从非洲大陆漂移出去，慢慢进入印度洋，带走了地球上其他地区已经看不到的各种动植物，因此具有极大的科学研究意义。在我们抵达之前10年，岛上发现了科学界已知的最小哺乳动物——侏儒狐猴。我们想到雨林里去，看一看那里的野

生生物。我们曾经听说过马达加斯加岛上起死回生的传闻。一个人死后4至7年，死者家属会按照传统聚集在坟墓周围，把尸体挖出来，重新摆放尸骨的位置，然后告诉辞世者各种各样的新闻。很遗憾，马达加斯加像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一样，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否则这个岛国会成为旅游者的天堂。

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统计，不管依照什么标准来衡量，莫桑比克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集中体现了非洲混乱不堪的现实。我确信，莫桑比克存在着很多机会。所有的东西都非常便宜，政府的讲话都正确得当，一场长期的内战结束了，我满怀期待着和兴奋之情踏上这块土地。

但是我看到的却全是腐败。

由于前一年洪水泛滥，大量的救灾款项涌入莫桑比克（水灾确实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受灾的范围并不像新闻报道要全世界人民相信的那样大），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钱并没有派上真正的用途。就像无数非政府组织挥霍无度一样，这些钱基本上都落入了不同政客和官僚的口袋里。（莫桑比克是我发起的取消对非洲援助运动中要援引的例子。我对非洲大陆的发展另有一个计划，将在下文详细说明。）

我们遇见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雇员，该组织的任务是防治疟疾，在莫桑比克，除他之外，还有小组里其他一些人。

“洪水造成疟疾爆发了吗？”我问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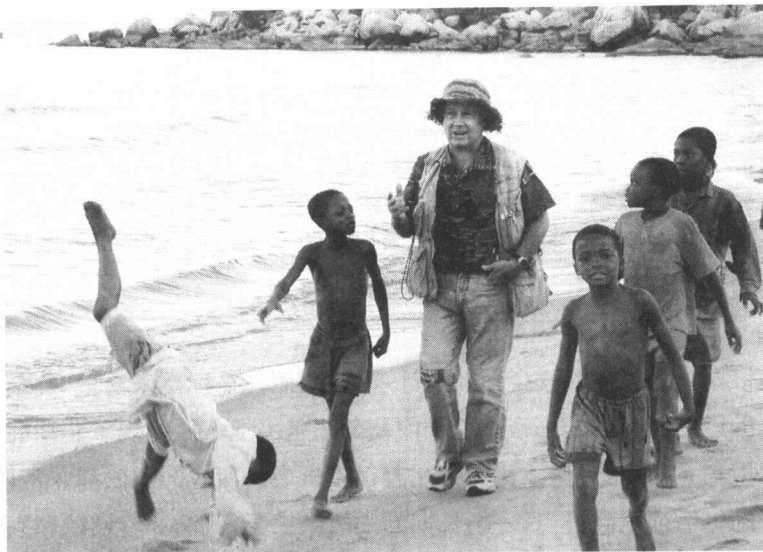
“没有，”他回答说，“但是，会爆发的。”

洪水泛滥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我想，如果洪水过后会爆发疟疾的话，疟疾早该来了。再不来就有问题了。但是，他在那里花着总部的钱，和小组的其他成员开着四轮驱动、车窗紧闭的空调车，过着舒适的生活。

我对这类人相当反感，当地人也非常蔑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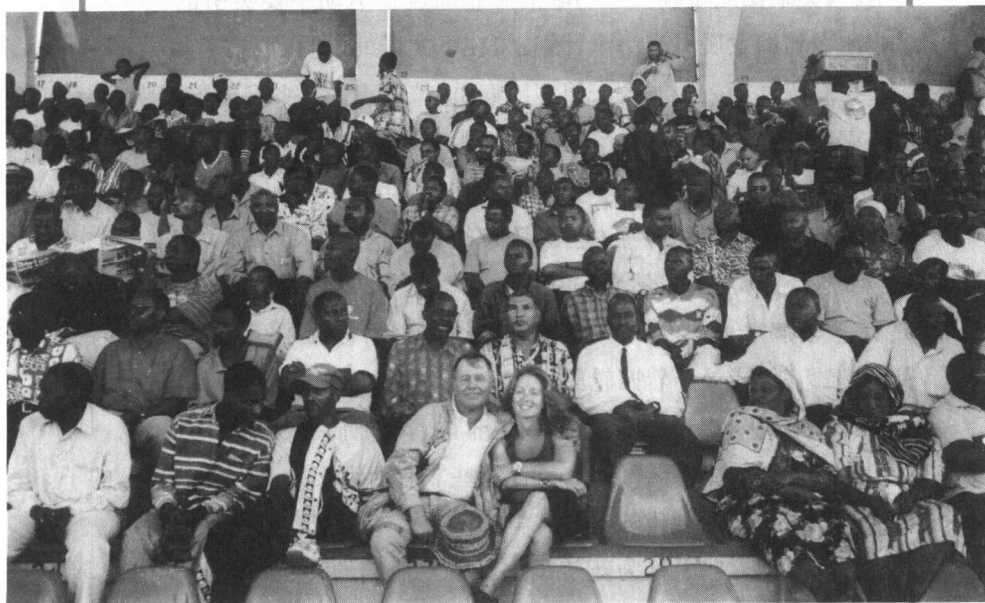
“如果对此仍有怀疑的话，就让那些非政府组织人士把他们自己的子女送到他们为我们创建的‘学校’里来读书。”一位非洲记者这样写道。

非洲人把这些人称为新殖民主义者。他们的举止言行确实如此，他们也是以这样的态度看待这些国家的。他们知道的东西比当地人多，他



当地村民未经游客邀请不得进入马拉维湖度假胜地。
我邀请照片上的村民来玩。德国一个非政府组织
把这个度假胜地整整包了一个星期。

我们一直想做当地人做的事情，例如观看这场莫桑比克足球赛。
由于那些经常出入第三世界的非政府组织的官僚们很少会去
做当地人做的事情，因此我们两个人往往是场内仅有的
白人。（照片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拍的，
因此佩奇是仅有的三个女人中的一个。）



们的钱也比当地人多。殖民主义者至少还得听命于某人。这些人却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他们住在大院里，外有警卫把守，内有大门阻挡，屋里还有卫星电视可以享受，他们开着车在各地巡视，让贫穷的当地人明白自己多么愚蠢。

“我们在等它爆发。疟疾会爆发的。”

如果不爆发的话，他会祈祷，请老天爷下雨。

后来在马拉维，我们在该国一个湖泊度假胜地争取到了最后两个房间，因为整个旅馆被德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包租了整整一个星期。非洲各国的政府部长飞到这里来开会。会议议程就是该非政府组织的主要议题：“评估与评价”。我们在南非时，姆贝基总统和马拉维总统巴基利·穆卢齐一起谴责这种大肆挥霍和浪费的行为。这两位总统从此以后不会再允许自己的部长出席任何类似的会议，而每年这样的会议要举行几十场。

姆贝基说，我们不需要空谈什么新南非，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新南非。我们必须停止空谈，我们已经空谈得太多了。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参加会议，而没有一个人真正在做事情。

开会完全是浪费时间、金钱和资源，而现代政府的服务似乎就是开会。非洲各国的部长们都喜欢开会——当你可以住在一个五星级度假胜地，大谈自己可以做什么时，何必真的去费力气改善自己的国家呢？非政府组织对开会更是上了瘾。

我们在莫桑比克最后的经历很能说明，姆贝基和穆卢齐在努力把自己的国家带进 21 世纪时，正面对着什么样的阻力。当我们即将离开莫桑比克进入马拉维时，一个边境官员拦住了我们，坚持要我们购买莫桑比克的汽车保险。

“我们要离境了。”

“你们没有汽车保险。”他说。

“我们入境时完全是按照要求行事的，”我告诉他，“这是图章，海关的盖章，出入境部门的盖章。我们并不是偷偷溜进贵国的。”

“你们必须要有汽车保险。”

“为什么？我们不在莫桑比克开车。我们要离境了，不会回来了。”

“我不会让你们离开这个国家的，除非你从那个人那里购买汽车

保险。”

我们只好买了 30 天的汽车保险，他这才让我们走了。

在我看来，就旅游来说，坦桑尼亚是非洲惟一最好的国家。你可以随意把非洲大陆其他任何 6 个国家放在一起，坦桑尼亚能够提供给你的非洲经历仍然要比这些国家全面。你并不需要费多大气力就能领略这种经历：坦桑尼亚至今为止尚未被外国游客侵扰，因为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该国都因那位社会主义解放者的偶像——朱利叶斯·尼雷尔——而与世隔绝。在坦桑尼亚，赏心悦目的地方很多：有印度洋之滨风光绚丽的海滩；有桑给巴尔(Zanzibar)这座充满异国情调的古老海岛，因古时候阿拉伯人的珍珠和香料贸易而带上神奇色彩，其历史在亘古永存、引人入胜的故事中代代相传；有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狩猎公园，里面动物成群结队；在著名的塞伦盖蒂平原(Serengeti Plain)附近，有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Ngorongoro Crater)，在它边上有一家“火山口旅社”，旅社里的人在澡盆里铺上玫瑰花瓣来招待客人。佩奇比喻说，好像著名设计师范思哲来到了非洲，没得比了。在我和佩奇看来，坦桑尼亚是非洲最安全的地方，而且物价低廉。除了这些去处之外，还可以攀登乞力马扎罗山(Mount Kilimanjaro)。

坦桑尼亚是我们游玩过的国家里第一个让我们自己开车进狩猎公园的。他们甚至同意我们把车的顶篷放下来。那里到处是动物，但是看不见人。在南非、纳米比亚和其他国家，我们必须和导游一起乘坐他们的车游览，并且很侥幸才能看见一只动物。在到达坦桑尼亚之前，我们每一次游览之前都会听到公园方面的声明：“在公园里开车游览，不一定都能如愿。我们无法保证各位一定能看见任何动物。”在坦桑尼亚，这类声明就显得多余了，因为狩猎公园里到处都是动物：大象、狮子、水牛、鬣狗、猎豹、斑马、小羚羊、长颈鹿和大鳄鱼。

坦桑尼亚是在 1964 年由坦噶尼喀(Tanganyika)和桑给巴尔联合组建而成的，在这之前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从英国手中争得了独立，而英国是从德国手中得到这两块殖民地的。坦桑尼亚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被迫的与世隔绝状态中醒悟过来，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如今，坦桑尼亚

鼓励外国投资,国民经济具有很大的潜力,因为该国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非洲最好的教育体系,文化普及率也非常高。尽管在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和大陆的非洲人之间存在着因族裔和宗教而引起的紧张态势(依我之见,他们最好是再分开,泰然面对现实),坦桑尼亚因其开明的经济思路已经处于蓬勃发展的前夕。该国政府宣称,用不了几年该国的股票市场就会向外国人开放。对旅游业的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塞伦盖蒂东南马萨伊(Masai Steppe)草原上的阿鲁沙(Arusha)附近,那里曾经一度有一百多个或许多达二百个以上的咖啡种植园,尼雷尔把所有的咖啡种植园全部收归国有,只有6个除外。国有化之后没几年时间,就只剩下这6个咖啡种植园还在生产咖啡了。那些抢走种植园的人一旦发现种植咖啡需要技能、专门知识和埋头苦干的精神,他们就拆光种植园的各种设备,将种植园洗劫一空,然后听任种植园成为一片废墟。有一个仍然在经营的种植园属于达维科兄弟——卡拉多和鲁格罗,他俩的父亲来自意大利,早在1931年就开始了这项生意。卡拉多一直在互联网上追踪我们的旅行,我们相互间交流过一些电子邮件。我和佩奇经过阿鲁沙时专程去看望了他们兄弟俩。

他们的种植园叫蒙杜尔咖啡庄园,在蒙杜利(Monduli)村附近,有大约1200英亩山地。兄弟俩能在坦桑尼亚这么困难的年月里挺过来,不放弃自己的种植园,继续维持经营,让世人看到了他们崇高的工作情操。在没有政府的帮助,没有任何国家建造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他们战胜了困难。种植园离城市有30公里,道路状况非常糟糕,过去40年来就靠这个家庭在维修。兄弟俩长期雇用120名马萨伊劳工,在收获季节可创造上千个工作机会。

马萨伊人在传说中是勇猛好战的民族,他们狩猎狮子的英雄事迹举世闻名,但是佩奇对他们的印象并不好。佩奇注意到,马萨伊族的女人干所有的事情,头上顶着重物上山,背上还背着婴儿,而男人则闲坐在那里喝茶。佩奇发现,整个非洲各个社会都是这种情况,她的看法得到达维科兄弟俩的证实。他们说,马萨伊人的大男子斗士情结特别有害。

如果我们不在阿鲁沙郊外跟达维科一家呆上几天的话,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阿鲁沙住下来,除非我们愿意睡在汽车里。方圆100英里之内

的每一间旅馆房间都被预订掉了，大多数是被陪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一起访问或为他打前站的人订走的；克林顿现在把注意力放到了非洲，要进行一次有史以来美国总统所作的规模最宏大的访问。在公开赞扬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不愧为民主总统（《纽约时报》现在对奥巴桑乔正在进行无情的攻击），并且自己也作了充分表演之后，克林顿决定去阿鲁沙，亲自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一项关于结束邻国布隆迪内战的条约签字仪式。这次访问除了拍拍照片之外，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克林顿来访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中为民主党争取选票，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找个机会与纳尔逊·曼德拉总统合个影，后者在和平条约的谈判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类帝王出巡般的访问必然是要前呼后拥的，随行人员包括白宫警卫小组、工作人员、扈从和无时不在的马屁精，当然还有美国的新闻记者。这些人把阿鲁沙市内市外所有的东西都封锁了整整一个星期，而总统并不会在那里过夜。特勤处把市内所有的电话线都掐断了，只留下他们自己要用的和假设要给总统的新闻随从使用的线路。当美国白头鹰展开翅膀翱翔时，非洲的新闻记者都必须把电话挂上，而坦桑尼亚东北部的当地民众则更是提都不用提了。

不仅仅是坦桑尼亚人，其实所有的非洲人都对美国人这种为所欲为的傲慢态度感到愤怒，美国人也因此在世界各地被人憎恨。美国特勤处的特工把坦桑尼亚总统本杰明·姆卡帕从轿车里拉出来，搜查他的总统座车，对他本人彻底搜身之后才放他进入举行签字仪式的会场，这时人们的愤怒到达了顶点。姆卡帕总统是只身一人入场的，他的警卫被挡在了门外。特勤处将会场封闭之后，任何人都不得进出。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坦桑尼亚警卫小组在白宫前面把一位美国总统从轿车里拖出来，我们会有什么感受？

最后，由于某些派别拒绝签署和平条约，签字仪式变得毫无意义，整个过程也就成了一场闹剧。非洲新闻界报道了这次和平努力以失败而告终的全部经过，但是美国媒体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大概可以这样说，白宫记者团中甚至没有几个记者知道布隆迪在哪里，更不要说有些许关心了。但是，这个插曲是值得记住的，因为总统将访问非洲的几个地点，而

仅仅这一个地点就让当地民众产生了同总统的外交里程一样多的怨恨，而美国的纳税人还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后来在印度，当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因美国总统对该国的一次国事访问而出动了几十架满载设备的运输机飞往该国时，我们才真正领悟到这类访问需要付出的以美元计算的代价。总统的随行人员和设备需要 26 架 C-17 和 C-5 运输机、5 架 C-130 和 C-141 运输机、7 架 KC-10 加油机，以及 39 架 KC-135 运输机。据《空军时报》报道，为给 5 天的访问提供支援，美国空军共飞行了 1 150 架次。且不说总统所到之处还有大量的工作人员要进入，这种动辄调用所有这些设备的做法，没有一次不给当地的民众带来不便，破坏他们社会运作的正常秩序。美国的普通民众不了解，这种帝王出巡式的访问在海外朋友的心里起了负面作用。当美国媒体在报道大街上挥舞着美国大使馆提供的美国国旗的人群时，外国新闻记者则在问：“这些傲慢的混蛋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我们在达维科家住了几天之后出发去塞伦盖蒂国家公园。

尽管坦桑尼亚在促进旅游，但是该国的基础设施问题尚待解决。去公园的公路糟糕透顶，走到半路，拖车上的钢板弹簧又断了。我们在路边呆了 8 个小时，等一个“二把刀技师”（这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把弹簧再焊接好。开了 100 公里之后弹簧又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为什么其他所有人都要乘飞机进来。他们派来了一辆卡车，拖车被拉走了，在配备新钢板弹簧的时候我们就住进了“火山口旅社”。

几千年以前，非洲最高的山不是乞力马扎罗山，而是一座火山。火山爆发后，在塞伦盖蒂平原的边缘留下了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火山口旅社”的设施之豪华奢侈让我们大吃一惊：玫瑰花瓣把我们引向已放好水的浴盆，起居间里摆着雪利酒、手工制作的巧克力糖和精心烹调的佳肴；加上这家旅馆所处的环境，处处都在向人强烈显示，坦桑尼亚正朝着发展的方向迈进。这家旅馆由南非的一个连锁旅馆公司管理，类似的旅馆在这个旅游业刚刚兴起的国度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每天进入乞力马扎罗山的人数是有限制的。去山顶的路有好几条，

我们挑了一条最容易上山的路线，上山下山一共是五天四夜。导游又兼挑夫，不是强制性要带的，不过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独自行走的话，获得登山许可就会困难一些，但是维尔弗雷德·翁约尼帮助我们。泽比迪亚是我们雇用的两个挑夫中的一个，50岁出头，给游客当向导上山下山已经34年了；在这些年里，他每月至少在山上走一个来回。

我们挑选的路线叫马兰古(Marangu)线，是以离主要大门2公里的一个村镇的名字命名的。登山是从1700米标记开始的，沿路有事先指定的停留点，那里建起了A字形小木屋，可以露营过夜。我们是在8月中旬登山的，上山时看到几个单身女子在爬山，单身男人很少，成双结对的夫妇倒是很多。第一天我们走了18公里，第二和第三天各走了15公里。第四天半夜开始最后6公里的行走。

我们是在第二天才第一次真正清楚地看到了位于海平面之上19565英尺(六千多米)的顶峰——基博峰。登山途中，我们经过了几个小气候区，从森林进入非常密集的雨林，当我们接近顶峰时又进入了高山沙漠区，气温骤降。最后1000米除了沙子和砾石之外没有其他东西，顶峰上则覆盖着冰雪。

在这次旅行之前我参加了最近三次纽约马拉松长跑，但是当我离乞力马扎罗山顶峰还有500米时，我气喘得要命，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我真的是在大口大口地吸气了。后来，我当然醒悟到，其实傻子也会想到了，我在海平面19000英尺之上，并且在爬山，气喘的原因很可能就在于此。爬完山回到营地后，我真的精疲力尽了。不管怎么说，这次经历还是值得的，但是并不好玩，尽管风景绚丽。我决不会再去了。最大的好处是，现在我可以这样说：我爬过乞力马扎罗山了。我有证书可作证明。

马兰古线是旅游者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线路，又被称作“可口可乐线”，我猜想是因为沿途的营地里有出售给登山新手的小吃而传开来的吧。“可口可乐”一词还被坦桑尼亚人用作完全不同的用途，让我一想起来就不免要笑。我喜欢坦桑尼亚，甚至连他们的贿赂方式我都喜欢，这证明我是真心喜欢上这个国家了。

在坦桑尼亚，限制时速的标志似乎是可以拿着走的，在该国驾车开了

不久我就看出了一个有规律的现象。我发现，只要看到一个时速限制标志，附近必定会有一个手持雷达测速器的警察。在离开达累斯萨拉姆的公路上，规定的时速限制是 80 公里。当我超速出城时，我看到了可移动标志上的时速限制符号，我立即减速，但为时已晚。两个女警察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她们让我看雷达测速器上的读数：她们逮住我时，我的时速是 94 公里。罚款 2 万先令，她们告诉我，大约 25 美元。

“好吧，”我说，“你们能给我一张收据吗？”

这两位警察都不会讲英语（她们会说俄语），但是都听懂了“收据”这个词。我从碰见的当地人那里了解到，一旦我说了这个词，会出现什么情况。

“可口可乐。”其中一位警察笑着说。

在坦桑尼亚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开发票只收一半钱。

“好吧。”我表示同意，交给她们 1 万先令。女警察笑了，我也对她们微笑。“可口可乐。”我对她们说，然后开车离去。整个过程花了 2 分钟都到。

我还要再说一遍：如果你去非洲，想要得到在非洲的全部经历，那么坦桑尼亚就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肯尼亚与坦桑尼亚恰好相反。在塞伦盖蒂平原的肯尼亚一侧，动物要少得多，但是旅游者却要多得多，旅馆也供过于求。在保护区的肯尼亚一侧，人工建筑太过泛滥了。在内罗毕(Nairobi)，当我们到达时，肯尼亚议会正批准给每一位议员一个月 5 000 美元的旅行津贴，而该国的年人均收入是 1 000 美元。在这之前不久，他们投票给自己增加 200% 的工资。最近，一位试图揭露政府腐败现象的天主教神父被暗杀了。有人告诉我们，内罗毕是劫持汽车行为的发源地，这类犯罪案件是在肯尼亚首都首次发生之后全世界各地才有样学样的。很奇怪，肯尼亚人似乎对此还挺自豪的。肯尼亚北部暴力犯罪猖獗，而且明显是刑事犯罪比出于政治动机的犯罪多；为此我们不仅必须在军人护送下旅行，并且得自己出钱支付这些士兵的费用。在我们的整个旅途中，这段路程最为糟糕。我们碰见一位卡车司机，他的车有 6 个轮胎在那里被割破。在前往埃塞俄比亚

之前，我们设法使自己在这一带留下美好的回忆。在一个专卖野生动物食品的餐馆，我们吃了当地的几个特色菜：大鳄鱼和箭猪（都是骨头多肉少），就像我们在法国马赛（Marseilles）喝浓味鱼肉汤，在德国斯图加特（Stuttgart）吃鸡蛋面疙瘩一样尝尝鲜。

离开达累斯萨拉姆之前，我们去了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在从纽约出发之前，我们就一直试图得到进入沙特阿拉伯的许可。在非洲，只要我们所经国家的首都设有沙特大使馆，我们都会进去申请签证，但是每一次都被拒签。在世界上所有的大使馆，不管是在巴黎、伦敦还是东京，只要我们停下来或打电话，说：“我们在开车周游世界，希望能去沙特阿拉伯。”一般对话就到此为止了。我们被告知，沙特阿拉伯没有旅游业，即使有的话，也不允许任何人在那里开车。通过在美国的奔驰公司，我们一直与奔驰公司在阿布扎比（Abu Dhabi）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其他地方的人联系，他们在阿拉伯半岛都很有影响力，我们也与奔驰公司负责整个沙特阿拉伯的专卖商联系，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家庭的成员。这些人都告诉我们，根本办不到。

我去沙特驻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的那天正好是我们要离开的日子，我们考虑再三决定是否要去。我们知道，他们一定还会拒签的。我们开车到大使馆，那天首都的英文报纸上登载了我们那辆汽车的照片（我们也在照片上）。主事的官员很喜欢我们那辆车，我们拍了一些他和他的助手站在汽车前面的照片。为了表示尊敬，佩奇那天穿了一条长裙，还遮盖了手臂和头部。那位官员开始把各种资料都抄录下来：所有有关汽车的号码、我们护照的号码。并向我们保证，他会争取让我们进入沙特阿拉伯的。他要我们跟他保持联系。我一点都不相信他能办成，但是我们也因此不会有什么损失啊。我想，我们可以从内罗比、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以及往北行进的路上给他寄明信片。

当我们到达埃塞俄比亚时，按照我们的日程安排应该是9月10日，而那天该国的日历则是元旦。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仍在使用儒略历（Julian calendar）的国家之一，儒略历是以尤利乌斯·恺撒的名字来命名的；在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早在15世纪就用公历取代了儒略历。

在埃塞俄比亚，这天不仅是元旦，而且是 1993 年元旦，我们一跨过边境线，两人就各年轻了 7 岁。

自罗马帝国时期以来，埃塞俄比亚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7 世纪兴起的伊斯兰教包围了埃塞俄比亚，但是未能渗入，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地理因素。埃塞俄比亚是个山岳之国，流入尼罗河中的水 85% 来源于此。该国不仅未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没有受到欧洲基督教进化的影响，传教士们带到非洲去的基督教是比较后期的那种基督教。因此从宗教上来看，埃塞俄比亚人不同于所有邻国的大众，不管他们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

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更像早期基督徒奉行的宗教，与其欧洲教友相比，更保持了犹太教和《圣经旧约》的精神，而欧洲教友基本上信奉的是《圣经新约》的宗教。埃塞俄比亚的《圣经》更接近于早期的标准文本。古阿比西尼亚（即今埃塞俄比亚——译者注）使用的闪语——吉兹语——仍用于宗教礼拜，它采用一套独特的字母。

在埃塞俄比亚人的遗传体格中仍然可以看到闪米特人（Semites）的特征。总之，我们现在是跨入了闪米特人的国度，这片地区包括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埃及，跨越肥沃的新月地带进入伊拉克，一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我们现在一再看到以身为闪米特人而自豪的人，他们对美国人错误地使用“反犹”一词感到愤怒（英文 Semitic 意思是“闪米特人的”，犹太人也属于闪米特人，英文中的 anti-Semitic 专指“反犹太人”，但从字面上看，则是“反闪米特人”，因此引起闪米特人的不满——译者注）。他们不断指出，该地区有一亿多人口。他们争辩道，他们中有些人可能反对以色列，但是他们本身也是闪米特人，几乎不可能成为“反闪米特人”的人。

有一段时间，美国援助非洲的大部分物资流向了埃塞俄比亚，因为该国的厄立特里亚海岸（Eritrean coast）占据了控制红海的战略位置。埃塞俄比亚与美国的军事关系于 1976 年中止，即在该国皇帝海尔·塞拉西在一次政变中被赶下台两年之后中止，因此才有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美国以人道主义援助为借口进入索马里的冒险行动。塞拉西在 1936 年法西斯意大利入侵该国后被迫流放，在第二次大战中因其与英国军队一起战斗结束了意大利的占领而名扬四海。今天，人们一想到他，就会想起一

个残酷的、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独裁者，尽管取代他的政府并不比他好到哪里去。推翻塞拉西的那个政府后来发动了一场大屠杀，杀戮了成千上万的反对派人士，直至1991年被推翻。1993年，经过多年的动乱之后，终于导致厄立特里亚独立（该国保证埃塞俄比亚继续拥有出海口），组建了今天统治埃塞俄比亚的代议制政府。

新宪法承认埃塞俄比亚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允许九个不同的组成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自由退出这个国家。作为防止内战的一个机制，宪法强制中央政府必须对每一个人负责。这种文明的做法让我很感兴趣，这也是我很高兴到埃塞俄比亚去的理由之一。我同样很高兴去看一看厄立特里亚，因为该国宣布，打算按照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规则发展经济，不向任何人提供施舍。令人遗憾的是，两国之间因边境争端而重新爆发了冲突，厄立特里亚关闭边境，使我走访该国的计划泡了汤。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埃塞俄比亚是世界第二位最贫穷的国家。许多美国人把该国与干旱和饥荒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该国的确有300万人遭受饥饿，但是未见报道的是，大约有6000万人并没有受到影响。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是沙漠，经常遭受灾难性的特大干旱，但是该国的大部分地区是高海拔雨林，雨量充沛，尼罗河里的绝大部分河水是从这里流出去的。埃塞俄比亚基本上可以生产自己所需的食物，数百年以来一直自给自足。

埃塞俄比亚缺乏的是把食物送给饥民的动力。看到全国各地不停漏水的水塔，让我想起印度经济学家赢得诺贝尔大奖的原因——他证实，大多数饥荒并不是因为缺少粮食而造成的，而是政府的决策错误造成的。

当我们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时，美国国务院主管援助的官员带领一个小组也飞过来了。他们在一个世界上最豪华的旅馆里住了四天，只到现场去了一天，就打道回府飞回华盛顿了。

在亚的斯亚贝巴正北大约二百英里有一个古老的城市拉利贝拉（Lalibela），是上一个千年初期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中心。在12世纪，皇帝（拉利贝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幻觉中看到了耶路撒冷，由于埃塞俄比亚人的四周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因此无法去耶路撒冷朝圣。皇帝接受指示复制圣城，在拉利贝拉建造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在幻觉中，



我们整个旅途中走过的最糟糕的一条公路在肯尼亚。图中所示为其中一段比较好的路。监督施工的西方国家的顾问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合同，他们和那些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当地人早就把钱汇到了瑞士。



在拉利贝拉的一位埃塞俄比亚神甫正在朗读一本具有 800 年书龄的手抄《圣经》。我们也受到邀请去朗读，但是我们不懂古阿比西尼亚的闪族语——吉兹语，因此无法胜任这份差事。

他还看见许多教堂。因此今天在拉利贝拉，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些 12 世纪时全部用石头建造起来的教堂，这些石头是当地人花了整整 40 年时间从山壁上用人工一块块地凿出来的，而且还可以看到橄榄山、约旦河和圣城等其他《圣经》事物的复制品。埃塞俄比亚人正尽力将拉利贝拉开放，让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来游览。那里现在已经建造了一个机场和一条通往市区的混凝土公路。

拉利贝拉的市场真是太棒了，那里的交易情况与一千多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市场上有人在做瓦罐、制鞋、卖柴火。我们到达时不知道那天是集市日，真是赶巧了，有幸能看到真正的埃塞俄比亚，看看远古时期埃塞俄比亚的生活形态。这座城市仍然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我们可以走进教堂，那里的神甫会拿出一本历时 800 年的宗教书籍，让我们随意翻看、拍照。那里有许多古代的肖像，许多中世纪的珍宝。每一座教堂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在埃塞俄比亚国内，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十字架，有些是黄金打造的，但大多数是银质十字架。

自从西方新闻界首次报道饥荒之后，大量援助，主要是免费食物运进了埃塞俄比亚。我们在拉利贝拉时，其中有一天是每月一次的运粮日。来自各地农村的人骑着毛驴进城了，实际情况是，不是进城，而是到城市附近。分配食物的原则是，你越穷，分到的食物就越多，因此没有人愿意显示自己的家当；所有人都把自家的毛驴拴在城外 3 公里之处，步行进城。城市附近有成百上千头毛驴等在那里，市中心则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等候运粮食的卡车。卡车到后，就开始分发一袋袋 50 公斤装的小麦，袋子外面印着捐赠国的名字，有些是从美国来的，那天我们看见的是由德国捐赠的。

在分发免费食物的时候，拉利贝拉周围所有肥沃的土地都空闲下来了，因为没有人再去耕作了。整整一代埃塞俄比亚人成长起来了，却没有学会怎样耕作。为使餐桌上有食物，他们所做的是每个月到城里去一趟，把毛驴拴在城外，然后领取粮食。我们在拉利贝拉的那天看到，有些领了粮食的人直接就把分到的粮食背到市场上去卖。由此，除了永远没有学会如何耕作的那代人之外，又增加了一代不再耕作的人，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卖出去了：他们的产品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免费粮

食呢？

非洲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并且重新出口粮食，但是绝不能让非洲的农民去跟西方受津贴的农业和免费午餐去竞争。

我们到达塞内加尔时，我对佩奇说：“走，到市场去走一圈，看看你母亲的教堂送到非洲来的那些东西。”

“你这话什么意思？”她问道。

我向她解释了美国国内在捐赠衣服方面的大规模行骗行为，这些衣服如何有系统地从慈善机构转到黑市市场。起先，佩奇对我的话很不以为然，直到我带她看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国的市场之后，她才认识到，慈善事业不仅“起始于美国”，同样也结束于美国。这种欺骗行为遍及整个非洲大陆，但是在黑非洲有关证据更是昭然若揭。理由很简单，美国人一般都通过自己本地的教会捐赠实物，向敬畏上帝的基督教教徒捐赠的美国人自然比向敬畏真主的穆斯林捐赠的美国人多。

在整个非洲大陆，可以看到在大市场里一捆一捆的T恤衫摆在那里出售，这些东西都是像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克利夫兰市分会和夏洛特市第一浸信会这样的机构捐赠的。这些T恤衫和各种各样的衣服本来是美国人捐赠给非洲穷人的，但是当这些东西到达非洲时，却被当作商品出售了。参与贩卖活动的人肥了，当地的裁缝却失了业。裁缝无法竞争，织布、纺纱或者种棉花的人也无法竞争，而后面几种人的费用最终都要由裁缝来承担。本来路边上有很多带着缝纫机的裁缝，现在很少见了。他们怎么可能跟那种几乎免费的产品去竞争呢？

美国的慈善机构，如浸信会，如果要把捐赠物送到非洲的某个教会去，首先会把这些物品送交在布鲁克林(Brooklyn)或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的集中处理公司，在那里装进集装箱，运往海外。这时这些物品就成了集中处理公司的财产了。物品到达非洲后，卸下船，放在码头上，批发商就来一项一项地检视，然后竞标。衣服用卡车运到内地，到当地的村庄集市零售。集中处理公司拿到了钱，慈善机构则一无所获。事实上，物品一离开北卡罗来纳州就被骗走了，大家捐赠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流入了同样的渠道。

贩卖慈善物品是过去 10 年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我是在上次骑摩托车旅行时才首次知道的。由于利润丰厚，产生了许多中间商，这些人只要支付教会一点钱——无非就是往教会的集资盘里丢点零钱，走访美国的一些慈善机构，就能收集到成船成船的免费物品。他们走访一个一个教会，宣称自己在为非洲收集衣服。当然，如果我们要让非洲的裁缝不失业的话，如果我们要帮助他们生产并自给自足的话，我们就需要进口他们生产的东西。送他们衬衫，使他们失业，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他们更多的衬衫，这样做总比让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纺织业工人受到失业威胁要好得多，而这位纺织工人则把自己穿过的 T 恤衫捐给教会，造成非洲纺织工人和裁缝失业。这与美国政府把食品捐赠给拉利贝拉的民众，使他们统统忘记耕作的做法如出一辙。

在亚的斯亚贝巴，佩奇与她在旅馆新交的埃塞俄比亚朋友阿尼娜·阿布拉希一起去买一件宽身无袖长袍，就是那种传统的从头覆盖到脚的袍子；如果我们得到允许去沙特阿拉伯，佩奇在那里就需要穿这样的长袍。我们觉得这种长袍在苏丹也用得上。现在佩奇已经很独立了，她常常会撇下我，一个人出去闯荡，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她已经真的喜欢上非洲了，我们到埃塞俄比亚时，她对非洲大陆已经很习惯了。

在非洲旅行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很幸运，跟雨季是逆向而行，而不是同行。雨季基本上以锋面向前移动，四个月前我们进入加蓬时，雨季向北移动，我们穿越了它。现在，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向苏丹方向行进，雨季从相反方向向我们袭来。往北去的道路非常难走，我们花了 12 个小时才走了 100 公里。很快，道路就无法通行，前面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地。夜幕降临，我们被困住了。

我们停在一个小村庄里[后来我得知这个村庄的名字叫奈加德巴希尔(Negade Bahir)]，我从村里出发走了半个英里，查看前面道路的情况，想找一条最佳路线。我看到，有些卡车在那里已经被困住好几天了，司机正企图把卡车挖出来。我找到了村里的酋长，一个细长单薄的男人，他穿的深褐色瑟法里装(瑟法里装原指欧洲人在东非旅游时穿的服装，也叫狩猎装——译者注)远远超出了佩奇对非洲酋长衣着的想象。我告诉他，我

们被困住了，问他是否有地方让我们住。镇上最好的旅馆也是镇上唯一一家旅馆，不过是一些很原始的小棚屋，茅草屋顶泥巴地，没有卫生间，所有的小棚屋都小得只能住一个人。出乎我们的意料，小棚屋还算干净，维护得也不错。实际上正如佩奇说的，住在这里远远比我们在格鲁吉亚住的那些所谓的四星级旅馆要舒适得多。

“地扫过了，被单很干净，毯子也没有臭味，还有给我洗脸刷牙的水。我还想要什么呢？”她说。

她在外边找了一块石头顶住门，因为她的门连门闩都没有。

我们住在奈加德巴希尔的那个晚上恰巧是埃塞俄比亚一个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庆祝发现十字架真迹节——的前夕。根据传说，埃塞俄比亚王朝是以色列国王所罗门和皇后示巴的儿子曼涅里克一世创建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300 年之后，曼涅里克的一名后代，也是埃塞俄比亚女王，在梦中得到指示，要她去各各地（Golgotha）（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译者注）将十字架圣物带回埃塞俄比亚，她在各各地生一堆火后，火的烟雾会向她显示圣物的所在之处。她成功地找到了圣物，每年埃塞俄比亚人都会点燃篝火，以唱歌跳舞的形式来纪念她的功绩。

奈加德巴希尔的民众正处于节庆的气氛中，期待过节和点燃篝火，我们很高兴能与他们一起庆祝节日。那天晚上我见到了两位神甫，他们刚刚结束见习期，我给他们买了啤酒，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啤酒。我们给年龄稍微大一些的那位神甫拍了一张拍立得照片，当我们把照片交给他时，他真是欣喜若狂，因为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自己的照片了。我们给许多村民拍了照片，很多人从未见过外国人，更不用说见过拍立得照相机了。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敌对冲突迫使两国关闭了边境，使得我们失去了去厄立特里亚旅游的机会，很令人遗憾。这也意味着，在向北行进时我们必须紧挨着苏丹境内的战区行走。这个看起来不受人重视的冲突（如果人们还记得的话）是由南方黑人对北方穆斯林的反抗引起的，是非洲持续时间最长的冲突。以建立一个世俗苏丹为名的这场暴动（实际上这场战争是为了争夺对南方油田的控制权）日趋惨烈，最后演变

成为南方民众之间以部落划线进行相互杀戮的战争。

我们一跨过边境，在埃塞俄比亚境内随时可见的那些教堂、《圣经》和十字架就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原教旨伊斯兰教。地形地貌同样也起了变化。气候突然就干燥了，我们走进了沙漠。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在穿过边境时我们第一次找不到外币兑换处。本来外币兑换处什么地方都有，不需要你去找它们，它们自己就会找上门来的。但是没有人从这里入境。我们穿越了一个名叫加拉巴特(Gallabat)的村庄，这时我们已经远远地偏离了那条泥泞不堪的公路；那天晚上我们找不到过夜的地方，只好在警察局呆了一夜。尽管美国在两年以前对喀土穆(Khartoum)发动了一次巡航导弹打击，炸毁了一座完全合法的制药厂，但那里的警察看见我们仍然很高兴，并且非常殷勤好客。警察在警察局外面搭起了行军床，他们就睡在那里，而坚持要我们睡在里面他们平时睡觉用的上下铺上。

我们是在9月29日到达喀土穆的。我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打电话给沙特阿拉伯驻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的那位官员，看看他答应办理的签证是否批下来了。我现在有点着急了。我们正朝印度次大陆方向行进。如果不允许我们开车穿越沙特阿拉伯的话，情况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不要担心，”他跟我说，“我告诉过你，我会帮你搞到签证的。”

我已经在太多国家听到太多这种空话了，我无法不担心。我知道，东西不在自己的手上就不能相信是真的，有时哪怕到了自己手上都不一定是真的。

我从喀土穆打电话给我父亲。我一直试图说服他到非洲某个地方来跟我们会面，但是现在看起来他是不可能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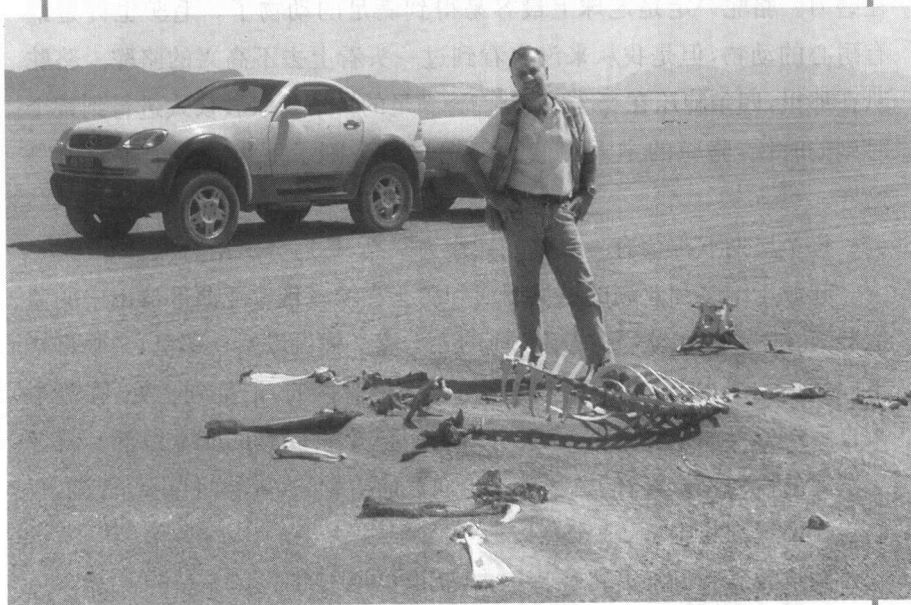
他说：“我周游世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却认为，他周游世界的日子主要局限于他在战争期间在欧洲度过的岁月和他在俄克拉荷马州上大学时度过的岁月。我的祖父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我父亲的叔叔送他去俄克拉荷马州读石油工程专业，因为他开了一个石油公司，希望我父亲毕业后能为他工作。但是，战争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他的叔叔在战争期间去世了，公司也卖给了别人。父亲从欧洲回来后去了迪莫波利斯，在博登化工厂当经理，一直干到退休。



在奈加德巴希尔庆祝发现十字架真迹节，我给这些年轻的埃塞俄比亚神甫买了他们有生以来喝的第一杯啤酒。他们拿酒瓶的姿势似乎要比我的姿势好得多了。

撒哈拉是一个度浪漫蜜月的神奇去处，但是进出撒哈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哪怕对骆驼来说也是一样。



父亲是个很能吃苦耐劳的人，但是现在他却受着病痛的折磨，不得不大大增加止痛片的剂量，止痛片是他对付自己病症的惟一手段。他拒绝化疗，因此所谓的治疗都治表不治里。那天他告诉我的好消息是，他的体重增加了一磅。在这之前，他的体重一直是下降的。

我们在喀土穆呆了大约一个星期，在离开前我们做了几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亲眼目睹旋转苦行僧（苦行僧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苏非派教团的高级成员——译者注）的狂热。苦行僧是穆斯林一支苦修派别的成员，他们通过狂舞和宣唱宗教套话而集体进入灵魂出窍的状态。

那天是个星期五，在喀土穆城外一座清真寺前，我们看到一群苦行僧跳舞一直跳到神情恍惚的地步。起先只有两个男人在跳，到快结束时，随着音乐越来越狂乱，跳舞的人数达到了 50 人。一个妇女受到这种神圣情绪的影响，不由自主地冲进人群里也跳起舞来，但立即就被拉了出去。妇女是不允许跟男人一起跳舞的，哪怕是随着那些能驱动男人的有很强感染力的音乐节奏在边上摇摆都不行，尤其当男人在为真主的伟大而起舞时就更不行了。

在跳舞者的圈子外面拴着一头骆驼，趴在主人前面的地上，主人正在磨刀。骆驼一定是地球上最容易得到满足的动物了。毛驴也许是最有耐心的动物，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头看上去不高兴的骆驼。骆驼趴在那里，四条腿压在身子下面，一脸满足的神情。宗教仪式进行到某个时刻的时候，骆驼的主人突然一刀把它的头割了下来。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每个星期五都会有一头骆驼被作为祭品，然后分送给穷人。

起源于维多利亚湖的白尼罗河和源头在埃塞俄比亚西部群山中的蓝尼罗河在喀土穆汇集，形成尼罗河的主干流。你可以站在那里，亲眼目睹不同颜色的河水（尽管既不是白色的也不是蓝色的）汇集到一处，在一个来自阿拉巴马州未见过世面的男孩眼里，这个景象真的非常浪漫。就像尼罗河的流向一样，我们也从喀土穆向瓦迪哈勒法（Wadi Halfa）行进，我们将在那里穿越国境，进入埃及。

到埃及后我们还能再往哪里去，就谁也说不准了。

11

阿拉伯之夜

我一直认为,印度人是世界上最无可救药的官僚了;但是我发现,与印度人一样师承英国的埃及人把官僚习气发展到了荒唐的地步。在我们旅行结束之前,我一离开埃及就体会到,这个国家处于世界级的官僚灾难之中。我去之前的兴奋,对该国开放经济吸引外资计划的乐观情绪,全部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看到一些商人费尽全力满足了原材料进口的所有规定,却发现自己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被扣押长达数月,等待政府再次检验。我们遇见两个游客,就在他们等待美国的药剂师给他们寄药品成分证明期间,他们的处方药被没收了。即使收到了证明,埃及的化学师仍然要分析药品的成分。直到这两位游客乘飞机回国时,这些药丸仍然在官僚体系中,下落不明。

我们了解了更黑暗的一面,了解到为什么街上的群众那么憎恨胡斯尼·穆巴拉克政府。该国密布政府密探,任何主动行动或者异议都会遭到扼杀。除了以色列之外,埃及是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但是随着民众对自己的困境越来越感到愤怒,我们付出的代价就不仅仅是美元了。年逾七十的穆巴拉克之所以还能掌权,就是因为有美国的支持。不管今后穆巴拉克是被推翻还是自然老死,这个中东最大的国家都可能会发生动乱。

要想了解内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脚踏实地地周游世界。如果你飞到开罗(Cairo),乘出租车去参观金字塔,然后乘旅游车去卢克苏尔

(Luxor)观光,你就不会见到这些真相。

我们在苏丹的瓦迪哈勒法市时就已经开始领教埃及官僚体系的繁琐了。老瓦迪哈勒法市现在已经在水下了。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建造阿斯旺大坝和挖纳赛尔湖时把那个苏丹古城淹没了,电影公司曾经常常把这个古城作为外景,因为它深具该地区的特点。现在的瓦迪哈勒法市离开埃及边境大约十五英里,40 年前是不存在的。这个城市几乎完全是为了人们过境需要而建的。我们在那里被困了 12 天了,一直无法过境进入埃及。

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险遭杀害,他指责苏丹人企图暗杀他,因而关闭了边境。最近几年来,管制稍有松动,不过是以一种非常荒谬的形式出现的,只有官僚们才想得出来这种做法。你可以从苏丹乘飞机去埃及,你也可以从瓦迪哈勒法坐船去埃及,但是你不可以开车穿过边境。

我们在瓦迪哈勒法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找驳船上了。

星期二是瓦迪哈勒法的一个重要日子。在这天,从喀土穆来的火车到了,从阿斯旺来的每周一班的客轮也到了。每周一次从喀土穆来的航班在星期三到。大客车则每天都有。渡轮在星期三载着所有乘火车、大客车和乘飞机来的人返回阿斯旺,而从阿斯旺来的旅客则转机去喀土穆。我之所以要说这些,是为了要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旅馆必须和其他大约七十个人一起睡在院子里的行军床上。我们是星期二到的,现有的床铺是谁先到谁先得。星期三情况就好转了,整个旅馆就我们几个人。到下一个星期二,整个旅馆就又人满为患了。

船上卸下来的所有东西都装在毛驴车上运往其他地方。有一天我招手拦住一辆毛驴车,请赶车的载我们到镇上去兜一圈。他没有马上明白我们的意图,但是很快就领悟到了;从此他每天 6 点钟过来,带我们去兜圈子。困在沙漠中是一回事,而困在信奉严格的原教旨主义的苏丹还意味着没有啤酒喝。我们瞎撞撞到了一个卖冰镇七喜汽水的地方,你绝对想象不到我们那天高兴的样子。10 月 19 日。这天是我的生日。这时我们已经认识镇上所有的人。

我们真是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登上了那艘姗姗来迟的驳船。这是一艘铁壳平板船，勉强地用绳子系在拖船上，甲板上没有栏杆，实际上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施，更不用说让人享用的设施了。这可是在沙漠之中一个浩瀚无边的大湖上四至五天的航行啊！我们会遇上大风、沙尘暴，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滔天大浪几乎肯定是躲不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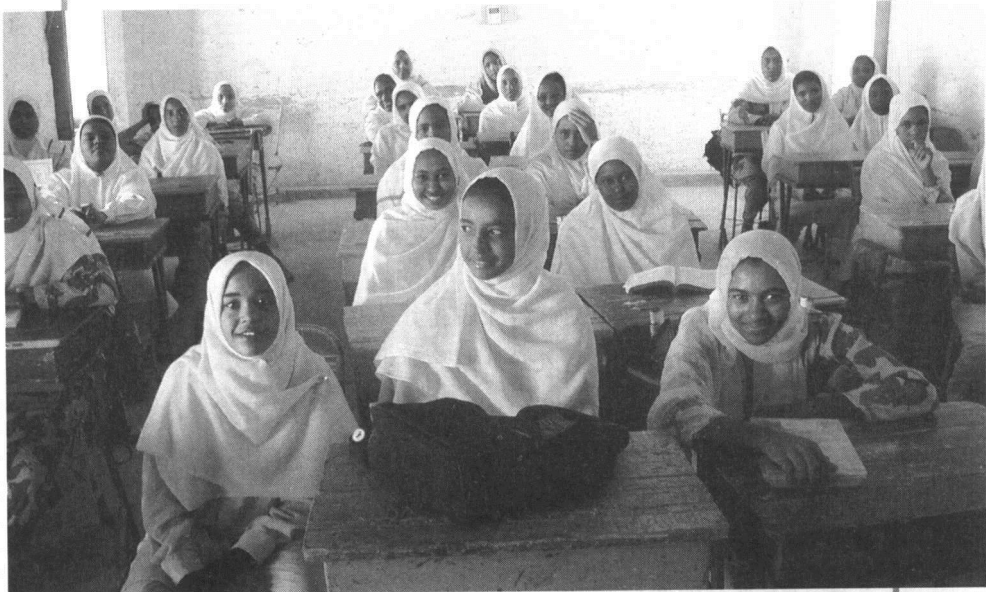
这真是一次无聊之极的航行，无聊得让人要发疯，间或有些稍纵即逝的类似伦勃朗在《加利利海上风暴》中描写的活动。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途中的风光了。沙漠中散落着一些天然而成的金字塔，看来努比亚人(Nubian)就是从这里得到灵感，从而建起了人造金字塔。

纳赛尔湖是阿斯旺大坝上游的水库，长达 325 英里，宽则 2 英里至 22 英里不等，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湖，实际上是一个大海，面积比特拉华州还大，是卢森堡的两倍，湖里所有的水都是从南面其他国家流入的。随着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国家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富裕，对水的需求量也越来越高，埃及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苏丹又会怎样呢？红海西面的紧张局势绝不亚于红海东面的局势，而导致紧张局势的原因不是石油，而是水。争端早已存在了，当世人不在意的时候，世界这部分地区很可能会为了争夺水而爆发战争。

在到达位于纳赛尔湖另一端的阿斯旺(Aswan)城之前，我们是不能下船的，而这时我们已经进入埃及境内大约 250 英里了。在阿斯旺的入境手续倒是比较简洁。但是，我们的车辆却遇到了问题。我需要盖几个特殊的印章来证明所有权的合法性，而这些印章需要到开罗去盖。车辆可以从驳船上卸下来，但是立即被扣押起来。我必须先盖好他们要求的印章，然后他们才会把车还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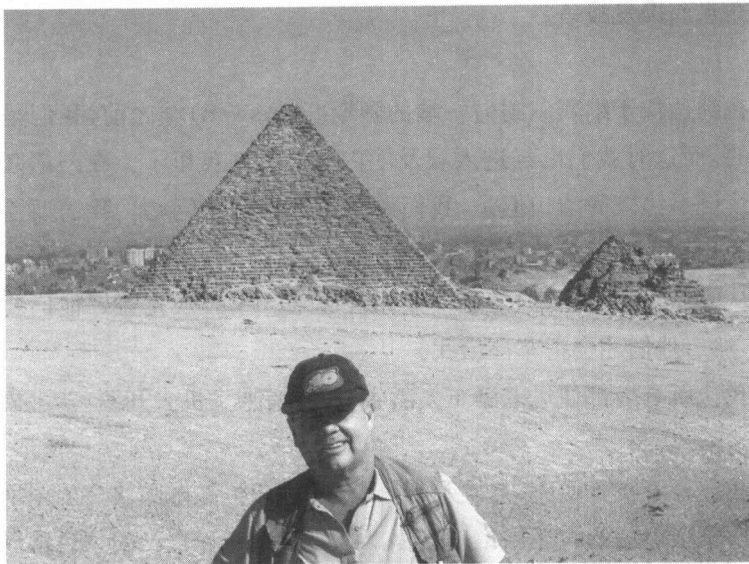
我让所有人都住进老瀑布大酒店，然后搭乘飞机去开罗，着手搞定所有事情。

我在开罗东奔西跑，与埃及官僚争来斗去时，佩奇则快快乐乐地在阿斯旺这家仙境般的古老旅馆里享福。这家旅馆声称自己的景色世界上没有一家旅馆可以比得上，他们说的也许不无道理。从旅馆里游客可以俯



我们没有想到苏丹的女孩会那么漂亮，我们很高兴地了解到，
在瓦迪哈勒法的每一个(穆斯林)女孩都上高中。

在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我们开车周游全球还这么困难重重。但是，想想
埃及人 5 000 年以前是如何创造各项奇迹的吧。这是其中的一项奇迹。



视尼罗河，眺望大象岛——岛上突兀着一块岩石，形似大象，故名大象岛。这座古老的建筑就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的景物。我们住在那儿时，佩奇阅读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坐在阳台上，你真的可以想象克里斯蒂小说里的比利时侦探埃居尔·波洛就跟你坐在一起，而附近什么地方，某个人正惨遭暗杀，可能是被毒死的。

我们在瓦迪哈勒法住了12天，然后在驳船上呆了5天（驳船上除了甲板上有个洞作厕所之用外，什么都没有），因此大家对滞留在阿斯旺老瀑布大酒店等候发还汽车的经历并没有觉得不妥。没有人想急于离开。

在金字塔面前任何人都只能甘拜下风。不管你对埃及人怎么说三道四，你都不能不承认是埃及人创造了金字塔。他们有金字塔，而你没有。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卢克苏尔等等，我们都去看了。这些古代的奇迹有点像人们说话时所用的套话，一提到这些奇迹，就显示你经历了“宏大的旅行”，到异国他乡旅行过了。就像大多数套语那样，这些奇迹的名字能让听者印象深刻。

我老实地去了沙特驻开罗大使馆。顺便说一句，我曾经认为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交通秩序最混乱、最不容易开车的城市，可是开罗与它相比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给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沙特官员和在吉达（Jeddah）的梅赛德斯—奔驰的经销商都打了电话，他们两人都告诉我，如果我去沙特驻开罗大使馆，肯定能拿到沙特阿拉伯的签证。我永远不会知道究竟是谁搞定的（当然两个人都有功劳），我到大使馆后简直难以置信，我们的签证申请居然已经批下来了。

我们沿着红海向南行驶，目睹成千上万个建造到一半就中途而废的公寓大楼和旅馆，这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投机性繁荣崩溃造成的后果，再次显示穆巴拉克糟蹋了埃及经济，整个社会正在分崩离析，类似的征象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我们9个月前开始穿越非洲的旅行时，我过分乐观了。在我上次1990年至1991年的旅行中，我看到一个正吹起变革之风的大陆。民众开始认识到，原来的政治方式再也行不通了。领导人则看到，过度的政府控制会阻碍经济增长。非洲开始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注意了。过了10年，

我旧地重游，希望看到非洲国家重振雄风，以崭新的面貌迈向繁荣昌盛的大道。

可惜，眼前的非洲让我失望。我在旅行期间看到的那部分非洲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我们走访的 32 个国家中，有一些国家，如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毛里塔尼亚，正在采取一些正确的举措，让工业私有化，放松官僚管制，把那些毁坏国家经济的混蛋赶下台。但是，另外有许多国家却在走回头路。我原以为自己会受到像肯尼亚、乌干达和莫桑比克这类国家的投资机会的诱惑。然而，在这些国家里，我看到的却尽是腐败现象，以及不值一提但又暴力血腥的争端，贪婪和对权力的贪欲往往就是这些争端的肇因。

我本来希望那些经久不息的冲突会有所减缓，但是在西撒哈拉、尼日利亚、两个刚果、安哥拉、津巴布韦、乌干达、苏丹和象牙海岸等国家和地区，这种冲突如今更趋激烈，也更无理性可言。我曾经对新一代领导人寄予厚望，但是他们跟自己的前任一样无可救药。在安哥拉，以前那场为了所谓意识形态而打的战争被剥开了画皮，其实质就是控制了国内钻石的叛乱分子和控制了石油的政府之间一场赤裸裸的权力争夺战，两边都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恶棍。

我在写这些段落时，正好游击队首领若纳斯·萨文比死了，安哥拉的疯狂局面看来可以结束了。如果所言不错，那么安哥拉将会出现世界上非常难得的大好机会。发财致富的一条捷径就是到一个刚刚结束惨烈战争的国家去。安哥拉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战前的安哥拉是非洲最大的咖啡生产国。由于战争摧毁了该国大部分农业，现在反而需要进口咖啡和大量粮食。旅游业、渔业、采矿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机会比比皆是。安哥拉很快就将超过尼日利亚、利比亚和加蓬，成为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它的钻石生产也将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安哥拉的人口只有 1 200 万，因此不管那些解放者偷去了多少，那里仍然会有足够的资源让人们去开发。

我已经见识了许多战后成功的例子了，我相信安哥拉就像是一枚压低了枝头的成熟果实，就待人采摘了。

埃及有着 6 000 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文化，开车穿越埃及，我看到让人

赞叹不已的历史遗迹和寺庙，不由让人再次对数百上千年之前的社会就有如此发达的文明感到惊讶。在这方面，埃及是最鲜活的例子。当英国人仍然在往自己身上涂抹蓝色浆草时，埃及人已经发展出算术、天文学、字母文字、365 天的日历、农业、先进的医术以及国家政府。但是尽管埃及几千年来都站在时代进步的前沿，现在却落伍了，而且落后得让人看不到希望。埃及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放松了对国营企业的管制，让工业私有化，从而赢得了“尼罗河小老虎”的称号，我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投资的机会了。

没有那么幸运。像我走访过的许多非洲国家那样，埃及仍然还有一只脚深陷在过去的泥沼里而无法自拔。过去 30 年来，这个国家一直被同一群人统治着，当国家的发展须听从单一思维的号令时，其凄惨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与此相反，民主给政治思维带来改革、新意和活力。过去 30 年来，埃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现在已经烂到芯子里了。我看不到那里还有什么好投资的。我穿越非洲的旅行就以这样严肃的结论画上了句号。

尽管说了上面那些话，我相信非洲仍然还有希望。我个人觉得，以下就是把这个希望变成现实的途径。

减免所有债务。这一点刻不容缓，即刻就减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非洲国家合在一起一共拖欠了 3 500 亿美元的外债。尽管没有人真的指望这些国家还清这笔债务，但它们仍然必须出资，每年支付贷款的有关费用。假设贷款的利息是 8%，这就意味着，非洲国家每年总共要支付利息 260 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支付本金。假设本金支付是 2% 至 3%，每年偿债的费用就高达 300 亿美元。一旦减免了债务，非洲国家领导人每年就增加了 300 亿美元，他们可以把这笔钱投入生产，此外他们的头顶上也没有了债务的阴影。就把这 3 500 亿美元当作补偿以往罪孽的赔款吧，如果这样想能让你感觉好一些的话。

但是，这笔交易的另一方面就是再也不会会有外国援助。

由此产生的影响无疑会非常深远。非洲就得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生存下来。非洲人民不再依赖施舍过日子，得学会如何养活自己。我遇见的那些从来没有学过耕作的埃塞俄比亚少年会不得不操起犁耙。在非洲

之角打仗的那些疯子再也得不到世界各地送来的武器。尼日利亚领导人将无法再走进银行，搬走一袋袋美元。那些统治莫桑比克的人将无法再得到水灾救济款来填充他们的保险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会破产，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将被迫退出舞台。

我们在埃塞俄比亚碰到过一个人，他经营了一家孤儿院。我们去的时候，孤儿院里并没有孤儿，但是他告诉我们，当外国视察人员从亚的斯亚贝巴过来询问“这些孩子有毯子吗，吃得好吗”时，孤儿院里就会住满“孤儿”了。要找些孩子来装门面，那是太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视察人员一走，孩子们就可以回家了。图书馆是非政府组织热衷的另外一个项目。他们喜欢建图书馆。他们喜欢做可行性研究。

非政府组织是个庞大的行业。它们随政府腐败应运而生——“我们不能再给这个独裁者援助了，我们把援助交给非政府组织”——这些钱蛀虫的成功杰作就是在外国援助与腐败的政府之间塞进无数个中间人。由此，官僚和当地的企业家们在援助款蒸发之前都可以大捞一把了。如果一个孤儿需要睡觉的地方， he 可以到图书馆去睡。

像我们在全世界一半国家里所看到的那样，目前大部分外国援助金最后都落入了外聘顾问、当地军队、腐败的官僚、新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头头和梅赛德斯—奔驰经销商的口袋。在那些甚至没有公路的地方都能看到梅赛德斯—奔驰的经销商。

有一位苏丹企业家不是把自己的智慧用在建立一个生产型企业上，而只想轻轻松松地赚钱，他充分地利用了腐败的非政府组织体系。奴隶制在非洲东北部，尤其在苏丹猖獗蔓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位企业家碰上了瑞士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他同意为这个慈善机构购买奴隶，然后后者给这些奴隶自由。当瑞士人发现事实真相（这位企业家去找自己的朋友和亲戚，用钱“买他们”，编造一些有关他们被人奴役的催人泪下的故事，让他们去讲给慈善机构听）时，他们已经损失了大约 200 万美元。

显然，援助的龙头一关闭，有些人将遭受困苦。

许多非洲人会迁移，被迫到他们能够正常生活的地方去工作。许多人会发家致富，因为他们的能力用到了生产性的活动上，而不再从事那些

腐败的行当。现在该是非洲有雄心壮志的人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了，就像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中国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作为第二步，非洲人应该组织一个新的非洲大会。就把它称之为金沙萨大会吧，因为金沙萨(Kinshasa)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城市。这个大会将由来自非洲各国的代表组成，而不是由残存的殖民势力组成，尽管这种势力对非洲的政治还能施加不少影响。新非洲大会将纠正 1884 年柏林会议的错误，因为当时由欧洲大国划分了非洲。

新非洲大会将考虑宗教、语言、历史和族裔方面的异同，重新划分非洲各国的边界。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多出了许多新的国家，也许有几十个小国家，但是这几十个国家是由相互协作的民众组成的，他们一起合作寻求繁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相互争斗。在欧洲人和阿拉伯人进入之前的非洲古代历史上，有着数不清的异常成功的国家。非洲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智慧、能力和动力资源，正等待开发利用。把非洲从过去的错误中解脱出来，让非洲人自己调集资源建立新社会，我相信最终就能出现一个真正的非洲复兴的局面。

把 3 500 亿美元债务注销作为一个礼物送给非洲是一方面，同时必须停止援助。非洲国家用我们的援助买的第一批东西就是枪支，用以维持“偷盗者”的权力。断绝援助就能迫使那些绝望的领导人从事生产。如果他们不从事生产，他们就会失去权力。非洲将会出现真正的解放者，最终实现真正的解放。把所有这些能力和动力组织起来的自由，以及开发非洲大陆丰富资源的自由，将给非洲人民带来巨大的繁荣和财富。

佩奇在非洲大陆呆了 9 个月之后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许多在非洲呆过一段时间的人与她有同感。她喜欢那里的民众、集市、农村、勤奋的工作精神，尤其是妇女的勤奋精神，但是对那里缺乏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保健，对贫困的生活条件和妇女的劣等地位等现象感到难过。

“如果我乘飞机进出，在一个野生动物旅馆住上一个星期，我肯定会说‘我喜欢非洲’，但是 9 个月时间足以让我看到许多生活在这里的民众所面对的丑恶现实。”她这样说道。

在我们向位于苏伊士(Suez)南面大约二百英里的胡尔加达

(Hurghada)飞速行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在胡尔加达,人们指示我们穿过红海,从杜巴(Dubā)镇进入沙特阿拉伯。胡尔加达至杜巴的轮渡不是每天都有的,我急匆匆赶到这里是不想让沙特政府里的任何人有机会改变主意。能去沙特阿拉伯观光我很兴奋,但是我更渴望在那里开车,这是我的高度优先项目,因为还没有人被允许这样做过。我听说那里禁止开车,就像赫克·芬恩听沃森小姐说:“你绝不可以乘木筏去密西西比河下游。”越被禁止的事情就越想做。

我们因急救物品遇到的惟一次麻烦发生在入境沙特阿拉伯时。我们在杜巴上岸,非常兴奋,当然像往常一样,又非常担忧。过境总让人焦虑不安,这一次更是如此。由于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麻烦,佩奇穿上了她买的黑长袍。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外国人是否必须这样做(规定是必须都这样做),但是为了避免引起任何潜在的问题,佩奇就从头到脚包裹了起来。我们在坦桑尼亚遇见的那位沙特官员很明确地表示,他希望佩奇的穿戴符合要求。他还坚持要确定我们是否真的结婚了。我让他看了《纽约时报》上一篇报道我们婚礼的文章,但是仍然不够。他要看结婚证书,我也让他看了。所有这些都是很严格、很神圣的。

我们开车去杜巴海关,正如我们想到的那样,我们像前几次一样被要求把所有的东西从汽车里拿出来。这是我们整个旅行中检查最彻底的一次,不过我们对此胸有成竹,我们对每件东西都是反复检查过的。我把箱子从汽车里拎出来时,检查员把医疗包放在桌子上。他还没有打开,我就知道闯祸了。

不用说,他拿出来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瓶伏特加酒。

沙特阿拉伯对拥有酒类的惩罚是监禁、流放或者鞭打,严格的穆斯林国家实际上明确规定要鞭打80下。(对贩卖毒品的惩罚是砍头。他们连问都不问,甚至不通知贵国的大使就把你的头砍下来了。)如果给我选择的话,我知道自己会作什么样的选择,但是检查员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也许作什么样的选择并不由我来决定。

在过红海之前,我警告每一个人,让他们把随身所带的所有酒类都处理掉。甚至在进入苏丹时,我们就非常谨慎,把携带的各种酒类全部丢掉

了，只保留了一瓶为庆祝新千年到来而用的雪利酒，并且把它仔细藏好了。我清楚地知道，沙特阿拉伯严禁任何酒类。而且我们知道自己会被搜查。因此在开车上轮渡之前，我们将所有东西检查了三遍，这倒并不是因为我们携带了很多酒，而是因为我们可能偶然会接受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白兰地酒。我们甚至作了安排，把冈萨雷斯·拜厄斯牌雪利酒绕过沙特阿拉伯运过去。我们检查了所有的东西，单单漏了这个医疗包。

我们除了随身携带过氧化氢之外，还带了伏特加酒，因为医生建议我们带，一方面可以作消毒用，另外还可以当作麻醉剂用。

“这是什么？”海关官员问。

“哦，我的老天爷，”我说，“我们忘记有这瓶东西了。是作医疗用途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了。我们不要了。把它扔了吧。”

他大惑不解。显然我们得到允许进入这个国家。他知道，按规定他应该让我们进去；我们希望他不必按规定鞭打我们。在我们旅行的早些时候，我们遇见一个欧洲人，他在苏丹临时逗留期间因为携带酒而真的被鞭打了80下，因此我们知道被鞭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位官员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就去向他的上司报告。他们讨论了很长时间。其他所有人都经过搜查放行了，只有我们几个人还站在那里等着。

终于，我被叫进了大楼，见到了那位官员的上司——海关分署的头头。我紧张得浑身发抖。在场的还有另外四个人，他们只说阿拉伯语。他的上司给我一份表格，要我签名。这是一份手写的声明，说明明白在沙特阿拉伯拥有酒是非法的，他征得我的同意销毁这瓶酒。我尽快签了名，四个证人也签了名。我们一起走到大楼外面，那个头头迅速把伏特加酒倒进沙子里，把酒瓶扔在地上，整个过程简短得出奇。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把酒瓶砸碎、藏起来或者对这种亵渎神灵的容器做些其他什么事情，但是当我们开车离开时，那个酒瓶还是躺在地上，大家一眼就能看到。

我们仍然惊魂未定，但是总算松了一口气，我们终于进入了沙特阿拉伯王国，身后留下了一只原先装满阿布索鲁特牌伏特加酒的酒瓶。

阿拉伯半岛在100年以前还是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置于英国的霸权控制之下，当时岛上尚有一些地方从未有过人烟。

T. E. 劳伦斯就是在这里组织阿拉伯人同与德国结盟的土耳其人奋战，从而永垂青史，被世人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伊本·沙特的祖先在 19 世纪争得了领导权，战后伊本·沙特巩固了对这个地区的控制，1927 年大英帝国正式承认了他的王国。五年之后，王国改名为沙特阿拉伯。

由于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现了石油（很快大家就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这里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石油资源，我的意思是储量非常之大的石油），这个国家实际上一夜之间就从穷国变成了拥有巨大财富的国家。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沙特家庭就完成了从骑着骆驼旅行到开着凯迪拉克旅行的转变。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完成了将所有资产移交给沙特控制的工作。在这之前，开采油田一直是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专属特许权。资产转移之后石油价格急剧上涨，到 1981 年，沙特阿拉伯不管按照什么标准衡量都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了。

现在该国的皇室里有大约二万个王子。一夫多妻制是传统，生养无数个子女是常规。（奥萨马·本·拉丹的父亲有五十多个子女。）沙特政府向所有王子支付 6 位数的年薪。沙特阿拉伯的实际工作大部分是由外国人做的，如巴基斯坦人、苏丹人、孟加拉人，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会计、计算机技术人员、营业员、看门人，以及无数企业家，所有这些都来自海外，他们占了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

但是一个巴基斯坦人来到沙特阿拉伯后，不可能立即就开一家肉店，他必须先找到一个沙特合伙人。这个沙特人也许永远不会在店里露面，他也许甚至永远不会去看一看这家店，但是巴基斯坦人必须每个月寄给他一张支票。在沙特阿拉伯做生意的海外公司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沙特人。尽管沙特人不做什么事情，他们却指望自己被提拔到管理层。根据外国企业家的说法，大多数沙特人很少工作，如果说他们真的干点什么工作的话，他们的缺勤率也很高。（有人告诉我们，有一个雇员请了三次假，每次都说是他的母亲去世了，后来他的雇主揭穿了他的欺诈行为。）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作沙特人”的。这是大家使用的表达方法：去清真寺、探亲访友、逛商场、喝茶、谈论那些可怕的外国人，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如果他们无法去上班，那是因为他们“作沙特人”作得太忙了。

我们在沙特阿拉伯遇到了很多外国医生、牙医和其他专业人员，他们

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到这里来的。尽管沙特王国不缺乏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但是沙特人的身份使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无法把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到从事这些专业的工作上去。

我们到沙特阿拉伯的第一天一直无意识地干着愚蠢可笑的事情,直到晚上才有所明白。到达的那天晚上,我们住进了旅馆,立即去找东西吃。我们找到了一家类似西方快餐店的沙特餐馆。柜台后的售货员对佩奇视而不见,因此我就要了食物,坐下来吃。我注意到所有的人都在注视我们,没有人说一句话或做任何动作。我们没有受到警察的骚扰,他们只在店外露了露面,但是我们确实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我们还以为是我们的汽车——这辆汽车经常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还有就是我们明显身为外国人所造成的,尽管佩奇按规矩穿着黑长袍。但是,我们弄错了。后来,吃完之后在警察的跟踪下,我们回到旅馆,他们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引起别人注意。

我得承认,我们犯了一个简单、天真又非常愚蠢的错误,正像我在上文说的那样:我们走进餐馆,要了食物,坐下来就吃。在沙特阿拉伯,如果一个妇女想到餐馆去吃饭,她要走另一扇门,到后面一个专门的家庭区去,里面是一间间独立的小间,在那里吃饭只有她的家人才看得到她,别人是看不见的。从而大家都不会因为有个女人在同一家餐馆吃饭而忍受不清洁的气氛。后来回忆一下,我们才想起来,当时那个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是男的,根本看不见一个女人。

除了这些之外,除了生活本身之外,沙特阿拉伯是很先进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大楼、港口等等,应有尽有。该国几乎全部是由沙漠组成的,宽大的高速公路横穿沙漠,偶尔可以看到沙漠上建成的城市和村庄。每一个加油站边上都连着一座清真寺。那里有数不清的购物中心,没有电影院,餐馆屈指可数,清真寺则有成千上万座。生活很简单:你要么就去采购,要么就去清真寺。清真寺和购物中心有共同的停车场。

穆斯林一天要祷告五次。当唤祷人高喊信徒们祷告时,所有的事情都得停下来,所有的商店都要关门。祷告的钟点每天刊登在报纸上,根据黎明和黄昏时刻的变化而变化。《古兰经》说,当你能分辨黑颜色的线和

白颜色的线时，黎明就降临了；当你不能分辨它们的时候，就是黄昏时刻了。由于沙特国土面积广大，几乎是得克萨斯州的四倍，是法国的四倍多，因此太阳落下和升起的时间在各地都不一样，在吉达的祷告时间与在利雅得的祷告时间是不一样的。

沙特阿拉伯的购物中心很讲究，囊括了所有的设计风格。到晚上，市场上，就是那种传统的集市上，就会人满为患，黄金市场更是如此。我周游世界时见识过大富大贵的地方，也到过首饰市场，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沙特阿拉伯黄金市场那样显富的。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 24K 的。你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黄金至少也是 18K 的，件件首饰都打磨得锃光发亮。市场上出售宽达 6 英寸的巨大皮带、项链、冠状头饰、手镯和戒指，许多都镶着钻石。（很多加工程序是在印度完成的，然后运到阿拉伯半岛。技工都居住在亚洲次大陆，不过有许多印度穆斯林现在成了这里的居民了。）我在一家面积不超过 1 000 平方英尺的店铺里看到的黄金饰品比在纽约第五大道第凡内总店里看到的黄金饰品还要多。

你永远不会在一个沙特阿拉伯妇女身上看见任何黄金饰品，在她们身上也看不见流行时装、珠宝等首饰。集市和购物中心有许多妇女，挥金如土地购买物品，如服装和珠宝，但是她们不可以在公共场所穿戴这些物品，她们只能在家里炫耀这些东西。商店里没有试衣间，即使在妇女服装店，售货员也全是男的。这些男人是不可以看见妇女试穿衣服的。如果一位妇女买了一件衣服，她就带回家去试穿，或者她愿意的话，可以在购物中心里的女厕所里试穿。在公共场所她必须始终从头到脚遮盖严实。

当你问沙特妇女她们对此感觉如何时，许多人会说，这个制度有其优越性。不知道她们这样说是否仅仅为了找点理由，但是如果把她们的待遇与欧洲妇女相比较，她们就会说：“没有人来骚扰我们，没有人甚至会走近我们身边，没有人会试图来勾引我们或捏我们的屁股。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到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而不必担心会有人来骚扰我们。”

这话说得也不全对，并不是完全没有骚扰。如果一个妇女在公共场合把自己的脚踝露出来的话，沙特宗教警察，即维护贞操和防止堕落委员会的官员，就会走过来纠正她；这些官员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干，他们的全

部工作就是强制执行这种法律。佩奇的头巾不止一次滑落下来，露出了头发，宗教警察就走过来，坚持要她改正。

沙特阿拉伯国内可以买到的外国出版物极少，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阿拉伯国家出版的，都要经过审查。内页被一张张撕掉，露出女人皮肤的照片用粗头笔抹黑，甚至女子网球赛的照片都被抹掉了。我们在海湾国家都看到了这种做法，算算看将每一本进入该区域的期刊一本一本地审查得需要多少人、多少粗头笔啊！

在沙特阿拉伯，妇女是不可以开车的。搭乘男子开的车时她们必须坐在后座，除非司机是家庭成员，那样的话她们就可以坐在前座。许多妇女未经丈夫允许是不可以出门的。1990年11月，47位沙特妇女上街抗议。她们拿了汽车钥匙，自己开车组成车队，穿越了利雅得，不过她们身上还是穿着黑长袍，遮盖得严严实实。她们家人的护照受到吊销的威胁，家人的生计也受到威胁。这之后不久，原来禁止妇女开车的习俗变成了规定妇女不准开车的法律了。

佩奇采访了三位在《沙特日报》工作的年轻女记者。她们不跟男记者在同一幢楼里工作。“我们确实想得到自由。我们确实想开车。”其中一位女记者告诉她。“依赖男人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起变化的。我母亲当年根本不可能干这份工作。”

在沙特阿拉伯，公开的生活和私下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不协调。我们探访了一些沙特人的家庭。他们给我们喝伏特加酒、香槟酒，给我们吃鱼子酱。他们雇用了欧洲男管家和女佣，房子都是由著名的西方设计师按照国际风格装饰的。在家里跑来跑去的妇女和孩子都穿着西式服装，价格之贵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更别说去买了。孩子们有所有最新的录像带和CD片，因为有卫星天线，全家人对全世界各地的电视节目都不陌生。

沙特王国国内的各种矛盾非常尖锐，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文化方面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沙特人花费的钱比他们赚的钱要多得多了，国家的债务急剧上升。如今，尽管沙特的资产数量巨大，但是它已经成为世

界上负债最多的一个国家。如果石油价格下跌，沙特政府终将宣告破产。政府将没有能力负担所有王子的生活，更不可能养活所有的毛拉。只有在石油价格仍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沙特阿拉伯才有可能渡过难关——而且仅仅是可能而已。

71%的沙特人年龄在29岁以下，而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却都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再加上原教旨主义势力抬头、百姓对王室的压制普遍不满，以及石油价格不停下跌等造成国内政治形势紧张，沙特王国已经处于动乱的边缘了。王国的崩溃将导致该国油田被占领或关闭，石油价格会立即大幅度上涨。

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至少在今后10年内我们都得为石油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呆了两个星期，走访了沙特的商业首都——红海城市吉达，政治首都利雅得(Riyadh)，以及位于波斯湾的胡拜尔(Al-Khubar)油田。从吉达出来，刚刚到达圣城麦加(Mecca)的西面，我们就看见一块高速公路标志牌，上面写着：务请所有外国人和非穆斯林从下一个出口出去。这个通告是以三种文字书写的，在出口之前出现了好几次，而且字体越来越大。我们走的那条公路是通往伊斯兰两个圣城[另一个圣城是麦地那(Medina)，在北面]之一的麦加的公路，非穆斯林是不允许走近麦加的。即使是穆斯林，如果是外国人，也必须得到允许后才能到麦加去。

在去利雅得的路上，我们看见数不清的骆驼，它们被漂亮的围栏阻挡着，以免从沙漠跑到公路上来。利雅得是座俗丽又现代化的城市，跟吉达非常相像，只是比较乏味，大概所有以官僚为中心的城市都是这样乏味的吧。沙特王国的生命源泉来自于东部，即来自于胡拜尔周围的油田，我们在那里参观了沙特石油博物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眼前的是世界一流的博物馆。根本就不能认为这单单是一个石油博物馆，因为它追溯了这个区域的整个发展过程，以详尽又吸引人的方式阐述了所有与阿拉伯有关的天文学、数学、药剂学、地质学和其他技术和文化进步的历史。沙特有的是钱，也愿意花钱。可惜，很少有人去那里，因为沙特几乎是不对旅

游者开放的，而且自从建国以来就是这样，最初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如今则是因为惧外情绪的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西方媒体喜欢称呼的那个“穆斯林世界”。认为世界上有一个单一的伊斯兰教的想法是很愚蠢的，沙特王室对这一点看得最为明白，因为王室对权力的控制是非常微弱的。就像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样，逊尼派和什叶派几百年以来一直在相互残杀；就像基督教不同的派别之间会发生战争一样，伊斯兰教不同的派别之间也会发生战争，哪怕在穆斯林一生中神圣的时刻——到麦加去朝圣期间——都会发生战争。每一年有一百多万朝圣者被允许进入沙特阿拉伯去麦加朝圣，但是他们只能逗留很短的时间。沙特阿拉伯拒绝或限制如此众多的穆斯林入境，从而也使它无法向信奉其他宗教的许多旅游者敞开自己的国门。

在吉达的一家室外餐馆，我们倒是看到了十来个法国人。他们好像是游客，我猜想，有这些游客在这里，这表明沙特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试验，因为沙特需要外汇。这之后，在整个逗留期间，我们再没有见过一个游客。

我想我敢肯定，我们在沙特期间从头到尾没有遇见过一个美国人。25 年以前，这里到处都是美国人。如今，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人都不敢走出他们大院的高墙。像所有外国人一样，他们都很低调，自从 1996 年以来他们一直都这样；就在那一年，恐怖主义分子用炸弹袭击了达兰（Dhahran）市的一个大院，炸死了驻扎在那里的 19 名美国士兵，炸伤了三百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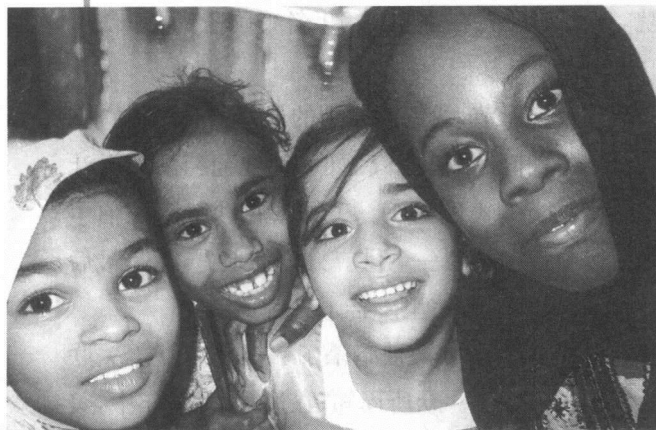
一年之前，我们在摩纳哥过感恩节，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餐馆是一家供应得克萨斯州—墨西哥州菜肴和桑格里厄汽酒（一种红葡萄酒加果汁的西班牙加冰汽酒。——译者注）的美国餐馆。美国人在沙特阿拉伯生活已经有些年头了，因此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供应火鸡的地方，但是最后我们只能在一家卖烤鸡肉串的土耳其餐馆里凑合了一顿。

我们在沙特王国期间，有好几个西方人被暗杀了。在两起互不关联的事件中，载着西方人的轿车被炸毁了。众所周知，在过去的 10 年中，美国在整个中东使无数人成了自己的敌人。沙特阿拉伯成了孳生憎恨情绪

在去麦加的路上，如果
转错一个弯就会产生严
重的后果。



每当被问到这辆车卖多少钱时，我总是开玩笑回答说：“100 万
美元。”这些家伙马上就会问：“要现款还是电子转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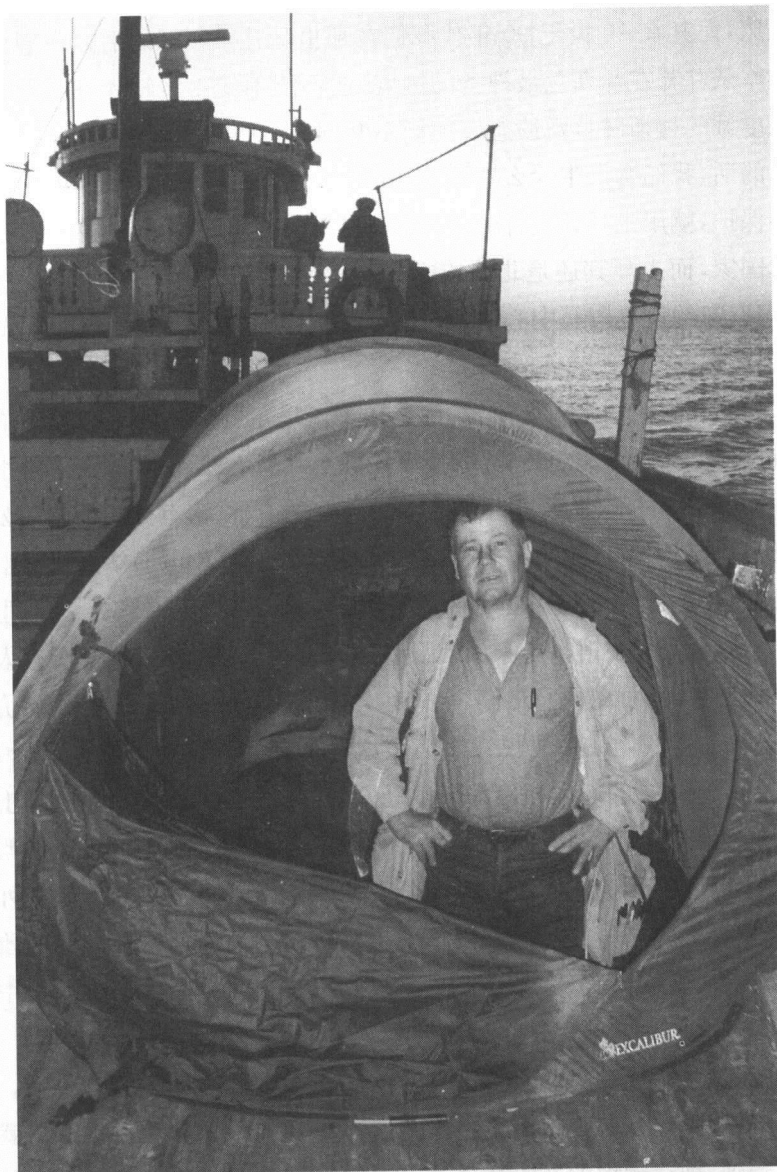


阿曼国内的许多女
孩到了青春年龄时，
就会把自己“遮盖”
起来。

的温床,尤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在那里驻扎了军队之后。一想到基督教军队驻扎在伊斯兰最神圣的国度,就不能不使得沙特人和其他国家那些虔诚的穆斯林日益愤怒。他们不断问我,如果让穆斯林军队驻扎在罗马的话,我们会产生什么感觉。(我对他们的回答是:如果沙特阿拉伯需要保护,就用土耳其或者摩洛哥的军队来替代美军,因为这两个都是穆斯林国家,而土耳其还是北约的成员国。我现在仍然持这个观点。)一年还不到,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就让全世界看到这种憎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在离开阿拉伯半岛之前,我们走访了卡塔尔、巴林、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比纽约、巴黎或者伦敦更绿意盎然,因此赢得了全世界各种环保组织的奖章,那里星罗棋布着茂密的森林、富有异国情调的公园和花园,全部用引自波斯湾的脱盐海水灌溉。迪拜(Dubai)举办世界上奖金最高的跑马比赛、世界上奖金最高的网球和高尔夫球锦标赛,拥有世界上惟一的七星级旅馆。这家旅馆设计成一艘巨大的航船,产权所有人是迪拜的王室,里面最便宜的房间一晚上要价 1 000 美元,最贵的要价为 8 000 美元。(我们住在凯悦大酒店。)这里富有的程度让人吃惊,哪怕跟世界上其他最富的地区相比都毫不逊色。各酋长国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可以采取独立的政策,无怪乎它们会被外来者征服。阿布扎比是各酋长国中最富有的,因为它占有了大部分石油,是酋长国中的老大,但是外国人在这里的势力日益强大,该酋长国于是向每一位迎娶本地妇女的酋长国男子奖励 7.5 万美元。卡塔尔也提供类似的奖励,因为该国人口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非卡塔尔人。

我无法不赞叹那里的建筑、基础设施、皇宫、集市、清真寺和生活。总有一天石油会告罄,野蛮人会进入,所有这一切都将淹没在沙漠中。我们一再看到,灿烂辉煌的文明社会最终衰败了,其中许多最终崩溃了,甚至在欧洲和日本都不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中亚和非洲,几百年来有多少城市整座整座地消失无形。著名的廷巴克图终有一天会像迦太基(古代北非一奴隶制国家,在今突尼斯境内——译者注)的城市那样变成一堆废墟。阿拉伯半岛自古以来一直是一块人烟稀少的荒地,它将恢复自己的历史原貌。一千年以后这里还能剩下些什么?未来的考古学家在此能



乘坐单桅三角帆船穿越阿曼湾。在甲板上支起的帐篷里过的
第一个晚上充满浪漫气氛,但是在海上航行5天后,
印度洋上的景物就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了。

发掘些什么吗？

我们在阿曼结束了我们的阿拉伯半岛之旅，在那里，我们每天都去伊朗驻马斯喀特(Muscat)大使馆，希望能申请到签证，让我们开车穿越伊朗。每天我们都给纽约去电话，他们说，我们去伊朗的签证已经办妥了，但每次我们去当地的大使馆时，却发现仍然没有办妥。

[我们从迪拜去了一趟基什岛(Kish Island)，这是个比免税商店中心大不了多少的小岛，我们空跑了一趟，什么收获都没有。基什岛是伊朗的国土，无需签证就可前往，因为当地政府正试图发展旅游业，我们到那里去是想看一看伊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基什岛曾经是伊朗国王的私人游乐场。海滩是根据性别和国别划分的，岛上没有酒，也没有什么夜生活，男人和妇女都得遵守严格的着装规定。我对基什岛是否能成为新的度假热点颇感怀疑，因为我们在世界各地遇见过很多穆斯林，他们喜欢喝酒、跳舞、去夜间俱乐部，这些人不太可能愿意到这个岛上来散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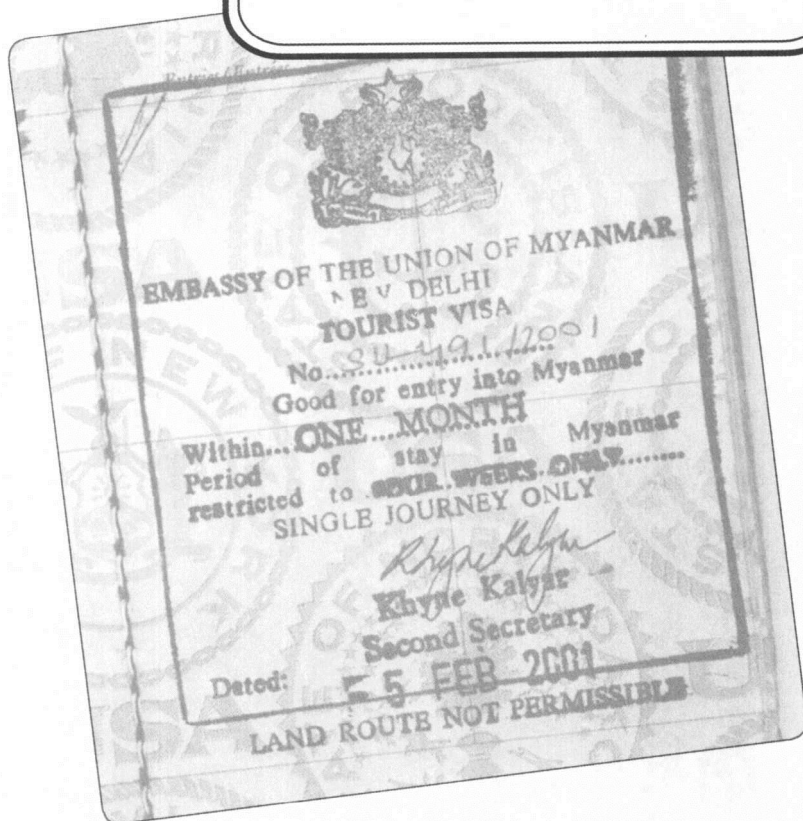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我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发现在繁忙季节，巴基斯坦运输洋葱的船只会在阿拉伯海航行，定期往返卡拉奇(Karachi)和马斯喀特。圣诞节即将来临，更重要的是，标志斋月结束的开斋节也马上就要到了，在过节的时候是不可能安排运输事宜的。如果不尽快解决运输问题，我们会在阿曼再耽搁上两个星期。在开罗时我们就拿到了去巴基斯坦的签证，因此我们就放弃了去伊朗的打算，预订了最后一班离开阿曼的运洋葱船——一艘 40 英尺长的独桅帆船，它预定空船返回卡拉奇。

随着我们结婚第一个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周游世界的第二个整年即将期满，我们把神秘的阿拉伯世界留在身后，启航去印度次大陆。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 3 部

2001年



12

同6000万人一起 洗涤自己的罪孽

我们搭乘独桅帆船横跨阿拉伯海，在船上，我们把睡袋摊在露天甲板上，边上支起帐篷。白天，我研究西南亚的情况，佩奇阅读《古兰经》，包括船长在内的6个巴基斯坦船员从海里打鱼，鱼打上来了他们立即就清洗干净烧给我们吃。晚上，我们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坐在船头仰望满天繁星，在国王学院合唱团的伴唱下高唱圣诞节颂歌。我们数着猎户座星云带里的星星，渐渐地进入梦乡。阿拉伯海是印度洋的一部分，海上的日落景色真是壮观绚丽，初升的太阳与我在沙漠上看见的日出一样色彩鲜红，充满活力。圣诞节的早上，我们醒来时看到一群海豚在船边跟着船一起游向前方。出门旅行难道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享受吗？尽管我们的船肮脏不堪，船上还有在阿曼卸下的洋葱留下的挥之不去的气味。

我们到达时，卡拉奇港关闭了。我没有瞎说，巴基斯坦最大的港口，主要的港口，说真的也是惟一的港口，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港口，居然关闭了。不仅港口为了庆祝斋月的结束而关闭了，而且那些看见我们出现而惊讶不已的政府职员还告诉我们，外国人是允许从海路入境的。外国人可以从空中或陆地上入境。他们说，除了商船上的海员外，外国人从港口入境是非法的。那么汽车呢？要把车依法带入境内的话，哪怕我们所有的证书都符合规定也得跑大约94个部门才能解决问题。

过了好几天他们才让我们下船，并且是在扣押了我们的汽车、没收了我们的护照之后才放行的。当我跟不同的人谈到埃及和土耳其，谈到这

同6000万人一起洗涤自己的罪孽

12

两个国家愚蠢的官僚系统时，他们的回答总是：“你觉得这样太糟糕？结论不要下得太早，你到印度去就知道了。”他们说，巴基斯坦跟印度几乎没什么区别。正是在卡拉奇，我学到了“加快费”的概念。没有人会向你索贿，但是有一种提高办事速度的办法。最后，我们走访了大约十来个局办，花了6天时间，元旦那天我们被准许入境了。

由于我是2001年9月11日之前去的巴基斯坦，因此，我入境时已有的关于地缘政治和巴基斯坦那些见解，以及我离开时形成的深刻理解现在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就在我们到达之前不久，克林顿总统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而自1947年以来，巴基斯坦和印度基本上处于不是冷战就是热战的局面。克林顿带着女儿在印度游览了几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愿意给予巴基斯坦的充其量就是在机场停一下，讲几句简短却不是那么友好的话。当时，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非常不好，在纽约竞选美国参议员的总统夫人居然把一笔5万美元的捐款还给了一群美籍巴基斯坦医生。我们到达时，巴基斯坦的反美情绪更为加剧了：美国先前已经卖给巴基斯坦一大批战斗机，却在最近拒绝交货，但是不退钱。我和佩奇在1月初到那里的时候，美巴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状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9月11日。9月12日，巴基斯坦又成了美国伟大的盟国和长期的友邦。

自然，这种做法激怒了更多的巴基斯坦人，这个在政治上一分为二的国家现在两派的立场都更趋强硬。如今，反美成了巴基斯坦各种政治意见的共同点。

巴基斯坦属于那些我认为无法照现在这个状况生存下来的国家，不管它与印度不可调和的分歧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巴基斯坦国内区域间的分歧之严重和相互间的敌意之深刻已经到了威胁其生存的地步。这个国家是在印度独立之后因大批穆斯林移居而匆忙建立起来的。（1947年到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仍被认为不同于当时早已在那里的穆斯林，其子女和第三代仍然属于“劣等”的范围。这种阶级区分如同现在德国的情况，在德国，前民主德国人是受歧视的。）这是个由疯狂的英国官僚凭空制造出来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凝聚力。旁遮普（Punjab）农民跟俾路支



棉花对巴基斯坦的重要性无异于石油对尼日利亚的重要性。

同6000万人一起洗涤自己的罪孽

12

斯坦(Baluchistan)部落人完全没有相同之处。西北边境的居民是数百年以前南下的高加索人的后代,许多人仍然具有蓝眼睛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合并在一起的各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个国家很不稳定(还因为它拥有了核武器而更具危险性)。最终,这个国家必定会分裂成好几个国家。

在卡拉奇,我们靠看报纸了解每天的活动,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保持这个习惯。我们看到有一场赛马活动,入场费是一美元。佩奇是免费进去的,我们立即找到了原因。场内有5000个男人,都穿着传统服装,一个女人都没有。佩奇立马就成了观众目光的焦点,大家的眼睛都不看那些赛马了。场内赌注登记经纪人出奇的多,相互间抢夺生意,我们跟一个经纪人下赌注,输了三四次之后我们就走了。

我和佩奇从卡拉奇出发,北上穿越印度河河谷,来到了拉合尔(Lahore)。印度和巴基斯坦共享一条大约二千公里长的边境,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市,该城城外是你能从这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的唯一途径。我们到达时,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稍有松弛:现在边境每天都开放,而几年以前,一个月才开放三个晚上。

往北去拉合尔的路上,我们走的道路大部分是一条状况不错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我们不得不调整我们所制定的国际排名次序。我们很快就决定,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驾驶员的集中地,他们无疑是赢家。这个国家的驾驶员喜欢在哪里开车就在哪里开,汽车并不总是在一条特定的车道上,哪条车道状况好,他们就在哪条车道上开。就他们而言,车道上不存在顺向和逆向的问题。驴车、牛车,偶尔还有骆驼车,各种各样的车都与机动车辆抢道,哪个车道方便他们就占用哪个车道。

巴基斯坦的洗衣业比起它的交通来要有效率得多了。卡拉奇的洗衣系统在那些外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事情。你无法理解这样做怎么行得通,但是这样做居然就行得通。男子到城里各处去收集脏衣服,他们拿了衣服却不给任何收据,不作标记,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识别方法。没有任何文字的东西。他们或是自己背,或是用驴车来运,把一捆一捆的脏衣服送到洗衣中心,这个中心占地可能有15英亩,里面有数百个水池。

在那里，脏衣服是工人用手洗的，然后放在太阳下晒干。一个男子洗有颜色的衣服（大多数雇员是男子），另一个男子专洗白色衣服，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工作。如果脏衣服洗完后需要熨烫，工人就熨烫。所用的熨斗是靠燃煤来加热的，熨斗有熨斗架。洗衣中心没有电。衣服干了之后就折叠好，送还给衣服的主人。

我前几次到这里来时碰巧见到了这个洗衣中心，我是正好开车从边上经过。我决定去看一看这个中心是否还在那里。我和佩奇拍了很多照片后还意犹未尽，洗衣中心真是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企业，我一直试图搞明白它是如何运作的。我没有看见记账的，我没有看见任何纸张，我也没有看见任何金钱往来。这里的街道就像拉各斯（Lagos）的集市一样杂乱无章。就像卡帕多恰（Cappadocia）国的地下城市一样，每一个城市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表明人类的智慧能创造出多么奇妙的事物。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看到人类无止境的创造能力。

与卡拉奇的洗衣中心相比，孟买（Mumbai）的洗衣店——多比加特（意为“洗衣人专用的台阶”——译者注）更大，也更混乱。

几千年以前，居住在印度河河谷的人民创造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数字系统。我们把数字称为“阿拉伯数字”，但是打了胜仗的穆斯林只不过是吸收了这套有效系统，并将它推广到全世界而已。

文明并没有止于数字，在如何控制从喜马拉雅山脉流出的大量河水方面，那里的人民也显示了自己卓越的聪明才智。今天，该国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世人所知的苏库尔水坝（Sukkur Barrage）——一个设计巧妙的水坝和水利枢纽系统，由总长度几乎达五千英里的运河组成。这是一个工程奇迹，由于其具有战略敏感性，他们不允许我们拍照。美国对一件事物就没有这样无可替代的依赖性。就跟埃及的阿斯旺大坝一样，摧毁苏库尔水坝实际上就意味着摧毁了这个国家。

巴基斯坦的食物普遍不错。我们经常选择自己要吃的食物，如同我们在中国时那样，只不过这里被选择的动物要大一些。在这里，我们不是挑选蛇或甲鱼，而是到门外挑选鸡或者山羊，挑中后就现杀、现炒、现吃。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会碰到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每一家餐馆，至少

有 10 个男人拿着冲锋枪坐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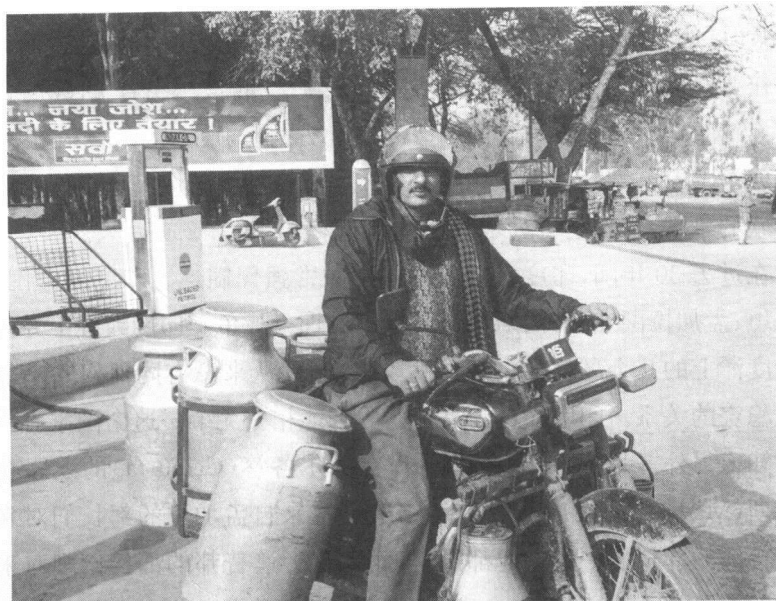
在拉合尔东面瓦加赫(Wagah)镇的过境站上,可以看到世界上一场最愚蠢,然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复杂的军队仪式。在那里,每天下午 5 点钟,在国际边界的两侧,身着制作精细的军礼服的巴基斯坦士兵和印度士兵分别举行一场换岗仪式,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咄咄逼人的神情,迈着正步,眼睛盯着对方,好像要真刀真枪地打一场的样子,或者至少是在采用先发制人的方法使对方不敢挑起事端。这种仪式与喜剧片《蒙蒂皮东》中的固定动作如出一辙,特别像约翰·克利斯扮演的那个推广可笑步态部里的官僚。参加这个仪式的士兵很把它当回事,一丝不苟地做完整套仪式,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模拟战争的想法尽管很简单,但是却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概念。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冲突都能以这种方式来处理,那么世界就会美好得多了。这样做总比在边界上向对方扔原子弹要好,而这两个国家似乎随时都准备向对方扔原子弹,现在看来也就是什么时候扔的问题了。

我们不想在那里等到 5 点钟,因此没有观看这场军队仪式。过境的一条基本规则是,尽快过境。否则的话,某些人很可能会改变主意。

进入印度后,我们直接就向瓦加赫东面的阿姆利则(Amritsar)市进发。阿姆利则在旁遮普邦的中心,是印度锡克教徒的圣城。锡克教是纳纳克于 16 世纪创建的,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结合的产物,信徒们遵循一本叫《锡克教圣典》的宝书,又称之为《圣贤智慧集录》。全世界有大约二千万锡克教徒,所有教徒几乎都住在旁遮普邦。

印度国内存在着几个大的分离主义运动,旁遮普邦是其中一个分离主义运动的根据地。1984 年,印度军队攻击了阿姆利则市内的锡克教金殿,导致英迪拉·甘地总理被她的锡克教警卫暗杀,这之后旁遮普邦就置于联邦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我上一次走访这个地区是在 1988 年,当时必须在军人护送下才可以观光。自那时以来,紧张局势稍有缓解,但是几乎在同时,在克什米尔(Kashmir)长期存在的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却变得越来越具有暴力倾向。

印度是一个不断发生暴力事件和政治上很不稳定的国家。作为一个



印度的送奶人在送牛奶。

发生在印度的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了许多这样的交通事故，我们不明白他们居然有本事制造这样的交通事故。

千万不要低估人类在方向盘后面创造奇迹的能力。



同6000万人一起洗涤自己的罪孽

12

国家,印度的整体存在不仅受到各少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威胁,而且还受到作为多数民族的印度教内采用暴力手段的极端分子的威胁。自1947年以来,野蛮行为一直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独立后不久,在巴基斯坦的成千上万印度教徒和在印度的成千上万穆斯林就惨遭所在国家的多数民族的杀戮,双方越境逃难的难民加起来至少有1200万人。

在过去30年间,印度对其邻国同样非常强悍霸道。印度同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交战,同斯里兰卡打过代理人战争。印度人登上并占领了印度洋上的几个岛屿。自从独立以来,印度从来没有同任何一个邻国有过稳定的关系。印度人也尚需证明内部能相安无事。这个国家有一半人不知道另外一半人在干什么事情,在加尔各答(Calcutta)的人跟在马德拉斯(Madras)的人毫不相干。在议会里,来自孟加拉的部长们对来自旁遮普邦的部长们一点兴趣都没有,而来自旁遮普邦的部长们则对来自南方的部长们不感兴趣,来自南方的部长们又对来自北方的部长们不感兴趣。

尽管有这些问题,印度却是我走访过的国家中一个我希望能找到令人激动的投资机会的国家。印度在冷战期间与前苏联结盟,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了1991年,该国发现自己破产了,账户上所剩的外汇储备都不够应付三个星期的支出。于是,该国政府开始放松管制,开放经济。印度似乎汲取了教训。印度中产阶级人数众多,因此出现奇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我离开印度时,我发现一切都与我的期望相反。我不否认,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解放经济的迹象,政府也确实认识到自己需要外资和国外的专门知识。但是,反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的精神仍然占着主导地位。印度集中体现了官僚主义和沙文主义,而且国内保护主义盛行。最近,一份对国外投资项目审批程序的工业研究报告表明,一个企业家需要付出10个人工年才能完成所需的审批程序。我们因为没有“进口许可证”,甚至无法领取汽车维修时需要的后视镜,这种镜子只此一个,没有一个印度人可以用得上,我们甚至也无法把镜子带出印度。我们出发去孟加拉国时,那面镜子仍然被扣在加尔各答机场里。印度人奉行的是:“我们是印度人,因此我们比任何人都聪明。”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恰

恰使他们更加对此深信不疑。

印度把自己称为信息技术的伟大培育基地，但是我们的手机在那里却不能畅通无阻，我们几乎在每一个城市都得买一个不同的手机。在中国，手机在国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话。印度人对中国人既怀着满腔的愤恨，又妒忌得要命。特别是想一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印度比中国要富裕得多了。印度人会跟你说，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他们印度人则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公民。不错，印度的中产阶级确实人数众多，大约有 2 亿人，但是剩下的 8 亿人则不属于中产阶级。（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只会更凸显印度作为一个国家在管理业绩上乏善可陈，印度政府辜负了自己的人民，却无法套用其他独裁政府所用的借口。）过去 20 年间，中国的发展比印度快得多了，中国建起了基础设施——高速公路、电话网络、移动电话网络。印度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

在孟买和德里(Delhi)，我们去购买物品，在那里的商店里，可以买到的最新型号的电脑设备都是美国三年前的技术。印度采取过度保护政策，不允许进口最新技术。我们开车从西岸到东岸，从孟买到加尔各答，几乎让我们花费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 2000 英里。我们整天开车，每一天都在路上开车，如果平均时速能达到 30 英里的话，就算是幸运的了。这条混凝土公路只有两条车道，所有的车都挤在这两条车道上——卡车、骆驼车、驴车。卡车司机穿越印度的平均时速是 12 英里。以这样的速度，他们怎么能跟中国竞争呢？在中国，卡车司机用比印度司机快四倍的速度在公路上飞驰。

所有这些都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他女儿英迪拉·甘地执政期间遗留下来的，他们两人领导的国大党自独立以来几乎一直控制着印度。只有那些官僚、政客和一小批受到保护的商业精英发家致富了。尼赫鲁是全世界解放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是世界不结盟国家运动的领导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殖民主义、反西方情结。他把一切外国资本和专门知识都看作是剥削的工具，领着不结盟国家誓死效忠社会主义。现在大多数不结盟国家都选择了私有化。我在印度时，那里的人都在谈论私有化的问题，但是 10 年过去了，他们仅仅私有化了一家公司——一家面包店。

印度有一些大型公司，但是很快大家就明白了，这些公司在世界市场

上不具有竞争力。印度在可耕地的面积数量上占世界第二位,但是农作物的亩产量只是世界平均产量的 30%。与此相比较,中国已经开始出口各种商品和农产品了。我们开车在全世界旅游,很少看到印度产品,尽管印度的经济规模宏大——其国内受到保护的市场有 10 亿消费者。这是因为,印度的资本集中程度、专门知识和产品质量都没有发展到在国外竞争所需的水平。就像所有保护自己国内经济的国家一样,印度根本没有质量的概念。前苏联也从来没有出口过任何东西。

根据德里经济学院和印度社会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该国 1.65 亿 6 至 10 岁的儿童中只有大约 0.35 亿读完了小学。在印度,大学是为那些精英和有关系的人开办的。我们看到很多印度大学生在国外留学,原因就在于,印度政府不愿意花钱建立学校,使这些学生能够在国内上学,尽管印度的人口不断增加,对学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几乎一踏上印度的国土,我们就注意到了那里的猪。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因为三个月来,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牲畜,关键在于,自从 9 月份离开埃塞俄比亚以来,我们没有看到过一头猪。穆斯林当然是不吃猪肉的,因此没有理由去饲养猪。印度教徒把牛视作神明,不吃牛肉。他们吃猪肉,因此就有了猪。但是因为他们尊崇牛,因此到处都是牛。牛在印度到处行走自由。

(不可思议的是,印度凭借其众多的人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之一。印度的穆斯林人数比巴基斯坦多 1 000 万,仅比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少 4 000 万。印度人口中只有 3% 说英语,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就凭借这一点,印度成了美国 and 英国之后世界上第三大英语国家。)

印度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多神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可追溯到公元前 2000 年。印度教有将近 8 亿信徒,除了在其诞生地印度之外,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能够看到印度教。印度教有无数不同的教派,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如果让 700 个印度教徒给他们自己的信仰下定义,就可能得到 700 个不同的答案。不同的教派依据不同的圣典,做礼拜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或家庭的事。但是,几乎所有的



世界各地有许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相片。我们的拍立得照相机是我们与当地建立关系的好帮手，常常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在印度教最神圣的节日——圣水沐浴节里，我们与在阿拉哈巴德的其他6000万人一起在恒河里洗涤我们的罪孽。这是人类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下一次可与此相比的重要集会将在2145年举行。克利须那教派的人给我们留了恒河里的空位。



在贾普尔镇的街上，我们的汽车吸引了大象的注意力。这些大象正上路去迎娶新娘，把她送到新郎家去。与大象相比，我们的汽车体积小巧，大象由此明白我们不是本地人。

同6000万人一起洗涤自己的罪孽

12

印度教徒都接受如下信念：恒河的水是神圣的。

每 12 年印度教都要过一次该教最宏大也最神圣的节日——圣水沐浴节。数以千万计的印度教徒聚集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市，恒河和亚穆纳河在那里与神话中传说的智慧河合流，如果在恒河中那些特别神圣的河段沐浴，就能洗去自己的罪孽。在阿拉哈巴德市举行圣水沐浴节是自公元前 2 世纪以来就有的传统，是朝圣周期中的一个环节（在其他年份里，轮流在另外三个圣城举行规模较小的圣水沐浴节），是世界上人类最大的集会。

12 年举办一次是印度教历法规定的，是根据占星术对行星排列的解读作出的。行星最强大的排列阵势，也是在圣水里沐浴最吉利的时刻，每 144 年出现一次。我和佩奇 2001 年 1 月到达印度时正好碰上了这个时刻，天体要到 2145 年时才会再次把自己排列成这种幸运的阵势。因此，阿拉哈巴德市成了人类的聚集地，几个星期之内人数就达到了大约 6 000 万。如果这次聚集不是历史上人类的最大一次集会，至少肯定是 144 年来最大的一次，而且在今后的 144 年内恐怕也不会有更大的集会了。

显然，这个时期只要人在印度，就不可能不听到有关圣水沐浴节的事情。我和佩奇听说了，当然就往阿拉哈巴德市赶去了。

那里到处都支着帐篷，信徒们在那里跳舞、放音乐，宗师领着属下一队队信徒步入河水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圣徒，其中许多人赤身裸体，一些圣徒由他们的寺僧抬到河边，有一些圣徒在吸圣烟。河里面任何时候都至少有 500 万人。

想一想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位于纽约州东南部，每年 8 月那里都举办音乐会——译者注），然后再乘上 10。

我们是从在网上收到的一系列电子邮件中第一次得知圣水沐浴节的。一位与我们保持联系的朋友鼓励我们到那里去，建议我们去他所说的在伊斯肯（ISKCON）举办的教育营地。他说，只要提一提他的名字，那里的人就会向我们提供住宿。我们提了他的名字，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不过他们还是向我们提供了住宿。我们发现，伊斯肯就是国际克利须那意识学社（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我跟这个学社的人只接触了这么一次，只知道他们是一帮身穿橘黄色长袍、剃

着光头、在大街上又跳又唱《摩珂迦罗颂》的人。大多数美国人把他们当作一帮神经病。如果我告诉母亲，我跟克利须那派教徒住在一起，她肯定会吓坏的。克利须那当然是印度教的一个主神。当时他们真是殷勤好客。他们在一个可以容纳大约二百人并有水电的公共大帐篷里给我和佩奇一人一张床，我们随着帐篷外有节奏的《摩珂迦罗颂》歌曲进入了梦乡。我们在克利须那教派的大院里只呆了一个晚上，但是就是在那里我经历了一次非常少有的不期而遇，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之稀少绝不亚于行星为圣水沐浴节本身作出的特定排列。

“吉姆·罗杰斯，”一个黑非洲克利须那教徒喊我的名字，这是一个大个子，他向我走过来，自我介绍说，“1991年我在中非共和国见过你。你骑着一辆摩托车周游世界。”

我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我清楚地记得他。我们当时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Bangui)。他在那里传教，当时他的解释是，劝导别人改信宗教，当然是改信克利须那教了。他叫巴利，是尼日利亚人。他有一根手杖，我很喜欢，我们在班吉时他就卖给了我。我仍然留着那根手杖。那天在印度的圣水沐浴节多达七百万的人群中我们居然会不期而遇，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世界真小？真是小得让人无法理解了。

第二天，我和佩奇在恒河里洗去了我们身上的罪孽。

离开阿拉哈巴德市后，我们开车前往阿格拉(Agra)，我想带佩奇去看泰姬陵，我自己也想再看一次。不管你到那里去了多少次，每一次你仍然会为泰姬陵庄严雄伟的景色而震撼。外国人要参观泰姬陵需购买比印度人贵 47 倍的门票，如果算上外国人必须支付的税款的话，则是 94 倍。为了能够让你咽下这口恶气，印度人把这个差额美其名曰环保税。

在我们走访印度的整个旅途中，我们的心情一直交集在对当地人人文地理美景的惊叹和对这种差别待遇的恼怒之中。印度真是一个旅游胜地，那里的人们漂亮美丽，食品美味精制，风景秀丽独特，那里的寺庙和农村将长达几千年的文化呈现在你的眼前。但是印度的基础设施真是糟糕透顶，电话、水电、公路都无可救药，官僚体系的控制窒息了这个国家的生机。

同 6000 万人一起洗涤自己的罪孽

12



在贾巴尔普尔的一个小村里,我们停下来拍了这张照片。在我拍第二张送给她的照片时,佩奇则在向一位男村民保证确实存在着那些可笑的转世轮回的事情。

在去参观泰姬陵之前，我们参观了在阿姆利则市的锡克教金殿。我们从阿格拉出来后往东走，去看卡杰拉霍(Khajuraho)市的寺庙，这些寺庙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尺寸都是按照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非常精确，其最著名之处大概就是那些作为寺庙装饰品的春宫雕像了。如果我们不绕道去参观卡杰拉霍市的寺庙的话(我们本来打算从阿格拉直接开车去孟买的)，我们就会在阿默达巴德(Ahmadabad)市过夜，而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地震，阿默达巴德市正好是震中，成千上万人在地震中丧生。

我们旅行途中穿过了卡杰拉霍市以南贾巴尔普尔(Jabalpur)邦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佩奇给印度农村的村民留下了永世难忘的印象。住在这种小村庄里的人是不太见得到外国人的，能看到金发白人的机会就更少了。佩奇在这种地方总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有几次她甚至遭到当地男人的轻薄。

我们在村庄里停下车，给我们遇见的一个村民拍照，是一个头上顶着大水罐的年轻妇女。像往常一样，我们引来了一群人。一个当地男子走到佩奇身后，把手放在了她的屁股上。佩奇转过身去，那个男子站在那里，根本不想撇清自己与这种轻薄行为的关系，他大概觉得自己完全有权利做刚才做的事情。

要真正理解下面发生的事所产生的意义，我们必须记住，妇女在印度的地位是低得不能再低了，把她们称作二等公民还是高抬她们了，她们是被当作财产而不是当作人来看待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农村的村庄里，妇女没有父亲或者丈夫的允许是不可以走出家门的。

佩奇对这个男子进行了反击，她一手抓住他的衬衫前襟，用另一只手抽他的耳光。她以电影《马耳他之鹰》里汉弗莱·博加特抽彼得·洛尔耳光的架势抽了他三个耳光。这个男子被镇住了，看得出来也吓坏了，一有机会脱身就撒腿跑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全村男女老少的面挨一个女人的耳光，这大概是这个男人遭遇到的最丢脸的事了。印度教徒当然都是相信投胎转世的，这个可怜蛋被小女子佩奇·帕克杀了威风，在贾巴尔普尔邦挨了耳光，看来以后不管转世轮回多少次，他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

同6000万人一起洗涤自己的罪孽

12



这个妓女在她 $3 \times 3 \times 6$ 英尺的小房间等待嫖客。她在加尔各答所属的新工会在推广使用避孕套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

人口稠密的孟加拉国空地稀少，因此把牛粪贴在树上晾干，然后当柴火用。



孟加拉国正实施戒严，因为一个反对派政党宣布罢市。在此种抗议活动期间，任何人如果冒险出来，都会被认为是敌人而可能遭到暗杀。

我们从孟买出发,横跨印度次大陆,穿越孟加拉地区到达加尔各答市,进入了另一种文明。加尔各答被新闻媒体描绘得一团漆黑,但却是我们喜欢的印度城市之一。这再次证明,所谓的常识,正确的时候并不多。我们碰巧见到了一位教授,他正在帮助当地的妓女组成工会。这位教授为我们组织了一次游览加尔各答红灯区的活动,由一群妓院的鸨母当我们的导游。

我们是在接近二月底的时候踏上孟加拉国的国土的,很想更多地了解这个伊斯兰国家,因为该国两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都是女的。我们在那里有许多新发现(有根据统计数字得出的,也有亲身经历得来的),其中之一就是,该国首都达卡(Dhaka)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孟加拉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尽管联合国和其他组织也许正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孟加拉国国际网络组织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论坛以及其他需为向受到砷和其他有毒物质污染的沉井项目提供资金的组织提起诉讼。20世纪80年代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孟加拉国的饮水现状令人触目惊心,于是诉状中提到的这些组织制定了在孟加拉国全国挖掘浅管水井的政策。

用孟加拉国国际网络组织的话来说:“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影响孟加拉国前途的许多决定是由这个国家以外的国际机构、贷款国政府和跨国公司作出的。”正如当地一份报纸所报道的:“砷中毒的短期和长期影响都是致命的。研究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砷中毒的来源就是浅管水井,农村97%的人饮用的水是从这些井里来的。人民每天都从浅管水井里饮用含有毒物质的水,而决策者及其执行机构还在继续用沉井法挖井。世界银行自己提出的数字是,目前有200万人面临来自管井的砷中毒的危险,7500万人有可能会受到砷中毒的危险,但是捐助方仍然继续在用沉井法挖井。”

国际机构没有停止挖井,而是举办了第三次减少有毒化学品对孟加拉湾经济体的影响国际研讨会——第三次研讨会!而那里正发生着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受害人数最多的一次中毒事件。

同6000万人一起洗涤自己的罪孽

12

我们向东行进再次进入印度，向缅甸(Myanmar, 以前拼作 Burma)进发。在穿越印度最东部的特里普拉(Tripura)邦时，我们是在军队护送下旅行的。在周游世界途中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在军队护送下旅行，但是这一次的气氛最为紧张。所有的士兵都穿着防弹背心，所有的卡车上都架着机枪。我们在跟许多官兵用宝丽莱的拍立得相机合影之后，于早上7点出发，同护送部队一起走了大约七十公里，向邻近的阿萨姆(As-sam)邦行进，沿路每隔100米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身着全副战斗装备的士兵。

在相对安全的阿萨姆邦，我们被耽搁了四天，露宿在锡尔恰尔(Sil-char)市，几次想进入曼尼普尔(Manipur)邦但都没有成功，仅仅在那个邦里就发生着24场不同的武装起义。克什米尔的战事得到新闻媒体的报道，但是曼尼普尔邦的人则把到克什米尔去当成是休假。印度的东部各邦比其他地区更混乱无序，也更具有分离倾向。正是在锡尔恰尔市，我们得知，护送我们的那支部队在与我们分手之后的第二天遭到伏击，与我们一起旅行的士兵中有11人被打死。不用说我们有其中一些士兵的照片。如果我们多跟他们一天，我们很可能也跟他们死在一起了。

我们在曼尼普尔邦的边界上被拦住了，得知没有德里方面的首肯，我们不可以开车穿越曼尼普尔邦。正如我们在许多地方见到的那样，这里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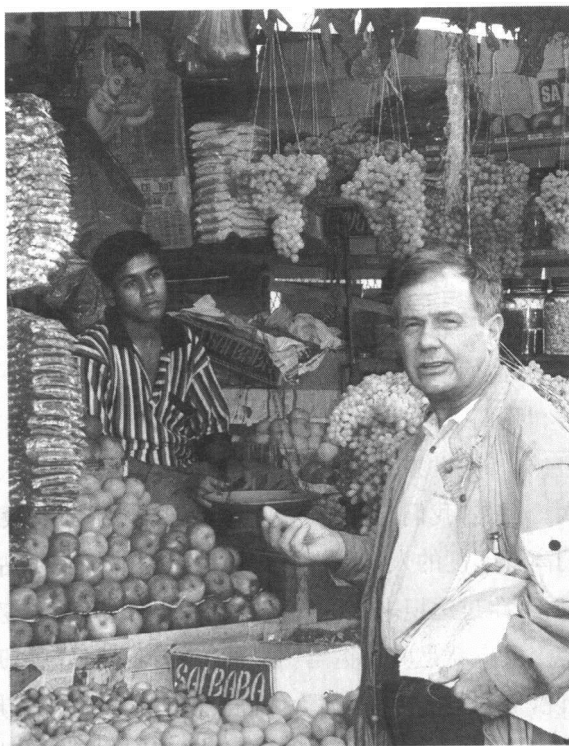
我们回到锡尔恰尔市，收到了我们所需要的许可证，再回到边界，又一次被挡了回来。这样来来回回地耽搁了四天，每一次边境官要我们钻什么圈，我们就得钻什么圈。

同时，那个对我施以援手的锡尔恰尔市警察局局长试图说服我放弃这次旅行。

“我无法阻止你得到许可证，”他说，“但是不要去。千万不要去。我的警察经常在那里被杀害。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不要到那里去了。”

他告诉我，在过去的12个月中，他损失了9名警察。

但是我决心要去缅甸。最后我终于在德里找到了一个能给我所需许可证的人，边境官允许我们通过。过境后，我立即就感到恐惧了，在整个旅途中，我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害怕过。我像佩奇在安哥拉那晚哭泣时



我们总是品尝街上贩卖的食物，这是我们在锡尔恰尔
时品尝食物的情形，尽管我们常常认不出来
自己吃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在缅甸森林中干完活以后回家的路上与我们相遇，双方都吃了一惊。

同6000万人一起洗涤自己的罪孽

12

一样害怕，我真的害怕了，过了一个月以后我才敢把警察局长当时对我的警告告诉佩奇。我们在丛山峻岭中行进，开车时每转一个弯，我都会担心受到伏击。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来了。我们在边境上这么来来回回地折腾，整个曼尼普尔邦肯定都在流传这样的消息：这些神经不正常的外国人想得到进入这个地区的许可证（尽管成功的人并不多）。每一次看见路边上有三四个年轻男子，恐惧感就顿生，我忍不住会猜测：这会不会是伏击？

当我们安全到达国际边境时，迎候我们的人兴奋极了。缅甸的边防警卫在等着我们，他们事先就得到通知，我们已经获得许可进入缅甸。他们见到我们时和我们一样高兴，同时又觉得难以置信，他们作了解释之后我们才明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是从印度开车进入缅甸国境的第一批外国人。但是，我们与曼尼普尔邦官僚的对手戏还没有唱完。那个盖章让我们离开印度的人显然没有向他的上司——边防站的站长——报告过，因为后者跑过边境来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离开印度。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向他指出明显的事实：我们早已离开印度了。

不对，他说，你们不能离开，因为你们没有进入曼尼普尔邦的许可证。

他告诉我们（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我们必须回到曼尼普尔邦去，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进入曼尼普尔邦的许可，因此我们不可以离开曼尼普尔邦。

我告诉他，我们不在曼尼普尔邦（我们是被禁止进入那里的），原因是，我们已经离开曼尼普尔邦了。我问他，如果我们没有进入曼尼普尔邦的许可证，我们怎么可以回到曼尼普尔邦去呢？这位站长坚持要我们回到印度去（尽管我们已经没有签证了），到邦首府拿到进入曼尼普尔邦的许可证，这样我们才能离开曼尼普尔邦和印度，尽管我们已经不在那里了。

尽管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向这个人的混乱逻辑让步（我们是不会再回到印度去的），但是这场争辩仍然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缅甸的边境官对他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试图跟他讲道理，看起来他们也希望我们跟他讲道理。他们必须以正常的方式跟这个家伙打交道。我们是他们接纳的第一批外国人，他们不想让我们感到外国人在这里的首次过境特别困难，同时他们也不希望让以后的人失去入境的机会。最后，某个人打了一个电话，把那位站长叫走了，我们才得以脱身而去。

13

去曼德勒之路

缅甸自 19 世纪后期以后是作为英国治下的印度的一部分被统治的，1937 年成为自治保护国，1942 年被日本占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行动的一个主要战区。缅甸于 1948 年获得独立，但是由于没有给予某些少数民族裔自治权，该国一直受到各种武装分离主义运动的侵扰，其中有些运动如今已经蔓延到境外。

缅甸现在名列世界十大穷国之一，而在 1962 年，该国曾经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就在那一年，奈温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政府，建立了一党制国家，开创了该党的“缅甸社会主义道路”。奈温将军凭借占星术和数字命理学，在仇外情绪、沙文主义和傲慢自大精神的驱动下，切断自己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开启了经济停滞时代。尽管缅甸在原材料和农业方面深具创造财富的潜力，还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经济停滞的现象直到今天仍然挥之不去。

1988 年，民众的压力迫使奈温辞职，该国也被置于直接军事管制之下。1989 年，该国国名又改回 Myanmar 的拼法。英国人开始把缅甸称为 Myanmar Burma，这是 150 年前缅甸最大的族裔的名称。反对该国军事统治者的外国人坚持把缅甸叫作 Burma（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殖民地名字），缅甸国内反殖民主义的人和那些将军们则坚持使用那个历史上使用过的名称。对于政治问题，未作调查研究之前我选择保持中立，但是对于这个国家的国名，我则站在历史和民众这一边，赞成用 Myanmar。1990

缅甸国内几乎所有人都使用“泰纳卡”保护皮肤。这种用树皮制成的浆液可作遮光剂和润肤霜，被称作“缅甸的蜜丝佛陀”。



去曼德勒的路上：这是虔诚的缅甸国内众多的睡佛之一。



年,缅甸 30 年来第一次举行了多党自由选举,但是当以昂山素季(她父亲是该国的缔造者之一)为首的反对党赢得决定性胜利时,选举结果被宣布无效。1991 年,昂山素季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当时她与其他当选政府领导人正一起遭到软禁,于是缅甸成了国际社会注意的中心,也成了美国制裁的对象。

1992 年,丹瑞将军掌管了军政府的领导权,政治压制的情况稍有改善。1996 年,缅甸召开了起草新宪法的大会。(昂山素季的父亲在把缅甸从英国人手中解放出来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原来的宪法就是在他的监督下起草的,其中规定,缅甸不可以让与外国人通婚的人当国家领导人。昂山素季是在牛津大学受的教育,在选举前一直住在英国,她竞选总理职位时保持着与一位英国人的婚姻关系,从而使她不具备当总理的资格,这些是缅甸军事统治者的说法。)

与此同时,缅甸开始从国际孤立状态中挣脱出来。1997 年,尽管面临美国的贸易制裁,缅甸仍然成为亚洲地区强大的贸易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正式成员。20 年以前,缅甸国内是没有游客的。15 年以前,游客可以在那里住一个星期。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环境就变得更为宽松了。旅游酒店开始在全国各地一幢一幢地出现了,政府还宣布 1997 年为旅游年。

当我开始在网站上登载来自缅甸的报道时,我收到许多人的电子邮件,对我去缅甸一事大表愤慨。他们坚持认为,我这样做是在支持那些掌权的邪恶将军们的统治。他们说,我应该同所有好人一样抵制这个国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好人都在抵制这个国家。许多国家在与缅甸接触,并在那里做生意:日本、中国、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新加坡等等。这些国家已经准备开发那里的各种自然资源——木材、天然气、黄金以及其他矿产,利用旅游业势不可挡的发展大赚其钱。

依本人的愚见,要想改变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与这个国家交往。采用孤立的方法很少能带来变化。你想结束卡斯特罗对古巴的统治? 教皇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对古巴的访问创造了奇迹:自那时以来,古巴人一直在公开庆祝圣诞节,而这是在过去 35 年来一直没有过的事。下一次把珍妮弗·洛佩兹送过去。卡斯特罗不会永远活下去,当美国国务

院坐等卡斯特罗离开这个尘世时，欧洲人、墨西哥人、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人则纷纷涌进古巴，把所有好东西都买光了。等到卡斯特罗走了，留给美国人的不会有什么值得做的交易了。如果法律允许的话，我肯定现在就把钱放到古巴去了。

在德里我探望了两位印度朋友，阿贾伊和阿多迪伊提·梅赫塔，他们曾在美国留过学。当时有一个美国妇女跟他们在一起，正在谈她即将去缅甸的旅行。当我告诉她下个月我也去缅甸时，她变得义愤填膺起来，宣称美国的制裁禁止我到那里去。

我问她：“为什么你可以去，而我就不能去呢？”

她回答说：“因为我在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

真是太棒了。

她说：“我到缅甸去了解那里的局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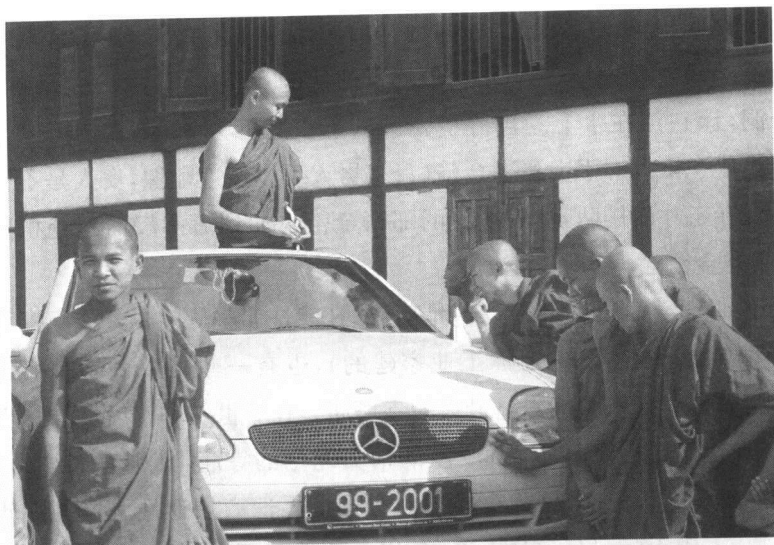
我答道：“我也是。我为什么要让你去缅甸了解那里的局势，然后替我作出判断呢？”

我有没有讲过我们相处得不好？

我们上路去曼德勒。去曼德勒的路根本称不上是路，而是曼尼普尔江和亲敦江。（当然，通商大河是伊洛瓦底江。）我们必须自己找路，在丛林中绕来绕去地走，许多路的状况真是一塌糊涂。缅甸是个原始的国家，因此我们看到，所有的房子都是用柚木盖的，哪怕再简陋也令人印象特别深刻。但是，不用说，柚木是缅甸的主要出口产品。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就觉得，要是看到用松木盖的房子，那才真的叫人吃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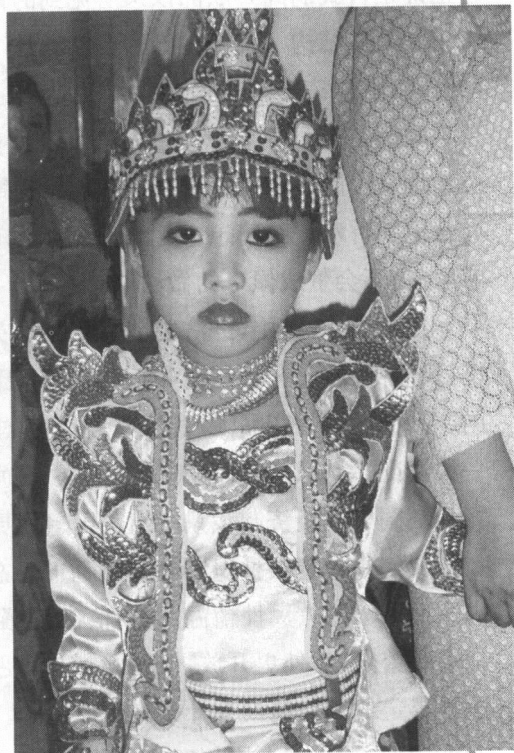
在缅甸，我们首先注意到的事情就是，缅甸人非常虔诚。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会看到佛教的寺庙。在曼德勒，每天早上4点钟，活佛神殿里的和尚就给活佛洗脸刷牙，把雕像收拾整洁，为即将来临的繁忙的一天作好准备，自从1784年以来，一直就是这样的惯例。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信徒们就会排队等候，轮到自己的时候就走到雕像前面，把金箔贴在雕像的表面。

金箔是从寺庙边干活的金匠那里买来的。金匠挥舞着笨重的大锤子，把运来的黄金从包装箱里取出来，一锤子一锤子地砸着，一口气干上



缅甸的男女老少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到寺院里去学习和修行一段时间。但是看来汽车总是能引起年轻人的好奇心,全世界都一样。

去参加打耳洞的仪式途中,这位6岁的女孩将参加一项通过礼仪(人类学用语,指为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如出生、命名、成年、结婚、患病、死亡,而举行的仪式——译者注),有点类似西方国家的洗礼。



几个小时，把金块砸成薄片。金匠们整天干活，只有在计时用的沙漏表明到点了，他们才能休息一下。所谓的沙漏就是一个掏空的椰子壳，底上钻一个洞，让它浮在水上。当椰子壳进满了水沉下去了，就表明可以休息了。我从一位金匠手上买了金箔（只有男人可以接近雕像，女人是不允许的），到寺庙外面排队，然后把我的那张金箔也加到活佛表面已经积累了200年的金箔上。

缅甸有巨大的寺院，有一些是新建的（就是那些从龟甲万或虎标万金油这类商标上发了财的亚洲工业家建的），也有一些是数百年以前建造的。缅甸西部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寺塔庙。在9世纪和10世纪时，巴甘（Bagan）市里曾经有多达4000座的精美绝伦的寺庙，其中有大约1000座保存了下来，巴甘市由此也成了联合国世界遗产的遗址。这些寺庙连成一片，一望无际，尽管是在900年以前建造的，其完美的建筑成就还是让人无法不赞叹万分，其形状之优美和历史意义之重大亦使人为之倾倒，这也许是自我们离开欧洲以来所见到的惟一一批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建筑物和人造结构。我们在巴甘市时，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朝圣，奉献食物鲜花，默念祷告。

我们在乡村里无意间见到了一家生产方头雪茄烟的工厂，那里的一位卷烟女工问我们是否可以从仰光给她寄点香水过去。佩奇给她寄了点尚蒂伊牌香水。我猜想，那个非政府组织里的女人出于经济制裁方面的考虑，是不会赞成佩奇的做法的。

在过去10年中，经济制裁成了美国爱用的工具。但是，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发现，经济制裁并不起作用，因为在被制裁的国家里不是与美国产品相竞争的产品大批涌入，就是美国的产品走私进来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受损失的都是美国的工人、公司和纳税人，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犯罪”国家。经济制裁只会给美国造就更多的敌人。

我们是带着某种遗憾离开缅甸的。总而言之，缅甸是最适合旅游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性情温和，笃信佛教，勤奋工作，循规蹈矩。我预计，缅甸会更繁荣，对外更开放；但是我认为，现在这个根据英国人划分出来的边界界定的缅甸是没有什么光明前途的。缅甸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很可能维持不了50年。掸邦（Shan State）的某些部分实际上早已自治了，由

那些因经营鸦片贸易而做大的军阀统治着。缅甸其他地区的暴力分离主义运动也不容易解决。也许，最终缅甸族裔人将组建自己的国家。但是，如果你想见识一个处于原始状态的完美国家，如果你早餐喜欢喝面汤、吃炸馒头（其他时候，你能吃到的就是用车前草制作的甜食、蔬菜炖鱼糊，当地人称之为“恩加皮”），我就推荐缅甸，这是个旅游的好去处，我建议要抢在世界各国的人去之前尽快去缅甸旅游。企业家的动作尤其要快，因为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已经蜂拥而入了。

缅甸和泰国在一个很长的半岛上相邻，由于国际局势紧张，我们无法开车沿着这个长岛旅行，也无法穿越边境。我们要去印度尼西亚，需要往南走，因此搭乘一条慢船去缅甸的顶端，中途在各个港口停靠。从那里我们迅速穿过了泰国南端，那里的伊斯兰分离主义运动势力越来越大，尽管泰国 95% 以上的人口信奉佛教。我们往南行，到了相对比较安全的马来西亚。

马来亚联邦位于现在的马来半岛，于 1957 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该国于 1963 年扩大，将新加坡和英国殖民地北婆罗洲（位于南海，东西大约长 400 英里）并入，并改名为马来西亚。1965 年，位于马来半岛南端以华人为主的城市——新加坡分离出来，宣布独立。马来亚族（穆斯林）在马来西亚人口中略占多数，华人（佛教徒）是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印度族人（印度教徒）占人口的 10%。

马来西亚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自 1981 年以来一直在达图·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总理的领导下。马哈蒂尔现在已年近八十，他把马来西亚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变成了亚洲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石油的发现并没有损害该国的进步。马哈蒂尔利用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亚人害怕被更为成功的华人和印度族人剥削的心理，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在商业和教育方面实施了对马来亚人有利的奖励和配额政策。他实施了把马来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政策，并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追求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的学位，而不必在数学、科学、经济或者其他有用的学科上多费心思。大多数这类毕业生几乎无法在私营部门推销自己，最终只能为政府工作。过去一些年来，马哈蒂尔独揽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内部的反对声浪也越来

越高,如果石油价格下跌,马哈蒂尔肯定需要更大的独裁权力。革命并不一定是政治镇压导致的,民众中激起的期望未能得到满足同样会导致革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1997年亚洲危机的一个激发因素是,好几个亚洲国家的货币是与美元挂钩的,马来西亚的林吉特是其中之一。其他国家在金融系统崩溃之后,认识到这个错误,转而使本国的货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让其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浮动。马哈蒂尔则大骂邪恶的国际金融家,掐断该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联系,使其成为不可兑换货币。他说,如果你在这里赚了钱,你就不能带出去。该国货币仍然与美元挂钩。真是糟糕透顶的经济学,但是他手上有枪,又如何奈何得了他!

政治家很少在失败之后说:“哦,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引咎辞职。”他们的做法往往与马哈蒂尔如出一辙。马哈蒂尔坚持认为,金融系统的崩溃不是他的问题,更不是他为了某些形象工程(而不是为了国家的繁荣富裕)而举借的巨大债务造成的,而是那帮外国投机家造成的。

坚持这种谬见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民众非常不满,反对声浪越来越高,马哈蒂尔不得不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镇压措施。当你告诉民众不允许把钱带出国时,他们的反应不会积极,尤其是那些发了财或者只是稍微有了成就的人。我在马来西亚有一些投资,因为马来西亚是个巨大的自然资源经济体,在自然资源方面我看到了将出现牛市的所有迹象。但是我并不感到高兴,因为我认识到,当马哈蒂尔退出政治舞台时,不管是因为他寿终正寝,被赶下台,还是辞职(他说他会辞职),这个国家都在劫难逃。历史表明,当一个在位已久的强悍独裁者离开时,不管是离开一个国家、一个公司还是一个家庭,接踵而来的往往是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政治示威、骚乱和移居国外的状况中已经可以看出些许端倪了。

我发现,马来西亚是个极其富有的国家,有高速公路、大酒店、餐馆和购物中心。至少有一些借来的钱没有被完全挥霍掉。世界上两栋最高的建筑在吉隆坡(Kuala Lumpur)。我们到马来西亚首都后,佩奇愣住了:她敢肯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这样的购物中心了,至少离开迪拜

后绝对没有见过。在卡迪亚专卖店,佩奇看到了她梦寐以求的结婚戒指,于是买来替换了我们在安特卫普(Antwerp)为混过结婚仪式而买的那枚戒指。马来西亚多年的繁荣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对我们这次旅行来说,我和佩奇尤其觉得,在马来西亚我们能享受到舒适和旅行的方便,尽管我们也看到了马哈蒂尔的疯狂劲头。马来西亚对我们来说是个休息站。

新加坡取得的经济成就比马来西亚更大。新加坡城位于战略要地马六甲海峡,这也许是世界上惟一一条最为重要的水道,亚洲几乎所有的贸易商品都要通过这个海峡。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城还只是一个蚊蝇密集的死水滩。现在,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经济多元化,涉足国际金融、银行、通讯、高科技产业和旅游业,这使新加坡的经济一直强劲不衰。新加坡已达到了非常高的生活水准,可能是过去40年间发达世界中最成功的范例。

新加坡的整个发展过程是在该国长期在位的首任总理李光耀的绝对统治下展开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关新加坡的恐怖故事,比如你必须剪某种特定的发型,你不可在走道上吐痰,严禁嚼口香糖和吸烟;犯了各种轻微的罪行,例如在墙上涂鸦,就会受到鞭打,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许多人认为李光耀采取了恐怖的高压统治手段,我们可以就此辩论一番。但是,不管你觉得李光耀多么恐怖,世界上比他更高压的独裁者多的是,并且他们拿不出任何东西来表明,其高压政策带来了成果。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就是这样一位独裁者。

在世界上,你再也找不到像新加坡这样既富有又安全的城市了。我和佩奇观看了一场由新加坡管弦乐队在公园里举办的音乐会。这个公园像新加坡国内所有的东西一样完美无缺。音乐会是免费的,孩子们在各处奔跑游玩,大人们在喝酒、野餐,听贝多芬的交响曲。公园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却看不到一名警察。你能设想在纽约中央公园出现同样的景象吗?

新加坡并不是因为有了有一个“邪恶的”政府才获得成功的,而是因为这个政府讲纪律,有智慧,遵循明智的经济规则。李光耀受过良好的教

育，现在退休了，但是在国家政治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当年在位时，他每天去上班时都真的会问自己：我怎么样做才能使新加坡变得更好？不仅局限于此，他还要问自己，如何使新加坡在 40 年后仍然能变得更好。李光耀曾修过经济学，知道要发展一个健全的经济体，必须要有高储蓄和高投资。他启动了强制性退休基金，从而使新加坡目前的储蓄率高达 40% 以上。

这不是笔误，确实是 40%。每一个公民都必须为未来而投资，把自己大笔的钱存起来。新加坡是世界上储蓄率和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与此相比较，在美国，20 世纪 90 年代的某个时期，我们的储蓄率实际上是负数。我们把积累起来的储蓄都花光了，靠刷信用卡过日子。）李光耀还明白，要想成功，就必须发挥新加坡的优势，而最明显的优势莫过于港口，很快新加坡就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当它周边的所有邻国都开始发现石油时，李光耀就开始发展炼油厂。他在教育上花费了大量的钱。新加坡有一支受过教育的劳动大军，是该区域也许也是全世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大军，因此在电子工业蓬勃发展时，该国才有可能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

新加坡的人口不到 400 万，但其外汇储备在全世界占第三位仅低于日本和中国，而日本和中国的人口分别是 1.25 亿和 12 亿。新加坡人的银行里有许多外国人的钱，按人均计算，他们拥有的外国人的钱比任何人都多。

不利因素呢？当然，言论自由在新加坡并不是惟一一件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事物。也正是该国的成功导致商业成本上升，现在的生产和劳动成本都非常高，生活费用更是高得吓人。由于采取各种规定，实施保护主义，金融业也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

新加坡深谙生财之道，一开始就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赚了很多钱；此外，新加坡是个华人国家，它向金融公司，尤其在香港的金融公司提供优惠。香港曾经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当香港回归中国时，新加坡就成了许多公司开展业务的首选之地。李光耀高瞻远瞩。当爱尔兰人在确保每一个人都会讲盖尔语，冰岛要求自己的学龄儿童学习丹麦语时，李光耀则坚持要每一个人讲汉语或者英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惰性产生了。新加

坡很富有，金融业受到保护，缺乏竞争导致了自我满足。

我在新加坡最大的银行有一个账户，我在那里时想做几笔金融交易。我存进一张支票，几天之后开始做交易，但是却被告知，支票需要五个星期才能兑现。支票是从美林证券公司兑现的，该公司在街角上就有一个支行。

我问银行里的人：“你真的能相信，到了2001年，新加坡最大的银行居然需要五个星期才能兑现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开出的支票？”

银行里的人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办理的。”

我告诉他：“我在全世界做生意，我知道兑现一张支票需要多少时间，哪怕是一张国际支票。如果真的都像你们这样办事，世界商业和金融活动都得停止了。”

他回答说：“我帮不了你的忙。我已经找过我的上司，我上司的上司，他们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办理的。”

我等了一个星期，再次去银行。

“我打电话给美林证券公司，”我说，“他们兑现了那张支票。资金没有问题。他们已经把钱交给你们的代理人了。”

仍然毫无动静。

现在，新加坡已经设立了一个权力极大的金融事务委员会，负责就开放金融业提出建议。但是，正如《金融时报》引述一位国外官员所说的：“我认为，新加坡早已错过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机会。他们本来应该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实现自由化的。”

不难想象，新加坡可以成为数字时代的威尼斯(Venice)或者佛罗伦萨(Florence)。那里的人聪明、富有、冲劲十足。问题在于，你可以强制执行纪律，却无法强制产生创造性。新加坡的领导人现在认识到，那帮把头发染成粉红色、批评政府、在大街上吐痰的家伙正是一批新生的信息技术专家，因此他们放宽松了一些。李光耀很聪明，他认识到强调全民步调一致也会产生不利的因素，因此正在试图找出一个办法，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孕育下一代发明家的温床。

新加坡每一个内阁部长都有相当于六十多万美元的年薪。李光耀就

是用这样的方法吸引人才，抵制腐败。津巴布韦公务员的年薪大约是1.8万美元，因此每一个内阁部长和官僚都可能会贪赃枉法。李光耀说，他在全世界都看到了这种现象，不管是华盛顿还是莫斯科都无法避免；他希望自己的部下在作决策时是以事情本身的优劣、以对国家最有利为根据，而不是以别的什么为根据。他不希望这些部下离开政府，然后去经营某家公司。

新加坡——世界上最大、最壮观的港口，也是地球上最有效率的集装箱作业中心。印度尼西亚——人口超过2亿，列世界第四位，位于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通道马六甲海峡另一侧，距离新加坡60英里。但是这两地之间竟然没有交通——没有汽车轮渡，海峡两岸之间没有定期、简便的直接航运。我能找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一艘集装箱船运送汽车，8天后抵达雅加达(Jakarta)。

我不想为了把汽车运出新加坡而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于是寻找其他变通办法，找到了正要返回苏门答腊(Sumatra)的一艘驳船和拖船。船上当地的印度尼西亚人几乎是空手旅行，驳船上除了我们的汽车没有别的车，而我们的汽车也是船上惟一的货物。驳船上只有我一个人，新加坡的官员只允许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可以伴同汽车一起走。佩奇和其他人乘坐高速客轮，这是新加坡和杜迈(Dumai)之间惟一一艘定期渡船。拖船上有几个水手，但在整个旅途中我都是一个人在驳船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支船队不起眼对我倒是有利的。我们所处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动脉，为数众多的海盗都明白这一点。他们是有组织的，无处不在。有时他们把货物卸下装到自己的船上，但是还有一些时候他们做得更过分：杀害船员，卖掉货物，然后再把重新油漆过的船只卖给拆船商。我听说过所有这类故事，因此在船上的两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

在印度尼西亚，行贿是直截了当的，在那里腐败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我到达杜迈时跟我打交道的年轻警官聪明能干，英文讲得很好，受过良好教育。他说了一个价钱，很快我们就达成了交易。他在我的证件上盖了章，让我和汽车入了境，我接上佩奇和其他人，然后一起穿越苏门答腊。

我们在米南卡包(Minankabau)稍事停留,那里的居民住在巨大的房子里,屋顶的形状像水牛角。他们称自己是亚历山大大帝军队的后裔。这是一个有 300 万人口的族裔,对印度尼西亚的文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还是一个母系社会。母亲拥有财产,并且只在母女之间继承财产,新郎搬来与妻子的家庭同住。

印度尼西亚曾经是荷兰的殖民地,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总人口的 87%是穆斯林),从地理上讲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印尼有 1.4 万多个岛屿,从马来半岛延绵到新几内亚,大约 6 000 个岛屿有人居住,其中大多数岛屿希望独立。自从殖民地时期以来,国内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就一直是印尼人生活的特色,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印尼分裂成十来个合理的实体。我们到达时,印尼到处都在发生大规模暴动,我们在那里的大多数时间都被用来计划如何使自己尽可能安全地穿越苏门答腊岛和爪哇(Java)岛。到 2002 年,暴力活动甚至还蔓延到了巴厘(Bali)岛。2%的印尼人是印度裔人,其中大多数居住在巴厘岛。巴厘岛是个非常高级的度假胜地,我们也去那里游览了一番。但是正因为巴厘岛是度假胜地,我们住的旅馆里住满了公费旅游的 IBM 推销员,巴厘岛不适合我们,不符合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了迅速结束我们在岛上的旅行,我们转而去印尼群岛中我惟一不能不去的岛屿:新解放的东帝汶(East Timor)岛。

印尼于 1975 年入侵了前葡萄牙殖民地、大多数居民信奉基督教的东帝汶。曾经属于荷兰的西帝汶早已纳入了印尼的版图。1976 年东帝汶并入印尼,但是未得到国际承认,在随后这些年,为争取解放,超过十万东帝汶人惨遭杀害。1999 年,东帝汶投票要求独立,印尼民兵开了进来,杀戮更为惨烈。联合国,主要是澳大利亚军队,进行了干预,我们到达时,当地有为数众多的联合国人员。

我们在那里时,东帝汶就如一个炸弹坑。所有的建筑物都遭到焚毁,岛上几乎没有电力,街上走的都是联合国的车辆。我对东帝汶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太注意,主要是看新闻媒体的报道,直到到了东帝汶之后,我才了解到战争背后的真实故事。这场战争并不是民主对独裁的战争,也不是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更不是自决权对抗侵略的战争。想到过石

油储藏没有？印尼和东帝汶之间的战争涉及的是近海发现的储量巨大的天然气。

新近独立的东帝汶资源丰富，人口稀少（大约八十万人），马上就将成为第二个科威特。这也是为什么澳大利亚那么愿意派遣军队的原因，该国现在已经有了一份开发和加工东帝汶天然气的合同。联合国在东帝汶大把大把地花钱，帮助东帝汶完成独立的进程，并坚持要以民主的方式完成这个进程，但是东帝汶真正的钱在地底下。

1991年我骑摩托车旅行时到过澳大利亚沿海许多城市，只是没有到过南部，我在《投资骑士》一书中叙述了在那里的经历。这一次，我和佩奇将走一条不同的路线，往内地去，从珀斯（Perth）往北到达尔文（Darwin），再从达尔文往南，开车穿过澳大利亚中部到艾丽斯普林斯（Alice Springs），然后走新路，继续往南到阿德莱德（Adelaide），沿海岸往东到墨尔本（Melbourne），然后再沿内陆公路去悉尼（Sydney）。

澳大利亚的面积相当于美国南部48个州面积的总和（而人口还没有超过美国第三大州纽约），1991年我在那里旅行了6个星期。我和佩奇将用5个星期的时间完成在澳大利亚的旅行。

在珀斯，我们很快就领教了澳大利亚非常浓厚的乡村气息。所有商店下午5点就打烊了，星期日也不开门。（在整个西澳大利亚州，也许只有一家超级市场星期日也开门营业。）对这种做法的解释是，支持家庭价值观，因为澳大利亚家庭成员在一起聚集的时间太有限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保护主义的做法。例如，任何新来的企业家，或者是大型的连锁商店，比如沃尔玛，为了竞争，可能会想出点子，实施延长销售时间的策略，在晚上和周末都开门营业。但是当地的店主就会抵制这种竞争，如果有这样的抵制机会的话，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遇上了一次在五一劳动节反全球化、反世界贸易组织、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游行示威。示威者根本不知道，这几个机构毫无相似之处。我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自己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看法。我赞同抗议者的要求，解散这两个机构，不过我觉得，我所持的理由跟他们的非常不同。但是，解散世界贸易组织就会导致大萧条，引



在亚洲的轮船上，乘客拥挤得水泄不通。



发战争。

我最想去的澳大利亚城市是达尔文，一个一流的边陲城市。以前我选择这个城市作为投资的理想城市，我很想去看一看我的预测是否成了现实。我上一次从珀斯去达尔文，是沿着海岸线走的；这一次，我和佩奇将开车从内地过去。

澳大利亚内地具有传奇色彩，我们经过一望无际巨大的牛羊畜牧场，几乎看不到人烟，还有荒凉的矿区，除此之外就是袋鼠，其他就见不到什么了。在内地开车，要特别当心袋鼠，尤其在傍晚和黎明时分。袋鼠跑得飞快，你还没有看到它们，它们就已经撞到你的车上了。袋鼠以为自己比眼前的汽车要跑得快。我们在旅途中看见许多被撞死的袋鼠（我在一家澳大利亚餐馆里吃的袋鼠肉就取自一只被撞死的袋鼠），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卡车撞死的，因为卡车即使想停也不容易停下来——有时被人称为公路火车的卡车长达 150 英尺。一列公路火车就是一个卡车机头拖着三辆牵引式挂车，像火车一样在延绵不断的沥青公路上飞驰，车速非常快，因为没有理由不开快车。

澳大利亚内地适合于那些孤僻的人、标新立异的人和漂泊者，内地的小镇犹如用带刺铁丝网关闭边境之前的美国西部的那些牧牛小镇和采矿小镇，镇上住着两三百号人。我们在那里停车过夜，走进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旅店、餐馆、酒吧三位一体的去处，不由让人想起旧时道奇城（Dodge City）内的类似旅店。我推开门，一眼就看见酒吧里的年轻女招待似乎只穿着内衣。当我看清楚她半身赤裸时，我张口结舌，非常尴尬。由于第一家旅店客满，我们又走到第二家旅店，发现这里遵循着类似的着装规则，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明白我们见到的那些广告词的意思了：5 点至 7 点穿着清凉，周末穿着清凉，整个星期穿着清凉。

这些场所的店主支付女青年很高的工资，让她们半身赤裸地作餐馆和酒吧的女招待，以吸引矿工和农场工人来吃饭喝酒。许多妇女是从珀斯和墨尔本这样的地方乘飞机过来的，成了打半工的通勤客。在澳大利亚内地这种杂乱无章的地方看到这种现象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们从一个叫特里什的女人那里了解了这些情况。特里什是个探矿者，她鄙视这种行为，我们在克尤（Cue）一个有 250 个居民的内地社区里

碰见了她。特里什个子不高，尽管只有三十来岁，却有一副饱经风霜的模样。她在这个地区已经工作了几个月，总算找到了一些黄金。我们很乐意地花了 150 澳元从她那里买了一块天然金块，做成了一个挂件。特里什还跟我们说，住在内地小镇里的很多人跟她一样，告别了他们以前的生活，从一个小镇搬到另一个小镇，从一个采矿作业点或者牧牛场搬到另一个采矿作业点或者牧牛场，就像美国牛仔传说中的人物。

我们在路边旅馆里见过这些人，在我的上一本书里我也提到过他们。澳大利亚的路边旅馆作为一个整体不失为受人欢迎的去处，一家路边旅馆与另一家路边旅馆相隔 100 英里甚或更远。“下一个加油站……下一个服务站……200 英里”，这是一个典型的路边旅馆外招牌上可能写的字；招牌上实在还可以加上：下一个供电所……下一个信箱……下一条狗。

不出我之所料，达尔文市发展了。自从我上次到过这里以来，达尔文这个种族和宗教的神奇大熔炉又有了发展，更加繁荣了。除了我以前指出的原因之外，即达尔文靠近北面新兴的亚洲市场，其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相对关系类似于中国/西伯利亚之间的关系，促使这个城市发展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军队进来了，建起了军事基地。对澳大利亚的任何真正的威胁最可能来自北面，但是集结军事力量的一个更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资助该国在东帝汶的部队。显然很快要建加工厂了，因为达尔文所处的地理位置最适合接收那个新国家的天然气。几十年来，一直梦想的建一条连接达尔文和南部的铁路，现在已经成为现实，而这条铁路将支撑并促进这个城市的发展。

这一次我决定不能光说不练了，我要在达尔文买地产，买一栋老房子，修理一下，每年来住个一两次，我不在时也可以把房子租出去。我走进该市一个较大的地产经纪人事务所，告诉他我的意图。

他说：“你买不了。”

“你说什么？”

“你买不了。你不是澳大利亚人。外国人在澳大利亚不能买房子。”

“等一等，”我说，“这里是资本主义国家。这里是自由的国土。你的

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你听我说，我比任何人都痛恨这个规定。”

他解释说，这是个新的法律；他的话使我想起了单一民族党——一个由议会议员保林·汉森为首的右翼政党。近来一些新的反移民运动在该国形成了气候。这是一个摇摆了一个世纪的钟摆的自然摆动。澳大利亚一直到 1973 年还在奉行只接纳白人的移民政策。尽管听起来有种族主义的味道，但这个政策却来源于反种族主义的情绪。开始实施白种澳大利亚政策时，澳大利亚境内的许多非白种人并不是典型的移民，他们是从偏僻的岛屿上作为契约仆人带进来的，到矿山和农场去工作，地位跟奴隶差不多。在各种基督教教会，尤其在虔诚的长老会里，发起了一项运动，要结束这种做法，最终在劳工的热情支持下在该国最艰难的大萧条时期通过了有关法律。但是，就像历史上许多其他法律那样，出发点很好的法律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法律最初的用意是要断绝绑匪和奴隶主的生路，但是法律规定把非白种人带进国内属于非法行为，从而使这项法律本身又成了种族主义法律，成为用来摒弃外国人，尤其是摒弃非白种人的反移民机制。

所有人都忘了形成这项法律的原因。在这项法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得到纠正之前，如果你不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白人，你就很难进入澳大利亚。那时这项法律已经不再起作用了。澳大利亚需要扩大与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国家的联系，它需要吸引资本。事实上，澳大利亚矿产资源能得到开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日本人投资，还因为与日本签订了长期的出口合同。只有在纠正了歧视性法律和保护主义法律之后，工业才有了长足发展。

到 20 世纪末，出现了对法律纠正的反对，这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澳大利亚国内的基督教徒买不起房子了，因为“有钱的华人和日本人把价格抬上去了”。澳大利亚出现了经济问题，不是该国平庸的政治领袖的错，也不是高消费和高税率的错；所有问题都是邪恶的外来者造成的。于是，像我这样的家伙就不能买房子。最终孤立主义大获全胜。

走之前，我们去欣赏了达尔文交响乐团的一场演出，晚上的节目包括了在北部地区首演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看到这个建团只有 12 年的交

响乐团几乎全部由志愿人员组成，我泪流满面。客座指挥和四个专业声乐家都是从其他城市乘飞机赶过来的。达尔文市比我上次来时有了长足的发展，快要成为一个十足的世界性城市了。我不禁想起了丹佛(Denver)和其他边陲城市，想想这些城市 100 年以前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第二天，我们参加了 V8 超级汽车赛，这让我们想起美国汽车比赛协会在国内组织的汽车比赛，从啤酒、比基尼泳装到乡村音乐，样样都是我们熟悉的。

也是在达尔文，我们找到了一个人，他制作的钢板弹簧让我们使用到了旅行结束，而原先的钢板弹簧总共已经断了 11 次了。我们找到他时，拖车上的轴承也断了。他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在澳大利亚，特别是在内地，那里的机修工比加利福尼亚的五金工要有经验得多了，随身携带的越野修理设备也齐全得多。

我们穿过艾丽斯斯普林斯往南走，这时佩奇的父母亲再次加入我们。我们一起绕道专程去看了艾尔斯巨石，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独块巨石，当地的土著居民把它奉为神明，现在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国家象征。我们向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阿德莱德行进，这个州我从来没有去过。中途我们在一个叫库伯佩迪(Cooper Pedy)的地方停了下来。

在 100 年以前，南澳大利亚州的库伯佩迪是不存在的。第一批欧洲人穿越这片浩瀚平坦而又寸草不生的沙漠，目的是到这里来寻找黄金和其他能找到的矿物，最终他们发现了猫眼石。如今，人口只有大约 3 500 人的库伯佩迪成了世界猫眼石的首都，全世界多达 95% 的猫眼石产于此地。我惊奇地发现，猫眼石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除了我们熟悉的乳白色之外，还有蓝色、绿色和各种褐土色。这个镇的名字是土著语不标准的翻译，大意是“洞里的白人”。为开采猫眼石，必须笔直地往下挖井，把泥土挖出来，在泥土里寻找宝石。在库伯佩迪，到处可以看到圆井，直径相当于一只 55 加伦的圆桶；如今是用安装在特种卡车上的设备来挖掘的，圆井边上堆着挖出来的小土堆。

夏天，库伯佩迪的气温可高达华氏 110 度以上，早期的采矿人花在寻找水源上的精力绝不亚于寻找矿物。就像澳大利亚其他地区一样，这里

的许多水源都含盐，必须净化后才能用。采用现代技术意味着现在能让数以百计的人有足够的水，他们采用的是逆向渗透脱盐技术提取纯水的方法。为保持阴凉，移民们开始把自己的家建造在地底下，他们在当地的砂岩里挖掘，在岩石里凿出一个一个的房间来。不仅房子是这样建造的，我们住的旅馆也是用类似的方法建造的，我们的旅馆房间就是从岩石里凿出来的。

我连续三天每天给我父亲写一封信，在库伯佩迪写了一封，在阿德莱德写了两封。从打往家里的电话中我得知，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我一直每天都打电话给他，但是我还想把我的真实感受写下来，让父亲知道，我深深地为他感到骄傲，我对他满怀挚爱之情；我要让他知道，他在我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南澳大利亚州，我正遇上他们过三天的节日，而在美国也是三天的长周末。我就一直写信，希望至少有一封信能及时送到父亲手里。我知道父亲已处于弥留之际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邮局把我的信送到了。我母亲告诉我说，他们收到了我的信，三封让我焦虑得整个星期都坐立不安的信。我想，父亲是没有办法亲自阅读这些信了，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的话也不多。我母亲说，他用手拿着信，盯着看。是母亲读给他听的。

在从阿德莱德去悉尼的路上，我跟一些人吃了几次晚饭，席间的谈话让我大开眼界。在墨尔本，我和佩奇跟一位澳大利亚的议员——一位摩托车骑士和他的妻子一起吃饭。他看过我的书，并跟在达尔文的人讨论过；他说，他和那些人都感到惊讶，我的预言居然会那么准确。

“不错，我想在达尔文买栋房子，但是我无法买。”

“为什么？”

他是议会议员，我原来以为他知道的。我告诉他为什么不能买。

“你肯定搞错了。”

他开始跟我争辩，没有敌视我的意思，但是态度很坚决，坚持认为是我搞错了。

我说：“好吧，我很高兴听见你这么。我在那里无法通过地产商买房子，我很高兴能听见你说，地产商的话不对。”

第二天，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

议员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他说，这是反对党搞出来的，执政党和澳大利亚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法律。

当时我想，好吧，就把这个法律的来龙去脉跟我说一说吧。居然连议会里那些通过法律的人民代表都不知道这个法律。

在另一天晚上的晚餐上，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反移民的情绪以最充满激情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而说话的那个人是最初你觉得似乎根本不可能讲这种话的人。我和佩奇跟一对受过很好教育的夫妇吃晚饭，他们就澳大利亚禁止接纳一切外来者提出了一系列带欺骗性的“科学”理由。让这对夫妇的话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男子和他的妻子本身就是移民。

“等一等，”我说，“你们不是从新西兰移民到这里的吗？”

“那是以前，”他说，“现在不一样了。”

哦，是这么一回事。

他声称，澳大利亚因为受气候、供水条件、绿色植被和其他自然因素的限制，只能养活 1 100 万到 1 300 万人。

我说，这真是一个可笑的论据。库伯佩迪是沙漠。100 年以前没有任何人住在这里。现在，这里的水足够供应大约 3 500 人使用，而且人口还在不断增加；我指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猫眼石就是靠这些人开采出来的。

他回答说：“嗯，这是个例外。”

他妻子说：“我们不能让人进来。实际上，我们应该让人口降下来。我们有 1 700 万人，太多了。”

前一年，澳大利亚货币一下子贬值了大约 40%。澳大利亚的经济是以农业、矿业、石油等为基础的原料经济，澳大利亚人并不是坐在那里制造很多汽车或者电视机，但是他们却开采了很多锌。不巧的是，过去 20 年，初级产品一直处于熊市。此外，澳大利亚一直在筹借大量的钱，用于刺激经济、购买选票、支付 2000 年夏季奥运会的费用。债务上升到了天文数字。而我觉得，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这个国家反而需要更多的

人,需要国外的投资者、专门技术和资本。要是我的话,早就敞开大门了。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只要碰到困难时期,人们就开始找某些人来背黑锅。澳大利亚的政客为了拉住选民,挑动起反移民的情绪,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仅使局势雪上加霜,而且他们还确保今后局势会继续恶化下去。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政客给了那些同我们一起吃晚饭的夫妇一样愚蠢的蠢货信口雌黄的机会。他们提出的那些论调我经常从某些祖上也是移民的美国人口中听到过:“我们进来了!赶紧封锁边境!”这真是把奸诈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总是声称:“从前是不一样的,那时的移民不同。”

从某一方面来说,我看好澳大利亚的前景,这就是原料。初级产品的牛市早已开始了,我买了那里的自然资源股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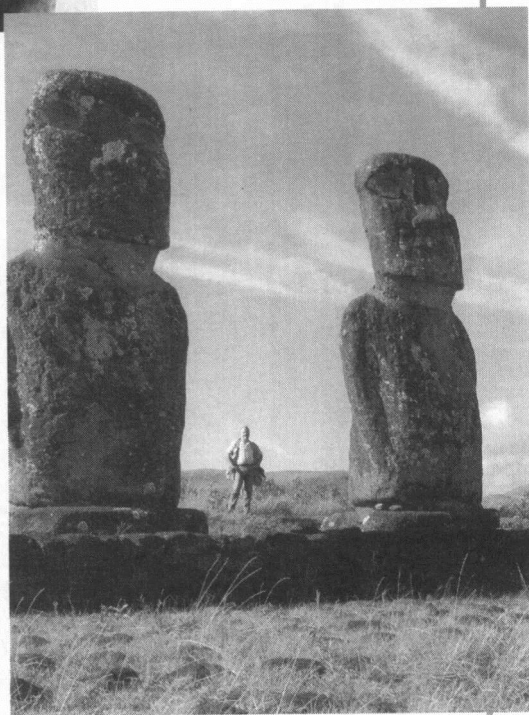
上一次旅行时,我对新西兰非常乐观。这个国家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实际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1984 年选举后组成新一届工党政府,扭转了局面。几乎一夜之间,新西兰就从受保护的农业经济变成了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1994 年,该国宣布 18 年来第一次实现了预算盈余。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都在那里投了资。货币升值了,股票市场牛气冲天。但是正如在民选国家经常发生的那样,某些选民觉得这种局面很难对付。于是从废墟里冒出了新西兰第一党——一个广受欢迎、排外的政党,在 1996 年选举后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快,货币贬值了将近 70%,政府大举借债。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大规模移居新西兰的趋势停止了。如今,反而出现了从新西兰移民他国的人数超过入境移民人数的现象。

该国非白人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白人人口的增长速度,政府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照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50 年前几乎全是白人的新西兰(土著毛利人占人口的比例不到 10%),最终将变成一个褐色国家。除了这些变化外,还有向该国土著非白人倾斜的平权政策和补助——新西兰的毛利人享受着同澳大利亚土著人一样的特殊福利,种族问题成了一张谁都可以打的政治牌。



新技术给澳大利亚的库伯佩迪带来了足够的淡水,使这个沙漠城镇能继续发展,但是下班后可干的事情仍然不多。

伊斯特岛曾经富有繁荣,但是后来那里的人们把财富和精力用在了非生产性的活动上。这些非凡的雕像耗尽了岛上文明社会的资源。



佩奇对新西兰一见钟情，她喜欢那里的火山、那里的山脉、那里的海滩、那里的野生动物和海狮。一天下午，她修剪了一头羊的羊毛，然后决定，我们搬到新西兰来住，开一个牧羊场和葡萄园。她有一整套田园诗般的设想，不像我，我是垂头丧气地离开的。在我眼里，新西兰是又一个闭关锁国、大举借债的国家。我在新西兰的原材料领域还留了一些钱，但是把我在那里的许多投资都卖掉了。

14

在拉巴斯客 串侦探

2001年6月10日，星期日，这是我和佩奇所在的新西兰的时间，美国时间则是6月9日，我接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早上5点钟，电话铃响了，我们两人都知道，坏消息来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前，父亲陷入了昏迷状态。如果当时我赶回家，我见到的就是一个处于昏迷状态的父亲，我实在不敢肯定，我不回去对我来说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我最后一次看见父亲是在我的婚礼上，他当我的男傣相。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满脑子都是有关父亲的往事回忆。每转一个弯，我都会想起他教会我做的事情，他说的话，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的事情。不管我做什么事情，似乎都得用上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技能，比如换汽车轮胎这样的技工活，或者是打破一个简单的人际交流上的僵局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人生经验。使用绝缘带或汽车上的应急电缆，查看地图，甚至驾驶汽车，所有这一切都是父亲带我入门的。想到这些，我就常常会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们把汽车放到一艘去南美洲的集装箱船上，人去法属波利尼西亚消磨时间，等待汽车到达智利。我们游玩了塔希提(Tahiti)岛和博拉博拉(Bora-Bora)岛。这两个岛并不像《南太平洋的故事》所描述的那样浪漫，甚至也不像旅游指南里所说的那样值得游玩。这两个岛完全是为吸引游客而设计的，岛上有风景优美的海滩和豪华舒适的度假区，但是毫无特色，不吸引人，也无法让人感到激动，甚至也无法激发人对之发生兴趣。

惟一让人吃惊的就是价格。塔希提岛的消费同巴黎不相上下，在岛上打的比纽约还贵。尽管我们期望很高，但是那里并不是买珍珠的最佳去处。物美价廉的珍珠要到澳大利亚西北部的布鲁姆(Broome)去买，不过谢天谢地，我们早已失去机会了。总之，岛上的旅行让人失望，但是那里的舞蹈倒是值得一看。我们再次被有些人抖动自己身体的技巧迷住了。这次他们扭动的部位主要是胯部，而不是像其他种族的人扭动的是腹部、臀部、肩膀和头部，这些表演曾经也让我非常着迷。我们在岛上呆了六七天，因为我们实在别无选择。横跨太平洋需要两个星期，汽车要到7月2日才能运到智利。

当我们到达圣地亚哥时，智利前独裁者、现在的智利终身参议员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命运正处在要决未决之际。皮诺切特刚刚从英国遣返回国，之前，英国应西班牙的请求软禁了皮诺切特。有关释放皮诺切特的协议规定，智利要控告皮诺切特犯了危害人类罪；毫无疑问，皮诺切特是有罪的。智利政府陷入了困境，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两派人都情绪激动。85岁高龄的皮诺切特仍然是智利幕后的实权人物，事实上，有些人把他当作国家的救星。几十年来，智利一直是南美洲经济管理得最好的国家。而站在对立面的那些智利人则认为，皮诺切特必须对他17年独裁统治时期数千人遭到残酷谋杀一事负责。

我们在智利的时候，两派人都上街示威游行，让人感到，不管政府往哪个方向转，内战都有可能爆发。我们到后不久决定就出来了，我认为，最高法院运用了所罗门的智慧。法院决定，皮诺切特病得太重，无法接受审判；法院申明，如果皮诺切特有身体恢复健康的迹象，就会审判他。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把皮诺切特软禁起来了。如果他试图重新回到他在参议院的位置，或者显示任何施展影响的迹象，他就会受到审判，结果几乎肯定是被判监禁。只要他躺在自家床上，他就是一个自由人。这个决定彻底剥夺了皮诺切特的活动能力，同时又抚慰了支持和反对皮诺切特的两派人。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皮诺切特和他那个血腥镇压异己的政府驾驶着一艘经济态势良好的大船。在他的统治下，智利人付出了巨大的代

价学到了其邻国没有学到的东西，对此，他们心知肚明。今天，看看阿根廷人，看看巴西人，他们的国民经济都崩溃了。

智利是一个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体，为给这样的经济体提供服务，智利建起了壮观的基础设施。现在你可以在智利中部一条四车道的收费公路上开车飞驰，而这条公路实际上是一条狭长的山脉。这条公路，加上其他一些设施，把南部的贸易和旅游大门打开了。以前我没有去过南部，现在在这条路上开车行驶，让我想起了中国。基础设施把挪威人带进了智利，现在智利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鲑鱼出口国。这个老道理屡试不爽：你修建一条公路，一条铁路，或者挖一条运河，之后就一定会出现奇迹。

圣地亚哥的薄雾历来有名，加上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脉，两者相得益彰，给初升的太阳增添了无穷的魅力，这里有我们旅途中看到的最美丽的日出。离开圣地亚哥后，我们向位于大陆南端的火地岛（Tierra de Fuego）行进，佩奇开车带我们穿过了白雪茫茫的安第斯山脉。

我们进入阿根廷境内，去位于巴利罗切（Bariloche）的圣卡洛斯（San Carlos）的滑雪胜地，在那里住了几天，佩奇在那里玩了幾次快速下滑，她已经好多年没有玩快速下滑了；然后，我们出发去世界最南面的城市——火地岛上的乌斯怀亚（Ushuaia）市。在隆冬时分穿越阿根廷有点困难，而这种困难是不应该发生的。我问自己，在阿根廷这条贯穿东西、穿越中部的主要动脉上为什么不清除积雪？这是显示阿根廷已经陷入严重困境的第一个证据，很快我又注意到了其他迹象。

火地岛是一个群岛，其中最大的岛屿就叫火地岛，由智利和阿根廷分别占有。我们必须穿过麦哲伦海峡才能到达火地岛，这将是我第二次穿越这个海峡，但是仍然让我激动不已。我——一个来自阿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的小人物——即将穿越麦哲伦海峡，一个以葡萄牙航海家的名字命名的海峡，而早在1520年，麦哲伦就带领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环球航行的西班牙探险队穿越了这个海峡。

当我们走近环绕乌斯怀亚的安第斯山麓丘陵时，覆盖着白雪、终年受大风侵袭的火地岛平坦的平原就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乌斯怀亚离合恩角（Cape Horn）不远，阿根廷政府使它成为避税的天堂；政府提供各种

各样的优惠,鼓励自己的公民搬到火地岛来居住。火地岛处于南极圈的北边,这种优惠条件无疑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行之有效,实际上在这方面全世界都一样。

我们往北去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在里奥加列戈斯(Río Gallegos)绕道往西北方向开,去看在阿根廷湖边上的莫雷诺冰川。我上次旅行时去看过一次,真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自然奇迹。我确实想去看一看,这个冰川是否还像我记忆中那样奇特。佩奇不愿意我们在隆冬季节多开 600 多英里,到安第斯山看莫雷诺冰川;但当她看到——并且听到——冰川时,她呆住了。莫雷诺冰川有 150 多英里长,是世界上仅存的少数几个仍在活动的冰川之一,它的活力既看得见也听得见:它在山脉之间缓慢地移动,伴随着吱吱嘎嘎的挤压声和断裂声。巨大的冰块从高达 160 英尺的冰川表面掉下来,轰隆隆砸进湖里。正是隆冬时分,除了我们见不到其他人,眼前的景象真是奇特,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造物都更令人难以忘怀。开始我好不容易说服佩奇到这里来,现在我得花时间说服她离开这儿了。我们决定,以后一定再到这儿来。

我们说服了我的母亲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加入我们。我父亲去世已经有六七个星期了,他们结婚 60 年,我不知道母亲如何面对父亲去世这一现实。说服母亲乘飞机去任何地方都不会太难,因此我对她说,飞到阿根廷来跟我们会合吧,因为我记得,阿根廷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美丽国家,尤其是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母亲已经 82 岁高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不能单独旅行,因此,由她的孙女,也就是我的侄女凯蒂·比陪着她。母亲跟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呆了一个星期,我们一起乘飞机看伊瓜苏瀑布。这次旅行对改善她的精神状态起了神奇的作用。

在我上次旅行期间,当我离开阿根廷时,我觉得阿根廷简直是牛气冲天。我非常看好这个国家,甚至曾想过要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住,因为这是我在全世界最喜欢的一个城市。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我看到阿根廷大举借债时,我就卖掉了我在阿根廷的股票,但是我把钱留在那里,而且留的是比索。比索是自由兑换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一个比索换一个美元的固定汇率,该国政府一直表示,他们将维持这种做法。比索账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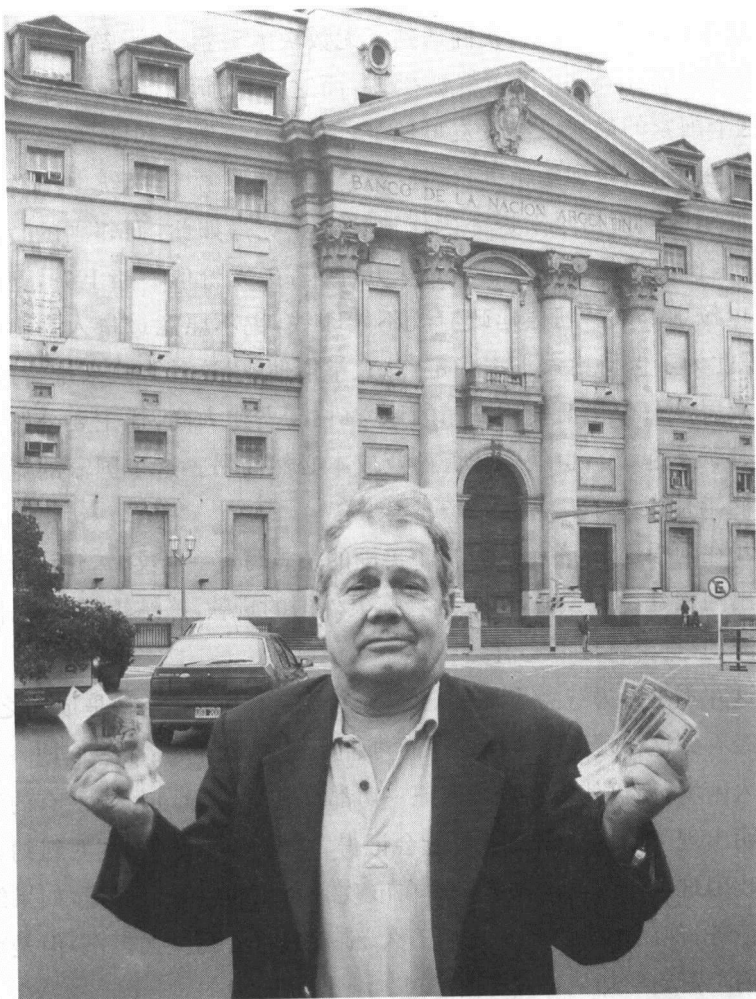
的利息高，因此多年来，我一直保留着比索账户，而不用美元账户，等着哪一天有机会再投资。

这次在阿根廷开车，我们遇到了无数次的警察路检，简直让人烦透了，有时每隔几英里，我们就被拦住，而这是以前没有的，于是我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的东西都贵得出奇，旅馆和餐馆的价格已经暴升到天文数字了，尤其当你把同样一件东西的价格跟附近邻国作比较时更觉得如此，而邻国的货币是浮动的，价值由市场来决定。过去几年来，美元价值一路上升，把比索价值也拉了上来。阿根廷政府既不能印钱，也不愿意过量人为出的日子，因此为了保持比索汇率稳定，就大举借债，以这种方式来维持经济，买通选民。一个生活费用高昂的地方（由于费用太高，连主要公路上的积雪都铲不起了），也就意味着商业成本必然高昂。这个国家的竞争力不可能维持太久了。

我在阿根廷时，曾给一家拉丁美洲的杂志写过一篇文章，建议读者把钱带出阿根廷。我预言，阿根廷会拖欠外国的贷款，冻结银行账户，阻止资金流动，直至将货币贬值。

这并不是因为我特别聪明。本·富兰克林说过：经验是成功之母。我已经看到这种现象在全世界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政客们把一个国家带入困境，但仍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切都没有问题，而实际上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出现了问题。纽约人可能会记得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纽约遇到了财政困难。阿贝·比姆市长站在市政府大楼的台阶上保证，如果纽约拖欠债务，他就不拿工资。之后不久，债权人就受到重大打击，但是市长大人的工资支票却从来没有落空过。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去银行把我所有的比索全部换成美元，然后带出阿根廷。银行里负责这笔交易的人为此嘲笑我，一些政客也嘲笑我。股票交易所的主席因为听到了我的意见，而“没有时间”见我。但是没过多久——三个月后，阿根廷经济崩溃的消息就成了世界的头条新闻。我收到阿根廷人写给我的信，问我：“现在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们，去黑市买外汇，不管汇率是高是低，有多少就买多少，然后把钱弄到国外去。我还建议他们搬到智利或者玻利维亚去。



阿根廷银行保证比索永远与美元等值。尽管阿根廷中央银行信誓旦旦,但像我这样的怀疑者还是拿了他们的美元跑了。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阿根廷就陷入了货币贬值、经济崩溃、政府垮台的局面。

阿根廷经济崩溃是一桩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本来该国的经济是在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同世界各地的政客如出一辙，阿根廷国内的政客一看到困难就开始借债。他们想要让货币维持稳定，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高通货膨胀已经有好几次把该国的货币带入绝境，但是接着这种做法就造成了伤害——维持货币稳定一定会带来周期性的伤害，注定要发生的事是躲不过去的。世界其他国家向阿根廷贷出了巨额贷款；华尔街是第一个向阿根廷提供贷款的。事实上，阿根廷的借贷数额非常巨大，已经成为国际债券市场上最大的单个推手了。该国就这样维持了五年，然后经济就垮了。华尔街对自己提出了错误的建议表示歉意，但是并没有归还已落入口袋的佣金，而有一些政客则被迫辞职。

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南美洲许多国家都是独裁政权横行霸道、国民经济乱象丛生的国度，因此，不是一个生活的理想之地。90 年代，南美洲引进全球化，打开经济大门，让国际贸易的奇迹在自己的家园发扬光大。但是，一旦这些政策得到落实并取得成功，政客们就开始投机取巧，以便维护自己的权力。他们借债或者印制大量的纸币，从而把国家带入灾难的境地。全球化并不是敌人；是腐败和/或没有能力实行全球化才导致我们在西雅图(Seattle)、热亚那(Genoa)和世界其他城市大街上所看到的示威活动。19 世纪的经济增长和扩张之所以会戛然而止，就是因为发生了导致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事件。当今世界难道还想重蹈覆辙、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日子吗？

乌拉圭是南美洲的摩纳哥，它采用了银行保密法等各种措施，在贸易自由化期间蓬勃发展。股市持续牛市和好几年的繁荣景象导致兴建了无数的旅馆、餐馆和公寓楼房。埃斯特角(Punta del Este)城成了乌拉圭的圣特罗佩(Saint-Tropez)(法国著名的海滨城市——译者注)，是一方宝地。佩奇对这个城市情有独钟，建议在那里买房地产。我以前和现在都非常想这样做。由于阿根廷和巴西的经济崩溃拖累了乌拉圭，在乌拉圭的里维埃拉(Riviera)(南欧地中海海滨城市——译者注)价格又趋向合理了。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许我们在那里已经买了第二栋房子了。

在巴西(我预言这个国家将分成南北两个国家)，我们参观了阿雷格

里港(Pôrto Alegre),这是巴西最南面的一个州——南里约格朗德(Rio Grande do Sul)州最大的城市。南美洲的足球赛,尤其是巴西的足球赛是不可以不看的,当我们听说巴西将与邻国巴拉圭踢世界杯的预选赛时,就设法搞到了球票。为了挑到好的座位,我们提前两小时就来到体育场,却看到里面早已人山人海了,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我们只好站着看完整场比赛。比赛前两小时,球场里的气氛就已经非常紧张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持续惊心动魄的场面——不管是体育运动还是其他什么活动。巴西队获胜后,全城人兴奋不已,闹哄哄地庆祝了整个晚上。

在征服新世界之后,天主教会通过使土著人改变宗教信仰和维护西班牙的政治统治,在美洲发挥了影响力。各种宗教修道会承担了维持和扩展西班牙控制范围的任务,其中就有皇室正式任命的机构——耶稣会。天主教会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特权,有人估计,在殖民阶段结束时,天主教会控制了西印度群岛一半的生产性地产。在巴拉圭和中南美洲的耶稣会传教团系统是新世界里最重要的一个教会组织。从17世纪初至1767年遭到驱逐期间,耶稣会沿巴拉纳河上游建立并维持了一个广泛的传教团网络,直到今天还可以在各处看到他们留下的遗迹。

我现在仍然无法想象,几个神甫出现在穷乡僻壤里,把整个地区的人都组织了起来,开始生产制成品、艺术品、大量的农作物,建造无数的房子。后来耶稣会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并且实现了自给自足,西班牙皇室无法容忍,最终把整个修道会都从新世界驱逐了出去。同样令我惊讶的是,整个修道会就这样杳无踪迹了,当地部落里的人离开传教团,回去重新过起勉强糊口的生活,拾起他们祖先创立的部落宗教。

1813年,即在耶稣会离开46年之后,巴拉圭脱离西班牙获得独立。但是,在大约65年的漫长岁月里,巴拉圭一直被独裁者所统治,哪怕用有史以来的拉丁标准来衡量,这些独裁者仍然位于荒唐透顶之列。历史上充斥着政客们和领袖们所做的荒唐事情:日本人怎么胆敢在1941年袭击美国?萨达姆·侯赛因怎么胆敢在1991年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敌?1865年,巴拉圭的独裁者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与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交战,挑起了灾难性的三国同盟战争。这就好比比利时突然宣

布与德国、法国和荷兰同时交战。450 万人口中有一半战死了，巴拉圭几乎所有的男子都被打死了。永远不要盲目地相信，领导人不会像疯子一样行事。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表明，真正的爱国者是那些违抗了自己国家政府的人。

今天我对巴拉圭的主要印象是，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自从耶稣会离开之后，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这个地方应该化整为零，分块出售，因为分块出售比整体出售更卖得出价钱。巴拉圭的邻国一定会把这些块块一抢而空的。巴拉圭的公民把出售得来的钱瓜分掉，然后搬到埃斯特角城去住。事实上，巴拉圭不像是一个国家在运作，它更像是一个正在作案的犯罪集团的运作。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黑市，在那里什么都可以卖，那里也是藏污纳垢之处。最近听说，基地组织可能会在巴拉圭开展活动，这个消息当然不会令我吃惊。

巴拉圭在世界上处于这样的地位，然而有趣的是，成千上万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阿米什派教徒（基督教门诺派中严谨派的教徒，至今过着简朴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译者注）却在该国的西大荒——查科（Chaco）——购买大片大片的土地。[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德国门诺派教徒（16 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反对婴儿洗礼、服兵役等，主张生活简朴——译者注）就一直往巴拉圭移民。]我和佩奇碰见的那些人解释说，他们移民到这里是为了逃避北美洲的宗教迫害，以及对他们生活方式越来越严重的侵犯。我得承认，他们的解释很有道理。在巴拉圭，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以干的。在一个为纳粹“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博士——提供避难所的国度里，一个人当然绝不会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迫害。

我们再一次穿越阿根廷去玻利维亚，在边境小镇亚奎巴（Yacuiba）入境。这个镇是个熙熙攘攘的闹市，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成千上万的人从物价昂贵的阿根廷蜂拥而至，过境来这里购物。在玻利维亚，货币是自由浮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低廉，亚奎巴市场到了深夜生意还热火朝天。

在亚奎巴，我把手机拿到店里去，花了 10 分钟时间，付了 8 美元，手机就调整好了，联上了玻利维亚的系统，立即就可以通话了。我们在阿根

廷的时候，手机从来就没有正常工作过。表明玻利维亚国家基础设施状况出奇良好的不仅仅是它的电话系统，一离开城市，高速公路系统即将实施的改革就给我留下了印象。所有北向公路全部是收费公路，哪怕是道路状况不好的公路。后来我发现，玻利维亚正在实施一个新的计划，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美洲大陆的主要运输转运中心。

另外一个让我们吃惊的地方是科恰班巴(Cochabamba)——玻利维亚的第三大城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科恰班巴是座山城，常年气温华氏 70 度，城市设施先进，但同时也保持某种程度的纯洁性。我们如果还想回来完善我们的西班牙语，这里就是最理想的地方了。我们去锻炼身体的健身房简直跟曼哈顿上城西边的健身房没有什么两样，设备一模一样，哪怕是去里面运动的人之间调情的手段都如出一辙。

如果说我本来对玻利维亚抱着悲观的期望，倒不如说，我对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抱任何期望。我和佩奇是到了巴拉圭之后才真的决定要穿越这个国家。当我们最后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把玻利维亚当作去秘鲁的捷径。我确实想看一看波托西(Potosí)和银山——正是这座银山使这座城市成了西班牙征服时期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座城市。我估计，如果我们在拉巴斯(La Paz)停一下的话，我就可以花点时间做点侦探工作，寻找那里的一个经纪人，我上次周游世界时曾给过他一些用于投资的钱，后来他带着这些钱失踪了。

事情是这样的：

10 年前我去玻利维亚，是顺便去的，我从利马(Lima)到了拉巴斯，那时玻利维亚的股票市场还不存在。但是我自认为，我在那里看到了好的势头。南美洲其他国家都在搞开放，我预测，玻利维亚很快就会建立股票交易所，我打算尽早进场。

玻利维亚是发展中市场经济里又一个物价极其低廉的国家。我决定购买，或者说试图购买该国最大的一家银行的股票。我走进银行，问东问西，最后被指引到银行总裁那里。那位总裁给了我一家投资公司的名字，是一家因玻利维亚将建立股票市场而刚刚开办的公司，并告诉我说，能帮助我的人就是这家公司的经理。

我回去作了一些调查，了解到，这家公司的经理，也就是公司的创办

人和主要股东，来自一个显赫而又声誉良好的家族，公司的运作也合法。我去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公司里，我最后是跟他的合伙人做了交易。他的合伙人告诉我，确实要建立股票市场了，很快就会有公开上市的公司，政府支持私有化，但是眼下还没有可买的股票。他保证，他可以在街上的私人卖家手里为我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银行股票，但是我不能指望能买到很多。我说，我宁愿开始时买得少一些。我给了他一点象征性的钱，要他买股票，并告诉他，如果结果不错，我会再寄点钱给他，我们将开始在玻利维亚投资。

后来他买到了股票，我就从纽约又寄给他一张小面额支票。过了不久，玻利维亚建起了股票交易所，我试图找到他，要他再多买一点股票，但是没有人回答我的信函。最后，我终于在电话上跟该公司的一个人通了话，我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他死了。”他这样说我的经纪人。

“死了？他还很年轻呢。他身体很好啊。”

“他得了艾滋病，死了。”

“那么我该跟谁谈呢？”

“他死了。我们帮不了你什么忙。”

“那我的钱呢？”

咯一声，电话挂上了。

在做国际性投资时，尤其要涉足新兴市场时，我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把经纪人账户开在该国最大的银行里。如果银行陷入困境，你是不会有损失的，因为政府会接管过去。你的股票不会消失。在我一生中，这是我惟一一次没有按照这个原则行事——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我无法按原则办事。我手上只剩下两张注销了的支票。我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玻利维亚大使馆，那里的人要我通过该国新建立的股票交易所解决问题。我打电话给交易所，说明我的问题。我说，我不相信我的经纪人死了，不管怎么样，那些人手里仍然拿着我的钱。股票交易所也无能为力。

我下了决心，如果我哪天去玻利维亚，我就一定去拉巴斯，找到那些家伙，把我的钱拿回来。钱虽然不多，但是事关我的本金，更关系到我的原则，我决心一追到底。

波托西位于玻利维亚司法首都苏克雷(Sucre)以南大约五十英里,在该国的行政首都拉巴斯东南方将近三百英里处。在16世纪中叶,波托西是西半球最大也是最著名的城市,也许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在鼎盛时期,波托西的城市人口曾达到16万。据说,一个当地的玻利维亚人在其中的一座山上牧羊,晚上燃起篝火野营。后来,火堆下面的地面开始融化了,流淌的液体竟然是银子。随后进行的调查发现,整座高达1600英尺的大山实际上就是一整坨纯净的银子。大家就把这座山称为“富山”。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这笔横财让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西班牙在经济上得以维持,除了其他用途外,还支付了西班牙所有的战争费用。这有点像印度尼西亚发现大量的石油储藏,就是这些石油让印尼支撑到今天。著名的八里亚尔银币索有许多就是建造在波托西的政府造币厂铸造的,当年西班牙商船在南美大陆北海岸一带作交易时,使用的就是西班牙王室发行的这种硬币。

这座山还没有挖完。经过漫长的四百多年岁月,山上仍然还有几百个矿工在继续挖掘这座宝山。他们开采出来的有经常与银矿石混在一起的铅、锌、锡和铜矿石,当然还有银块。他们还在用古老的方式开采,用炸药炸,用铁镐挖,沿着低矮、狭窄的坑道爬进爬出,工作环境很差。波托西矿工的预期寿命是42岁。矿工们把所有的矿藏都看作是魔鬼的财产,把银矿叫作魔鬼的嘴巴,定期向富山和他们称为“老家伙”的魔鬼献血。矿工们随身带着魔鬼的小雕像,每个星期五都要杀骆驼作祭品。就像他们的祖先几百年前所做的那样,他们靠嚼古柯叶来获取能量和精力。

每一个学历史的学生都知道,许多地方都有过辉煌的时候,辉煌之后就是衰败。波托西现在已经十分破旧了。城市里那座华丽的大教堂曾经是波托西地位显赫的象征,如今已年久失修。大教堂建筑上的镀金仍然完好无损,但是精美的彩色玻璃却东缺一块西缺一块地残缺不全了。波托西市内到处都可以看到美丽的教堂,显示着自己昔日的辉煌。我多年来一直想亲眼看一看波托西,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它那样,由于发现了一笔财富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一跃成了历史名城。我想去波托西的心情同我想去廷巴克图的心情一模一样:历

史最好就是身临其境地去体验。

拉巴斯的股票交易所很小，每天只营业一个半小时，但是却坐落在一幢新建的闪闪发光的三层办公楼里。交易所里面的人，大约十五个年轻男女，倒是在认真地工作。他们衣着潇洒，不时在办公室里走动，买进卖出，男子们穿的西便服看上去像是在伦敦定做的。我走进去，自我介绍一番。

“我从纽约来，我到这里来是想找拿了我的钱的那个人。”

交易所里的事情并不是很多，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开张时间不长，我猜想，眼下我一定是惟一个在抱怨的人。因为我在那里，站在这群困惑不解的人面前，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从纽约来这里兴师问罪的家伙。

他们非常愿意帮忙。

一个年轻妇女翻看着档案说：“我想，我们应该能够帮你找到你要找的那个人。”

我说：“他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

“他得了艾滋病，死了。”

她再一次翻开文件夹，说：“他在能源部工作。”

这个混蛋！

“我把地址抄给你。”她说。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喂，”我走进他的办公室说，“我是杰姆·罗杰斯，还记得我吗？”

“这不是我的错，”他立刻切入主题，告诉我说，“是我的合伙人，他拿走了钱。”

我说：“首先，我并没有把我的钱交给你的合伙人。我的钱是交给你的。就我来说，如果我拿不回钱，坐牢的就应该是你。我要到政府那里去告你。我已经去过股票交易所了。”

他喋喋不休地说，是他的合伙人的问题。他的合伙人是公司的所有人。他的合伙人根本就没有为我购买股票，却向我收了钱。他把钱拿走了，公司完蛋了，他走了，他出国了。

“第二，”我说，“说你得艾滋病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说什么！”

很明显，这两个家伙结下深仇大恨了。这个家伙声称，在他的合伙人把公司搞垮之前，他就辞职离开了公司。当他发现，他的合伙人把责任都推给他，并且告诉别人他得艾滋病死了之后，他就变得特别乐于帮助我。他告诉我，他的合伙人的父亲曾经是一家著名的国际会计公司驻玻利维亚办事处的头头，现在他的合伙人的哥哥接下了这个位置。我发现，这父子俩都是现在已经解散了的公司的股东。这两个人在当地的金融界颇受人尊敬，有很好的名声，若此事曝光，损失定然不小。因此，正是带着我的钱潜逃的那个人的家人带我找到了他。我发现他人在秘鲁，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告诉他：“我要告你的哥哥，告你的父亲，他们两个都是公司的股东。钱肯定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人拿的，我要你们还钱。”

这是我在境外数额最小的一笔投资，只有 3 000 美元。你总是从小额开始做起的，因为你必须确定一切都运作正常。哪怕是最大的银行，你都必须确认钱进了正确的账户里，而且银行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笔钱。我总是从小额开始做起的，以便确定我采用的方法能成功。在这个例子里，我投入的钱数额那么小，那是因为那里可购买的股票实在不多。因此，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追踪我的钱的去向的同时，我实际上也了解了很多有关玻利维亚政府和金融运作的事情。事实上，玻利维亚政府和该国类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个机构在向我提供协助方面非常积极，因为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他们要吸引外国投资者。

我对那个小偷说：“我不跟你开玩笑，我要拿回我的钱。我会到秘鲁去取钱。”

他不知道我是开着车周游世界，并且正要到秘鲁去。他肯定吃惊不小：我居然会追他追到那么远的地方。真正让他害怕的是我的威胁，我威胁他，我会追着他的父亲不放，并让政府和股票交易所来找他的家里人算账。

我告诉他：“我说话是算数的。我会去秘鲁的，我三个星期以后到那里。”

他说：“行，到秘鲁来吧，我把钱还给你。”

我在利马找到了他。我向他收取利息，他付了我 20% 的欠款，签了一个书面协议，保证在今后三年里把余下的钱还清，每六个月还一次。

玻利维亚跟厄瓜多尔一样是个典型的香蕉共和国，所谓的香蕉共和国指的是那些政府一天到晚变更，政变隔几年就要来一次，货币不停暴跌的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创造了历史上一个国家每年改朝换代次数最多的记录。每一个两年期内，玻利维亚国内就会发生大约 150 次政变或未遂政变。玻利维亚的历史是一部战乱史，其特点就是一小帮疯狂的白人为了赢得对大批土著人的控制权而自相残杀。自 1825 年玻利维亚脱离西班牙独立以来，该国就一直饱受蠢政的祸害。（玻利维亚以前称作阿尔塔，又称上秘鲁，是南美洲最后一块取得独立的西班牙殖民地。）玻利维亚自建国以来打一仗输一仗，大片大片的领土被割让给了邻国。

自从 1982 年以来，玻利维亚国内再没有发生过政变，政府也多多少少算是个民主政府了，政局也还算稳定。因此在经济上，局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我还是想起，从 1991 年我第一次环球旅行期间到 1993 年，玻利维亚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25 000%。所以我也会上当受骗，但是我并不是那么容易受骗。我对自己亲眼目睹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变化印象深刻。我看到旅游业开始兴旺了，而在 1991 年，当时根本就没有游客。金属仍然是重要的商品，东部在发展农业，日本人在投资（像移民巴拉圭的阿米什派教徒一样，移民玻利维亚的阿米什派教徒也在投资）。当然，如果要改造一个国家，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几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玻利维亚新发现的天然气储藏量巨大，最初发现时谁也没有想到蕴藏量会这么大。在 1996 年，该国的天然气出口价值 50 万美元，自从那时以来，已证实的储藏量增加了 10 倍，到 2004 年，天然气出口将达到每年 5 亿美元。他们一直都有新的勘探发现，蕴藏量几乎大得没有底；显然，那里的地质状况非常适合天然气的形成。

因此，我持乐观的态度，但持的是谨慎的乐观态度。我无法不想到当年那些极其看好玻利维亚前途的人，而且立即就有三个名字出现在我的

脑海中：切·格瓦拉、布奇·卡西迪和虎豹小霸王。后来这三个人的热情突然又都戏剧性地消失了，最后都葬身在玻利维亚。

自从我上次访问秘鲁后（我在《投资骑士》里对秘鲁作了很详细的叙述），“光辉道路”组织已被彻底摧毁，那个主持镇压毛派游击队暴力叛乱的总统——阿尔贝托·藤森也流亡国外。在被权力腐蚀之前，藤森扭转了秘鲁的经济局面，实行自由市场政策，将国营的主要工业私有化。通货膨胀率从1990年他当选时的7600%降到1992年的57%。1994年，该国经济增长达到12%，高居世界各国之首。

1991年我在秘鲁的时候，“光辉道路”掀起了公开战争，那时秘鲁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因此我很少碰到游客。现在，秘鲁的游客多如过江之鲫，在国内所有主要的旅游胜地，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商店和餐馆。如今马丘比丘（Machu Picchu）是南美洲大陆最大的旅游区，库斯科（Cuzco）则是最时髦的城市。利马不管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都是熙熙攘攘的，海滩上人满为患。游客开始分流到玻利维亚这样的邻国去了，尤其是背包客，他们总是捷足先登。

一旦某个国家的长期战争结束了，就应该尽快去那个国家投资，现实再次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增加了我在秘鲁的投资，但是我真的希望，战争结束时我要是马上就跳上第一班飞机飞过来就好了。

如今和平降临了，秘鲁南部、巴西西部、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的发展迅猛神速。例如，巴西西部几百年以来一直是巨大的原料和农业产地，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发展，因为把东西运到几千英里之外的巴西大西洋海岸是不现实的。现在修建了新的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打开了偏僻地区通向距离更近的太平洋港口的通道。秘鲁甚至将濒临太平洋的伊洛（Ilo）港的一部分让给内陆国玻利维亚，为的就是确保在这个地区开放贸易和过境。设想一下，你把家搬到了奥马哈（Omaha）、丹佛或盐湖城（Salt Lake），这时联合太平洋铁路运输公司把美国的这些内陆城市与海岸连接起来了，这会是怎么一个景象？这些城市将成为21世纪蓬勃大发展的地区。现实就是如此。在我们回程的最后一段，我们从内地开往新铺设的沿海泛美高速公路时，车轮下就是早已修建好的壮观的新公路。



在厄瓜多尔,烧烤前的准备工作。

我们在普诺(Puno)住的旅馆靠近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相对安静一些。里面住的人不多,我们入住后不久就认识了旅馆经理。我在用早餐,这时经理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嘴里说着:“太伤心了,实在令人伤心,太可怕了,太令人伤心了。”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但是很明显,他非常忐忑不安,我试着让他镇静下来,然后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能猜想到的就是,一定是有人把我们的车砸了,我们的旅行被迫中断了。当然,事情远比这糟糕得多。

我问他:“你在说些什么?”

他让我赶紧到他办公室里去,路上我们拽上佩奇,进了办公室,我们看到电视上第二架飞机撞进了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这天是2001年9月11日。再过9个星期我们就会跨过亚利桑那(Arizona)州的边境,离回家的日子还差三个半月。

15

我父亲的坟墓

同加利福尼亚州相比，中美洲的土地面积要小一些，人口也略为少一些，我们打算在那里逗留大约三个星期。我很想看一看，自从我上次来过之后这里发生了什么变化？运河已经归还巴拿马了，令我心惊胆战又限制了我的行程的那三场战争也已经结束了，现在将向我们开放一些新的地区了。我们想去看一看旅行线路必经的7个国家，这是惟一一条连接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陆上通道。

我们离开秘鲁两个星期之后到达巴拿马，进入了中美洲；在这两个星期内，我们到过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是两个最初被称作香蕉共和国的国家之一。确实名不虚传（顺便提一句，那里到处都是香蕉种植园），自从我上次离开之后，这个国家的政府不知道更换了多少次。但是看起来局势有所改善。现任总统让经济同美元挂钩（美元是法定货币），而他做这件事的时机恰到好处：当时正逢石油价格往上攀升。厄瓜多尔坐拥巨大的石油储藏，大量的美元几乎立刻就滚滚而来，于是人们就把这位总统看作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我就不作评论了。一旦石油价格跌落，厄瓜多尔这种新形成的政治威力就会受到真正的考验了。如果政府不能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高效率机构，国家就会出现問題。厄瓜多尔眼下的境况相当不错：第二条输油管道已经上马，等到竣工之日该国的石油出口将翻一番。

我们在厄瓜多尔逗留了不少时间。这是个美丽的多山之国，有着丰

富的文化传统,其渊源可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初。很久以前人类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后来印加人来了,他们的帝国幅员辽阔,绵延太平洋海岸几千公里,往北一直到达基多(Quito),其统治到了1534年才被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推翻。我们从基多越过赤道线(原来我们以为是最后一次过赤道线了),往北去圣巴勃罗德德尔拉戈(San Pablo del Lago)和库辛庄园(Hacienda Cusin),我们的一位朋友,一个从纽约来的英国人尼克·米尔豪斯是这个庄园的主人。尼克当年买的是一家破旧的旅馆,他花了10年时间修整旅馆,最后把这家旅馆变成了吸引游客的场所。

尼克向我们证实,由于长期的游击队活动,哥伦比亚边境关闭了。北行的惟一一条路就是先往南走。于是我们再次跨越赤道线,回到了瓜亚基尔(Guayaquil)。哪怕当时允许我们开车往北穿越哥伦比亚,我们也还是不能从那里开车去巴拿马,陷入死胡同是迟早的事。

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横亘着达连峡谷(Darién Gap),那里没有公路,要想过去就得走路。达连峡谷的名字取自与其相连的巴拿马南部省份达连省,长一百多英里,里面有沼泽地、丛林和波涛汹涌的河流,是横贯阿拉斯加(Alaska)州和火地岛的泛美高速公路中惟一没有竣工的一段路。总之,我们必须像其他游客一样用船把汽车运过去。如果我们去了哥伦比亚,我们很可能从布韦那文图拉(Buenaventura)把汽车运过去;而现在,我们则从瓜亚基尔把汽车运过去。

在瓜亚基尔的码头上,在把汽车装上船运往巴拿马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了彻底的毒品检查。他们不仅让狗嗅汽车,而且还让狗来嗅我们。后来在穿越尼加拉瓜时,我们碰上了美国缉毒局的一位缉毒站站长,跟他们夫妇俩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他向我们透露了最新的嗅毒狗技术的有趣内幕。

我们的汽车上路去巴拿马了,大概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我和佩奇则开始游览波哥大(Bogotá)和加拉加斯(Caracas)。波哥大是个正在遭受攻击的城市,城里成千上万的人身穿盔甲。哥伦比亚是个美丽的国家,那里的人民亲切和善,受教育程度很高,但是他们却要穿防弹背心。佩奇在健身房遇见的一个女子跟她说:“你实际上不必担心受到枪击或遭到绑架,除非你很有钱或者你是个政客。”

委内瑞拉的统治者是个疯子，本来委内瑞拉应该是个非常富有的国家，但却长期遭受蠹政之害。委内瑞拉是欧佩克成员国，除了石油出口之外，该国最引人注目的出口就是选美小姐了。为能在国际选美比赛中稳操胜券，该国发展了一个完整的选美行业。就像当年前苏联培养国际象棋选手和体操选手那样，委内瑞拉人挑选漂亮的幼女，必要时甚至给她们整容，训练她们，以使她们赢得全球小姐的桂冠。

我想让佩奇去看一看巴拿马运河。站在一个欢迎我们到运河去的标志边上，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获得允许观看这个标志，但却被禁止用照相机拍这个写着“欢迎”两字的标志。一个警卫跑过来，嘴里大呼小叫。在我们的环球旅行途中，身着制服的人被我们手中的照相机吓坏，这不是第一次，但如果这次涉及的是军事安全问题，我们则永远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性质的安全问题。这个警卫和后来过来的他的同胞想让我们知道，巴拿马人民（我们从他们用“我们”这个词猜测，他们想代表巴拿马人民说话）并不特别喜欢游客，尤其不喜欢美国游客，尽管正是他们树立了这块欢迎标志。他让我们拍运河的照片，但不让我们拍路边的标志。这种反美情绪让人感到失望，因为我看到在总统府周边地区有极好的投资机会：老布什执政期间，美国为了抓获曼努埃尔·诺列加而入侵巴拿马，并炸毁了总统府。

上一次周游全球的旅行中，在途经哥斯达黎加时我开了一个经纪人账户。哥斯达黎加作出了很多努力，以期让人相信，该国不仅欢迎北美的退休人士（许多美国和加拿大公民搬到那里去住，因为那里不仅气候宜人，而且生活费用很低），还欢迎外国投资。我在该国的经验让我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我在哥斯达黎加买的股票是有红利的，但是我被告知，为了将这些红利存入我的经纪人账户，我必须亲自到圣何塞（San José）去。我住在纽约，让我为了一点红利飞到哥斯达黎加去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发疯了。在新加坡，兑现一张支票需要 5 个星期，我由此认为新加坡的情况很糟糕；然而与哥斯达黎加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当我和佩奇路过那里时，我花了一天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到需要我去的所有地方去露

露面；我本想把账户注销了，但是因为一些交易还在官僚们的处理过程中，只好作罢。我是绝不会到这里来过我的退休生活的。

回家后我意识到，在这次旅行中我注销的账户数目与我开设的账户数目一样多；而在上一次旅行中，我开了一些账户，但没有注销一个账户。

自从我上次去尼加拉瓜以来，那里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战火刚刚停息下来，到处都是警察和士兵，全国各地布满了检查站。这一次再也看不到那种景象了。在马那瓜(Managua)，我们在一个汽车加油站加油，这时一个年约八岁的小男孩走了过来，说一口标准的英语，开始对我们的汽车评头论足起来。他的父亲跟了过来，自我介绍说是美国缉毒机构的站长。就是他告诉了我们有关嗅毒犬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边吃晚饭，一边津津有味地听他讲警察和走私犯世界里那些惊险刺激的真实故事，这是我一生中最有趣的一个晚上；他告诉我们，嗅毒犬不用多久就失去了它们在训练时获得的技能。这些狗并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可靠，真正的好狗都是毒贩子的狗。毒贩子买市场上能买到的最优良的狗，他们把毒品藏起来，然后让狗嗅盒子，如果狗发现了毒品，他们就重新包装毒品。

在洪都拉斯，我们凭吊了古科潘(Copán)城的遗迹。科潘是当时一系列富裕强大的玛雅城邦中的一个，玛雅城邦兴盛的年代与意大利有名的城邦，如威尼斯、热亚那、佛罗伦萨、锡耶纳(Siena)等等，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我再一次对数百年以前的人民能创造这样辉煌的成就感到吃惊。在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我们找到了10年前我第一次吃鬣蜥的那家餐馆。在那里，我再次品尝了鬣蜥，于是想起来鬣蜥肉吃起来像鱼肉，不过比鱼肉难嚼碎。在萨尔瓦多(El Salvador)，我结清了上次旅行时在该国内战期间所作的投资。现在该国是一派歌舞升平、繁荣昌盛的景象，大街上血流成河的年代已成昨日的回忆，我决定兑现利润，把我的钱挪到其他地方去。(后来，布什总统提出了一份有关中美洲和美国之间自由贸易的计划；我也许会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把钱留在那里。)在危地马拉

城(Guatemala City)有一家名叫让·弗朗索瓦的餐馆,是我们在世界上惟一一家前一晚吃过后又主动回来再吃的餐馆,我们要了同样的菜——以墨西哥烧烤用的辛辣的辣椒酱作为调料制作的嫩牛排。餐馆里的饭菜和酒水都是一流的。(在苏丹被困的12天里,我们天天在同一个地方吃同样的豆子,但那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在危地马拉,我们听到了联合水果公司管理层在20世纪90年代撤离和把自己逼到破产境地的过程中犯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也许这是该公司在偿还自己早期对危地马拉欠下的孽债吧;更大的可能是,联合水果公司的事只是要再一次证明,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永世长存的。

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中美洲遇害的话,那肯定会在伯利兹(Belize),就是以前的英属洪都拉斯,因为危地马拉声称对该国拥有所有权,引发了边界上的暴力冲突事件。我们到达前一个月,那里有4个人被杀害了,但是我们安全地穿越了我们旅行中的最后一个战区。自1981年摆脱英国实现独立以来,伯利兹成了一个护照天堂:如果你想要第二本护照,或者你想逃离自己的国家,你只要作某种程度的投资,伯利兹就会给你一本护照。

重约十一磅的《泰晤士世界地图集》一直是我个人图书馆里的常用工具书,多年来我买过好几个版本。这本权威性的手册是白宫战地情报室之外收集地图最全面的一集单卷本。如果你翻开地图集1967年版中的第115图版,你会发现36年以前墨西哥的坎昆(Cancún)城根本就不存在。坎昆城位于尤卡坦半岛(Yucatán Peninsula)的东北端,完全是墨西哥为吸引游客而人为造出来的一个城市,是墨西哥湾一个海滩度假胜地,里面几乎全是旅馆、公寓、餐馆和零售店。这个地方除了可以游游泳或者坐在海滩上喝点玛格丽塔酒(由墨西哥龙舌兰酒、酸橙汁或柠檬汁以及橙味酒混合而成——译者注)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干的了,没有我们喜欢的地方。但是,我很高兴我们开车经过那里,哪怕仅仅是为了看看这个海边城市,对这个成功的、建造效率很高的人造建筑物赞叹一番。毕竟,我们确实想在新旧千年交替之际从各个角度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世界。我很怀疑到公元3000年或者甚至到公元2500年时,这座城市是否还会在那里?

玛雅遗迹很可能会留存下来，而坎昆遗迹则可能会荡然无存。

我们开车往北穿越墨西哥，两个星期里我们途经梅里达(Mérida)、比亚埃尔莫萨(Villahermosa)和普埃布拉(Puebla)，最后到达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城，我第一次品尝了用龙舌兰虫做的菜，这是一道昂贵的精制菜肴。龙舌兰虫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因为这种虫靠吃龙舌兰属植物为生，而后者则是酿制龙舌兰酒的原料。从墨西哥城出来后，我们往海岸边开，向亚利桑那州边界行进，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马萨特兰(Mazatlán)、洛斯莫奇斯(Los Mochis)和埃莫西略(Hermosillo)稍事停留。(在洛斯莫奇斯，我们包了一架小飞机带我们去铜谷上空游览。为了得到较好的服务，我们甚至同意支付额外的费用。尽管我们一再得到信誓旦旦的保证，但是等了两个小时还是不见飞行员的人影。后来我们听说，飞行员对我们拂袖而去一事耿耿于怀。)在旅途中，我渐渐为这个国家感到十分担忧，我是抱着极大的期待来到这个国家的，这主要是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得到了实施，而且最近商界人士福克斯·比森特又当选为总统，从而结束了墨西哥七十多年的一党统治。

我渴望在这个国家新建的收费公路上行车。在上次旅行中，我很少看到令人满意的公路，我希望私有化会改变这一切。现在，收费公路是数不胜数了，几乎都是全新的公路，也是世界上收费最高的公路，比日本公路的收费都要高。但是我清楚地看到，这些公路都开始破损了，无一例外。公路损坏的速度飞快，肇因也许是管理不善，也许是腐败(渎职和贿赂是墨西哥国内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仅仅是第一个迹象，说明我对这个国家的期望是过于乐观了。

我们沿着墨西哥西海岸一条平坦的公路行驶，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们三年旅行中极少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汽油快用完了。幸运的是，我们随身带了一筒便油桶的汽油以备不时之需。我在前面提到过，这是为了防备在非洲沙漠或者西伯利亚这样广袤无垠、荒无人烟的地带可能会需要汽油。我们没有想到会在墨西哥这个世界上第七大产油国的境内用上它。但是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加油站。我觉得，这次经历有点像是 对墨西哥进步的一个隐喻：墨西哥就像我们的汽车，在春风得意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好像汽油快要烧完了。



到了墨西哥,我们怎么可能不去看看最热门的地方——瓜达卢佩的巴西利卡,据说,圣母玛利亚在1531年显现在当地的一个农夫面前。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宣称,这是西班牙人编造出来的,以帮助制服当地人,但是墨西哥人则反诘说,你们要是不相信这一奇迹,那就拿出证据来。

在墨西哥城吃龙舌兰虫做的菜——烧烤墨西哥龙舌兰虫,这是我们周游世界时品尝的各种美味佳肴之一。



1994 年和 1995 年的比索和金融危机之后，墨西哥领导人允诺要改变那种效率低下和腐败的管理方式，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化经济体制。起初他们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把通货膨胀率降了下来，遏制了政府的支出，将类似铁路和航空公司这样庞大的国营老企业私有化，并打开国门参与竞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放了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边境，在我到达那里的时候，该协定已经为墨西哥带来了十万多个新的就业机会。墨西哥后来又与欧盟、以色列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事实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带给美国的利益比带给墨西哥的利益要大得多。墨西哥从美国进口的货物比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货物量要大，因此，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是顺差。腐败、教育水平低下、缺乏基础设施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使墨西哥很难从美国夺走大量的制造业工作机会。）

新兴的墨西哥吸引了国际投资界的眼光，外国直接投资从 1990 年至 1994 年间的年平均 54 亿美元猛然上升到 2000 年的 130 亿美元。在强劲的石油价格和强有力的美国经济的推动下，墨西哥成了拉丁美洲经济体制中的老虎，其国内生产总值在千年交替之时达到了 6.9% 的增长率。在政治层面，局势也露出曙光。以前政府受到一党制的钳制而几近瘫痪，但在 1999 年末则改由反对党候选人福克斯执政。福克斯非常了解新闻媒体，敢说敢为，是墨西哥几十年来少见的练达老成之士，他有智慧有魅力，足以赢得墨西哥北美洲各邻国——最主要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的青睐。

但是，福克斯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美国经济下滑阻遏了对墨西哥类似电子、纺织、化学品和汽车零部件这些行业商品的需求。由于美国占了墨西哥出口量的 90%，因此由此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至 10 月底我到达墨西哥这段时间，有大约四十万墨西哥工人遭到解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停滞不前。很明显，这些问题不是福克斯造成的，但是他肯定要为此背上恶名。

墨西哥的国营石油垄断企业——墨西哥石油公司——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国有化的，是该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占了联邦政府收入的大约

40%。墨西哥生产的石油大约有 80% 卖给了美国。那么，我为什么不好这个公司呢？因为这个公司是由一帮腐败的官员掌控着，效率低下，而工资支出却高得出奇。我们来看一看，墨西哥石油公司雇用了 13.7 万名工人，每天生产石油 300 万桶，雇用的人数是生产相当数量的其他国家（如委内瑞拉）的两倍。像我这样试图在墨西哥寻找加油站的例子恰恰说明了这个公司存在的问题：加油站设置的位置是政府官员及其亲信决定的，而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加油站不接受信用卡。在我们的旅途中，我们只看到过一个加油站立着接受信用卡的标志，那个标志很大，上面写着：我们接受 VISA 信用卡。这个加油站就是以这种方法来促进革命性的变革的。

显然，油气工业在很多年以前就应该私有化了。福克斯试图影响工会，但是没有成功，最近又试图任命四个商业人士担任董事会董事，但是这项任命很快就被墨西哥国会否决了。福克斯与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关系肯定会越来越糟。墨西哥石油储藏正在枯竭。1990 年至 2000 年底，已证实储藏量从 520 亿桶减少到大约 260 亿桶。2010 年之后，生产量将会急剧下降，因为石油储藏已经衰竭。墨西哥在勘探新油源方面投资甚少。阿布扎比可以不勘探新油源，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内的富油国也面临着石油储藏减少的问题，但是，由于该国人口数量不大，其国民靠着余下的石油储藏仍然可以生活 100 年。墨西哥的人口超过 1 亿，而且该国人口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中位年龄是 23 岁，而美国则是 36 岁），因此就享受不到同阿布扎比一样的奢侈了。

墨西哥的炼油行业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弱小的，眼下看不到要大力扩展这个行业的迹象。事实上，墨西哥 25% 的汽油是靠进口的。

根据我的分析，石油储藏量减少将给早已不稳定的墨西哥带来更大的不稳定因素。尽管这不是福克斯本人的错误，但是福克斯在任期结束之前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现在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急剧下降了。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间，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从墨西哥转到了中国。更多的墨西哥人将在美国现身。一直以来边境就起着放气阀的作用，靠它来降低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如果你的儿女不想学中文，那就赶紧让他们学西班牙文吧。

从墨西哥出境花了我们 3 个小时，跑了 3 个不同的办事处，并不是所有的办事处都设在边境附近，跑其中一个办事处还需要我们从原路返回 15 英里。我们必须买一份游客许可证才能出境，这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惊讶。毕竟墨西哥就是这么一个国家，在那里，犯罪和腐败是司空见惯的事，这个国家的罪犯可能需要哥伦比亚人日以继夜训练整整 20 年才会搞懂如何通过贩卖可卡因来赚钱。

后来我们听说了这么一件事。一辆卡车来到边境，车上载着 340 张美国捐赠给墨西哥的课桌。墨西哥海关的官员要求支付高额关税，否则就不允许入关。几百个墨西哥学童来到边境，一次拖一张课桌过境，因为海关官员允许每次带进一张免税课桌。

我们在墨西哥边境上的经历荒谬可笑，不过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倒是在美国边境上看到的景象让我们真正感到焦虑不安。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了各种有关边境自“9·11”以来已经变成堡垒的报道，我们听说进入美国要遇到的无穷尽的拖延，汽车排成长队，以及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等待。我们出入境次数太多了，很清楚一个焦虑不安、好斗或者仅仅因为自己心情不好的海关官员或者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是如何可以无事生非的。我们出国已经 3 年了，不管从哪方面讲我们都看起来怪怪的——实际上，正是因为我们举止怪异和不同凡响才在很多场合下救了我们的命。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园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得到的信息使我们认为，现在的美国同我们 3 年前离开时的美国已经大不一样了。

一想到即将回到美国我们就兴奋不已：回家的念头让我们激动、雀跃。我们把我们去阿拉斯加的那段旅程和后来的经历看作是一段成功的旅行。但是眼下，我们的激动情绪缓和了。面对典型的过境程序时，你就得将自己置身于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你不能着急，你不能因为官僚程序的荒谬无理而失去自制能力，你必须耐心，跟随车流往前走，同时还要警觉，看是不是有机会加快过境的速。

我们是在亚利桑那州的诺加莱斯(Nogales)入境的，第一件让我吃惊的事情就是等候入境的人并不多，根本就没有人排队。过境的速度也很快，我最多只等了二十来分钟。当我们走到移民官面前时，一群坐在 15 公尺以外的海关官员已经站了起来，对我们招手说：“那是什么东西？你

们是哪来的？把那辆车开过来，我们要看一看。”他们都兴奋莫名。他们跟世界上所有穿制服的官员没有任何区别：都想看一看我们这辆车。移民官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了章，挥手让我们到海关官员那里去。

我们很自然地让海关的人看了我们的地图。在拖车车盖的内壁上贴了一张世界地图，三年来我一直在地图上标示我们旅行的路线。从前一次探险中我得出结论，向别人解释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在干什么的最简洁、快速、明了的方法就是给他们看地图。当我和佩奇被拦住要求出示证件时，我们就说“好”，我会将手伸到拖车里。打开车盖有两个立竿见影的效果：让大家看清拖车里装的是什​​么，使大家看清楚，我们并不在运送金条、枪支或者大麻；同时也立即向大家解释了我们在干什么。除此之外，这样做还能把提出检查要求的那个人的注意力吸引开去，因此好处不少。

入境美国确实让我们花费了一点时间，但是那只是因为美国海关的一些官员是车迷，我们得让大伙儿高兴。是否受到了刁难？根本就没有。

我们终于回到家了。

我们回国后的第一个晚上是在图森(Tucson)度过的，我们到外面去看看当地的餐馆，就像我们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不管那个地方多么富有异国情调。我们没有去品尝佳肴，而是在当地的“果蜂”连锁店吃了晚餐，店里的菜单上不仅有食物的图像还有啤酒的图像。我还有一个第一次经历，就像我第一次吃桑蚕和那条蛇的蛇胆一样。我说过，什么东西我都喜欢试一试。

书看到这会儿，你对我的举动该不会再大惊小怪了吧。旅行开始时，我是在南纬 55 度火地岛的乌斯怀亚纵向跨越西半球的，不开车到达赤道北面同样的纬度我是绝不会放弃的。确实，这样的旅行路线将把我们带到育空地区(Yukon Territory)靠近北极圈的怀特霍斯(Whitehorse)。我们将在沃森湖(Watson Lake)经过一个标记，上面写着欢迎我们到该地区的字样，并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身处北纬 60 度以北。

在赤道以上 60 度，温度是华氏零下 22 度。而现在才刚刚进入 11 月份。

我们开车穿越美国和加拿大时遇到了很多在互联网上跟我们一起旅

行的人，或者是我们停车去看他们，更多的情况是被他们拦住让他们看我们。从图森开始，几乎在每一个城市里我们都会与那些知道我们到那里去的人会面、合影、握手。后来在犹他(Utah)州我们遇到一位警察，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从大峡谷(Grand Canyon)出来在穿越犹他州的边界时，我们因超速被一位虔诚的摩门教警察开了罚单。这位警察很直率地承认，也许他的雷达测速枪的指针“停”在 78 英里上不动了。但是我们是外州人，他说，我们是否真的想在这里逗留，不怕麻烦，以期证明他随意向所有北行的旅客开罚单，仅仅是为了收取罚款？犹他州必须要赚点钱。这简直就是我与莫斯科警察和莫桑比克警察对话的翻版，安置的假超速陷阱也一样，惟一不同的是这个警察没有把钱放进自己的腰包。这当然是我的希望。

顺便提一句，世界级的景色和当地商会级的景色是有区别的。现在在第二次周游世界之后，我可以告诉你，大峡谷是世界级的景色。

在去加拿大的途中，我们经过了蒙大拿(Montana)州的狄龙(Dillon)市，这是我见过的惟一个城里的肯德基炸鸡店设有卡西诺赌场的城市。我们往北穿越艾伯塔(Alberta)，观赏了北美洲大城市之一卡尔加里(Calgary)，仍然带点西大荒的味道，但同时又非常先进，就像加拿大西部很多地区一样，因为石油价格暴涨而发生了巨变。我可能不应该感到惊讶的，但是我确实对那里完美无缺的高速公路感到惊讶，对高速公路居然能延伸到艾伯塔的北部而感到惊讶。我们在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的道森河零英里标杆处进入阿拉斯加高速公路，向怀特霍斯进发。

阿拉斯加高速公路亦称为阿尔坎高速公路，全长 1 671 英里，是一条战略性高速公路，由加拿大和美国从 1942 年开始花了 9 个月的时间修建而成的，当时是一条军事公路。这条公路起自道森河，终点是阿拉斯加州的费尔班克斯(Fairbanks)，整条公路的路面都没有铺过，直到 1992 年，为了纪念公路建成 50 周年才铺了路面。我在这条路上已经开车跑过两次了，现在是第三次在这条路上开车了，我愿意第四次开车来这里。

佩奇说：“谁会不愿意在这里开车呢？”

沿路经过的那些路边旅馆使我们想起了澳大利亚内地类似的旅店，

还有那些当地的居民。但是，美洲野牛、驼鹿、麋鹿、驯鹿和山羊从来没有跟我们抢过道，我们从阿尔坎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动物离我们远远的，比袋鼠远得多了。将近隆冬了，高速公路上除了动物和我们之外几乎空无一物。

育空地区的面积与得克萨斯州一般大，但是只有 3 万人（得克萨斯州有 2 000 万人），其中 2.2 万人住在育空地区的首府怀特霍斯。那里的人觉得零下 22 度（摄氏零下 30 度）是相对温和的温度；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想要尝试一下这个城市真正寒冷的季节，那就再等上一两个月。他们说，一月份时温度可能会降到零下 58 度。我们对他们说，我们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我们从怀特霍斯出发往正南方向行进，去阿拉斯加州的斯卡圭（Skagway），在那里接上我的母亲，她从阿拉巴马州飞到这里，再一次跟我们一起去看旅行。

母亲虽然已经 82 岁了，但是她什么地方都愿意去。这一次她是跟我的另一个侄女达尼斯一起来的，她换了好几班飞机。尽管旅途辛苦，她仍然精神抖擞，比我们上次在阿根廷见她时更为自信。我父亲已经去世半年了。尽管母亲很虚弱，但是她从不知道疲倦，除非我们告诉她，说她累了，只有到这时她才会休息片刻。在斯卡圭，我们乘汽车轮渡沿内湾航道而下，直到鲁珀特王子城（Prince Rupert），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海岸的一半，在那里我们呆了一两天，然后又乘船去温哥华岛。

温哥华（Vancouver）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城区人口不到二百万（城区不在温哥华岛上）。温哥华的自然景色壮观绮丽，群山蜿蜒而下与大海相接，众多的公园得到了极其完善的保护。美国西北部濒临太平洋的地区能有的景色这里都有，而且只多不少。温哥华是个充满活力、繁荣兴旺的城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起到了现代大熔炉的作用，是连接亚洲的通道。同美国以前的做法一样，加拿大积极寻求并鼓励移民。大量的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欧洲人、伊朗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把自己的家安在了温哥华。这让我想起，纽约在 20 世纪初也一定是这个样子。100 年之后，也许二百年之后，温哥华这个当今北美洲的伟大城市必将成为世界性的伟大城市，除非有人做了愚蠢透顶的事情。

在温哥华，我们让我母亲搭乘飞机回国，自己则开车向美国边境

行进。

本来我以为会在西雅图看到一片萧条的景象，因为波音公司大量裁员，公司总部外迁到其他地方，网络公司又纷纷倒闭。但是恰恰相反，我却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都市。我上次来西雅图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在这期间西雅图发展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城区颇具规模，大街上熙熙攘攘，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勾勒出了城市的空中轮廓线。10年以前，西雅图的乡村气息很浓，更像塔尔萨(Tulsa)或伯明翰(Birmingham)。现在在西雅图城里散步跟在纽约或旧金山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我急着要赶回家过圣诞节，要单独跟我母亲过这个节日，因此我们走5号州际公路向加州疾驰。10年前我在这条公路上骑过摩托车，自那时以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西雅图、塔科马(Tacoma)、波特兰(Portland)直到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就像从纽约开车去波士顿(Boston)一样，我们走在一条漫长的城市走廊上，但是这里更现代化，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在无垠大地上逶迤蔓延的现代化辉煌大都市。在往南行进途中，我们在旧金山、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和洛杉矶稍事停留。在周游世界时，我会向当地人了解那里的政治、人口和金融情况，佩奇则通过研究当地的市场、与妇女交谈学到很多与某种文化或文明有关的知识。因此很自然，到达洛杉矶后，我们非得去看一看罗迪欧大道(Rodeo Drive)。佩奇本来指望会在这条世界有名的大道两旁看到长长的、一望无际的商店，毕竟这里是以炫耀性消费而闻名于世的地方，但是眼前的景象让她大失所望：这条大道长不过几个街口。

圣诞节即将来临，在美国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注意到，购物商场、旅馆和餐馆到处人满为患，而我们在国外得到的印象却不是这样的。在阅读了全国的新闻报道之后（当然大多数是来自纽约的报道），我们原以为会看到一个深陷在经济泥沼之中的国家。无疑纽约正在遭受苦难，但是美国其他地方似乎在健康发展。“9·11”事件之后的美国仍然那样热闹繁忙、生机勃勃，这大出我们的意料。另一件让我们吃惊的事情是，爱国主义热情在最初的高涨之后达到了顶点。国旗四处飘扬，但是现在已经

破烂不堪了。没有看见任何人在换挂新的国旗。

在加州我们遇见了一个人，他不相信我们的经历。他说，他和未婚妻一起从加州开车去康涅狄格州，两人腻在一起 5 天时间，当他们到达新英格兰(New England)时，他们之间的婚约就解除了。

我应该来谈一谈拉斯维加斯(Las Vegas)，因为我们在那里也逗留了几天。不谈一谈这个城市的话，就会像在《圣经》时代记日记时不提到所多玛与蛾摩拉二城*一样。拉斯维加斯我去过好几次了，通常都是出席演讲会，但是佩奇从来没有去过，很想去看看。我得事先声明，拉斯维加斯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城市。首先，我不赌博。

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所有人都跟你想的一样，但是请相信我，这种想法跟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不会拿自己的钱去冒险的，永远都不会。成功的投资家的做事方法通常就是什么都不做，一直等到你看到钱就在那里摆着，就在墙角那里，你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走过去把钱拾起来。这就是投资之道。你要耐心等待，一直等到你看到，或者发现，或者碰到，或者通过研究发掘了你觉得稳如探囊取物的东西。获取这个东西不需要冒太多风险。在你下单购买之前，你一定要肯定自己买的东西价格低廉，或者你看到积极的变化即将来临。换句话说，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你才下单购买，人生中看到钱就躺在那里的机会是绝对不会太多的。

很多人在股票市场里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买了某种股票，看它往上涨，自以为聪明能干。他们觉得买卖股票容易得很。他们赚进了很多钱，立即开始寻找其他可买的东西。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真的应该什么都不干。自信心会导致骄傲，最终导致狂妄自大。其实此时你真的应该把钱存进银行，到海滩去玩上一段时间，直到自己冷静下来。因为好机会本来就并不多，更不会接踵而来。但是，你并不需要很多好机会，如果你不犯太多的错误的话。

* 《圣经》所载著名的罪恶之城，其址在今以色列境内死海南端附近利桑半岛以南的浅水之下。两城与押玛、洗扁、琐玛(贝拉)合称《圣经》时代“平原五城”。据说这两城因罪大恶极而被“燃烧的硫磺”所焚毁，实际上可能是毁于公元前 1900 年自约旦河谷至东非赞比西河流域的大裂谷中死海地区的地震。——译者注

因此同你想的恰好相反，我不是一个赌徒，从来就不是。

我从来就没有对拉斯维加斯情有独钟过，但是现在我是在用新眼光看这个城市了。也许在国外生活了3年，游历了116个国家之后，使我产生了变化。佩奇被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和无与伦比的奢侈场面所吸引，我则发现自己开始在感受和理解这个地方。这座城市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城市相媲美，它是巨额财富的聚集地，这里集中的智慧和金钱之多真让人瞠目结舌。拉斯维加斯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人造景观，巨大的综合建筑群一座紧接一座，每一座的价值都高达几亿美元。每一座建筑群本身都非同凡响，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绝不逊色于古代文明中的伟大寺庙群。这里有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建筑师的代表作，不管你认为他们的作品质量完美还是低劣。世界上伟大的设计师、著名的餐馆、有名的商店，只要你听到过的任何名牌这里都有展示。我们在拉斯维加斯期间，古根汉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在那里分别办了两场展览。连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的俄罗斯国立美术馆(又称爱尔米塔什博物馆，1764年由俄国女皇创建，是宫廷艺术博物馆，1852年开始对外开放——译者注)在这里都有展览。这座城市一天24小时不停运转。你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有。你可以在晚上任何时候乘飞机进来或搭飞机出去。拉斯维加斯国际机场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从不关闭。竭尽全力、创新精神、金钱、设计……无穷的力量……拉斯维加斯从世界各地吸引了娱乐界所有的大腕，从古典音乐家到流行音乐歌星，到动物表演，各种重大活动，大型锦标赛，网球赛，高尔夫锦标赛等等，应有尽有，同当年的古罗马没有什么两样。不管你喜欢与否，都无法改变拉斯维加斯是21世纪一个伟大的奇观和景观这一事实。

100年或200年以后，这里又将成为沙漠。不管是迈阿密海滩、坎昆还是迦太基(Carthage)(非洲北部，今突尼斯的奴隶制城邦，腓尼基人所建，公元146年被罗马帝国所灭——译者注)，所有这些东西都将成为过眼烟云。科潘从地球上已经失踪了几百年了。麦哲伦海峡曾经是世界贸易和探险不可或缺的伟大通道，现在基本上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的老渡口了。

我们于12月18日离开拉斯维加斯。我和佩奇都想回家过圣诞节：她去北卡罗来纳州跟她的家人一起过节，我则回迪莫波利斯跟我母亲一起过节。我们必须在几天内回到家里，因此路上停留的次数不能太多。

阿拉巴马州是我父亲的故乡，可以往上追溯好几代人，而我母亲则来自俄克拉荷马州，我的一对曾祖父母去那里的时候俄克拉荷马还不不是一个州呢。我母亲生在那儿长在那儿，我的外祖父母安葬在那儿。我的父母以及我的外祖父母都是在俄克拉荷马大学相识的，是在学生联谊会里认识的，因为大学的女学生联谊会就在男学生联谊会的隔壁。我们旅行期间，我的表兄妹们一直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在我们急匆匆往东赶路的途中，我和佩奇还是在诺曼(Norman)停留了一下，跟他们见了一次面。

俄克拉荷马州处于我们回家的路上，但是新奥尔良(New Orleans)就不是了。新奥尔良本身是个美丽的城市，值得我们绕道去看一看，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同样强大的动力。在新奥尔良住着一位名叫沙伦·兰伯特的妇女，她一直跟着我们“旅行”，像很多人一样在网上跟着我们，但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她跟了我们整整三年，而且她是同自己的孙子孙女们跟我们一起“旅行”的。孩子们的年龄从4岁到16岁，她给每一个孩子都买了一个地球仪，当我和佩奇在周游世界时，他们就在地球仪上标出我们的旅行路线。

沙伦和她的孙子孙女是我们最忠实的跟随者，在整个旅行中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因为奶奶坚持要所有的孩子们去了解世界。除了这些之外，沙伦还尽力帮助我的母亲。我母亲不熟悉电脑，沙伦就主动把录音记录下来给她看。我们绝对不会放过去见一见沙伦的机会的。我和佩奇请她和所有的孩子们在加拉托瓦尔餐馆吃了午饭。

现在我和佩奇面对的问题是：在哪里为我们的环球旅行画上句号，正式宣布我们的旅行到此结束了？可以想到的合适地方数不胜数。上一次是在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我的表兄弟兰达尔举办了一个聚会，庆祝我的旅行圆满结束。我们在伯明翰的皇冠车行为汽车做了环球旅游之前最后一次检修；在这之前，我们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旅行用品商店出来在乡间试了一下车，试车结束之后才从伯明翰出发开始我们周游世界的旅行。不言而喻，夏洛特(Charlotte)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选择。我是在夏洛特认

识佩奇的，而在遇见我之前，佩奇正是在这里迈入成年时期的。当然还有纽约。最后，我们在所有这些地方都举办了庆祝聚会，而佩奇的父母亲则在北卡罗来纳州落基山(Rocky Mount)为我们举办了一次精彩热闹的香槟酒聚会，让大家品尝的食品中还有佩奇特别喜欢吃的饼干夹火腿片。

我们的旅行到底是在哪里正式结束的？是在哪里正式庆祝旅行圆满成功？这就只能让大家自己去决定了。事实上，这并不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旅行是在阿拉巴马州结束的，结束在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一个人在家族的墓地与我父亲一起分享这次环球旅行的成就。

我家的墓地位于一个叫莱托哈奇(Letohatchee)的小镇里，那里除了一个铁路平交道、一个小邮局、罗杰斯家族墓地和其他一些坟墓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墓地。如果你要拍电影，需要这样一个墓地，那么这块墓地会是非常理想的选择：高大庄重的木兰树、西班牙寄生藤、白色大理石。墓地里有很多古老的坟墓，还有野餐的场地。罗杰斯家族每年正是围着这些野餐桌举办家庭团聚会的。我记得小时候，团聚会是在7月份举行的，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为墓地的草坪割草、清理野草。我可不认为拔野草是夏季的一项娱乐活动，在7月份阿拉巴马州的烈烈炎日下更不是一项好差事。某一天，不知道谁灵机一动，建议把团聚活动改到5月初举行。也许这同一个人还提出，花钱雇人事先把场地整理好。这之后，团聚活动真的是其乐无穷了。

我父亲的癌症一确诊，他就立即着手对房子进行多处修缮，这样，他去世后，我母亲就不必为了诸如修理屋顶这样的事操心了。他在墓地里也做了很多工作，挑选墓址，加固墓地，在我们家族的墓地周围建起一道新的围栏。他建了一堵混凝土的加固墙。他原以为自己只能活6个月。幸运的是，或者说不幸的是，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干所有这些活。

我母亲跟我讲了葬礼的事。我有4个兄弟以及不少侄儿侄女。棺木放到墓穴后，我的一个兄弟走过去，开始把泥土铲到坟墓里去。然后其他3个兄弟和所有的孙儿孙女也拿起铲子，一家人一起用泥土把墓穴填平。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人在葬礼上是这么做的，当母亲把这一切讲给我听时，我直后悔自己当时不能身临其境。我没能参加葬礼，为此觉得自



在莱托哈奇的家族墓地，我拜谒了父亲的坟墓，告诉他，
我们终于实现了周游世界的梦想。我把这次旅行散
献给他，并开始思考这次旅行对我们的意义。

己有愧于母亲。当我宣布打算环球旅行时，我父亲叫我和母亲都坐下来，态度坚决地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应该中断旅行，而我母亲则很明白地表示，她的看法完全相反：如果她发生意外，她告诉我说，我就必须立即赶回家。

当我和佩奇往家里送鲜花时，我恳求迪莫波利斯花店的人在送花时顺便送一幅世界地图。我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父亲：爸爸，我们在作环球旅行，我们是为了你而这样做的，我们没有中断旅行，我们在周游世界，而这正是你一直想做的事情。花店的人在镇上找遍了也无法买到一幅世界地图。她能找到的惟一一幅地图是阿拉巴马州地图。我们只能靠这个方法来说让父亲知道，我们在实现他的愿望，并且把这次旅行敬献给他。

这是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圣诞节，过去我对圣诞节是很不当一回事的。自从我离家去上大学后，尤其是去了英格兰之后，由于来回奔波不是很方便，我已经习惯在外面过圣诞节了。我在陆军当兵，或者在华尔街工作。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我也经过了一个不想回家的阶段；我太成功了，因此不用回家，我太忙了，因此无法回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事情开始起变化了，我开始经常回家了。父亲的癌症确诊后，我回家就更勤了，尽可能多地回家。

12月24日，即我回家两天之后（佩奇继续赶路回落基山，以便跟她的父母一起过圣诞节），全家人都到齐了。我的一个兄弟被征召去中东服兵役，估计很快会被派到海外。那天是他惟一可以到家里来的日子，因此我们就提前过节了。第二天，也就是圣诞节，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母亲了。家里有一种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宁静与祥和。尽管我不很清楚是什么原因，但是我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少有的平和。

两天之后，我只身一人去探访父亲的坟墓。我不知道自己期望或者想要什么，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情景确实让人难受。墓地里似乎寒冷异常，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令人沮丧。但是我想不出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让我开始全面回顾我刚刚完成的环球旅行。

16

重 归 故 里

在异国他乡旅行的三年里，我对美国有了更深切的了解，远远超过我在美国国内开车行驶六个星期所能了解的程度。想想在时间多寡方面的差异吧，我想，这也说不上有多么深刻的含义。也许事情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不管你自以为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有多么深入的了解，也不管你在这个国家里旅行过的范围有多大，如果你真心想要了解美国，那就为你自己做件好事，走出国门到外面去呆一段时间吧。

有一件事情一直让我忧虑：大多数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真是少而又少，更可悲的是，他们甚至根本不愿意去了解。环球旅行回来后，我的这种忧虑就更深了。美国人不仅对世界其他国家不感兴趣（他们对自己的无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就是对这个他们身在其中的国家同样所知甚少。确实，如果你对世界其他国家不了解，你就不可能了解自己的国家。

我是满怀着兴奋的心情返回故里的，庆幸自己能活着回来，同时也在问自己：我是否还会再从事这样宏伟的事业？但是回国后我所见到的人却让我一再感到失望：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我告诉他们：“我们开车周游了世界。”他们却问我：“乘的是哪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或者说：“这一定很有趣。要花多少时间？”我就告诉他们：“三年。”然后再跟他们说一遍，让他们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真正意识到我们这次旅行的艰难：我们行程 15.2 万英里，游历了 116 个国家。

许多人不能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在作有关这次旅行的专题演讲时，我会给听众展开一张地图，上面显示我们的旅行路线，我请大家随意点出 6 英寸的一段旅程。在一张较大的世界地图上 6 英寸不过是短短的一条线，但是对我和佩奇来说则意味着数十种不同的遭遇：磨难和困境、失望和成功。可品味一生的酸甜苦辣的心情和冒险经历都浓缩在这短短的一条线里了。

另一方面，有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到过的一些地方，这让我感到失望。换个角度来看，这确实也不太令人意外。你会发现，美国的新闻媒体对世界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几乎不作任何报道。我们美国人在地理上一直就是与世隔绝的，因此很容易在政治上也与世隔绝。许多美国人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了解法国、波兰或者乍得。美国新闻界的人士也不例外。

而当美国新闻界真的报道世界其他国家的新闻时，这种新闻往往是有偏见的，外国的观众可不像美国观众那样天真、那样不见世面，我们的媒体因其偏见而煽起了外国观众的爱国热情。在我回国之后，美国的新闻界实际上实施了新闻审查制度，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要求，不报道中东的某些事件。

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世界局势，我订阅国外的期刊，听海外的广播，如以色列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然还有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英国人提供的国际新闻的质量一直比美国新闻单位提供的要高出一大截。英国公民总是可以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就像所有欧洲人一样，英国人有一种放眼世界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美国媒体公司派驻海外的办事处已经只剩下几个了。

假如中非共和国发生了爆炸事件，美国人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或者充其量也要等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之后，也就是等某个美国机构终于派出记者到达现场之后，才会知道这件事。（更有可能的是，美国新闻机构会采用英国广播公司的供稿或者利用路透社的电讯稿。）一般的美国人永远都不会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很明显，一般的美国人根本就无所谓，即使那些嘴上说自己在意的人往往也就是说而已。他们不愿意去深入了解马来西亚或赞比亚，或任何其他国家。

为此，我们在2001年9月11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美国公民这种对外界孤陋寡闻、不愿意去了解的态度自然会反映在我们选举出来担任政府要职的人身上，这些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水平之低实在令人汗颜。

让我现在就把我的观点亮出来吧。我对世界上那些自称为公务人员的人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世人对他们评价很低，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你可以问自己：这些人为什么会步入政界？答案是再明显不过了：这些人是在学生时代是以会玩出名的。课间休息时，这些人无论干什么都很出色：在教室外跟女孩子调情、打弹子、跳绳、打球等等，样样都行。研究表明，在中小学读书时课外活动表现优异的人最终都会进入政界，而且通常在政界混得很好。

世上有能力建立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国家的政治家极为少见，迫使这些人只能进入政界混饭吃。哈里·杜鲁门从商失败，不是失败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比尔·克林顿从来没有在一个正规的公司干过。小布什干了两三家公司，但是都失败了，后来有人给他买了一个棒球队。我并不是说，会管理公司就一定表明智商高或者能力强，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在成功人士，在那些精通生活之道的人士中，很少有人会去从政，而且肯定不会在早年从政。有些人发财了，然后才从政（事实上，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富人实际上是用钱在买参议员和市长的职位）。但是除了提供政治经验之外，还能向政界作出其他贡献的政客犹如凤毛麟角。而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如林登·约翰逊，在离职时钱囊饱满，他们利用自己的职位大谋私利，从建国以来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当年帕特里克·亨利和乔治·华盛顿就在投机未开发土地时大捞了一把。

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是本届政府中世界观最为成熟的人。我猜想，这可能因为他的父母是移民，而他本人又是军人出身。在政府的绝大多数其他成员中都不了解世界，也根本不想去了解世界。例如，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就与鲍威尔不同，她的背景不仅没有让她受益，反而使她为之受害。赖斯在学生时代主修俄语，她在政界一步一步往上爬，成了苏联问题专家。她几乎不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因而赞成一项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因为她必须这样做——这项政策能确认她具有

所谓的专门知识，而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她就会成为多余之人。

国务院内有许多拿高薪的官僚，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就是建立在反中国的政策之上的。即使他们能看到一线曙光，他们也不可能向着曙光前进。我们的古巴政策如出一辙。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无法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了。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看好古巴的未来，正在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在我们眼里，古巴人肮脏得要命，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摧毁我们在古巴的可能机遇。为什么这样做？因为 45 年来，已经有一帮官僚凭借这项政策升上了高位。

在思考官僚的仕途经历时，我不由地想起了悲痛的不同阶段：被排斥、争辩、愤怒和接受。晚期病症是这样，伟大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是这样。当某人突发奇想时，所有人都不当他一回事。然后，他们对他的想法加以取笑、激烈驳斥，最后才予以接受和支持。然后他们不仅不由自主地去解释为什么这个思想闪烁着光芒，而且还恬不知耻地说：“当然，这都是我想到的。”历史上这种例子举不胜举，不管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战争方面，都充斥着这种事例。比利·米切尔将军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宣称航空母舰是未来战争的利器，但是却因此被革除了军职。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这回事了，军队里的人更是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大家都明白必须迅速声张正义。我还觉得，随着真相逐渐显露，也许某个在华盛顿的人会说：“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政策，看看我们是否能改进我们的工作。”我周游世界时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树敌过多。这也许是因为在柏林墙倒塌后美国政府有点迷失了目标，决策者们一直以来全力关注的都只是一个方向。前苏联顷刻之间解体了，这些人无所适从，这是可以理解的。世界发生了巨变，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们的外交政策部门没有为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作好准备。也许这是因为事出突然，亦有可能是官员们无能，总之在攻击世界贸易中心的事件发生之前的 10 年间我们结下了太多的仇敌。

令人遗憾的是，华盛顿至今尚未进行重新审视政策的工作。权力中

心所在的大厅里传出的言辞仿佛是 20 世纪 50 年代写就的东西。我记得高中老师当年告诉我，美国之所以打赢了所有的战争（这是发生在美国去越南冒险之前的事），是因为上帝站在我们一边。我的老师们都相信这一点，我当时也相信。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质问一下。美国人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是受到诅咒的。

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一再重复的主题。19 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就在书中这样写道：欧洲的所作所为都是神的意志。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一点。

在我们回家途中，我被邀请去参加一次智囊团的会议，我谢绝了，因为他们对我说：“我们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看待美国的，我们只要你讲讲旅行的见闻。”不久以前我和一位前美国国会议员一起参加一个小组会议，他大力赞美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提出了一个贻笑大方的论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名至实归，当仁不让，而事实上我们也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他为此提出了依据：是我们美国人创造了汽车，是我们美国人创造了电视机。国会议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们美国人在历史进程中确实取得过某些辉煌的成就，但是我们的政策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显像管和电视机都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前者是 1897 年在德国诞生的，后者则是 1925 年英国利用德国的技术第一次展示给世人的。我们也不是电视播放服务的开山鼻祖，开创此行业先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时间是 1936 年。我们美国人是在欧洲人的电视流行半个多世纪之后，即到了 1953 年，才在这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第一次成功地发射了彩色电视节目，对电视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汽车也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在汽车历史的每一个方面欧洲人同样都要比我们先进，从 1770 年开始，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都有所贡献。内燃机是一个比利时人于 1860 年发明的。美国人直到 1908 年亨利·福特推出了 T 型车之后才算加入了汽车行业，而这已经比德国的卡尔·本茨推出第一辆汽油驱动的机动车晚了整整 23 个年头了。

深入探讨历史的做法不符合美国那些政客的愿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也不受国务院欢迎。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也许有利于赢得选票、有利于获得选民的赞同、有利于五角大楼获得经费，但是对公民、对社会

或者对经济则从来都是有害而无利的。美国为什么会成为受攻击的目标呢？有人对你说：“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富裕，因此遭人嫉恨。”说这种话的人绝对是对世界无知到了极点。就人均收入来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比我们要富裕。日本、新加坡和瑞士都比美国富裕。没有人去轰炸它们。“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享受着自由。”全世界的人听到布什说这句话时都会盯着你说：“他在说什么疯话？没有人恨自由。如果要说的话，我们喜欢美国就是因为它给民众自由。”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听到过任何人说：“我要出征为祖国捐躯，好让我的子孙后代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许多人会告诉你，若论公民享受自由的程度，美国在他们看来根本排不上第一位。但是并没有任何人要炸毁以自由程度高而闻名于世的荷兰。

你如果想要得到正确的答案就得提出正确的问题，并且问对人。任何参与战争的人、经营公司的人或者哪怕是与人发生争辩的人都需要明白一点：自己的敌人、竞争对手或者对立面到底想干什么？不然的话就不可能在战场上取胜、在市场上赢得份额或者在争辩中击败对方。全世界每一所军事院校都会这样教导学生：必须了解对手的想法。敌人也许是疯子，但是你必须了解他头脑里在想些什么，否则你就不可能打败他。

我和佩奇在周游全球时几乎没有见到任何反美情绪。也许是因为我们游历的那些国家美国人很少去，我们成了当地人好奇的对象。每一个人都想尽地主之谊。我们碰到的所有人几乎都想到美国来。我认为，一般来说，民众是会把公民及其政府作一区别的。《哈泼斯杂志》于2002年夏天报道说，美国是年轻穆斯林眼里最好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形与此相似。很多人对美国的政策不满，但是他们并不一定对我们不满。全世界所有人似乎都知道美国人民是好的，但是他们似乎也知道，美国人只要一到华盛顿当官就会发生变化。

世界人民对我们的政策不满，这并不令人奇怪。华盛顿对干涉别国政府的事务从来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对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活动都要插手，而且往往帮了倒忙，有时甚至就是因为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而惟一的受益者似乎就是那些在华盛顿的三十来岁的专案管理员。如果我们花同样的时间和金钱来料理国内事务，我们的境况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会比现在要好得多。

美国为了别国的事不惜花费几十亿美元，朝鲜就是最好不过的例子。朝鲜对美国根本构不成威胁。如果该国政权真像美国所说的那样危险，那也是其邻国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日本、韩国、俄罗斯和中国都距离朝鲜不过几英里，这些国家可以采用很多手段来对付这个只有 3 000 万人口的破落国家。如果朝鲜政局不稳，其可能存在的核计划并没有让这些国家感到担忧的话（实际上，韩国现政府和前几届政府一直在积极地促使朝鲜开放），我们何苦要对此多费心思呢？何况我们自己国内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呢。把我们浪费在别国事务上的资源拿过来用在对付癌症上，我们也许就可能战胜癌症了。

一个国家的势力过于扩张总不是件好事，尤其对一个背负债务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英国和西班牙曾经是强大的国家，它们试图在许多地方维持自己的存在，最终拖垮了自己。我不希望看到美国重蹈它们的覆辙。势力过于扩张会威胁我们的货币、我们的力量 and 我们的经济，最终会威胁全球化进程，从而影响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陷入这种境地的国家从来都是无法全身而退的，最终它们往往会面临危机，至少是面临半危机状态。把我们的资源铺得太开，尤其是在太多的地方显示我们的财政和军事实力，会进一步在全世界引起对美国的敌意，从而产生恶性循环，导致我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来维持自己的安全和繁荣。不再充当多管闲事的世界大叔会为我们省下很多资源，我们可以将这些资源用到其他地方去，包括用在国内。如果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十年后，在冷战结束 14 年后不再派军队常驻欧洲、日本、韩国等地，我们就可以节省成百上千亿美元，少结几个仇敌，减少成为被攻击目标的机会。

华盛顿不断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到目前为止，我们确实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但是我们还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超级大国。我们目前只有 12 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拥有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空军战机的平均机龄已达 20 年，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们的许多雄伟战机会变得毫无用处。2001 年期间，美国声名显赫的 B-1 轰炸机只有 31% 处于适航状态。我们只有 21 架 AC-130 强击直升机。在阿富汗，我们几乎用尽了我国的巡航导弹，而这还是一个相对小型的军事行动。

对一个决心把自己的权力映射到全世界的国家来说，这样的军事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而花钱去取得这样一种军事潜力会就让美国破产，在地缘政治上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们出门在外期间，美国的媒体、政府和华尔街频频向全国人民保证，美国物价稳定，通货膨胀受到控制，而这无疑是弥天大谎。我们认为国内的情况并非如此，国内应该出现的状况绝非如此，而我们最终发现实际上的情况与他们所说的大相径庭。当我和佩奇回到国内后，我们对物价暴涨大感吃惊：不管是电影院的票价还是爆米花的价格，不管是干洗衣服的价格还是取暖费、学费、律师费、邮资、会计费、牙医费、水管工费、电工费、糖果价格、医疗费、住房费、体育运动比赛门票、过路费、杂费、电话账单、娱乐费用、餐馆、套装、保险、燃料、食物或者地产税，同我们离开时相比，这些费用统统都涨了一大截。不出所料，政府在媒体和华尔街的配合下正在大玩文字游戏，而正像大多数文字游戏一样，这种文字游戏只能哄骗一些人，只能哄骗一段时间。

1996年，一个总统特别委员会宣布，政府一直以“不恰当的方式”报告生活费用，并创造了一种衡量通货膨胀的新方法。预算办公室采用了“享乐指数调整数”的方法，他们报告的物价上升情况远远低于原先的计算。根据劳工统计局的计算，雪佛兰汽车的实际价格没有上升，因为新出厂的雪佛兰汽车比旧型号“更舒适”。汽油价格不是上涨了20%，而仅仅上涨了15%，因为现在的汽油比以前的汽油要“好”。

最近出版的统计数字表明，构成消费物价指数的数字中有56%的数字现在经过了“享乐指数”的调整。这个词条并不是我杜撰出来的，劳工统计局就是用它来描述有关调整的。由于“调整数”把社会保障费用和生活费用的上涨保持在低水平，使政府易于平衡联邦预算。我们可以假设，这些“调整数”还会用下去，而56%并不是他们的底线。事实上，现在正在进行新的“研究”，看是否需要再次修正计算程序。

劳工统计局于2002年11月报告说，取暖费用下降了11.1%，而根据《华尔街日报》和市场的报道，事实上价格却上涨了20%。同样，劳工统计局报告说“2000年5月汽油降价”，而美国能源部在2000年5月却

报告说，价格上涨了 20% 以上。这些数字是很容易核实的，然而华尔街和新闻界却问都不问就接受了政府提供的数字。但是当时正是这些人说股市牛气冲天，“新经济”正在形成（而所谓的新经济只是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报纸上而已），而事实上当时股市并非牛市，“新经济”也属于虚乌有。

为了强制维持低利率以挽救华尔街和股票市场，联邦储备银行正在快速印制钱币。但是历史一再表明，市场的力量，或者自然的力量，或者现实的力量，最终会发挥作用，利率最终会上升。因此，你最好现在就重新贷款，或者出钱购买普林斯顿俱乐部的终身会员资格，尽可能锁定利率，因为现在价格的上涨速度会变得更快。

在我旅行期间，我发现人们（那些注意美国的人）对美国的数字不敢置信，因为全世界的物价都在上涨。不错，石油价格在我出国期间下降了一两次，但是与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离开时相比，石油价格却上涨了不少。市场价格总是呈 Z 字型上升的，没有任何东西是直线上升或直线下降的。几乎所有东西的实际价格都上升了，但由于政府所采用的会计方法，价格上涨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就被整个社会接纳了。如果你一生中沒有学到其他东西，你一定要学会如下道理：不要听从美国政府，或者任何政府提出的投资建议，实际上不应该听从它们提出的任何建议。

我回国后接到了劳工统计局（该局负责报告通货膨胀的数字）一些前雇员的来信，他们说，外面的传言说得不错，他们确实常常被要求“抹平”任何大的上升数字。美国在计算劳动力、经济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方面一直采用这种胡言乱语的方式。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全世界各国政府多年来所发布的数字也都是虚假的数字。例如我们知道，在前苏联时期，它所报道的数字是假的。（但是至少它还提供假数字；根据我的个人经历，我可以这样说，如今该国根本没有任何人在收集或者汇集任何真实的数字了。）

欧洲人经常指出，如果他们像我们这样报告他们的数字的话，他们的账面看起来就会好看得多了，尤其是如果他们采用克林顿和艾伦·格林斯潘手下那帮人发明的技术的话。世界其他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做账，对我们报告的数字大不以为然。仅仅在数年以前，当华盛顿还在大唱赞歌，

庆祝预算实现平衡时,政府的总债务却在增加。如果你我采用美国政府的方式记账的话,我们准会被关进监狱的。

说到这里,我们该谈谈美国的公司了。

国内目前对公司做假账一事是一片喊打之声。毫无疑问,做假账的程度很严重。历史上每一次出现民众想一夜致富的狂躁情绪时,就会有人走捷径,找窍门,而且他们往往能够得手而不受惩罚。市场往上抬高时,谁都不会注意。大家都不关心。事实上,这种不当手法还得到鼓励,因为这种手法有利于维持市场的上扬趋势。

但是,现在不仅股票巨幅下跌,而且许多公司和政府的退休金计划也大幅度缩水了,尽管对这方面的报道并不多。不用几年时间,许多雇员和目前拿退休金的人就会大吃一惊了:他们原想拿到正常退休金的期望要破灭了。政府的一个机构——国家退休基金保险公司——保障我们的退休金,但是从技术上来说,这个机构同样也破产了。

20世纪30年代,时任纽约股票交易所代理主席的理查德·惠特尼锒铛入狱,我说的这个惠特尼就是惠特尼家族的那个惠特尼,就是惠特尼博物馆的那个惠特尼。他也参与了投机取巧造假账的活动,但是他是在泡沫破灭之后才被当场抓住的。每一次出现一夜致富的狂躁现象时,这类行为就被忽视了。甚至觉得这类行为是有利的,大家希望出现这样的事。只有到了全面崩盘时,大家才会问:“你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呢?”

世通公司那些人在1999年和2000年所干的勾当,当时每一个人都是举双手赞成的。现在,当然,这帮人要进监狱了。问题是:这些人仅仅是笨蛋吗?很多时候,他们确实是干了傻事,我可不愿意建议,因为某个人愚蠢就把他关进监狱。其他许多人应该进监狱,如环球电讯公司的加里·温尼克,因为他把自己公司价值七亿多美元的股票卖掉,卖掉的钱落入了自己的腰包。他的“公司”在成立几年后就消失无踪了,他没有为社会或者这个世界创造任何东西。其他雇员和投资人上了他的圈套,血本无归,而他仍然还有几十亿美元的资产。温尼克曾经为德崇证券公司干过,这个公司以前设过圈套,联邦政府开始把该公司的人关进监狱时,公司就倒闭了。这个家伙别的不会干,就会让别人破财,而他自己则从中捞取了几十亿美元。像他这种损人利己、中饱私囊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只能

希望法律体系最终能发挥作用。否则的话，也许会出现“恶有恶报”的传统结局。历史上有过许多暴发户死时穷困潦倒的事例，因为他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因而手头的钱来得快，去得更快。

国内这样的丑闻层出不穷，但是你还是不断听说，外国人如何想把他们的钱投到美国来，因为美国的会计标准和规章制度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优越。当然，这种话是无稽之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会计标准和惯例——不管是政府部门的还是公司的，都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在世界许多国家里，会计师和管理层必须证明财务报表准确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在这方面，他们只要遵循几十条细则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细则是可以用很多方法来解释的，尤其是细则多得数不胜数时。我举个例子。如果通用电气公司不采用投机取巧的会计方式，其股价就永远不可能升到 60 美元的价位。当时所有人都对此喜笑颜开。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会损失很多钱，向税务局缴纳更多的税，而本来他们是不会损失这么多钱的，因为通用电气公司、IBM 和住房抵押贷款协会，以及其他许多公司的股价都高得离谱了。大家希望政府采取行动。我的看法是，政府不应该做任何事情。因为眼前的压力而作出反应往往会适得其反，而有史以来政府走的却都是这条老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任其自然纠正，尽管会有暂时的痛苦，但却是惟一有效的治理方法。但是得想法说服艾伦·格林斯潘。

鲍伯·伍德沃德写了一本名叫《艺术大师》的书，是关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但是他对格林斯潘所做工作的了解不会比他家里那条英国小猎犬多到哪里去。他整个地被公共关系这架机器吸进去了。他也许在 1999 年买了很多股票，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因为他觉得格林斯潘是个天才。事实上，格林斯潘的失败事例不胜枚举。这就是为什么他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原因。他从来就称不上是一个成功人士。

1974 年，他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头头。当时，美国已经显现通货膨胀的端倪。格林斯潘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散发印着“WIN”（英文“立即制止通货膨胀运动”的缩略语——）字样的小徽章。不用说，在他的任期内，通货膨胀如脱缰的野马完全失去了控制。不管他怎么努力，都以惨败告终。于是他回到私营部门工作，在那个位置上他拼命游说，获得了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这个职位。

几乎就在他一得到这个职位之后就发生了 1987 年的大恐慌，股票市场在一天内就暴跌了 20%。从百分比上讲，这是有史以来股票市场最剧烈的崩盘。格林斯潘本人和他嘟嘟囔囔的抱怨与这次崩盘脱不了干系。崩盘前一个星期，格林斯潘唠唠叨叨地一再重申，美国的贸易差额状况正在改善，局面得到了控制。两天后，贸易差额的数字公布了，是有史以来最差的。我和许多投资人，尤其是那些国际投资人，立即认识到：“这个家伙不是傻瓜，就是骗子。他对局势一无所知。”我们现在知道，格林斯潘不是骗子。他对股票市场从来没有搞懂过，对经济也是一窍不通。

1998 年，一个大基金——长期资本管理——损失了几十亿美元，陷入了窘境。如果该基金垮掉了，将对华尔街的许多公司产生影响。投资银行找到格林斯潘，向他哭诉。本来，格林斯潘应该让该公司破产，进而清理金融系统，就像几百年来熊市所起的作用那样。但是格林斯潘害怕得乱了方寸，把很多钱投入金融系统，帮助他的朋友解了套。这种轻松送钱的做法更加助长了暴富心态，使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从而形成泡沫，现在泡沫破了，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突然之间，大量的低息贷款流入市场，而这些低息贷款总得有个去处。十有八九，这种贷款的首选之处就是金融资产——股票、债券、初级商品，因为这个去处很容易进。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之后的 18 个月里，泡沫化达到了顶峰，也就是纳斯达克股票暴涨的时期。请记住，美国公司的利润在 1997 年达到了顶峰。1998 年，股票市场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在那一年，美国 60% 的股票下跌了，1999 年呈现了同样的态势。利润再创新高，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但是，如果你看看股票平均指数或者你看电视的话，你会看到所有的人都为“新经济”和牛市疯狂不已。当时共同基金的销售额开始开创历史新高。真正的趋势被掩盖住了，因为思科公司的股票天天在上扬，微软的股票则从没有下跌的时候。如果你把大约三十来种给人以假象的大股票抽出来，你就会很容易看到，熊市早已来临了。尽管格林斯潘一再努力，但是市场有其运行之道。

但是格林斯潘面对短期危机却惊慌失措了。他大印钞票，是造成泡沫的始作俑者，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格林斯潘没有让筵席及时收

场,并拿走潘趣酒碗(潘趣酒:一种用酒、果汁、牛奶等调制的饮料——译者注),而是让气泡越胀越大,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他还不停地往潘趣酒碗里加烈酒。从他提供的各项证词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促使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确实相信了有关“新经济”的那些高谈阔论。如果他插手,我们本来就会经历一次正常的熊市,他的袖手旁观可能会使一些人暴跳如雷,但是这种结果比他插手造成的后果要好得多,他干预的结果只能是造成大家损失巨额金钱。在类似的局面中,政府总是对电话线另一头传来的慌乱声作出反应,而不是参照历史经验,并对慌乱的人说:“对你们这些人来说,最好的结局就是让你们破产。”政府应该尽力静观其变,让金融体系自己来作出调整。但是政客们必须拍他们的选民和捐款人的马屁。

我认为,格林斯潘完全可以想到一条既能挽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又能避免制造泡沫的两全其美的策略。他可以放松银根,向市场投放大量头寸,同时提高对保证金的要求,从而增加投资股票市场的费用。大家似乎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就在1996年,他还谈到过保证金要求可用作控制投机的手段。部分原因是,他后来对华尔街的骗局也深信不疑了,但是我仍然无法想出他不这样做的令人信服的理由,除非他是为了帮助自己在高盛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朋友。

在2001年,格林斯潘再次惊慌失措。那一年,如果以百分比来计算的话,美国中央银行印发的纸币比共和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格林斯潘一直不停地往国民经济里注钱,货币扩张的程度史无前例。同时,财政政策却放松了。政府在这两个方面都随心所欲,布什总统花钱的速度可与格林斯潘印钱的速度相媲美。不管是从财政上还是从货币上来看,全世界都钱满为患。美国人自言自语道:“嗯,看来情况并不坏。”你认为这样的局面可以维持多久呢?所谓的艺术大师凭借降息的手段现在已经造就了房产和消费泡沫。要解决泡沫问题总是很痛苦的,当这次泡沫破灭时,受损害的人数会比以往只多不少。

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很明智,他在1998年离开了政府部门。但是,鲁宾很聪明,是个精明的股票交易手。格林斯潘就没有那么聪明了,他没有离开,但是话又说回来,离开政府部门后他又能走到哪里去呢?他

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找一份新的工作，而他又是那么愚蠢，根本不知道自己给经济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中央银行及其金融家们像上帝一样能创造奇迹，这种想法是西方国家近十年来才形成的。央行和央行的金融家们现在享有了崇高的地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美国中央银行行长的名字或英国银行董事长的名字。这种现象也会过去的。如果局面突然之间变得不可收拾，我们也许就得在联邦储备银行未垮台之前就将其取消了。美国有史以来有过三个中央银行，前两个失败了，现在这个无疑也会走上末路。

在哪里可以找到一种健全的货币？美元具有本质上的缺陷，欧元有问题，日元也有问题。艾伦·格林斯潘和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伯南克已经正式宣布，联邦储备银行将尽全力防止美国国内的物价下跌。为预防通货紧缩，他们将加紧印制钱币，需要多少就印制多少，以购买国库债券、公司债券，以及购买“不动产、金矿——购买任何资产”的方式将钱注入经济体系。总之，他们将用尽一切手段把物价抬上去。对我来说，这就是抛售美元的信号。

任何人只要认为将发生通货紧缩，那么他就是没有了解 21 世纪中央银行的运作过程。今后很有可能会发生通货紧缩性崩溃，但是在此发生之前，政府会拼命印钱，直到把全世界的树木都用光为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一种安全的替代货币。40 年以前，全世界还知道瑞士法郎、德国马克，还有其他一些货币是由该国人民规定必须保持稳定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政客们已经学会用货币贬值的方法来购买选票。我一直不停地在寻找一种安全的货币，用它来保有我的投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我只发现有一些货币比其他货币安全一些。我有世界上使用的好几种货币，但是对任何一种货币都缺乏信心。

历史上一切具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家都告诫不要将货币贬值，列宁曾说过，将货币贬值是推翻任何一个社会现有基础的最有效手段，因为这是一种狡诈阴险的伎俩。对这种现象有所观察的人，不管是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还是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都对此表示赞同。凯

恩斯说：“列宁说得完全正确。”海明威对世事阅历很深，能够看透事物的本质，他说：“对一个管理出了偏差的国家来说，第一贴万能药就是通货膨胀；第二贴药就是战争。两者都能带来暂时的繁荣，也都会造成永久的毁坏。政治和经济机会主义者对这两帖药都情有独钟。”

当尼禄(古罗马暴君——译者注)于公元 54 年在罗马登基时，罗马使用的是纯银或纯金的硬币。到了公元 268 年，银币的含银量只剩下 0.02%，而金币则从市面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聪明的罗马人把他们的财富从贬值的硬币里取出来用于投资，以维持财富的价值。

这使我想起一件事：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对诺克斯堡(Fort Knox)(诺克斯堡位于美国肯塔基州，是美国政府用于储藏黄金储备的金库——译者注)储藏的黄金进行过独立的外部审计，尽管对此提出过反复质问，美国政府却拒绝予以说明。也许，大家都害怕走进诺克斯堡。职业安全和卫生管理局最近确认，丹佛和费城(Philadelphia)的美国铸币厂是“联邦政府内最危险的工作场所”，费城的运作因而被停止了几个星期。

事情总是要发生变化的；永恒不变的事情是没有的，尤其是一个人的投资组合。但是金融市场的泡沫和暴富心态却一模一样，在整个历史长河中都是这样的。大家都在高喊：“新经济，新经济！”这种话我们以前也听到过。铁路改变了世界。收音机改变了世界。美国无线电公司曾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之一，赚取过巨额利润。但是，如果你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买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的话，你永远不会赚到一分钱，因为这个股票的价位再也没有高过当年股民狂热时炒到的价位。如果你在 19 世纪 40 和 50 年代买了铁路股票，你将遭遇同样的命运。铁路是 19 世纪之后才出现的。当然，铁路最终在整个世界星罗棋布，火车成为主要的运输和交通形式。但是大多数买了铁路股票的人没有赚到一分钱。你必须在股民狂热之前或者在发财梦破灭之后购买铁路股票，这样你才能赚到钱。你要在所有人都说“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再买铁路股票”时才去买铁路股票。

汽车改变了世界。美国有一段时间有几百家汽车公司。除非你碰巧选中了两三家生存下来的公司，否则你是永远赚不到钱的。通用汽车公

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公司，但是除非你绝顶聪明或者福星高照而选对了这家公司，并且在股价暴涨之初就买到手，否则你永远发不了财。在出现狂炒股票的现象时，所有的人都会加入炒股行列：街角上卖香蕉的小贩、女理发师、老大爷、老大妈；你去看医生或者看牙医，接待员想跟你谈的只有股票，是她在电视上看到别人在谈论的那些股票。当泡沫大到这个程度时，聪明人已经把钱撤出来了。伯纳德·巴鲁克是个传奇式的金融家，给好几位总统当过顾问。有一天，他在华尔街上擦鞋，擦鞋童向他提供了股票赚钱的秘诀。巴鲁克一回到办公室就把所有的股票全部抛出去了。

华尔街的牛市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形成的，但是当时没有人相信这一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 1966 年是 1 000 点，1982 年该平均指数低于 800 点。16 年之后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20%，这还没有把通货膨胀的因素计算在内，而这 16 年是美国历史上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没有人会为了熬到能领取自己公司 401(K) 养老金的年龄而等这么久。

在 1982 年，你不会看到很多杂志把最新的热门共同基金管理人当作封面人物来报道；你不会看到很多投资顾问跑来跑去接受采访。大家没有人在信用卡上借钱，把自己的房子作二次抵押贷款，把借来的钱急忙投资到股票市场。事实上，当道琼斯指数增长了 50%，到 1 200 点时，很多人在说：“你最好抛售，因为这不合常理。股票上涨得太快、太高了。”

到了 1998 年，炒股票的狂热达到了顶峰。但是如果跟新闻界、跟大众或者跟华尔街说，这样的情形是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的，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对你翻白眼。大家都会以怜悯的眼光看着你。大多数股票早已走低了（请记住，60% 的股票在 1998 年是下跌的，大多数股票在 1999 年下跌了），然而共同基金的销售量却如日中天，因而也确保了后来的巨大损失。他们会对你说：“这次不同。这次是不一样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刊登了有识之士的文章，解释说不存在泡沫。只要有人告诉你说，这次的投资情形与以前的不同，你就赶紧拿了钱走人。从来就不存在不同的投资情形。从来就不存在“新经济”。从来就不存在“新时代”。《金融时报》报道说，上一个 10 年期末由于夸大了信息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作用，由此花费的钱所得到的是负收益。新闻界最近

开始不再把“新经济”几个字的首字母大写了。

据说德国银行家、罗特席尔德家族银行创始人迈尔·罗特席尔德在被问到怎么发财时，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两件事情。他说，他把买股票的时机选择在大街上血流成河的时候，也就是众人恐慌混乱、市场愁云密布的时候。（就老罗特席尔德来说，在拿破仑战争的混乱期间投资，血流成河既是一种比喻也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他总是“提前”脱手，他从来不等激情到达顶峰，他总是知道脱身的时机，总能做到带着自己的钱全身而退。

迈尔是否会买今天的股票，我表示怀疑，因为不等到大家都对股市绝望的时候，迈尔是不会出手买股票的。毕竟，华尔街里还有许多人仍在大把大把地赚钱，失业率只上升了一点点，按照历史数据来衡量股票价格并不便宜，而共同基金也仍然很红火。迈尔也许会说，自从1990年以来，日本共同基金的资产损失了95%，这更像是大街上血流成河的景象。

如果迈尔仍然在世的话，我猜想他会把自己刚刚卖掉股票拿回来的钱投资于初级商品市场。不错，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期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股票收益颇丰，而原材料价格却一路下跌。60和70年代的情形与此正好相反。从1906年到20世纪20年代，股票价格一直原地踏步，而初级商品的价格则节节上升。这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是这种情况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种周期总是在供应和需求形态出现转变时发生。80和90年代期间，所有的人都投资了股票，但是投资于提高自然资源生产能力的资金却很少。在70年代的大繁荣之后，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因此根本没有人打电话来要我们投资糖料种植园、铅矿或者近海钻探平台。全球的需求还在继续增长，最终需求超过了供应，而供应量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化。亚洲作为整体成了巨大的购买方；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冷战期间积累起来的多余库存全部变成了现金。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一次典型的转变。原材料的供求关系又出现了偏差，库存正在减少。初级商品会红火好几年，而刚被挤过泡沫的股票则将表现平平。

新的初级商品牛市已经初现端倪了，但是对此有所认识的人极少。

与此极为相仿，20 世纪 80 年代新的股票市场的牛市出现时意识到的人也不多。从 1998 年底我和佩奇出国旅行到 2003 年初期间，初级商品的价格上涨了 80% 以上，而股票价格则大幅度滑落。美国政府、华尔街和媒体都不停地告诉我们，价格并没有上涨，但是大家可以翻到初级商品那一版，看看事实。战争和印制钞票的做法只会确保初级商品繁荣的时间持续得更长。

但是这种繁荣局面也会有尽头。过几年之后，我们还得卖掉手上的初级商品，再反过来购买股票。美林证券公司已经没有初级商品经纪人了，因为这个行业的行情实在过于糟糕。当美林证券公司重新操起初级商品这一行业、CNBC 频道开始报道芝加哥大豆交易场的新闻时，就赶紧把手上的初级商品出空，改买股票。

自从创建罗特席尔德王朝以来，制约市场的规则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其他方面就不能说没有改变了。当我和佩奇出发去周游全球时，我们料想自己的这次旅行将是一次考察变化的旅行。我们确实是想抓住这个时机。在新旧千年交替之际去测量世界的脉搏，这种机会 1 000 年才有一次，下一次机会得等到 1 000 年以后了。当然如果倒数回去 1 000 年，在 1000 年 1 月 1 日，当时的世界上能确知那天意味着新千年来临的人是少之又少的；那时，世界上大多数人还没有使用罗马儒略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历里的元旦出现在不同的月份里。）当时的世界上，穆斯林比基督徒要多得多，穆斯林有他们自己的日历。人数超过穆斯林也超过基督徒的亚洲人对上述这两种历法都不熟悉。在西半球，在天文学方面颇有造诣的玛雅人使用的是所谓的长历法，以 5 200 年作为一个周期来测算人类的历史。我们的公元 1000 年是他们长历法中的 3188 年。根据他们的计算，文明定于公元 2012 年冬至时崩溃，崭新的时代将要来临。（赶紧给自己规划一下吧。）

现在连我们都不用罗马儒略历了。自 1752 年以来，英语国家就不再使用罗马儒略历了，这之前 170 年，格里历（公历）进入了基督教世界，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格里历。如果以史为鉴的话，这个世界很可能不会有公元 3000 年 1 月 1 日那一天。谁知道 1 000 年以后会使用哪种日历？

谁知道那个时候哪种文化会成为强势文化？公元 1000 年时全世界 2.7 亿人中有哪一个会想到在 2000 年时在北美洲（当时谁知道这个北什么洲？）有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当时你了解地球上各种文明的话，你也许会举家迁移到现代拉丁美洲的某个大帝国去，到阿拉伯世界的某个大帝国去，或者到亚洲去。你也许迁移到了非洲，到廷巴克图去了。

上个千年末最大、最繁荣的城市是西班牙的科尔多瓦（Córdoba），最富有的城市是塞维利亚（Seville）。当时这两个城市在文化上都要比拜占庭帝国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影响要大得多。到 10 世纪末的时候，托尔特克人（Toltecs）取代了玛雅人的伟大文明，开始他们对中亚美利加洲 200 年的统治。1 000 年之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过去 13 年中，我花了整整 5 年时间游历世界，只要凭借我亲眼见到的从柏林墙倒塌到世界贸易中心倒塌之间世界所经历的变化，我就可以向你断言，再过 1 000 年，世界将会变得让你我都无法辨认。要想准确地判断世事的变化，就得要有一个超自然的跑表。

在圣马可广场一个富丽堂皇的陈列橱窗里，大家可以看到前威尼斯共和国所有领导人的名字，威尼斯共和国曾经是一个在民主制度下兴旺发达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世界强国，在 19 世纪以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与之相媲美。这些名字列举到《威尼斯宪法》消亡后为止，是拿破仑率领军队于 1797 年开进这个被打败的城邦国并取缔了《威尼斯宪法》。在上一个新旧千年交替之时，威尼斯地位上升，海军力量之强大无人能出其右；威尼斯垄断了地中海的贸易，控制了欧洲与东方的贸易。正是这个城市产生了马可·波罗，为文艺复兴的盛期推波助澜。

我想，如果没有这个橱窗，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当年威尼斯的任何一位领导人。我想许多意大利人也做不到。我可以断言，总有一天，如果不是 400 年之后，那么肯定在下一个新旧千年交替之时，能记得一个美国总统名字的人，哪怕是记得乔治·华盛顿的人都将少之又少，尽管我这样说显得有点不近人情。

人世的荣耀就此过去了。

人世的荣耀可能一去不复返，但是人类将永世长存。

我想起了在卡帕多恰山里凿出来的那些城市，还有在澳大利亚沙漠

库伯佩迪里建造的那些家园，这都是人类创造性和生存能力的实物见证。康沃尔人说的语言也许会消失，盖尔语也许会消失，威尼斯也许会被大海吞没，尽管凶事预言者一再预言世界会毁灭，但是人类绝不会在地球上灭绝。哪怕我们在世上作孽，比如我们造成气温过高或者过低了，我们仍然能够想出自救的办法。我们会往下挖掘，直到在大山下挖出地下河水，挖出地下清泉。世事变幻是阻挡不住的，但是人类应对变化的能力之强绝不亚于大自然的力量。

我到达迪莫波利斯时感受到的那种内心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一回到纽约就有一种朦朦胧胧的不安感，我只能把这种感觉称为产后忧郁症，也许是环球旅行之后的失望感，我得指出，在上一次旅行之后我也有过这种感觉。

一年以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开车从泰姬陵去加尔各答。两年以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准备开车出发游历非洲的 32 个国家。现在在阔别三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自己在纽约的家中，试着回想我是从哪个公司买的取暖炉，水道工的电话号码是什么？更糟糕的，我什么盼头都没有了——早上醒来后，我无处可去，我没有必要到任何地方去。过去三年中的每一天，我和佩奇一醒来就知道前面有惊险的事情在等着我们。我们必须起床，因为前面存在着挑战和威胁；我们总是有事情可做，总是有令人激动的事情在那里等着我们。可是现在，我不需要到任何地方去了。

一跨出房门我就意识到，必须简化我的生活。我要把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清理出去。我再也不想买任何东西了。对自己的日程安排也得小心谨慎了——在我们去周游世界之前，我的日程安排总是满满的：不是晚宴就是午餐会，不是出差、演讲就是主持项目，要不就是聚会或者接受采访。我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了。过去三年我没有日程安排过得也是好好的。过去三年里，我没有在日历上填过一项计划要做的事情。但是就像非洲的雨天无法躲避一样，我一回到家，日程就差不多排满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你要重蹈覆辙，如果你回家的第一天就恢复离家时的那种境况，那么也许从一开始你就不必离家去周游世界。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试图适应在家里过日子的生活，同时也一直在问

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听人说，丧父或者丧母会使子女立即感到自己年长了一辈。我自问：现在该是安居乐业的时候了吧？或者在我真正领悟到人生苦短的悲哀之前，我还需要再去游历一番吗？

安哥拉和东帝汶那里的战火已经平息了。我知道那些地方的人民正取得巨大的成功。上海很快会成为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城市……我应该去那儿吗？或者去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缅甸？这些国家在闭关锁国几十年后现在都纷纷开放了。或者去玻利维亚和南美洲西部的新开发区？去西班牙南部的大西洋海岸？花几个月时间开车穿越巴西、印度或者中国？

回想我在那些地方的日子，看看报纸的报道，我真想到所有这些地方去走一遭。

而且我知道，这次不管我们去哪里，我和佩奇将不再是二人行，我们将有儿女同行。我们现在要开始一种新的冒险生涯了：回到家里8个月后，等到所有的疫苗从我们的血液系统清除出去之后，我们要生儿育女了。

在我遇见佩奇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要孩子的念头。我一直明白，抚养一个孩子会需要很多时间、精力、关心、金钱和爱心——哪怕你的抚养方法不对头。多年来我一直不想要孩子。记得在我12岁时，父亲拒绝了一次提升的机会，因为接受新职位就意味着要我们搬家。父亲从来没有明说过，但是他话里的意思我们还是听出来了：如果他接受了新职位，孩子们的生活就会动荡不安；如果没有我们，他就不会放弃这次提升机会。

我父亲因为有了孩子而牺牲了经历冒险生活的机会，而我则为了尽可能多地经历冒险生活而牺牲了生儿育女的乐趣。周游世界是一个美梦，大多数人都是在生儿育女之后才去实现这个美梦的。我越过了成长过程的这个阶段，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不由自问：如果有小孩的话，我的游历生活是否会更丰富一些呢？我不知道父亲对此会有何种感想。一知道佩奇怀孕了，我脑海里就闪出一个念头：我从来就没有问过父亲，当父亲是怎么一回事？

我一生中所有的冒险经历都无法跟这一次相提并论。我的孩子将向我展示一个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世界。如果说当父亲能丰富一个人游历

的体验,那么我敢肯定,一个人的游历同样能丰富当父亲的体验。我想起了我周游世界期间得到的所有收获,我现在可以把这些收获统统传授给我们刚降临世界的女儿。我恨不得马上就能教她开车、看地图,把我父亲教会我的技能全部传授给我女儿。我已经给女儿买了一本世界地图和一个地球仪。女儿学会英语之后,我们首先要教她学什么语言?要学中国的某种方言吗?还是学西班牙语?

我想到了所有我不曾到过的地方——巴西内地、印度南部、厄立特里亚、伊朗、以色列。下一次周游世界时,我会让女儿去看一看这些地方和其他一些地方。佩奇一直劝说我搬到上海或者西班牙的西南部去住,去埃斯特角或科恰班巴待上一段时间。或许我们的孩子会在其中的某一个地方成长。或者也许我会在阿拉巴马州沃里尔河我拥有的土地上盖一栋房子,坐在摇椅上,唱唱《老人河》,在我父亲生儿育女的土地上抚养我自己的子女,这一切又有谁能说得准呢?我猜想,我父亲会对此表示赞许——以他的智慧,他肯定早就猜到我会走这一步的。

旅程时间表

冰 岛	1998 年 12 月 29 日—1999 年 1 月 12 日
英 国	1999 年 1 月 12 日—20 日
爱尔兰	1999 年 1 月 20 日—24 日
英 国	1999 年 1 月 24 日—30 日
法 国	1999 年 1 月 30 日
比利时	1999 年 1 月 31 日
德 国	1999 年 1 月 31 日—2 月 9 日
奥地利	1999 年 2 月 9 日—11 日
匈牙利	1999 年 2 月 11 日—15 日
南斯拉夫	1999 年 2 月 15 日—16 日
保加利亚	1999 年 2 月 16 日
土耳其	1999 年 2 月 16 日—23 日
格鲁吉亚	1999 年 2 月 23 日—26 日
阿塞拜疆	1999 年 2 月 26 日—3 月 4 日
（里海）	1999 年 3 月 4 日—5 日
土库曼斯坦	1999 年 3 月 5 日—11 日
乌兹别克斯坦	1999 年 3 月 11 日—20 日
吉尔吉斯斯坦	1999 年 3 月 20 日—21 日
哈萨克斯坦	1999 年 3 月 21 日—4 月 1 日
中 国	1999 年 4 月 1 日—5 月 17 日
（黄海）	1999 年 5 月 17 日—18 日
韩 国	1999 年 5 月 18 日—31 日
（朝鲜海峡）	1999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

旅程
时间
表

日 本	1999 年 6 月 1 日--7 月 2 日
(日本海	1999 年 7 月 2 日--4 日)
俄罗斯	1999 年 7 月 4 日--28 日
蒙 古	1999 年 7 月 28 日--8 月 3 日
俄罗斯	1999 年 8 月 3 日--20 日
哈萨克斯坦	1999 年 8 月 20 日
俄罗斯	1999 年 8 月 20 日--9 月 4 日
白俄罗斯	1999 年 9 月 4 日--6 日
立陶宛	1999 年 9 月 6 日--7 日
俄罗斯	1999 年 9 月 7 日--8 日
立陶宛	1999 年 9 月 8 日
拉脱维亚	1999 年 9 月 8 日--10 日
爱沙尼亚	1999 年 9 月 10 日--11 日
俄罗斯	1999 年 9 月 11 日--15 日
芬 兰	1999 年 9 月 15 日--19 日
瑞 典	1999 年 9 月 19 日--29 日
挪 威	1999 年 9 月 29 日--10 月 4 日
瑞 典	1999 年 10 月 4 日--5 日
丹 麦	1999 年 10 月 5 日--11 日
德 国	1999 年 10 月 11 日--28 日
瑞 士	1999 年 10 月 28 日
意大利	1999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4 日
梵蒂冈	1999 年 11 月 4 日
意大利	1999 年 11 月 4 日--8 日
圣马力诺	1999 年 11 月 8 日
意大利	1999 年 11 月 8 日--11 日
斯洛文尼亚	1999 年 11 月 11 日
奥地利	1999 年 11 月 11 日--13 日
斯洛伐克	1999 年 11 月 13 日
捷 克	1999 年 11 月 13 日--20 日

德 国	1999 年 11 月 20 日—21 日
列支敦士登	1999 年 11 月 21 日—22 日
瑞 士	1999 年 11 月 22 日—24 日
意大利	1999 年 11 月 24 日—25 日
法 国	1999 年 11 月 25 日
摩纳哥	1999 年 11 月 25 日—27 日
法 国	1999 年 11 月 27 日—29 日
西班牙	1999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1 日
安道尔	1999 年 12 月 1 日—2 日
法 国	1999 年 12 月 2 日—12 日
卢森堡	1999 年 12 月 12 日—14 日
比利时	1999 年 12 月 14 日
荷 兰	1999 年 12 月 14 日—17 日
比利时	1999 年 12 月 17 日—18 日
英 国	1999 年 12 月 18 日—21 日
爱尔兰	1999 年 12 月 21 日—24 日
英 国	1999 年 12 月 24 日—2000 年 1 月 25 日
比利时	2000 年 1 月 25 日—2 月 2 日
法 国	2000 年 2 月 2 日—5 日
西班牙	2000 年 2 月 5 日—10 日
葡萄牙	2000 年 2 月 10 日—13 日
西班牙	2000 年 2 月 13 日—18 日
直布罗陀	2000 年 2 月 18 日—20 日
西班牙	2000 年 2 月 20 日
摩洛哥	2000 年 2 月 20 日—3 月 5 日
西撒哈拉	2000 年 3 月 5 日—11 日
毛里塔尼亚	2000 年 3 月 11 日—21 日
塞内加尔	2000 年 3 月 21 日—25 日
冈比亚	2000 年 3 月 25 日—28 日
塞内加尔	2000 年 3 月 28 日—29 日

马 里	2000 年 3 月 29 日—4 月 7 日
布基纳法索	2000 年 4 月 7 日—9 日
象牙海岸	2000 年 4 月 9 日—16 日
加 纳	2000 年 4 月 16 日—24 日
多 哥	2000 年 4 月 24 日—25 日
贝 宁	2000 年 4 月 25 日—27 日
尼日利亚	2000 年 4 月 27 日—5 月 3 日
喀麦隆	2000 年 5 月 3 日—10 日
赤道几内亚	2000 年 5 月 10 日
加 蓬	2000 年 5 月 10 日—24 日
（大西洋	2000 年 5 月 24 日—25 日）
刚果共和国	2000 年 5 月 25 日—28 日
安哥拉	2000 年 5 月 28 日—6 月 8 日
纳米比亚	2000 年 6 月 8 日—14 日
博茨瓦纳	2000 年 6 月 14 日
津巴布韦	2000 年 6 月 14 日—15 日
赞比亚	2000 年 6 月 15 日
津巴布韦	2000 年 6 月 15 日—16 日
博茨瓦纳	2000 年 6 月 16 日—18 日
纳米比亚	2000 年 6 月 18 日—22 日
南 非	2000 年 6 月 22 日—7 月 2 日
莱索托	2000 年 7 月 2 日—3 日
南 非	2000 年 7 月 3 日—8 日
马达加斯加	2000 年 7 月 8 日—11 日
南 非	2000 年 7 月 11 日—18 日
斯威士兰	2000 年 7 月 18 日—21 日
莫桑比克	2000 年 7 月 21 日—30 日
马拉维	2000 年 7 月 30 日—8 月 5 日
坦桑尼亚	2000 年 8 月 5 日—30 日
肯尼亚	2000 年 8 月 30 日—9 月 10 日

埃塞俄比亚	2000年9月10日—27日
苏丹	2000年9月27日—10月20日
(尼罗河	2000年10月20日—23日)
埃及	2000年10月23日—11月10日
(红海	2000年11月10日—11日)
沙特阿拉伯	2000年11月11日—25日
卡塔尔	2000年11月25日—28日
沙特阿拉伯	2000年11月28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00年11月28日—12月5日
伊朗	2000年12月5日—6日
巴林	2000年12月6日—7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00年12月7日—8日
阿曼	2000年12月8日—23日
(阿曼湾	2000年12月23日—27日)
巴基斯坦	2000年12月27日—2001年1月9日
印度	2001年1月9日—2月22日
孟加拉国	2001年2月22日—28日
印度	2001年2月28日—3月7日
缅甸	2001年3月7日—24日
泰国	2001年3月24日—26日
马来西亚	2001年3月26日—30日
新加坡	2001年3月30日—4月10日
(马六甲海峡	2001年4月10日—12日)
印度尼西亚	2001年4月12日—28日
东帝汶	2001年4月28日—29日
澳大利亚	2001年4月29日—6月4日
瓦努阿图	2001年6月4日—6日
新西兰	2001年6月6日—21日
法属波利尼西亚	2001年6月21日—29日
智利	2001年6月29日—7月13日

阿根廷	2001年7月13日—20日
智 利	2001年7月20日
阿根廷	2001年7月20日—22日
智 利	2001年7月22日—23日
阿根廷	2001年7月23日—8月10日
乌拉圭	2001年8月10日—13日
巴 西	2001年8月13日—17日
阿根廷	2001年8月17日
巴拉圭	2001年8月17日—21日
阿根廷	2001年8月21日—23日
玻利维亚	2001年8月23日—9月6日
秘 鲁	2001年9月6日—23日
厄瓜多尔	2001年9月23日—10月3日
哥伦比亚	2001年10月3日—4日
委内瑞拉	2001年10月4日—7日
巴拿马	2001年10月7日—10日
哥斯达黎加	2001年10月10日—14日
尼加拉瓜	2001年10月14日—17日
洪都拉斯	2001年10月17日—20日
萨尔瓦多	2001年10月20日—23日
危地马拉	2001年10月23日—27日
伯里兹	2001年10月27日—29日
墨西哥	2001年10月29日—11月13日
美 国	2001年11月13日—20日
加拿大	2001年11月20日—28日
美 国	2001年11月28日—12月2日
加拿大	2001年12月2日—8日
美 国	2001年12月8日—2002年1月5日



我们比较了到过的116个国家后，对中国情有独钟。我已三次开车穿越中国，每次玩得都十分开心。我很想定居上海。上海正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的城市。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但21世纪将属于中国。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可以感受到创业精神。中国正在走向世界。

……这本书里，既有历险的经历，又有爱情故事，还有对第三个千年之交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口状况的分析。我讲述了今后如何投资，在哪里投资，还讨论了投资家如何思考投资问题，如何决定投资结构以及如何决策等问题。

——吉姆·罗杰斯



ISBN 7-208-05152-6



9 787208 051522 >

定价 32.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